

精神分析研究

第四辑



JĪNG SHÉN FĒN XĪ YÁN JIŪ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刊 1897

精神分析研究

第四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分析研究. 第4辑/霍大同主编.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798-7

I. ①精… II. ①霍… III. ①精神分析—研究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3510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精神分析研究

第四辑

霍大同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798-7

2018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1/4

定价: 58.00 元

主编

霍大同 谷建岭

副主编

居飞 秦伟 严和来 尹立 郑禹

编委

蔡婷婷 姜启壮 姜余 李锋 李娜 刘瑾 罗正杰 潘恒

石岩 陶杏华 许丹 杨春强 张涛 赵旻

本期执行编委

谷建岭 刘瑾 金伟闯 张沙沙

目 录

纪念米歇尔·吉布尔 (Michel Guibal) 先生专题

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高级研讨班讲座

.....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1)
第一讲 介绍.....	(3)
第二讲 记忆.....	(8)
第三讲 重复.....	(13)
第四讲 爱与恨.....	(17)
第五讲 转移.....	(23)
第六讲 压抑.....	(28)
第七讲 阉割.....	(34)
第八讲 原始场景.....	(41)
第九讲 精神分析的局限.....	(47)
第十讲 再见.....	(53)
后记.....	(57)

“创伤理论” 专题讲座

.....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59)
第一讲.....	(61)
第二讲.....	(65)

第三讲·····	(70)
第四讲·····	(74)
第五讲·····	(79)
第六讲·····	(87)
第七讲·····	(95)
第八讲·····	(101)
第九讲·····	(108)
第十讲·····	(116)
第十一讲·····	(120)
第十二讲·····	(124)
第十三讲·····	(127)
何为精神分析? ·····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139)
黑手党母亲·····	米歇尔·吉布尔 / 著 佚名 / 译 (146)
一例幻听个案的分析治疗	
·····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151)
开场白·····	(153)
第一讲·····	(157)
第二讲·····	(166)
第三讲·····	(174)
第四讲·····	(181)
第五讲·····	(188)
第六讲·····	(195)
第七讲·····	(202)
拉康与孟子·····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209)

第一讲 辞说	(211)
第二讲 男人和女人	(221)
第三讲 反对语言学家	(228)
第四讲 反对语言学家 (续)	(236)
第五讲 天下之言性也	(245)
第六讲 冲动：性与死	(257)
第七讲 从威廉·海希到临水夫人	(268)
第八讲 临水夫人陈靖姑	(278)
第九讲 声音的知识	(285)
第十讲 Ludus	(294)
第十一讲 结语	(302)

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高级研讨班讲座*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秦伟等 / 记录整理

陶杏华、赵旻 / 编校

* 原载于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内部刊物《精神分析笔记》第二卷第三期，主编：霍大同，副主编：秦伟、张晶艳，执行编辑：郑禹、尹立、严和来。

第一讲 介绍*

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接受的是医学训练，主要是精神病学的训练，我在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作为一名住院医师到精神病院工作。当时我们的主任开枪自杀，这件事对所有的人都影响极大，大家都极为震惊。于是，我向精神分析求教，为什么他要自杀？为什么我们被震惊？是个人的痛苦使我去接受精神分析，由此我解除了痛苦，并爱上了精神分析，最后成了一名精神分析家。

现在讲一下精神分析与医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的关系。

精神分析是由一个精神病科和神经科医生创立的，他就是弗洛伊德。他研究神经科学，之后遇到了癔症。作为一种神经症、一种综合症，癔症有许多形式。医生们试图找到其器官原因，但都未成功。医生有一种自恋的倾向：当找到原因时，大家十分高兴，当找不到原因时，大家感到十分痛苦。医生对病人很好，却找不到原因，于是只好想各种各样的方法。

弗洛伊德当时在维也纳，听说在法国南锡有人使用催眠疗法治疗癔症。催眠有两个作用：一是找原因，二是它是一种治疗方式。比起其它方法，催眠有一个优越性，即在睡眠中不知不觉地治疗，治疗过程没有什么痛苦。弗洛伊德觉得这更为人道，所以去学习。

西方文化的传统是身心分离的传统。在癔症中人们看到身心的分裂，身体症状取代了心理症状。

* 时间：2000年8月11日晚7:00—9:30。

癔症是躯体症状，是在精神症状中占有主导地位躯体症状。

中国文化讲身心统一，但此统一性遇到了西方人的问题。

弗洛伊德看到了这个在精神中的躯体症状，因为癔症病人是在睡眠中说话的——不是身体在讲，而是精神在讲。

这就产生了一个概念：躯体转换。有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引起躯体问题，例如肢体瘫痪而找不到神经系统的问题。又例如一个人头痛，医生检查了，说一切都正常。那就是心理出了问题。如果进行催眠的话，患者将讲话，不是讲头痛，而是讲让他觉得头痛的原因。

在催眠下患者讲的东西是他从来未曾给任何人讲的，甚至是从来不曾意识到的——童年回忆。弗洛伊德发现，身体所表达的症状是童年经验的扭曲表达——某个记忆，但不是一个一般的记忆，而躯体症状则代表了这个记忆。这个记忆不可能被说出来，只能以躯体症状的方式讲出来。这就是弗洛伊德通过进行催眠实践而对于癔症的发现。

由此，弗洛伊德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概念：

转换——精神到躯体（的转换）

压抑——不能说出来，所以转换

弗洛伊德为此发现十分高兴。他把手放在病人前额上进行催眠，然后让对方讲童年历史。但另一方面，病人醒来以后症状转移了，例如从头转到手、手转到足。结果，讲出了原因却未治好，弗洛伊德为此又不高兴了。

弗洛伊德不高兴，他不满足、不停留，而是继续思考。后来一个女病人对弗洛伊德帮助很大。她有一次说：“别碰我，只听我说！”对于这样的一句话，一般医生不会在意。弗洛伊德却在意，他听从了她的话，开始按她的要求去倾听，在清醒状态下进行治疗。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汉学家、作家，即《费加罗报》的专栏作者阿兰伯·赫费特，写过一本书名叫《当中国醒来的时候》，意思是中国醒来之后不得了。对于精神分析也是如此，当病人醒来的时候也是不得了——这是关键的时刻！

阿兰伯·赫费特的意思是“中国现在正在睡觉”。但这几天我在北京和成都的生活中发现，中国一直醒着，中国是一个大工地，特别是四川大学。工地会睡着吗？所以不能说中国是典型的癔症。不过也许由于精神分析的引入，中国可以讲述她的童年。

阿兰伯·赫费特先生已经长眠了，我们也可以回来讲我们的精神分析了。

这个女病人讲的仍然是童年的故事，与催眠的情况类似。但是差别在于，她现在讲得十分吃力和痛苦。这一痛苦，弗洛伊德认为是必须的。因为这不同于躯体的痛苦，它是精神性的，对于解除症状而言是必须的。

在与弗洛伊德工作中，女病人突然讲了两件（她从未记起过的）事情，都是童年时的性的诱惑，这让弗洛伊德十分震惊，同时也让患者十分震惊。诱惑——她受到性的诱惑，但不是行动——导致了她的症状。

作为受过医学教育的医生，弗洛伊德自然地将此加以推广，提出幼年创伤理论。

这就牵扯到回忆。回忆可以是真实的、已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幻觉的回忆。

女病人相信诱惑是真实发生过的，所以弗洛伊德相信，这种回忆意味着她经受了实际的创伤经验：

童年时的性场景（原始场景）：孩子看到父母做爱。

在幼年期间，孩子可能更多地关注吃、玩等，而性场景的出现扰乱了孩子的心理发展。

讨 论

听众：是不是所有的癔症病人都经历了原始场景？

吉布尔（以下简称“吉”）：下次再讲这一问题。弗洛伊德提出性的问题，这在当时引起了公愤，大家认为是丑闻。在认识论上，医生们倾向于一种病对应于一种原因，所以弗洛伊德通过一个个案而相信这个

唯一的原因能够解释所有的症状。不过后来，弗洛伊德有变化，承认存在个体差异。

听众：能不能有别的创伤？

吉：弗洛伊德后来遇到了一个三、四十岁的女病人，她不断咳嗽，所有医生对此均无办法，所以这不是躯体的原因。弗洛伊德对她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她突然回忆起，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她十分痛苦，守孝六个月。此经验已经被遗忘。当她讲出来之后症状就消失了。

于是弗洛伊德又对此加以推广，说女儿爱父亲，因父亲的死亡而受到极大的创伤，进而说女儿爱父亲，儿子爱母亲。读者也会这样做出一般的推广和夸大。

以上说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一步。

当精神分析家接触到一个新病人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崭新的人、崭新的对象，他忘记了以前所读过的、所见过的一切，一切都重新开始，因为个体的独特性是不可比较的。这和医生正好相反，医生是试图一般化一切，将个体归入某个分类系统之中。

听众：忘掉了以前的经验如何帮助病人呢？

吉：让他讲述他的历史，由此发现被压抑的东西，并解除压抑，这类似于浪漫的奇遇。

听众：你的立场是什么？

吉：我一只脚站在古典的一边，一只脚站在现代的一边。之所以说是古典的，是因为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说是现代的，是因为比起那些年纪更大的精神分析家而言，我还较年轻。我感到很舒服，没有什么冲突，因为中国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我来中国，本身就说明我是开放的，否则我就和别的分析家一样，去蓝色海岸度假了。

精神分析容许一种转换，从过去到现在的转换，这并不痛苦。笛卡尔的传统是身心分离的传统，这在法国占主导地位。

中国可能不一样。

精神分析派别很多，这是好事，只是大家要能够相互交流。这就好

像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它们都有许多流派。

心理咨询是给人以建议，而精神分析这一学科则是接受了病人的建议才出现的——“不要碰我，只听我说！”弗洛伊德假设了病人有能力知道并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心理咨询却假设病人没有这一能力。弗洛伊德受了很好的教育，本应给人以建议，但是他的天才却使他放弃了这些建议，而追随病人的建议。

第二讲 记忆*

你们上次听我讲，也许没有抓住什么东西，所以我担心大家不来了，特别是今天雨又大，是很好的借口。不过大家都来了。在一个与西方文化差异甚大的中国，人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表明大家对西方文化感兴趣。

还是从弗洛伊德讲起。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了，弗洛伊德悲痛得影响了工作，做了许多梦，于是他开始分析自己，进而写了《释梦》，成为了精神分析的开创者。

弗洛伊德自己很痛苦，通过梦，他发现了此前完全遗忘的童年记忆。如同癔症病人的自由联想一样，他记下了梦，然后想到什么记什么，反复此过程，发现了许多遗忘的童年记忆。

他通过梦发现童年的经验，并写了一本书，是写给广大读者的，让专家之外的读者也来阅读，特别是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这在维也纳医学界引起轰动，成了一件丑闻。弗洛伊德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父亲的去世使他很痛苦，他通过自由联想而有了一个缓解。这一方法也正是他治疗癔症的方法。

癔症最大的特征，是记忆被遗忘但是仍然存在于内心深处，表现在躯体症状上。由自由联想而唤起记忆，从而能够治疗癔症症状。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童年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我们的研讨班是在哲学系的背景下举办的，而弗洛伊德当时是在医学院背景下进行工作的。医生为了治疗，必须找到病因。弗洛伊德发现的方法就是自由联想——回忆过去，这一做法将问题一般化了——主体

* 时间：2000年8月14日晚7：00—9：30。

存在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主体存在本身是怎么一回事？父母、兄弟、姊妹是怎样的？这都和他生活在其中的、他所属于的那个群体有关。例如头痛，引出了主体历史的存在与其群体的关系。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通过自己释梦（也许弗洛伊德患有强迫症）而得到了缓解。

弗洛伊德属于犹太人共同体，后者又处在德奥文化中。《释梦》出版之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这也与反犹的背景有关。因此癔症回忆与此共同体联在一起。头痛可能与共同体的政治、历史联在一起。也许中国人的头痛与中国文化、政治、历史联在一起。因为人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文化中构造的。

此时我想起一个成都人，是女的，叫张蓉，她在英国，写了一本书叫《鸿》。她在书中讲述了父母、祖父母的历史，类似于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的讲述，尽管二人都是在没有精神分析家的帮助下讲述。请不要认为这很容易，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发现回忆是困难的，并且是痛苦的。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提议的回忆，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共同体的回忆。

弗洛伊德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把疾病转成了个人的、社会的和存在的历史。精神病学没有办法，但是不得不找到一个方法。例如一个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警察就将他抓起来，要么送进监狱，要么送进精神病院。这样精神病院的医生们起了保证社会稳定的作用。

精神分析不回应社会的这个需要，而把这一工作留给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只让患者讲，给患者一个言说的权利，这是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差异。张蓉讲母亲的故事，通过她的讲述，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弗洛伊德，还有别的人也发现症状与文化、政治和宗教是相关的。所以，弗洛伊德要求患者进行充分的联想，讲述历史，以达到身心的健康。

在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中有忏悔的传统，但这不是自由联想，而是说如何犯了原罪，神甫予以原谅。曾有一个时期，神甫不原谅，而是起诉此人及其家人。所以在弗洛伊德之前，人就知道人的历史与家庭、与共同体的历史是联在一起的。为了了解此人的历史，可以查档案，询

问其周围的人——这是社会学调查。精神分析不这样做，它只采用躺椅，只是让他讲述，以此了解此人的历史；同时让此人也了解、也懂得自己的历史。

作为医生，弗洛伊德在患者讲述之后绝不转述于他人，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秘密。这一点很重要。我的朋友在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因为拒绝政府对于患者的调查而入狱。

精神分析就是让患者讲述其回忆，大多数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这是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并用于癔症患者身上。霍大同经常有一个口误，混淆两个法语单词：Hystérique, Historique。弗洛伊德在Hystérique那里发现了Historique（霍大同先生补充：我有一个历史学训练的背景，所以在精神分析家的面孔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

对于霍大同自己而言，解释是一种快乐，他通过这个语误而发现了问题，但这与你们无关，所以你们不感到快乐。

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癔症患者，在意识中认识不到自己被压抑的历史，但是其身体认识到了。治疗的任务就是回忆，把身体所认识到的历史转成意识中的历史。

讨 论

听众：如何区别真实的与虚幻的记忆？

吉：弗洛伊德刚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果回忆都是真实的，那精神分析就太漂亮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弗洛伊德发现了患者创造出来的记忆，试图区别真的记忆与假的记忆，他将后者称为屏蔽记忆（Souvenirs Ecrans）；因为癔症患者很难讲述真实记忆，所以以假的屏蔽记忆抵挡了对真实记忆的重忆。在精神分析引入法国很久之后，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才认识到二者同样的重要，都是积极的，对二者进行区别不是精神分析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家既不满足于真实记忆也不满足于虚幻记忆。

听众：(是否要)区别好的与不好的记忆，前者记得住而后者记不住？

吉：分析家不回答、不判断一个记忆是好的或者坏的、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他只是说：“说出来到你脑海中的东西。”

你似乎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精神分析则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达到的状态也不一样。

弗洛伊德与张蓉有一个小小的差别，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个性别差别是重要的。

到弗洛伊德那里的人愿意讲，至少愿意讲他们遇到的痛苦，而弗洛伊德则询问是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时候等等，于是病人就开始讲述了。

精神分析家也进入医院工作，但情况有些不一样。他们跟医生谈，医生愿意跟他们谈；他们跟护士谈，护士愿意跟他们谈；只要患者愿意，他们也跟患者谈。

在北京，我跟孤独症孩子的父母谈，这些父母非常痛苦。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从未跟任何人谈过。我只是听，而这缓解了他们的痛苦，间接地帮助孩子。

同样，精神分析家在精神病院里也是这样间接地帮助了病人。

听众：统计数据表明精神分析的疗效如何？

吉：精神分析家不是统计学家，所以不统计疗效。因为分析家接受了分析，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精神分析的有效性。这与精神病学不一样，精神病医生们并未服用病人的药。

听众：讲述痛苦的经验，再次回忆痛苦，这种方式真的有效吗？

吉：在法文中，“打开”（ouvrir）等于讲话，即意识到未知的东西，就如发掘三星堆。当然会有痛苦，正视痛苦之后逐渐地得以消除痛苦。如果伤口已经好了，就不能打开，只能面对伤口叙述其历史；如果能够打开，就表明里面还有脓，需要重新处理。

一个人来找精神分析家，是因为有一个痛苦折磨着他/她，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自己痛苦，从而需要说出来，以达到不痛苦的目的。

在古法语中，有一个成语——请你忍受我讲——意思是请你忍受痛

苦而听我讲，因为讲话本身打开了痛苦经验，而打开意味着消除。

在精神病院中，只要病人愿意说，分析家就听，包括集体地说。当然，分析家也充分认识到精神分析的局限性。

我从不建议一个人吃药。如果允许病人讲述，他就会回忆童年。

记日记是自我分析，如弗洛伊德《释梦》一样。

第三讲 重复*

弗洛伊德用了一个词，它在法语和德语中都很流行和重要，它描述了癔症病人的一个现象。弗洛伊德在听了大量的病人的话之后很疲倦，于是想找一个工具解除疲倦，并与同事交流——任何工作都需要工具，一个概念、一个单词，以记录病人的讲述并与人交流。

这个单词就是“重复”。

弗洛伊德以此解释他遇到的现象，并与精神分析家、精神病学家交流。他由此建立了一个大厦。大厦是保护大家的，以抵御风雨、生育孩子等等；弗洛伊德的大厦保护人类以抵御疾病。

我是下午在成都的大街上骑车想到大厦这个隐喻的。大厦里有若干房间，人们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装饰，根据各自人格的不同而定。弗洛伊德的大厦也一样，一个人来了，要求红色，弗洛伊德就给予红色；另一个人来了，要求绿色，弗洛伊德就给予绿色。

监狱与大厦不一样，犯人不能按自己的需要装饰房间。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监狱，它允许人们改变和装饰。

弗洛伊德先是发现真/假记忆，后来遇到新的问题：病人能够回忆历史，但却反复地回忆同一个事件，不断地重复同一件事。这个人在分析中讲了几个月的话，以前病人感觉很痛苦，而现在弗洛伊德发现病人感觉快乐，其中有性的意味；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也发现这样的快乐。而这样的情形成了丑闻，这在维也纳引起了公愤。

人们不说“快乐”一词，哪怕是听莫扎特的歌剧也不谈快乐，因为

* 时间：2000年8月15日晚7:00—9:30。

它有性的色彩，所以弗洛伊德这样说之后，引起了大家的指责。

但是，这样的反复讲述不能消除症状，病人不满意，弗洛伊德也不满意——因为既然有快乐，又重复，其中一定有某个东西决定着这种重复。

例如一个女孩，她爷爷希望她成为钢琴家，她生活中只有学习（钢琴），但她不喜欢，后来就不学了。过了15、20年，某种原因使她很痛苦而进入分析。几个月之后，她发现，钢琴仍然让她很快乐，只是因为曾受到强迫而不喜欢。这样问题并未解决，因为她自己仍然在重复。弗洛伊德最终发现，某个不快乐的东西使她重复。弗洛伊德感到震惊，经验使弗洛伊德相信是不快乐的东西使人重复。

当然我们可以换一个男孩、一个妇女、把钢琴换成是中国书法等等。（分析者）通过分析找到了弹钢琴的快乐，完全是为了自己的高兴。按理，她还应该找一个也会弹钢琴的男孩来一起弹。但是相反，她完全不去找这样的人，而是找一个与爷爷一样的人，后者始终说你如何如何的不对。这就是重复，重复童年的不愉快的痛苦经验。

另外的一种可能是，她找一个会弹钢琴的丈夫，她则扮演爷爷的角色，指责丈夫如何如何的不好。

在此之前，弗洛伊德建了一个大厦，说里面的人全是快乐的。现在的关键在于不快乐。现在弗洛伊德只能说“超越快乐原则”，快乐之外有一个东西在反复地重复。

在弗洛伊德思想的早、中期，他说人们忍受痛苦，而分析使大家快乐；然而现在遇到了病人重复痛苦。为了说明这两类现象，弗洛伊德称前者为生冲动，后者为死冲动。

有人将冲动（pulsion）译为本能（instinct），这是不对的。本能主要用于动物性的需要，如吃、繁殖，是自然的。冲动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弗洛伊德在早、中期讲生冲动（éros），后来病人在重复中找到了快乐但并未消除症状——于是有了死冲动。

由死冲动引出了话语。

弗洛伊德仍然认为，生冲动与动物本能有一种联结，但是死冲动完

全是文化的。动物适者生存，无死冲动。所以，死冲动完全是文化的。至于话语，那更是文化的了。

这里要补充、确定一点：弗洛伊德是在家中接待病人的，是在家中构造理论的。后来的精神分析家到了精神病院，才在精神病院构造理论。

讨 论

听众：在哪里重复？重复偏重于行为还是言语？

吉：到处都是重复。

听众：比如婚姻问题，同一模式的重复；又如父亲虐待母亲，女儿找的丈夫如父亲。

吉：这两个例子很好。行为可以传递——通过认同：母亲形象以认同形式传递给女儿。弗洛伊德提出重复和认同这两个概念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

言语的重复可能终止行为上的重复。

重复与转移有某种关系。

在分析家面前，重复当然是转移，由此打开封闭的那个东西，从而终止现实中的重复。在现实中，重复指责将导致丈夫离开，在分析中，重复指责不会导致分析家的离开，从而最终解决问题。

认同是传递的前提。如果无认同，则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后者不认同于人。

认同还发生于分析中，把分析家当作爷爷。分析家不得不扮演爷爷的角色，但是最终要让病人知道，分析家就是分析家，而不是爷爷。

当然，我之所以举这样的一个假设的例子，是因为我是男的，在引诱在座的女士们。如果我是女的，情况会不一样，会去引诱男士们。我在此讲精神分析以引诱女士、男士、所有的人。

从不快乐中找快乐，表面上“快乐”、“生冲动”与“不快乐”、“死冲动”是分开的，但是弗洛伊德不像其他的西方思想家，他认为这两方

面是不可分的，就像中国的太极图。

两个文学家 Sacher-Masoch（马索克）和 Sade（萨德），描述了受虐（Masochism）与施虐（Sadisme）的现象，这两种现象从而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都是从痛苦中找到快乐的例子。

在社会中经常有这样的对子。法国人习惯上认为夫妻二人过了新奇阶段而不分开的，都是有 M-S 关系，不过，这不是精神分析家要说的。新奇感消失之后为什么还能在一起——其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此即 M-S。

按照一般人的思路，生与死是分开的。弗洛伊德则认为生本身是走向死亡。拉康说，死冲动是符号性的，与语言联在一起；死冲动推动言语。如果有普遍性的东西，那就是死亡。

是重复概念让我们今晚说了这么多的东西，是痛苦把我们连在一起。

每个人，包括精神分析家，都有自杀的倾向。在法国，人们认为，如果讲了就不会做。所以，如果有人分析期间自杀了，就说明精神分析家未让病人充分地讲述，从而自杀。

有病人阅读了弗洛伊德的书而在分析中讲重复这一概念，弗洛伊德将之看成抵抗。如果分析家在分析中总是想到重复这一概念，也是抵抗。

解释就是翻译、泄露和背叛。

印象就是解释。

在治疗中，病人会出现语误，之后马上说，“这不是我想说的”。这是一个背叛、一个泄露、一个解释，精神分析由此而得以可能。梦也是这样，泄露了无意识的秘密。

我的这十次讲座也是展示、解释、翻译、泄露和背叛，所以我不专门讲解释。

听众：动物也有自杀倾向？

吉：如鲸冲到海岸？但是这是不是自杀？动物学家说，鲸有符号交流，拉康等人研究工作表明，符号与能指是不一样的。这一区别构成了动物与人的区别。

西方学术界存在一种拟人化的倾向，不管是动物，还是上帝、神。

第四讲 爱与恨*

这两个词在法语中很通俗，我想在中文中也一样。我想说明，它们如何变成了精神分析的概念。精神分析家与大学教授不同，后者之所以有工资，是因为建构理论，而前者之所以有收入是因为倾听病人如何言说——他也许晚上会写点什么，也许会打点网球，无论如何都不是以建构理论为己任的。

精神分析家的本质工作是倾听病人。这里所谓的病人可能真的有病，可能只是痛苦，一般而言更可能是抱怨。他们向父母、朋友、许多别的人诉说他们的抱怨，到了精神分析家这里，他们也继续诉说他们的抱怨。

我喜欢搞理论，但是我只是讲，我不写书。为了今晚上的讲座，我在成都市区骑车到处跑，有时坐一坐，有人来给我讲某些东西，我作为精神分析家倾听，对方讲完之后我又继续走。

在到中国之前，欧洲人流行一句话，“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可是，我在北京，在成都，在火车上，许多中国人都来找我说话。

离开北京时，有人说坐火车会遇到抢劫，于是刚上车的时候我紧紧抱住行李，过了几个小时，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家都爱我。

到了大学，教授们对我反倒不是那么高兴，当然这并不影响我睡觉。但是有一个事情影响我的睡觉。昨天晚上为了睡好觉，睡前我取出一本书，书是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们写的。他们是大学问家，到中国来，写了中国的事情。我看后十几分钟就睡着了。

* 时间：2000年8月16日晚7：00—9：30。

这些大学问家们知识渊博，问题在于他们只有理论，不考虑如何解释痛苦，只考虑让中国人改宗信天主教。

我在法国的时候多次读这本书，这次带在身上，是为了不忘记精神分析的工作是实践。耶稣会的人是理论家，只带着爱，爱天主教的上帝。

Amour de Dieu（上帝的爱）。

——人爱上帝，上帝爱人。

由于没有实践的支持，他们的努力十分艰难。

神甫说，你们必须爱我们的上帝。为了让中国人改变信仰，他们根据“天子”概念造了一个词叫“天主”，意思是比天子更高、更早。在原来的天主教中，上帝下降，与耶稣一体；现在天主下降，与天子一体，于是有的中国人就相信了。

但是有的中国人不信。他们也许比欧洲来的人更聪明，他们写书攻击天主教，甚至用刀攻击神甫。

恨就出来了。

这是两个理论的对质。天主教认为上帝是永恒的、不变的，而中国人认为天是不断变化的。于是有了冲突，于是有了恨。

我到中国来不是传递理论，而是传递实践的方法。因为精神分析的理论不是固定的、永恒的，而是变化的。

一个人写了书，他死了，书也就不变了。但是他的后继者们会修改书，会发展理论。这是反天主教的，一如 17 世纪的中国人反对天主教一样。

精神分析总是破坏一部分，建立一部分，就像成都的市政建设。这也是符合中国的理论的。巴黎市内也是同样的，法国的精神分析运动也是同样的。

这是我们之间共同的基础。

法国最伟大的精神分析家从小生活在天主教的家庭中，长大后却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把理论建立在言说的基础上，建立在向大众讲演的基础上。

要知道，二十世纪之前的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20 世纪初，天

主教才与国家相互分离出来。所以法国精神分析运动的状态与成都一样，希望你讲，不管听不听得懂。我处在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上，不仅听大人讲，也听小孩讲，甚至听婴儿讲。弗洛伊德本人从未听婴儿讲过。

精神分析的后继者们是开放的，精神分析也是开放的。

我通过翻译而接触了孤独症孩子的父母们，他们却直接对我讲，略去了翻译，仿佛我能够听懂他们。

神甫们讲：

Aime ton prochain comme toi-même（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
seigneur du ciel（天主）

爱是上帝的命令，是强制性的。

法国的精神分析倾听病人讲述爱与恨，发现了上面的命令存在问题：“爱你的邻居”——远方的人你爱不爱？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爱阿拉伯人、不爱外国人。

病人来找精神分析家，说我的父母离婚，父亲走了。如果按照上面的天主教教义，病人就只爱母亲，但是事实上病人可能仍然爱父亲，甚至更爱父亲。可是天主教理论无法解释分析中实际存在的这些问题。

“如自己一样”——什么是自己？分析家还发现，病人有可能不喜欢自己。

于是天主教的理论又出了问题。

在法国，通常一个小伙子如果喜欢上一个漂亮的姑娘，就邀请她去吃饭等等，最后说：

Je t'aime（我爱你）。

姑娘听了，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但是如果他说：

Je t'aime comme moi-même（我爱你如爱我自己）。

那么姑娘就肯定不接受。反过来，如果姑娘对小伙子说：

Je t'aime comme moi-même (我爱你如爱我自己)。

小伙子也会走开的。

“爱别人如爱自己”，实际上是说“我不爱你，我只爱我自己”。

小伙子说“我爱你如爱我自己”，实际上是说“我爱我自己因为我是男孩子”。

进而，还有一个意思，如果小伙子对姑娘说“我爱你如同爱一个男孩子一样”，那么姑娘肯定会走开。不久这个小伙子就可能对另一个小伙子说“我爱你如爱我自己”。这一次，后者不会走，这是同性恋。

异性恋的公式是：

“爱一个男孩是因为他是男孩”。

“爱一个女孩是因为她是女孩”。

天主教神甫与中国的和尚一样不结婚，不爱女人，所以“爱邻居如爱你自己”实际上是说神甫们有一个相互的爱，这是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神甫们的同性恋。

自己是什么？

精神分析家在倾听中发现了“自己”。

天主教理论家认为“爱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确实有许多人说，他们非常恨自己，极端的例子便是自杀。更经常的是有时候爱自己，而有时候恨自己。

精神分析是一个实践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发现理论未考虑的问题。所以我来中国不是来传递理论。

这里请你们想一想：独处之际，你爱自己吗？

不知道这一问题是不是为难大家了？

耶稣会在中国还有一句有名的话：

Rien de ce qui est humain ne nous est étranger.

(如果是人，对于我们而言就不是陌生人)。

反过来，它的意思是，如果陌生的人就不是人。所以黑人不是人，中国人也是野蛮人。因为上帝在近东只说过一次话，未到远东，未对中国人说过话。

于是有了贩奴、屠杀。

精神分析家恰恰相反，听到白人说爱黑人，黑人说爱白人。人人平等，可以相互爱或者恨。

精神分析理论是开放的，传递实践。所谓的实践，指的是倾听，倾听人们愿意向你述说的话语。注意，耶稣会并未使中国人改信天主教。精神分析是让独特的主体讲自己，讲中国的事情、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家庭。

成为精神分析家，需要思想开放，如果他是社会规则的代表，则不能成为精神分析家。这并不是在讲民主、讲政治，而是让病人讲；他自然地要讲超我，例如社会组织的功能。

弗洛伊德本人是在最后一刻才逃过毒气室的。

请注意，希特勒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所以民主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谈论它。

希特勒上台之后有一个口号，“你们要爱你们的领导”，唤起了对祖国的爱。结果便是屠杀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外国人。还烧了许多精神分析的书，因为希特勒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从内心爱他。

Mère（母亲）— patrie（祖国）— pater（爸爸）— père（父亲）

法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爱祖国如爱父母一样，德国人也是这样，所以希特勒成功了。是从小所灌输的超我在命令个人做事。孩子长大后有自己的身体的快乐，与超我不一样，二者有冲突，于是去找精神分析家，发现了自己的身体的快乐，逐渐才说出来。

不过天主教神甫们传递给了中国人公元纪年。

另外，一个天主教神甫在四川找到了一块石头，上面的字表明上帝给中国人讲过话。于是耶稣会的人说，上帝其实是对中国人说过话的，只是中国人忘记了，现在我们帮助中国人回忆这些话。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分析家类似于考古学家。例如三星堆，大家完全忘记了，一个农民的突然发现，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还发现了不能读懂的文字。不断有人来，希望理解这些文字，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不是希伯来文字。

精神分析家也遇到这样的文字。

讨 论

听众：你今晚上讲的是哲学，不像是精神分析？

吉：我在讲的时候，我不是精神分析家，而是分析者，是病人。由于受了此处的哲学背景的影响，自然就讲了哲学与精神分析的区别。

听众：倾听够用吗？

吉：对于癔症病人来说够了。对于儿童、对于孤独症、对于重症精神病人而言，不够用。

理论和方法都是开放的，可以修改。

第五讲 转移*

昨天讲了耶稣会的人来中国传教，到一个所不认识的人群中传递爱或者恨，这是欧洲人第一次与中国人相遇。这样讲的理由在于，个体要讲述历史，自己的、父母的、祖父母的等等，从而就与300年前的历史事件联在一起了。不过大家只讲1848年之后的事情，忘记了300年前的事情。我来中国是带着爱，希望中国人理解精神分析，诱惑中国人去做分析。当然，最好是能够诱惑你们中的某一个人马上跟我到巴黎接受分析。

转移，就是感情的转移，包括爱与恨的转移。

爱的转移，在被分析、给人分析的时候都会遇到。在法国，是在天主教的影响下，“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人们在分析中都要谈到这一句话。它已经是法国人的超我了。

转移一词，其词根是 *transfert*，即转移，如飞机旅行、银行转账，这是老百姓使用的词。希腊语中也有一个词 *métaphore*（隐喻），意思是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

我坐飞机从巴黎到北京、再到成都，带着行李，也带着感情——爱与恨的感情。第一次遇见中国人，不管在哪里，他们都说“你好！”。

ni hao Bonjour 声音

好

母 子

我想起这个词，我发现了一个转移的问题。当人们说“你好”时，

* 时间：2000年8月17日晚7：00—9：30。

表达了一个感情，转移了一个感情，这成了礼节。法国人说 Bonjour，中国人不一样，还有文字。把“好”字分解为母子，这有一个意义的转移，转成了母子关系。

昨天讲了，天主教中有一条习惯法，即“爱你的邻居如爱你自己”，而这里的“好”也许是中国的习惯法：母亲爱儿子，儿子爱母亲。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这由你们决定。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说“母女”呢？女儿在哪里、父亲在哪里？也许母亲由女儿变来，儿子将可能成为父亲。是不是“父亲爱女儿，女儿爱父亲”就是“不你好”（bu ni hao）呢？

这也是转移，转成了不好。

为什么不是“父子”？

我们由此认为除了母子关系之外，其它的“好”就未表达。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这叫作“压抑”。

女孩做分析，就可能讲述与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压抑被解除；把精神分析家当成父亲、母亲等等，这是转移。

我的这些发现，不管对于你们中国人来讲是否成立，对我而言都是发现。而我之所以能够发现，是因为我是作为精神分析家而来的，不是作为一个带着一大堆书和理论的教授而来的。

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一个病人之所以来找精神分析家，除了痛苦之外，还因为在其它地方他找不到一个人听他的倾诉。转移会引出好奇心，好奇自己的历史从而去挖掘，一如考古学家：一是好奇，一是爱的感情的投入。而精神分析家则是帮助病人将痛苦转移成好奇心。

现在讲转移的另一方面。例如一个男孩，他觉得鼻子鼓起来了，找所有的医生，都没解决问题，最后去做分析。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他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有麻烦，即阴茎不能鼓起来。这也是转移，勃起的愿望转成了鼻子鼓起来的症状。

鼻子鼓起来，这是一种言说的方式，实际上是在讲述。在中国文字中，自己的“自”是鼻尖。如果按中国传统，鼻尖能够鼓起来，我就能够鼓

起来。在精神分析中发现，他之所以不能够与女人有关系，是因为每次他与女人交往，他母亲都不高兴，只好和女人分开，于是为了爱母亲（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的习惯法）而放弃了与别的女人打交道的机会。

但为什么转移到鼻子呢？是因为社会习俗不允许在公共场所讲阳痿，而鼻子有症状就可以说出来。转移是因为有压抑。

在此例子中，“好”有一个限制——只是母子的爱，而排除了其它的爱。如果一个女孩来，也说“你好”，她自己并未在此之列，她的爱该怎么办？母亲也来了，也说“你好”，她先是女儿，与一个先生做爱而后有了儿子，而这一切均未被“你好”表达出来。所以就更难、更复杂了。

“你好”导致了一个复杂的转移过程，在母、父、儿、女之间鼓励了一些东西，而压抑了另一些东西。

精神分析解构了“你好”，鼓励任何人讲述困难、困难发生的过程，如女孩不能与男孩建立关系，因为男孩类似于父亲，而她曾爱父亲却不在“你好”之列，遭到压抑，从而出现问题。

转移的另一方面，一个形象转成一个声音。中国文字可以追溯很远，人们由此知道一个形象如何转成一个声音，这也是症状转成声音的过程，如上述的鼻子症状，通过说而翻译为声音的形象。

在精神分析中，一个人到精神分析家那里讲述自己的历史：一种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如恋爱问题，将情人形象投射到分析家身上——如果分析家去度假，病人就很难受，如失去情人一样；一种是回到童年，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投射到分析家身上，甚至把母亲形象投射到男性分析家身上。

这是一种转移。

另一方面，分析家为了精神分析的继续而不得不扮演这个投射过来的角色，重演了现实的或者历史的故事。此重演宣泄了情绪，并缓解了痛苦。

上述几种转移都可以归为移置，一种东西移置到另一种东西那里。

在精神分析中，转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分析家不代表法律或

者超我。否则，在法国病人就只能说“爱邻居如爱自己”，在中国就只能说“母子相爱”。所以病人在精神分析中可以表达与习俗不同的东西。

精神分析家一定是开放的，不认为自己已经清楚了病人的一切东西。他只是充满好奇，注意下一句话、下一个词，一切都是崭新的，表达着新的意义。正是这种开放的状态和好奇的态度使转移成为可能。

法律如何影响情感？中国制定独生子女政策是因为人口增长太快。这一政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做爱之后不能生孩子，于是采用避孕措施，影响了人们的爱与恨的关系。同样对于此法律我们也充满了爱与恨。

“爱邻居如爱自己”，这是法律，但是这之外还有同性恋。我们对天主教定的法律也充满了爱与恨的转移和交织。

我又想起两句话，欧洲人听说中国农村有人为了生男孩而溺死女婴，这将引起麻烦——女孩的减少将导致人口的减少。

对于男孩的偏爱也对应于“好”。

讨 论

听众：转移都是有用的吗？如何解决转移？

吉：我的精神分析生涯已经有40年了，我发现精神分析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精神分析中不能说解决。转移引出更多的麻烦。

当然除去上述的玩笑成分，精神分析肯定有转移，也肯定有帮助，不然人们怎么会来呢？

听众：何为反转移？

吉：一个女病人爱上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称之为转移；同时弗洛伊德也发现了自己对病人的感情，于是称之为反转移。

到了拉康那里，只讲转移，大家分享转移。病人将分析家当作某人，但意识不到，需要逐渐地意识到。而分析家接受了分析，可以很快地意识到，并与自己的历史联系起来，回应这一转移。

听众：倾听之外还有别的干预方法吗？

吉：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精神分析家使用其它许多方法，如游戏、绘画，但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倾听。例如孩子绘画，分析家要理解其意思，并改进病人的状态，使他有一天说出来。

始终是为了病人说出来。

我在北京遇到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孩子不能说话，出生不久就发现患了孤独症；父亲受不了，离得远远的，母亲带着儿子过。母亲说，父亲偶尔打电话回来，问可不可以回家过一夜，母亲断然拒绝。但是孩子确实说过并多次地重复一句话：“父亲在哪里？”但是所有的人都忽略了这句话，而一致认为孩子不能说话。其实孩子问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表明孩子是有可能说话的。

对于这段故事，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层意思，而现在意识到了。今天讲“好”，也许是它在背后推动着我——我的父亲已经死亡，我至今都还伤心。孩子的故事引出了我的转移。

听众：分析家如何对待转移？

吉：用语言而不是行动。

第六讲 压抑*

压抑，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抽取出来的概念。我们举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说，转移也是移置，比如从巴黎到北京、银行转账等等。当我到了北京，要接受入境检查，如果我没有签证，我将被拒绝入境。如果中国在动乱的时期，警察也会拒绝我入境——拒绝就是压抑。不愿意外国人进来，怕引起更多的麻烦或者不愿外国人看见动乱。

同样，法国对外国人也是这样的。

所以在移置的运动中存在一些边界，边界有哨卡，要检查证件，不让政治犯进入。

当时弗洛伊德也是用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明压抑的概念。

这里强调国境线，一个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带着行李，需要报关。旅行者经过海关，海关叫他报关，要检查、要交税。如果旅行者说，我没有不被允许的东西，那么海关工作人员可能相信他，也可能不相信他。不相信就要检查。

也可能是旅行者本身就不能通过海关。

许多人有一个愿望——偷越海关，带上许多不被允许的东西。另外，旅行者在旅行的过程中不知道自己的行李有不能通过海关的东西，比如黑社会把普通人的行李换包，让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带违禁物品。

这是隐喻，旅行者想到外国去，有一个界线——海关，能通过海关就能进入，否则就进不去。这就是检查机制。

* 时间：2000年8月18日晚7：00—9：30。

一个人找到弗洛伊德，想解决问题，从自己的家中出来，然后上车、下车、敲门——这本身就是一种移置，相当于进了海关。弗洛伊德要求他说（自己想到的东西），这相当于报关。说出一个人知道的事情，这也不容易，有些东西是他不愿意说、不敢说出来。这很困难。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能向一个人说出全部的人生经验（你们晓得的），尤其是那些不好的。此时来访者认为弗洛伊德是海关官员，说出来他将惩罚他。

这里，分析家与海关官员不同。

当病人说了不好的东西，分析家并不压抑他，也不批评他，而是让他继续说。

当一个先生引诱一个女士，或者一个女士引诱一个先生，都不会向对方说出自己的全部历史。

在弗洛伊德那里，病人有许多东西不愿、不敢说——但这远不是压抑，只是压制，日常生活中常有压制，如痛苦的经验。我们经常是对一个人说一点，又对另一个人说一点。弗洛伊德说，我可以接受你来做分析，但是你不要压制，要想到什么说什么。

这就是自由联想原则。

在病人说了一切之后，精神分析家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只是要求病人说得更多。病人虽然进行自由联想，但也不可能全讲出来，而是会出现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东西——就像一个不知情的人带了毒品被检察官发现一样。

我们在此到了一个边界，一个知与不知的边界。

逐渐地，病人意识到分析家不是海关官员，于是说出他晓得的東西。下一个问题是压抑了。因为病人不知道，想说也说不出来。他不知道的东西，弗洛伊德称之为无意识。因为意识不到，所以是无意识。

无意识包括压抑。

被压抑的东西浮现之际，感觉是陌生的。无意识相对于意识而言是陌生的。当病人到弗洛伊德那里讲的时候，病人可能有头痛、肢体瘫痪

等等，但并不知道这些症状与心理问题的关系。通过分析，他逐渐地发现，压抑了的东西是通过躯体说出来的。通过话语，他把症状与遗忘了的历史联系起来，从而消除症状。

那么，具体地说，旅行者头痛之类的症状如行李箱，心理原因如毒品。分析最后发现了毒品，分析家像海关官员一样自然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从而发现背后的故事。

通过历史的讲述，病人说出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其中有些不太清楚——认同父母、父母内化为超我。分析家看到认同父母的过程，并追溯到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历史，比如语言的历史。

当病人意识到分析家不是海关官员的时候，他就会讲述一切，他的一切所知，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是不知道的：父母，超我，超我的代表，父母的的东西又来自于祖父母。这里遇到了另一个国境线——无意识地将父母、祖父母的形象投射到分析家身上，进入下一个阶段。

有了这个投射之后，又回到病人的身上，使病人意识到原来未意识到的、作为超我的父母形象。

这样的回复就是压抑的解除。

我们在此看到了分析家与海关官员不同。弗洛伊德的立场是发现了毒品，只说“你继续说，你有不知道的东西，我也有不知道的东西”。

分析家与医生不同，不是必须接受医学训练。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一个人来找我，他是哲学教授，一个优秀的教授，知识渊博，远在我之上，也无躯体症状；问题在于，他想知道一切，却不知道一切，于是十分痛苦，想自杀。因为没有躯体症状，所以无法找医生，听别人介绍而来找我。

他始终认为我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而且不断地要求我告诉他；我承受了这一歪曲的形象。

此人在大学中是非常优秀的教授，深受学生爱戴，找我的时候已是到了自杀的边缘，要打我、杀我——因为我知道而不告诉他，甚至还到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继续分析，回溯到了童年。

偶尔一次他说到：他在学校始终是第二名，回家后他父亲说“我的儿子永远无用”，不断地这样说。

不仅仅是他想自杀，而且他还想杀我。我知道有三个同事被病人杀了。如果病人越过边界，那将是危险的，这是分析家必须得承受的。

通过分析，病人知道了杀父亲的想法，通过杀自己而杀父亲，因为他认同了父亲。

在此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转移、压抑、无意识。

病人的行李中有“想杀父亲”，但他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病人想杀某个人，比如自己和我。

最后压抑解除了。精神分析把谋杀的行动变成一种话语。

是不是可以说，所有的男孩都想杀父亲？弗洛伊德说是的，并以俄狄浦斯为例，以他自己在父亲去世之后所做的梦为例。

俄狄浦斯神话是希腊世界中很有名的、并不不断地被重复的故事，如其它希腊神话一样。故事发生在国王与神之间。国王有一个王后，她希望生一个孩子，国王不愿意。这种情形在许多夫妻那里都存在。王后很聪明，让国王饮酒，趁他醉了做爱从而怀了孕。国王不知道，他并不想要孩子，于是就把孩子给了另外的一对夫妇。那对夫妇很爱这个养子，俄狄浦斯也就以为他们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了。长大之后，他成了一个男子，离开了家，走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先生，他有卫兵；因为路窄而发生争吵，年轻男子用刀杀了对方。继续向前走，遇到另一位女士，爱上了她，跟她睡了觉。后来才知道真相，是事后才知道真相。

在这之前曾有一个神，说了一个预言：这个孩子将杀父娶母。但这个孩子以为养父母是亲生父母，为了避免预言而离家出走——压抑了预言，偶然地出现了后面的事情，杀父娶母，这里是生物学的父母。

现实的发生，证明了预言。弗洛伊德提出俄狄浦斯情结既是由于他的某些个案，也是由于此剧的广为流行，具有文化代表性。

一般来说，在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之间，夫妇的故事分为两个部分：孩子知道的一部分，孩子不知道的一部分。同样，祖父母也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展示，一部分不展示。

就像养父母未对俄狄浦斯讲明其身世一样，尽管孩子很敏感，知道一些父母未给他讲的，但孩子经历着一种痛苦，他不能知道一切东西。

（人们）通过精神分析发现了未讲的或者讲了又遗忘的东西。

我们的理解不同于弗洛伊德，不是一定要杀害，而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些不知道的东西，打开行李箱让行李自己讲述。

而不知道的东西就是压抑。

讨 论

听众：一个个案，男，24岁，哥哥经常欺负他，姐姐爱他，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农民，父亲经常打母亲，他很小的时候看见父亲骑在母亲身上打，那时他帮助母亲打父亲。我给他做了解释，但是症状并不缓解。

吉：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咨询师听了之后会说如何如何，他们与精神分析家一样都认为症状意味着另一件事，但是精神分析不会告诉病人症状可能意味着什么，因为精神分析家不知道。他只是说：对，继续讲吧，讲出双方都不知道的东西。

并不是分析家不讲。我的一个朋友听了病人的讲述之后，便讲自己被唤起的历史，不是说病人怎样，而是说我听了你的话之后怎样。

不过精神病学家需要维持一个权威，而在精神病院的精神分析家是自由人，并无权威。

弗洛伊德和荣格一起去美国，一起乘船，在船上，荣格给弗洛伊德讲了许多梦。荣格要求弗洛伊德也讲梦，弗洛伊德拒绝了，说，那将使我失去权威。

听众：一个个案，女，婚外恋，肢体麻木，经过咨询逐渐明白了二者的关系，向其丈夫坦白了，之后症状消失。压制对于症状的意义如何？

吉：这是压制，你说得很对。压制解除而症状消失。精神分析是针对压制解除之后症状仍然不消失的情况，即干预压抑。

法国有一些婚姻专家，给人建议，但是有两种情况：一是建议给了，但是不遵从——为什么不遵从？二是遵从之后仍然问题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得不到解决？在此两种情况下，精神分析才干预进来。

第七讲 阉割*

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在这里讲也许是很困难的。

相对德语而言，法语中的概念更抽象一些，例如，一个德国人能够比较好地理解海德格尔，我指的是他的语言，是因为他是将日常经验连在一起来讲哲学的。翻译成法语后就完全脱离了日常经验，非常抽象。

我对中文理解很少，就我这一点很少的理解而言，我觉得中文中的概念非常具体。因为声音对应于文字，文字又源于象形，象形字是具象的。我不晓得阉割翻译成中文后是否与日常生活联在一起。

为了避免过分抽象，我举一个成都遇见的例子。很有意思的是，我忘了是在成都，最后(才)想到今晚的约会不能缺席。缺席(manque)——不能缺席，如果我缺席，对你们、对我自己都觉得缺了什么东西。

这样，我们引导出了这一抽象的概念——某个时候、某个地点缺某个东西。

那么，人的存在不可能在不缺什么的情况下就生存下来。我说的是人类的存在。

我们讲动物存在，动物生活在它的需要(besoin)的基础上，比如需要吃东西。那么动物利用各种方法来寻找东西使自己得到满足，未找到食物就会死亡。

一个雄性动物需要一个雌性动物，也是如此。为了再生产，这些动物在某一个时间有性的需要，雄雌动物聚在一起相互满足需要。

* 时间：2000年8月21日上午9：00—12：30。

我们能够看到动物世界的本质，当然这是人所看到的特点，不一定是动物本身的，即利用各种方式来满足需要。

举一个例子，这个动物叫人类，出生之际处于婴幼儿期，它需要照管，需要母亲喂养，给予食物。当然在座的每一个母亲都比我更清楚孩子的这种需要。当孩子得到食物时，还有别的请求（demande）。

请求爱是人类的特点。

在请求这一点上，母亲遇到一个问题：她不能完全满足孩子。这是因为母亲还有另外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就是婴儿的父亲。

在此意义上，孩子不能与另一个人分享母亲的爱。这指示了母亲的一个缺失，即母亲给父亲的爱而引起的缺失，这是第二点。

还有第三点，在人类的世界中，还有欲望（desir）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爱，还有欲望；弗洛伊德提出性的欲望，这在上世纪初的维也纳引起了公愤。

这并不意味着孩子来到人世间就有着成年人的性欲望，而是更为简单的，刚开始时有一种口腔快感。

他在母亲的乳房上获得了这种快感。也许我们可以说，性快感有点刺耳，但二人都获得了快感。孩子出生之后能够感到是否能使母亲快乐，这个快乐的分享与爱不一样，是在身体快感的基础上的性欲望。至少在现在的维也纳和法国，快感（plaisir）是一个隐喻，总是使人想起性。这个快感与爱之间的差别是充满激情的爱。

这样，我们区分了三个层面：一是需要，需要母亲的照顾；二是请求，与父亲分享，出现缺失；三是欲望，性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性的欲望不可能和母亲一起实现，这只能与另外一个人完成，补充这一缺失。这样一种性欲望与阉割联在一起。现在我们谈论的东西涉及到了生殖器，至少可以有这样的理解。

通过阉割，人类就有缺失。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来解释，对于母亲而言，孩子是一个有性的对象，与食品不一样；在孩子这方面，母亲的嘴唇和乳房，也不仅仅是食品，也有性的意味。这构成了母亲-口腔间的性的

意味。成年人的接吻来源于此，以此获得口腔的快感，并且两个人会同时获得。

所以，口腔的东西实际上是隐喻，男性生殖器穿插女性生殖器也隐喻着口腔快感，两人同时获得快感。嘴巴是洞的意思。那么人人要问，为什么要以各种方式来转换这个洞。

人们问上帝，上帝未回答。

这三个事情：吃、排泄和性交，人们能够在公开场合谈论前二者。所以，弗洛伊德为了解释这种现象，说社会有一个机制，先是压制它，然后是压抑它。

尽管先是压制，后有压抑，但是性仍然存在，只不过是转换了，而病人到医生那里只能说饮食的问题。

现在来到阉割的问题。我只能讲西方的情况。在《旧约》中讲了大量的阉割问题，男性在出生后第八天割掉包皮。这个仪式非常重要，举行仪式时女性不能参加。这是孩子由此而整合入人类中间的重要的仪式。因为弗洛伊德属于犹太人共同体，（因而）阉割是一个记忆、一个登录、一个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从而进入人类共同体。

这个记忆是人从自然存在过渡到文化存在的标志。要割掉他的身体的某个部分，不是别的地方，而是生殖器。所以弗洛伊德在谈阉割时是在谈一个传统，而不是妄想狂式的想象。

这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仪式，整个伊斯兰教都有此仪式。我之所以强调犹太人共同体而不是伊斯兰共同体，是因为整个基督教传统是跟随犹太人共同体的，从而整个西方文化是跟随犹太人共同体的。

在这个地方，精神分析与耶稣会不一样，后者要求中国人改宗。显然，当谈论精神分析和西方传统时，我们无法想象精神分析在中国发展而不谈中国传统。

从自然存在到文化存在需要一个登录，登录在其身体上。弗洛伊德虽然属于犹太人共同体，但他仍然希望精神分析能够从犹太教传统传到基督教传统，所以他很高兴有非犹太人来接受分析。他听了新教和天主

教教徒的述说，这会影其理论。

在传统中，不仅仅是阉割的问题。基督教共同体后于犹太教共同体，而二者有冲突。基督本人是犹太人，但是受了希腊传统的影响而认为要传给所有的人。在此情况下，他的主张得到了犹太人的领导和非犹太人的同意，但是后者有保留，即不行割礼。冲突具体到一点上，即他们不同意割掉男性生殖器的部分包皮。

谈了这么多，实际上凝聚在这一点，小小的一点皮。

基督教同意为了进入人类共同体而做点什么，但不同意割礼——这样会导致终身的缺失。那么天主教的人拒绝行割礼而付出东西，只是在内心中施行这样的礼节。

“心”这个概念在中国更复杂。

通过这个东西，基督教把实际的缺失转成内心的缺失。这样基督教把缺失刻印于内心，终身不能填补。正是这样，后来精神分析家创造了新的概念——符号性阉割而不是真实的阉割。

当人类从自然转成文化时，后者是符号性秩序，这是对缺失的一种修补。这个符号性秩序，特别是对于法国精神分析家而言，就是人类在讲话。正是人在讲话的过程中，这个缺失得以安置其中。

例如真理的问题，人们在讲话时，真理不见得能表现出来，因为人们在讲。这个想法来源于精神分析的经验，它表明，人们不能够把真理讲出来。正是这样，一个人来找精神分析家时，后者并不说“你讲出真理”，而只是说“讲出脑子里的东西”，允许说谎。因此精神分析这样一种立场与基督教不一样，教皇说的都是真理，这在犹太教、天主教那里都是这样。与科学家也不一样，比如原子科学家说我们发现了真理，而分析家则说，你们可以这样说，但是不可能说出真理。由于在言说中我们不可能讲出真理，从而有了一种缺失；由于不能完全讲出真理，所以有了缺失。

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在我所读的书中，三世纪道教大师们严厉地批评了语言的作用，特别是孔子的正名理论。后者认为声音与实际所指，

有一个密切的联系，而道教大师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保持沉默。之所以道教大师们意识到了语言不能讲出所有的真理，他们难以接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希望找到所有的真理。

从西方的观点看，他们不能承受这一点，从而离世而保持沉默。由此我们看到了一种缺失，真理的缺失，在此情况下它无法被承受。讲不出真理的东西，只有压抑；讲不出来，是因为压抑。

我们现在是八点一刻，现在进入我的第二部分：人与动物的关系。

有时人会说：要是我是动物，我会很高兴。类似地，佛教大师们认为人很痛苦，死后变成动物反而很快乐。

现在有一种特殊的动物掉入人类社会、掉入语言。在此之前，有父母的形象，形成超我。出生之后，如果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就在需要的平面上没有缺失。但是他需要一个爱，而爱的缺失是因为母亲要分一部分爱去爱她的情人；同时，另一个问题是他不能爱他的身体和面容，因为他看不到。

孩子可以看到父母的脸，自己的身体的某些部分，但是不能看到自己的脸。那么，这就有了一个缺失，通过这个缺失他进入了人类的共同体。因为他的注视非常重要，听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在能走路之前就能看能听。这将构成他身上很重要的部分：他不能追随他人的运动。因为能够看到父母的脸、自己的身体、鼻尖、生殖器，但是看不到脸，这一缺失就记录在他进入人类共同体的行动上。

男孩儿看不到脸，但可以看到生殖器，这一点很重要，它导致了男女差别。这一点很重要，男婴儿不仅仅能够看到一个很特殊的器官，还能够给他快感，可以勃起。如果说，这时他还不能走路的话，那么他可以看到这个特殊的器官能够动，这给他一个快感。

女孩看不到。我有一个个案，女性，回忆起在出生之际母亲说“这个孩子未完成”。在法语中，人们习惯上说，姑娘是有缺失的男孩，姑娘们也说自己是具有缺失的男孩。这里，缺失（manque）也有过失的意思。

在整个文化特别是宗教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男人在思考。也许是生

殖器起了作用，是男性生殖器的权威起了作用，促使父系社会的发展。在三到五岁之间，男孩发现有人没有这一器官。我的一个个案是男性，他到了15岁还一直认为人人都有此器官。

正是男孩发现了例外，动摇了前面的信仰，从而有一种冲突，对自己的信仰有一种怀疑。但是男孩提出怀疑，他遇到的是一两个人没有，并不能推广，说有一群人没有这一器官。那么，就有一个界线，他要越过此界线才认识到男孩有而女孩无。

还有一个界线，就是，所有的女人没有，但是母亲有。

在他未越过此界线时，他认为一个女孩之所以无阳具是因为她原来有而被切掉了。孩子的这种认识，是一种幻想，幻想女性是被阉割的。

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不过，不是成年人的逻辑，也许是基因给定的逻辑——男孩会想，这种事情也许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做了一些可笑的、糟糕的错事，做错了事就可能被阉割。父母的高兴与不高兴，引出了对与错、善与恶，这与动物不同。恶引出阉割，所以认为女孩是做错了事的人，因为她们没有男性生殖器。

我刚才所有的讲话都是针对男孩的，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女孩的情况更复杂。当小男孩（在幻想中）意识到女孩因做错了事而阉割，那么到目前他未被阉割，从而表明未做错事。

小男孩要做错了什么事才被阉割？

弗洛伊德认为小男孩想填补母亲的缺失，即杀父娶母，这遭到父亲的威胁，说如果这样就要阉割你。孩子的这种性的欲望促使他进入俄狄浦斯期，从而面临阉割的威胁。

女孩的问题以后再讲。

我的一个同事建议由女性们讲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女性们才能讲出究竟在她们的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家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讲女孩的事情，并要求获得女性的权利。

讨 论

听众：今天您讲得比较抽象，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吉：我已举了一个女性的例子，她后来始终表现出男孩的行为，因为母亲说她未完成。你的提问本身就是缺失的例子，因为我已经举了一个例子，而你不满足，还要一个。

听众：和尚的削发和烧疤，是不是象征性的阉割？

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转移。阉割是印记，但是说不出来，是禁忌，于是转成削发和烧疤。弗洛伊德有一个个案叫“鼠人”，是个男孩，他始终觉得其鼻子上有坨坨，结果却是性器官的表现。佛教通过这一仪式显示标志，割礼不能显示标志。

弗洛伊德曾说，道德学家们、教育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讲的是地面上的建筑，我讲的是地窖里的东西——性。

听众：中国有真的阉割，即太监。你如何看待？

吉：我今天去了文殊院，几百个和尚在做仪式，听到他们在唱歌，很好听。我想起西方歌剧传统中是阉割了的男人扮女人唱，也是非常好听。伊斯兰教有太监的传统，看守女人。我曾看到一个中国血统的汉学家谈太监，说在某些时候他们很重要。遗憾的是，至今尚无阉割后的人来我这里做分析。

我倒是要向你提一个问题，你们见到过完全被切掉的或者只是睾丸被切掉的太监吗？如果是后者，则无缺失，因为没有欲望。

第八讲 原始场景*

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至少听到一个病人讲这个原始经历。该术语由两个词构成，我们分别进行解释。

关于场景，例如，我希望与大家合影，这就是置于一个场景中。我喜欢在下面，有人喜欢在上面。今天未实现，只能明天再做，这样，创造这个场景成了一个事先的计划。那么大家可能会做梦，梦见如何照好，提出意见。在法国，导演负责如何安排场景。他要做的事是先写一个剧本，安排好场景。要构成场景，先要有脚本，然后再变成声音、形象，电影就做完了。大众能够看，是因为有屏幕，投在上面。因此在制作电影过程中，导演有主意之后，还有许多工作，完成之后可以说是导演的主意的事后表现。还有一个问题，电影制作出来之后，导演和演员，就与以前不一样了。我讲的是好的导演和演员，不是商业片。好的电影对于导演和演员都是奇遇，有了这个电影后他们就与以前不一样了。

这些东西如何与精神分析相关呢？一是要有时间。有些人反对精神分析是因为精神分析需要许多时间。他们想象有一种方法，就像魔术师，一下就解决问题了，但这是不可能的。精神分析如同电影一样，制作需要时间。有一个人来见精神分析家，说他遇到了问题，这些问题在其它地方不能解决，但是他因为做一场精神分析需要许多时间而犹豫。我说，你到处找解决办法，也花了许多时间，比精神分析的时间还多。这个人还是非常犹豫，认为精神分析要花许多时间和金钱。其实他到处寻找，花的钱更多。

* 时间：2000年8月22日晚7：00—9：30。

同时他还面临一个危险。既然是奇遇，自然存在危险，如同电影一样，好电影的导演和演员要面临危险。这种危险性是指他可能在分析中失去什么，如他的汽车、他的夫人、他的房子等等，甚至出了问题找警察局，都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来做分析。分析可能使他失去什么，那么这是一个进入精神分析的个人奇遇。

病人有问题，带着他做好的电影，介绍给妻子、法官、警察等等，最后才到精神分析家。他的剧本是被压抑了的，精神分析家在开始时也是听他说。当他带着电影来找精神分析家的时候，他不问导演是谁，演员是谁，仅仅是看电影；精神分析家也这样，也只是看电影。在看这个电影的同时，精神分析家不管电影的背景，只说“讲出你脑海里的东西”。

逐渐地，回忆浮现了，追溯到童年，有另外一个场景出现；后者可能与一个历史真实事件联在一起，也可能没有这样的联系，无论如何，这才是精神分析的场景。前一个场景与后一个场景有什么差别？前者是移置了的记忆，能够向他人讲述；童年期的场景则相反，不能说出来。第一个场景，我们称之为回忆，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回忆，只能说是理由，向大众说的理由；后一场景才是回忆，也许与历史事件、也许不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难以向他人说，在精神分析家帮助下艰难地说。

另外一个场景，在讲述时包括了他的演员，他是以导演的名义在说。但这个导演已经被压抑了，病人和精神分析家都不知道，在讲述的过程中才逐渐浮现。

我举一个例子。在第一个场景中，一个女人，她总是头痛，对丈夫说、对朋友说她的头痛。回到原始场景后，它的名称可能发生变化，比如叫瘧症等等。在第一个场景中可以叫头痛的夫人，在分析中出现了名字，叫 Claude Duben 夫人，这里姓、名出来了。“为什么我叫这个名字？”由此追溯到父母那里。到了另外一个场景时，这样的问题自然导致了关于童年期整个家庭生活的一种叙述，弗洛伊德称这为原始场景。

弗洛伊德发明这一概念也与他的自我分析有关。在《释梦》一书中，涉及许多梦不能被理解，于是进行自由联想，而逐渐解释了梦，逐渐触

及到了童年的经历——原始场景，所以叫原始场景。精神分析家后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只讲弗洛伊德的——孩子看见了父母做爱的场面。所谓看到了做爱的场面，其实孩子不懂，只是看见了这样的互动，于是经历了创伤。弗洛伊德称之为创伤情景。孩子面对的这一情景是完全未见过的。他以前看见的只是一般的家庭场面，而现在的场面其动作较激烈、让人害怕，使他经历了创伤。他自己也追求身体的快乐，这也许与他自己也有关系，他以前只是与母亲在一起。弗洛伊德认为这是童年创伤的基本原因。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 20 世纪初的维也纳，哪怕是在最亲近的人中也不讲性，而现在的法国的父母可能故意让孩子看做爱的场景。所以在当时的维也纳，孩子讲出来之后，社会被震撼了，受到伤害，引起公愤。在维也纳的背景下，如果孩子问，你们在做什么，父亲可能过去打他的耳光，或者父母默不作声，因为大家无法讨论这一问题。父母们没有自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关好门？

这种创伤经验被弗洛伊德讲出来——类似孩子一样，同样也类似孩子一样被维也纳打了一个耳光，维也纳社会也像父母一样，不是自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讲性？弗洛伊德除了讲孩子看见父母做爱而受创伤，也讲出生之后就性，吮吸乳房时两人分享了一种快感。这就更引起轰动，遭到更猛烈的攻击。刚才我们的例子，头痛的夫人变成了 Claude Duben 夫人，进而发现她的父亲、爷爷也叫 Duben，并讲出了父母做爱的场景，弗洛伊德称之为原始场景，也叫创伤场景。

我们从弗洛伊德的时代转到现在的法国、英国和美国，人们大量地讲到性的规则，讲到恋童癖。他们诱奸女孩和男童，这种事经常发生在儿童中心的领导者那里，这满足了他们的幻想。而弗洛伊德问父母们，为什么不关门而开着门？开着门意味着引诱，与恋童癖有一种类似性。

还有一个例子，一个母亲在法官那里说其丈夫要鸡奸儿子，但是法官什么也不做；母亲请律师打官司，法官极力阻止。后来才发现法官也有恋童癖。开着门对孩子有一个诱惑，后来承认有这一诱惑；到现在父

母公开让孩子看其做爱。这一过程很有意思。

下面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欧洲。德国人到泰国旅游，在红灯区找稚嫩的孩子做爱。那些孩子们之所以在这里接客，据说是由于经济原因被他们的父母卖到这里。有人专门喜欢找年幼的处女，于是父母就将小女孩卖出来，供欧洲人享乐。

回到弗洛伊德的理论，父母做爱时为什么把门打开，这个问题与这里的卖孩子有关。有人针对这些现象攻击弗洛伊德，指责他打开了门，而有了这些现象。但弗洛伊德只是说“你说你脑子中的事情”，然而这些恋童癖却只做不说，拒绝说浮现在脑海的事情，这是对精神分析的抵抗。需要指出的是，精神分析这种奇遇并不容易，比起做自己想到的事情而言，说出自己想到的事情更复杂。

原来精神分析家是听病人在躺椅上的述说，现在有精神分析家到监狱工作，听恋童癖者的述说。我本人就去过。他们有时也讲，以前往往受到过男性成年人的性骚扰，他们记得住这些事情，他们成年之后做同样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童年的事情与成年期行为的关系。

恋童癖做的事情与当年成年人对他做的事情相同，这是认同，这很重要。也许在弗洛伊德时代就存在，只是孩子讲不出来，比如讲给母亲、讲给周围的人，大家不相信，于是法国有专门的报警电话。在泰国，人们组织这些被卖的女孩子做其它的事情，当然这些组织面临着黑帮的威胁。

我想表明，一个人想说出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可能因此而受到惩罚——仍然是压抑机制，这是精神分析的开始，然后才是说自己压抑了的、不知道的事情。这里有两个障碍需要越跨。原始场景即创伤场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中有一些修改，同时法国的精神分析家进一步做了一些修改，留到明天晚上讲——精神分析的局限和幻想。被叫作原始场景而非创伤场景，这显然是与幻想有关的。

讨 论

听众：通过精神分析能够解决恋童癖？似乎原始场景是恋童癖的原因。雨果年轻时很自律，老年时性行为很紊乱，精神分析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

吉：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明天还会讲，精神分析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当一个人遇到了问题而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来找精神分析家讲的情况下，精神分析才起作用，才可能解决这个人脑子中的问题。继续解释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家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就要有权利，如在法国要当总统，发布命令叫所有的人来讲。但精神分析家拒绝这样做。进一步说，要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立法，针对每一个人，而精神分析不针对所有的人。

听众：原始场景是儿童创伤的来源，那么法国父母让孩子看见自己做爱，会不会减少创伤？

吉：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法国，其实是发生在整个西方，与性解放联在一起。一是由于语言的解放，可以谈论；一是由于行动的解放，可以婚前同居。前者如母亲说孩子吃奶时，我的快感如情人在抚摸一样。父母做爱并告诉孩子你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想要孩子并由此感到快乐。这之所以不是创伤经历，是因为弗洛伊德说的原始场景中父母不告诉孩子真情，孩子不理解，所以语言与行动有一个脱节，所以构成创伤。如果解释了，孩子就没有创伤。这是法国知识分子读了弗洛伊德的书后的理想。精神分析家并不给成年人说你应该做什么，他仅仅说——仍然是——“你说你脑子中浮现的东西”。所谓性解放运动，68年为其顶峰；父母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已经过去30年了，那时的孩子仍然来做分析。

听众：如果只看见动物性交，会有创伤吗？

吉：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不晓得你是处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我自己是在农村中长大的。在农场，经常看见动物的交配，没有造成创伤，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经历，不代表别的人。也许我可以找到一个理由是我看见了狗、牛、猪的交配，但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当我看见一头公牛骑在母牛上时感到很安全，因为这样公牛就不会攻击我。

听众：原始场景中如果父母不批评孩子，如何？

吉：这个事情很难这样说，因为从68年过去了30多年，那时的孩子仍然有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推广。所以当时欧洲也有人想建立一个没有问题的社会，但是不可能。不过这不属于我的工作，我只管一个人的问题，他来找我倾诉。我更喜欢某个人说：我们的社会有问题，我们正在试图解决它；而不喜欢人们说，一旦当了总统，我就要建立一个无问题的社会。

听众：原始场景能够被推广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吗？

吉：部分地说是。能够推广到每个人的，对分析家而言，只能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当然，比如一个孩子突然回忆起一个忘记的事情：半夜里醒来听到一些声音，父母的一些朋友在审问父亲，说他背叛了他们的组织。第二天孩子问父亲，父亲又无法解释。这也许也会造成创伤。

第九讲 精神分析的局限*

在照相之后我不知道该讲什么。

昨天我们讲了场景，导演如何安排场景。晚上回去在想：我骑自行车转了许多地方，但还未看过成都的夜景。于是我骑车出去看夜景，如同弗洛伊德当时听了许多东西不能公开讲，只能晚上讲。那么我到处转直到三点钟。

一点钟正好遇到一帮人在拍电影。我不觉得惊奇，因为有灯光。联想起未讲妓女/男妓的问题，为什么？有点奇怪。从巴黎到成都，卖淫都是被禁止的。尽管巴黎白天禁止妓女拉客，仍然有妓女白天在街上拉客，而成都未发现。我不是自己想找一个，你们不要认为我要去理发店。为什么成都有这么多的理发店？是不是说成都人除了打麻将之外就是去发廊？但是我发现发廊是空的，里面有许多年轻的姑娘在等待客人。跟我已经学了麻将一样，我也想去发廊，但不敢去，担心发廊是专门为妇女开的。一点半时行人很少，只有少数的人，但是发廊开着，里面是很有魅力的女郎，所以我也不敢，因为可能她们就是卖淫女。

我之所以讲这个事情，是想说弗洛伊德发现的是晚上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自己或者别人——父母做爱、妓女，发生在“地下室”，吸引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刚刚度过自己的童年。也许我对成都的发廊的想法错了。（听众：没错）我更希望我弄错了。刚才我讲的是昨晚的第二个奇遇。如果中国禁止妓女，但是到了晚上，却没有警察来干预，对此我会感到困惑。拍电影的有灯光，从而判断为电影；发廊也有灯光，但

* 时间：2000年8月23日晚7：00—9：30。

是不同，根据这样的符号来做判断，这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特点。

遇到的第三个事情，我认识了一个卖邮票的人，这个人学了七种语言。我与他谈话，目的在于使他的邮票能卖得便宜一点。一个姑娘来了，拿了一个本子出来写数字，写了简化字，然后是繁体字，仿佛是在追溯文字的根本。这个先生看了书名，然后在写，使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方法：一个人头痛，但是找不到方法解决，于是说。这里也是先写简化字，后写繁体，类似于解释。不同的是弗洛伊德是私下讲的，而这里是公开讲的。

然后通过卖邮票人的中介，我与姑娘聊起来了。她说自己是学经济的。她继续与卖邮票的人说。结果我发现她在找他算卦。我们听她讲她的父母。这个先生从简化字一直写到繁体字，到甲骨文，后者用来算卦。这个先生很对，他问姑娘的现在、过去、父母和家庭，并对照文字而判断未来。

因为刚才照相，有点忘掉主题了，现在才发现这正好要讲精神分析的局限。这个先生帮助别人预知未来，比如我明年也想再来，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来。精神分析让分析者回忆愿意讲的东西，这是过去在言说，而不是预知未来。在西方也存在算命，特别是在弗洛伊德所属的希伯来文化中。当时弗洛伊德的学生在法国写了第一篇文章，根据自己的经验——精神分析家讲的都是自己，分析结束所知道的，是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都会死亡。不要忘记我们不知道死亡的时期。

犹太人使用一种方法，如一个希伯来文字（2500年）的词根 R，分析词根时总是在晚上而不是在白天。2500年前的文本已经预言了现在的事情。犹太神甫晚上做这种研究，因为白天禁止做这样的研究。现在许多人承认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的逻辑，也可以预言未来。但是恰恰官方的宗教组织严格禁止人们预言未来。弗洛伊德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

精神分析是让你讲现在而揭示过去，所以其局限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不知道从现在到未来（的事）。为什么宗教组织禁止对未来的预言呢？因为如果能够做到，我们就是神，是上帝。而这正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如刚才那个先生做的预言未来的事情。类似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希伯来

文字的起源也是神启的；不同的是希伯来神甫禁止预言未来，所以弗洛伊德也说我的方法不预言未来。

也许在中国不禁止预言未来。这是东西方不同的。

弗洛伊德遇到精神分析的局限，就是他所在的文化中超越我所禁止的东西。

弗洛伊德的一个弟子在法国遇到一个女士，女士说有人给我算命，说我将遇到一个老先生。当这个女士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分析家并不说她是一个疯子。弗洛伊德在这方面未做什么研究，我也没有。当时她讲的事情显然是处于精神分析实践中，属于两人的私人对话，不过这显示的事情是：精神分析有一个限制，不能触犯这个限制。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这个界线是被禁止的；这个界线是不可能超越的。这里有一个选择，要么是被禁止的，不能违背它；要么是不可能的。虽然有精神分析家试图回答它，但大多数精神分析家都不去触碰它。

第四个奇遇，我遇到一个医生。我说我有病，所以我还不能说明年能不能来；而这个医生说：你很健康，一定能来。他就是在预言未来。也许基因研究可以使人不死。对未来的（事我）不可能知道，而现在的科学对刚才的两难问题是一种反驳。我就讲到这里。

听众：请继续讲一讲女性的阉割问题和幻想的问题。

吉：现在讲这个问题也许太复杂了，也许只能明天讲。关于幻想的问题也只能留到明天讲。

当时弗洛伊德听到许多女性讲，他自己并不懂女性的问题，而将之称为“黑色的大陆”。在弗洛伊德之后，有一个杰出的法国精神分析家比弗洛伊德多讲了一点。很早以前是男性在讲他们自己的经历，这个人说这些都是男人们讲的事情，小女孩的事情仍然很神秘，只有女性们自己来讲。他说实际上并不是女性未讲，大量的女性们来做分析，只是她们未在公开场合上讲。所以精神分析家说的是他们听到的，这与自己说的显然是不同。为了说清女性的问题，就需要女性们自己出来说、写，才能说清问题。

举一个例子：一男一女相遇，他们相互吸引，做爱，男的想让女的有一种享受。有些女作家受了精神分析的影响而写她们如何做爱和快乐。男的便幻想成为女人的主人，让女性如何快乐；这些女作家在写的时候说在女人身上发生的另外一种愉快，与男人所想的不一樣。她们有的成为精神分析家，说她们想的是另外的快乐。男人们由于生殖器的抽动而快乐，于是幻想女人也会由于生殖器抽动而快乐，于是发明各种方法进行抽动。这些男人虽然知道女人无男性生殖器，但是无意识地认为女人有，认为女人与男人一样。也许这多少能够回答女性阉割的问题。这很难回答，如同算命一样。问题在于女性如何获得快感。有女作家根据自己的经验讲女人的身体整体类似于男性的生殖器，不是具体的生殖器，而是全身的喜悦。

换到男性的角度，做爱时很有快感。女人提出如何让她有快感的要求，这时男人就会阳痿。这意味着她的快乐是和男人不一样的，这使男人害怕。我们打开了这个门，这些话也许不该在公开场合讲，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些话。

小女孩如何呢？我只讲了做爱的事情。实际上进一步追究，做爱时有一种快乐，孩子在母亲怀中互动也有一种快乐，也许类似于做爱的快乐。在此情况下，两个人做爱时回到了童年，遇到了童年的快乐和困难，与母亲在一起的快乐和困难。有一些母亲和姑娘，她们会说一句话：“当我把奶头给男孩时，他的生殖器勃起了，当给小女孩时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她的快乐而看不到证据。”因为母亲自己也看不到，小女孩没有生殖器。精神分析家都说女孩子没有性器官。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萨特，遇到一个杰出的女性，即波夫娃，《第二性》的作者。她认为女人也有生殖器，尽管看不到。

请大家发言，如果有女士讲的话我会很高兴。

法国有一个说法：有个问题让大家有点不舒服，让大家沉默。在精神分析家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不舒服和沉默。

精神分析还有许多其他局限，你们可以想象。

讨 论

听众：中国女性不认为自己是具有缺陷的男孩，相反认为男孩是做错了事而增加了一个东西。

吉：我很高兴你不是提问而是提出你的回答。在你的回答和我们以前所讲的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东西：为了惩罚，要么割掉一个东西，要么增加一个东西。虽然这个问题在女性中和在男性中还不清楚，是幻想。通过同性恋者所做的分析，两个男性，一个扮演男性，一个扮演女性，从中可以看到男性中也有女性的因素。之所以要扮演女性，也有一个生殖器穿透的问题。其中扮演女性的同性恋者做分析，说当我达到性高潮时，全身都是快感，忘记了自己男性生殖器的存在。所以他们说，他们是一些高级的人，因为他们有男性生殖器，能穿透，同样也能被穿透。

听众：什么是阴茎嫉羨？

吉：这个所谓阴茎嫉羨，是弗洛伊德创造的（名词），是因为你有了缺失。后来一个法国精神分析家进一步说欲望——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一旦将嫉羨问题转成欲望，对于女性而言好说，因为她们缺阴茎。但是对于男性呢？男人为什么找女人呢？你有阴茎，还缺什么呢？为什么不手淫呢？法国精神分析家说男人因缺而缺。这个缺失通过同性恋者的倾诉，特别是扮演女角的一方，可以看到所缺的是身体的快感。也有人认为男性生殖器让他非常痛苦，想让它勃起的时候它不勃起，不想让它勃起的时候它却勃起，如同是对他的惩罚，如你们中的一位刚才所说的那样。

我不希望大家产生一个印象，即精神分析家认为所有的男人都应变成同性恋。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成为同性恋者。同样，也有女人成为同性恋者。希望女士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听众：有没有方法缩短分析的时间。

吉：有，那就是最好不做分析，如此，时间为零。另外一个方法尽可能讲得很快。但是只有在受到惩罚时才会这样，而精神分析不惩罚你。我们两种奇遇，一个是精神分析的奇遇，一个是生命的奇遇，显然前

者短于后者。举一个例子：头痛先生，为了避免长的分析而不做分析，从而终身头痛。一个哲学家说生活在于活着很好，精神分析家要说的也一样。

另一个例子：有人要我的简历，我给了部分简历。我做了6年的分析，在一个女分析家那里，对她有一种热爱，之后仍然将她作为督导，继续向她讲述，持续了30年。正是这个分析，使我能够到这里来讲这些事情，否则我只能讲我的脚上有一个包等等。如果没有做这么长的分析，我就要讲脚上的包，大家就不会与我照相。之所以我还继续分析，是因为我大脑中还有东西要讲出来。

听众：请多讲一讲限制。

吉：弗洛伊德说过，那些来接受分析的人是适合分析的人。有一个同事被杀了，但是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不清楚的，唯一能知道的是分析者不愿意讲——有更多的东西，所以有杀人的行动，这不能预期。

第十讲 再见*

我的一个成都情人送我一鞋垫。

昨晚我遇到了我的局限，无法问答你们。

刚开始时我不知道你们来自何方，只知道你们对精神分析有兴趣而并不专门从事精神分析，所以我为自己定了一些限制。我做自由联想，但在分析中，所以毕竟不是分析中的自由联想；而你们也提问，不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家。逐渐地我放开了一些限制，比如昨天晚上我讲了性的快乐。不知这样做合不合适？

尽管如此，今天早上在讨论班上走得更远，因为（早上的听众）他们接受分析，又有理论训练。不过我在昨晚还是走得太远了一点。但是精神分析就是这样，每一次都比上次讲得更多。

弗洛伊德仍然承受不了病人的某些述说，他毕竟只是做了自我分析。Deutsch 是第一个女性分析家，在弗洛伊德那里接受分析。Deutsch 接待了 Tausk 先生，Tausk 讲了许多事情使 Deutsch 大受触动，所以 Deutsch 在弗洛伊德那里做分析的时候大谈 Tausk 如何天才，如何比弗洛伊德走得还远。一天，弗洛伊德实在受不了，说，你要么停止谈 Tausk，否则我就停止你的分析。Deutsch 只好停止谈论 Tausk，同时停止了跟 Tausk 的分析。Tausk 就自杀了。

不能简单地说 Tausk 的自杀是弗洛伊德的错，但由此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限制。Tausk 接受了许多精神病院的病人，而这是弗洛伊德未做的。Tausk 不是一个精神病医生，仅仅是一个分析者，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接

* 时间：2000年8月24日晚7：00—9：30。

待了许多妄想狂等病人,并根据这些接待写了书,在德国和法国很有影响。

因此,精神分析也是有限制的。分析家不是上帝,有自身的局限。

每一个新的来接受分析的人对于分析家来说都存在知道的有限性,都是崭新的。

我的一个例子:在同事的会议上,遇到一个攀登喜马拉雅山的人。当时这个会议的主题是精神分析的限制,邀请这个人来讲登山的限制,8500米,超过之后就有危险。过了这个限制之后,他的感觉很奇怪,他无法预期会发生什么。

精神分析同样有这个限制。当一个人刚来分析时,你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不过登山是真实的死亡,精神分析是一种奇遇,我们只知道会失去什么。比如我多次举的头痛先生的例子,他将失去头痛,和“我的妻子,我的汽车”等等。

而精神分析家则可能失掉他的理论,因为理论可能解释不了这个新的例子,因为他的理论如同头痛先生的“我的房子”。要失去理论时有两个可能:传统的人不愿意失掉;而开放的人愿意部分地失掉——修改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与登山是一样的,都有局限,都要失去。

法国有4000名分析家在工作,其工作与理论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倾听。只有极少数的人——如一个刚去世的人——建立理论,这些少数的人是天才。而精神分析家不是理论家,只是倾听,哪怕是接待长期分析的病人,每一次都是崭新的倾听。

绝大多数的分析家是在分析室里倾听病人,还有一些人移动到精神病院等等,实际上这是对精神分析的限制的一种超越。这些活动都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要求理论有一个修改。

在监狱、精神病院,原来的理论是无用的。举一个个人的例子。

我在一个妓女中心工作,将街头妓女引到咖啡店,试图让她们离开妓女这个行当。第一次接待妓女时,是在办公室,她很不习惯,因为她与男人在一起就意味着挣钱。最后她明白了我不是她的客人,于是开始谈话。她的眼睛如三星堆的纵目,是突出的。她讲这个,讲那个,说自

己的病。我有医学背景，很快地认为她有甲状腺炎。也许三星堆的纵目也是由甲状腺炎引起的。她未讲眼睛，讲了许多症状，我猜测她有甲状腺炎。她说，你什么时间付钱做那种事情，我说你有一件事未谈，未谈你的眼睛。她说曾去医院治疗，当快要消除症状时却停止了治疗。当时我只有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个理论说人们希望消除症状。可这个病人却在快要解除症状时停止治疗，为什么呢？那么，她继续解释，是因为她有鼓的眼睛，大家都叫她鼓眼睛姑娘。如果治疗好了，大家就会换了一个名字，别人就找不到她了。所以，她拒绝治疗是为了维持一个身份，维持一个好的客源。

当时的分析家和许多接受了分析的精神病学家，双方有一个讨论或者争论：如何面对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病人的那些病人。

在精神病院，我们总是进行分类，如强迫症、癔症、孤独症、妄想狂。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人独特的名字、社会背景等等。当精神病学家和分析家在一起开会时，有人建议做一些统计，看一看存在着什么联系。但是张三与李四毕竟不能混淆，如何统计？统计需要相当大的人群才有效，而且还需要对这个人具有相当的知识，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统计、分类，用某个特定的药治疗某个特定的病，这可以维持一种社会关系。但是个体的独特性使人们对统计方法提出一个置疑。

这并不是对精神病医生的批评，也有一些精神分析家进行分类和诊断，因为他们在大学中所接受的教育而要求一般化。现在大家达成共识，就是叫病人的名字，如张先生，李先生等等。

我们接触到这个局限性。还有一些孤独症的孩子。精神分析强调倾听，但是这些孩子不说话。有些精神分析家与他们单独相处，可能孩子会讲出一句话，很有意义。比如“父亲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是通过母亲的口而说出来的，实际上是说她失去了一个男人。

在孤独症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不能讲，但是父母能够讲，能够表达因孩子的病而承受的痛苦，通过他们痛苦的减轻可以间接地帮助孩子。这是无法统计的。

我们现在遇到时间的限制，我准备结束这个演讲。也许我讲了许多，上午讲了三个小时，晚上又是两个小时。也许这些话没有用，如果其中有一句有用，我甚为欣慰。感谢大家让我有了这个机会，感谢霍大同的翻译，使我们之间有了交流。我离开了，但霍大同还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我能够到这里来，首先是由于霍大同超越了一个国境线，超越了一个语言的界线。

讨 论

听众：病人讲了之后说没有话了，怎么办？

吉：霍大同他们回答。

听众：你像阿兰德龙。

吉：应该说他像我。

听众：法国的理想女性的标准是什么？

吉：就像你的这个样子。

后 记

我受了7年的精神分析，我的分析学家是 Piera Aulagnier，她是一个女的。从第3年左右起我开始做精神分析的工作，我的控制者是 Gisela Pankow，她的老师是 Deutch，控制时间为7年。在结束分析之后，我又多了一位控制者，他是 Lucien Kock。他们3位都是拉康学派的成员。我经常听拉康讲演，并有3次与拉康接触，其中一次是5分钟，这个5分钟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中国的家族很重要。

索绪尔讲结构，但是他不讲性别；列维·斯特劳斯讲结构，但是他不讲语言。拉康并不仅是补充了性别和语言，他工作的领域不同，他向前走了，与前二人一起构成了结构主义运动。

在拉康看来，没有语言就没有图像。

吉布尔先生于9月2日下午2:30离蓉，前往上海，次日回巴黎。

“创伤理论”专题讲座*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张晶艳、张海燕 / 记录

张海燕、郑禹 / 整理 谷建岭、刘瑾 / 编校

* 编者按：米歇尔·吉布尔先生于2001年9月24日乘飞机从北京到成都，自去年八月后第二次访问成都精神分析小组，并带来了“创伤理论”的专题讲座。以下刊登的是吉布尔先生的讲演和现场讨论的记录。

第一讲*

(吉布尔教授给大家播放从法国带来的录像)

希望在看电影之前通过翻译讲几句话。我非常高兴一年后又到了中国。去年与大家一起工作，我不知道给你们带来了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发现你们给我带来了许多，当然还包括北京的田女士。希望以后我能继续介绍法国的精神分析家到成都来工作。我回到巴黎后，收到今年暑期在成都工作的 Simone Lamberlin 的电子邮件，在 Email 中她说在成都工作非常愉快，来成都之前我和她还没来得及见面。去年通过霍大同的翻译知道大家对拉康很感兴趣，去年我们也学习和评论了作为精神分析家的拉康的最初的两篇文章。之所以选择这两篇论文，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标志着精神分析从奥地利传到法国。现在的中国的情况类似于当初的法国，因为精神分析正从法国传入中国。

今年的讲座相对于去年的有些不同，今年我们讲精神分析的创伤理论。讲创伤理论的目的是通过这个题目讲一讲我所理解的东西。我会写中文“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地”、“精神分析性”。但是不会写“创伤”。请霍大同写一下这几个字。

(霍大同在黑板上写下“创伤理论”)

我们首先讲一讲创伤的含义，最早它来源于希腊语。也许在中国“创伤”代表更多层的意思，我不知道。我先介绍一下今晚的电影。二战给欧洲、

* 9月25日晚 7:30 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电教室。

给全世界带来了创伤，包括身体的创伤。战争这个概念，在某些时候是把某些东西放到秩序中，可以带来痛苦、可以带来创伤性意义。战争与创伤是不一样的，二战期间纳粹惩罚精神病人、精神病儿童、犹太人，这不是战争，而是创伤，更进一步说是谋杀。我把介绍这个电影作为我的讲座的第一部分。这个电影全世界都在放，但中国还没有。我把它作为礼物带给大家，大家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只是要尊重版权。电影中用了许多语言，但都有英文字幕。

（两个半小时的电影）

电影很长，不可能在今天放完。对我而言，放录像只是我讲座的引论，引出九、十月份我所要讲的东西，引出的内容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犹太人被杀的，这对于我，对于精神分析家，对于西方人，都是创伤，对于欧洲人、美国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来说也都是。这个创伤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电影中正好出现了纽约的两幢最高的楼（注：2001年9月11日它们被炸，六千多人丧生）。这个创伤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创伤，在这里只是先引入“创伤”，然后从这里我们再接下去讲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创伤”。大家讲一讲看了录像之后的感受吧。

讨 论

听众：比较枯燥。注意到电影中有一人始终在笑，他说生活既有欢乐又有痛苦，很同情他。

听众：不是很明白创伤这个概念。

吉：战争从人类开始就有，是两个武装集团之间的事。而希特勒的政府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观念试图杀死全部的犹太人，而犹太人手无寸铁。这是全新的，所以是创伤。

听众：这是不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拍的，而不是从更深的角度？

吉：所有的人都找不到话来说关于犹太人被杀的这件事。导演与精

神分析家讨论之后决定用话去刺激人们，让他们说。战争可以说，而这件事却无法说，所以是创伤。关于希特勒杀犹太人的事情有许多书和电影。这个导演不想重复。他抓住了人们无法表达、无法理解这一点，并将一切放在波兰美丽的自然风光下进行对照。电影中的人物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它是创伤。有许多关于大屠杀的电影，在电影中都展示尸体。二战结束后许多人谈到犹太人的尸体，他们中的有些人为此感到愉快。例如这部电影中的波兰人边说边笑，像是在说一件好笑的事。许多人把痛苦当作享乐的游戏。这个导演不想这样。实际发生的看不到，只能听到，让人说，然后听见。

现在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它说明为什么这个导演不显示一个实际的屠杀的场面。我曾遇到一个人，他说在15岁的时候读中学，老师让他们看一个电影《雾的夜晚》，是关于集中营的故事，电影中有许多尸体。这个15岁的孩子说从来没有见到父母是裸体的。如果他看了现在这部电影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不是分析，但是它让别人说话，实际上是做了一次社会的分析。

战争创伤与精神分析的创伤有什么不同？弗洛伊德在什么意义上讲创伤这个概念？战争引起许多问题，可以讲出来，人们为战争立碑。而这个电影所展现的是人们遗忘了的、不能讲的东西，是一种知道的、传递的缺失，是它们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创伤。纳粹杀犹太人的时候尽可能消除一切痕迹，这与战争很不一样。

听众：不是全部的人都忘了。

吉：是的，但只是存在于大脑中，不能说出来。电影中的那个以色列人说“这是我第二次讲，第一次是在一个控诉纳粹的大会上”。

那么要注意希特勒不是反闪族主义，因为有了对方也就没有了他存在的意义，所以他并不反闪族。这使我想到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争论，许多精神分析家都不喜欢看荣格的书，因为他曾宣称自己是纳粹，但据我所知荣格并不是纳粹，他只是反闪族，但他并不是要杀死犹太人。

就像我这次在北京田女士那里才知道重庆人不喜欢成都人，但他们

并不是想把成都人都杀死，同样成都人也不喜欢重庆人，但也容忍重庆人的存在那样。看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兴趣。那么这种讨论就属于文明的范畴，如果田女士到这里来她会说成都人怎么怎么样，你们成都人也会立即会说重庆人怎么怎么样，但如果哪天重庆人拿起枪把成都人杀了，再放一把火，就属于野蛮的范畴，就会出现一个断裂。弗洛伊德当时对神经症患者的看法就是让他离开沉默，让他说话，这是一个文明的东西。但39年后文明被破坏了，我们不断看到有人炸南斯拉夫，这次又有人炸世贸大厦，文明被破坏。我又想到非洲部族之间的冲突、比利时要审判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沙龙。昨天有人问我如何看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只有你们去说，但至少它是一次革命，就是符号的；至于现在的恐怖主义是不是革命，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它是符号秩序破裂的标志。革命与符号是连在一起的，希腊神话中儿子杀掉了父亲，就是符号。从我的角度讲，第一，革命与符号性持续连在一起；第二，西方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是符号的表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自然灾害，就有大跃进。

第二讲*

昨天的电影涉及到欧洲的问题,很难去抓住它对西方世界的重要性、对世界意义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精神分析界的重要性。

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对犹太人所遭受的厄运曾经有个讨论,那时拉康在教育界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回到弗洛伊德的意思是我们要对弗洛伊德著作进行重新阅读。弗洛伊德在二战前夕从奥地利流亡到英国,在英国去世。他之所以能从奥地利逃出,是因为他是世界性人物,但他家庭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死在了纳粹集中营,包括他的三个妹妹。那时,希特纳希望把犹太人这个种族全部消灭,犹太籍的精神分析家大部分流亡到美国,精神分析的书籍也被焚毁。流亡到美国后他们继续从事精神分析工作,但他们却忘记了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这些精神分析家就是IPA的精神分析家。拉康批评他们遗忘了这些事情,而且他们甚至还不愿意听他人讲起这些事情。在这点上拉康的理论认为社会政治事件与精神分析是有联系的,并由此提出了他的创伤理论。

这个电影拍了14年左右。许多分析家认为创伤理论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拉康注意到一个问题,即“死亡营”与“集中营”这两个词的区分,其区分表达的是:战争——在一个特殊事件中发生的事。西方的战争是有战争规则的,这些规则是一些符号性意义的东西。在西方最重要的战争协议就是日内瓦协议,协议中提到不能攻击平民,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如果其中一个不尊重此协议,就犯了战争罪,国际法庭就会审判这个国家犯了战争罪。战争中的法律、罪恶、审判均属于

* 9月26日下午2:30—5: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11室。

符号性事件。但符号性事件在二战中有断裂，希特勒在发动战争后就屠杀了国内的犹太人、精神病人和战败国的犹太人，这些做法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协议，是对人道主义的侵犯。

精神分析是诞生在犹太人中间的，犹太人与精神分析有很紧密的联系。

二战是人类的一个断裂，一个创伤，是在符号世界发生的断裂。

昨天的电影就是想建构一个创伤理论。

“伤痕文学”中的“痕”很有意思，与昨日电影联系在一起。我们听到了以色列人说：“对屠杀犹太人事件有遗忘，因为说不出，就应该遗忘。”因为不能遗忘，就处于沉默中，电影中的人物经常笑（有时是痛苦的表情），导演就努力让剧中人说出来。

为了做这个电影，导演花了14年时间，找当时事件的证人、旁观者花了很多时间。导演强迫这些人讲出来，寻找这些痕迹。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痕迹是曾被遗忘的，导演希望他们能重新回忆起来。电影中看到老犹太人不愿意讲，他女儿奇怪爸爸为什么不讲，是女儿及导演促使他们讲。在电影中看到采访受害者、波兰农民、纳粹分子等，述说困难存在于受害者身上，不是在纳粹分子或旁观者身上。我在做精神分析时曾遇到一个纳粹分子的孩子，孩子相对容易些。导演曾寻找地面的痕迹，并通过这个行为来让他们说出来，痕迹很重要，生活中存在很多痕迹，但被大家遗忘了。以色列人觉得这不是好事情，希望它消失。如果他是想让痕迹消失掉，这个痕迹就存在，如果不存在，就没有必要让它消失。

回到昨天的问题，战争与创伤的区别，战争会留下痕迹，如坟墓、纪念碑、军功章、宣传册等，大家会去说这些事情，而创伤却是试图把痕迹消灭掉。

希特勒1939年进攻波兰时签署的文件现在就找不到了，杀掉所有犹太人这个命令是通过口语传递的，不是通过文件传递的。在电影中，死亡营与集中营是有差别的，但在死亡营中找不到毒气灶的痕迹，纳粹希望把这些痕迹抹掉。二战时德国有很多集中营，他们把战俘和农民关在

集中营。根据日内瓦协议，他们要养活这些人，他们没有把集中营的设施痕迹抹掉。而死亡营的情况就不是这样，死亡营中的焚尸炉是保留下来了，因为德国人是新教徒，新教的人死后就被焚烧，所以焚尸炉在全国各地都有。因此，纳粹就没有把焚尸炉毁掉，毁掉的是杀人的毒气灶。我们可以看到在受害者与纳粹之间有共同点，他们都想抹掉痕迹，这是很基本的一点。

拉康告诉神经症患者“有 1001 种方法可以抹去痕迹”，罪犯与受害者同时都有 1001 种方法抹去痕迹。弗洛伊德研究俄狄浦斯情结，儿子杀掉父亲被认为与此有关系，所以神经症患者也处在一种罪恶之中，他们也总是想抹去痕迹，而创伤理论就是要重新找到痕迹。人们总是想让罪恶的痕迹消失掉，那么就留下了一个完美的罪行——没有痕迹的罪行，但抹掉痕迹的行为所留下的痕迹却不能消除，消除痕迹的努力本身留下了痕迹。从这种意义来说，我们就看到了痕迹，弗洛伊德和神经症患者一起创建了精神分析，他没有分析战争，但他仍然把罪行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把正义与罪行联系在一起。

弗洛伊德说法官审判一个罪行，而精神分析家做分析时从癡症中看到罪恶，二者之间有差异性，法官所做的工作是经过审判知道他犯了罪，精神分析家所做的工作是让处在分析中的人知道他犯罪的行为。

弗洛伊德通过自我分析发现了自己杀父的愿望，因此他认为人人都有此愿望。但现在分析家在说俄狄浦斯情结时很慎重，只说愿望，却不说是 Oedipus 的愿望。拉康认为有愿望是因为有缺失，不是没有愿望，既然愿望因缺失而起，人们就总是试图遗忘掉这个愿望。中文翻译成“愿望”这个词不准确，法文中“愿望”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愿望。法文中说爱一个女人就是说欲望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和拉康谈到欲望中有谋杀，死亡的梦也许与杀掉父亲和母亲的愿望有关。

拉康认为先有性欲望、享乐，带有死亡的享乐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这点和弗洛伊德是一致的。弗洛伊德认为欲望是无意识的。电影反映的是社会学的东西，精神分析家所做的工作与社会工作者所做的工作都是

让痕迹再现。

重要的问题是痕迹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是可以讲的，但对这次屠杀人们找不到词来说。压抑导致言语的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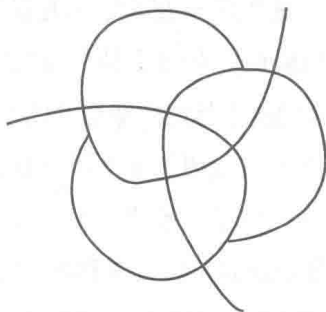
之所以有词的缺失是因为断裂，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断裂，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断裂不同。不仅是受害者缺乏这个词来言说，精神分析家也缺乏这个词来倾听。电影中可以看到这些受害者由于词的缺失不能离开沉默的状态，他缺乏用词来说明他为什么没有被纳粹杀死。

在电影中看到证人回到死亡营现场，谈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被杀死，并且看到了他们的尸体，他为什么没有拒绝搬运他们的尸体，当时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没有说，因为没有词能够表达。

有这样一件事情，在苏联被抓的俘虏中，有位妇女，在转移集中营时看了一个男人一眼，德国兵问她为什么看那个男人，这位妇女说那是她的父亲，德国兵问完后就把她父亲打死了，这位妇女后来认为是她造成了父亲的死亡，在分析时她也是找不到什么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这种词的缺失现象在拉康的概念中被称为实在，始终找不到词来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被称为实在的东西。

这样的范畴是弗洛伊德所没有考虑的。符号——想象——实在，拉康在讨论这三者关系时画了拓扑图形，形成一个结：



神经症就是这样运作的。如果把一个结砍掉，整个结就会松掉，如果这个结分开，就是精神病。纳粹杀犹太人就是符号序列的断裂，使得

这三个圈散开，也就成了集体的精神病。如果没有一个言说来表达实在的东西，那么实在的就是独立的，既不能说，也不能想象。世贸大厦的双塔已不存在，恐怖分子患了一种集体的精神病。

实在的序列无法言说。

第三讲*

(吉布尔在三天中连续掉了两部自行车)

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我尽管受到很大挫折,但还未变得疯狂。一战时,两边军队对峙,弗洛伊德寻找到一个词来描绘战争——“恐怖”,恐怖的战争持续了两千年,恐怖的事件具有它的位置,在历史上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了,但仅仅是一个事件而已,类似于我掉自行车的经历,尽管我很生气,但很多人都会对我说这很正常,这种事情出现是因为社会组织出现了问题。

战争有它的位置和它的法律,我们能够用语言来表达它,属于符号世界的事件,作为符号性事件,并没造成裂口、断裂,与创伤是不一样的,因为创伤在符号序列中造成了缺口,创伤留下了痕迹,任何人也无法去消除痕迹。二战后,法国每年都要纪念,给战士授勋,痕迹清清楚楚地存在,这些事件也都记在历史中,可以传递下去。

拉康引用了弗洛伊德的释梦,讨论妙语,对此进行重新阐释。弗洛伊德没有和精神病患者工作,就没有机会看到这种创伤的问题,拉康的角度与弗洛伊德的角度有区别,他能看到创伤的问题,这种创伤是找不到言辞来表达的。例如,爷爷得了精神病,家人就把他关进精神病院并且不能讲——不让别人知道,这就是创伤。

1932年,拉康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博士论文,这正是他从医生转向精

* 9月27日晚7:30—9: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11室。

神分析家的过程。

精神分析是通过这些精神病患者创立起来的，另外语误、梦是在医院里而不是在大学里创建起来的。因此，精神分析是不可以像大学里老师教授给学生那样教授给学生的。在大学中是师生关系，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而精神分析家却不这样做，那里没有师生的模式，否则就没有精神分析。

犹太人事件是社会的精神病，二战与此不同，是集体的精神病，关于集体的精神病有很多研究，但并没有发明出什么东西。精神分析在大学中也讲，也没有创造出什么。拉康也大讲集中营，却未讲死亡营，前者每次战争中都有，而后者却不一样。拉康接近这个话题却讲得并不彻底。

拉康接近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有位女患者是奥斯威辛死亡营的幸存者，她在分析室讲了她的经历，后来她成为了一名精神分析家，她的名字叫 Anne Lyse Steve，正是她和拉康创造了小 a。如果她的名字是 Annalyse，就成了分析。拉康认为 a 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但 Anne 认为是在讲述奥斯威辛时自己讲出来的，她说 a 是纳粹把人看作大粪，简约为对象、客体。所以精神分析的理论是在精神分析实践中创造的。

Anne 也是那部电影导演的朋友。那位导演也不是学院派，他在大学之外发现了另一种电影的语言：面对集体的精神病，我们处于沉默中。

为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科学在其中的运用，纳粹禁止人们把犹太人叫作犹太人，他们叫犹太人为尸体，叫他们为图形或大粪的图像，小 a 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用了所有的科学知识是为了使大屠杀行动更为有效。纳粹从 1937 年开始就从家谱中了解哪个是犹太人，让学校的研究者做这些研究，动员了石油、煤气工业等，研究怎么样降低杀人的成本，也动员了精神病学家鉴定哪些人是不值得生存下去的人。德国的精神病学家签署了这个文件，他们说所有的努力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善的价值来实施这次屠杀。同时还动员了所有的铁路运输，把这些人送到波兰，运输中还让犹太人相信这仅是一次旅行，甚至不少犹太人自己付了车票钱。纳粹企图把他们的罪恶目的掩盖起来。

以上所述，帮助我们了解拉康所说的主体，这里的某一个东西在西方哲学上很重要。黑格尔讲了主-仆，而拉康的 subject-object 支撑在黑格尔的主-仆概念上。科学的 subject 就是把犹太人还原为 Viren（病毒）。

孩子姓了父亲的姓，就进入了符号世界，法语中 Nom（姓）与 Non 的发音相似，这个“父亲”就是说“不”的人。父亲是不能与女儿睡觉的，如果一个父亲与年幼的女儿有性关系，这种发生在沉默中的事情，违背法律、道德，会导致一种断裂，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女儿或父亲均有可能。父亲会嘱咐女儿不能告诉家人，否则便杀死你，这种家庭中发生的事和社会中发生的事有一种对应。

讨 论

听众：即使犹太人还原为 Viren，符号序列始终存在，何以断裂？

吉：当然这个命名是存在的，但和符号序列的断裂是两回事，后者趋向于将之还原为 Viren，但即便断裂，仍有命名存在，如在一个家庭中女儿与父亲的性行为，精神分析家可以命名为“乱伦”，如果 20 年后你在精神病院遇到了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无法说的。所谓断裂是三者关系的断裂，造成混乱，而并非符号序列不存在。

听众：是否 a 是无法言说的？

吉：是。a 是无法命名的，拉康有一个概念：

Verwerfung → Forclusion du Nom（因过期而权力丧失）

du significant（父姓能指的丧失）

Nom（姓）→ Non（不）二者发音接近

父姓即为符号，父姓一代代传下去，父即是说“不”的人，是建立法律的人，是父姓（法律）在言说“不”，即这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某个爸爸，而是指符号性的父亲。如果父姓能指丧失，父姓的文化丧失了，就会有行为的混乱。

听众：父姓的丧失与海德格尔“存在的遗忘”有何关系？

吉：似乎没有关系。近年来发现的档案认为海德格尔是纳粹，他的老师胡塞尔及妻子是犹太人，被赶下台而由海德格尔接替。现在不少分析家在研究海德格尔与拉康的关系，他们也遗忘了海德格尔是纳粹，“存在的遗忘”。相对于“存在的遗忘”，拉康发明了一个词，即 *desêtre*（音），这次可能讲不到这里。我感兴趣的是，不少人包括拉康都和海德格尔是朋友，似乎遗忘了这一事实，这才是“存在的遗忘”。

un panner：故障

dépanner：消除故障

如果海德格尔的状态为：存在即是我处在故障的状态，因此就需要 *dépanner*，也就是 *être* 的状态。

海德格尔说存在时，拉康理解为人和人粘在一起，而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家就是要把粘着砍开，让人独立，精神病人处在 *panner* 的状态，分析家的工作就是 *dépanner*。

海德格尔说存在的源头在希腊，希腊文化不仅创造了西方哲学，而且创造了基督教，而拉康信奉天主教，所以他说集中营而不说死亡营。

我不断地说 *Jews*（犹太人），也许我的姓是源于希伯来语。

第四讲*

所有我讲的都来自于我讲演的题目，直到现在我还未谈到何为精神分析的创伤理论，不过我围绕这个话题讲了不少话，可以看到一个线索，通过对精神分析的阅读，我们知道什么叫创伤，精神分析家面对的创伤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伤。

精神分析家对某个人的工作就是在做创伤的工作，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沉默。电影中人们沉默表情的拍摄来自于导演，有很多原因使人们处于沉默之中，根据电影可以看到没有什么词可以让人从沉默中离开。

弗洛伊德认为患者在治疗中的沉默，是因为他脑子中出现的词可能与医生有关，与对医生的进攻性有关，这个词说不出来，这是一种阴性转移。在治疗中应该对来访者进行解释，帮助其走出来。治疗中的沉默可能与幼年期的焦虑有关，沉默也可能不是自愿的，但 mutisme 是自愿地沉默，即我不想说，mutité 是指聋哑人丧失说的能力。弗洛伊德还说 mutisme 在梦中是以一个死亡的表象出现的。我们能看到的死亡与聋哑的问题是不处在符号领域中的，死亡在西方意义上是属于符号界的，生-死都是和符号联系在一起的。死亡有个神话的表象，如魔鬼之灵等。弗洛伊德没说死亡的原因，只说有死亡，正是概念的符号性的构造。

我们说某人被杀，就反映了符号界的断裂，因为法律规定不准杀人。如果报纸上登消息：某某人被杀，杀人犯可能就被抓住、判刑，受到惩处。但是杀人者的结果却是很长的符号性序列。弗洛伊德没在破碎的符号界

* 9月28日上午8:30—11: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11室。

中工作。

弗洛伊德说的 *kränkung*（神经症）是很生僻的词。那些来倾诉的人处于 *kränkung* 状态中，是因为他们曾经被羞辱，因此，他们处在沉默中。精神分析所做的是为了让患者离开沉默。这些人说受到羞辱、伤害，弗洛伊德认为这是文明的一部分，符号世界的一部分。这里弗洛伊德就定义了文明，他认为一个人杀另一个人是不文明的，但一个人羞辱另一个人说“杀你这个猪猡”则是属于文明的。

文明与话语联系在一起。

在文明之中存在羞辱与辱骂，有些人可以对骂，有些人受到羞辱就处于沉默中，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让他们离开沉默，弗洛伊德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分析就是一种心理治疗。

弗洛伊德的父亲在街上走时被别人把帽子打到地上，他什么也没说，捡起帽子就走了。这象征着反闪族主义，仇视犹太人，这件事让弗洛伊德的父亲沉默，对弗洛伊德影响很大。

反闪族主义的行动处于符号世界中，希特勒并不是反闪族主义，反闪族主义依赖闪族人的存在，如果他们不存在，反闪族主义者就会很痛苦。

弗洛伊德认为对神经症患者的治疗就是让他们走出沉默，当时还是文明的背景，但 1939 年以后，这个文明就被希特勒打碎了，这个破碎在后来不断重复，如波黑冲突、非洲的种族屠杀以及这次纽约世贸大厦被袭就是例子。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都是文明的范畴，但恐怖主义却是文明的断裂，革命的概念与符号世界联系在一起，如希腊神话中儿子杀掉父亲，是符号意义的，更一般讲，年轻的杀掉年老的从而获得权力，这就是符号的序列。

对毛泽东的崇拜是符号性的。

我们已经讲到弗洛伊德当时让患者从沉默中走出，显然患者来就是向精神分析家讲什么东西，尽管困难，但还是不得不讲。但 1939 年出现了断裂，而我想说的是精神分析自身也是作为创伤存在的。当弗洛伊德说到让患者走出沉默时，他有一个假设，即这一困难的任务是可能被解

决的，这样才有进一步治疗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本身被质疑，因为弗洛伊德本人没有和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打交道。我们不能把弗洛伊德看作是神，或是神话般的奠基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有一个东西弗洛伊德提得很少，没有反复地推敲，那就是他本人已有多年的口腔癌的历史，影响了他说活，在德文中 sig (moud) 就是嘴巴的意思。精神分析就是让人说，弗洛伊德的工作就是让患者说，用嘴巴，但他自己的嘴巴却出了问题。从医学角度的解释是他抽烟，也许这正好能回答我自己为什么不断地抽烟又不断地掐掉烟头，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弗洛伊德患口腔癌有 23-24 年，也接受了手术，手术就意味着打开一个缺口。经历了这样一些痛苦后，说明了他不是一个神话中的人，而是一个普通人，他仍然继续吸烟，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症状，于是我们可以问弗洛伊德在哪个地方仍然是没有被分析到的。刚才有人问我抽烟的习惯动作，这显然是无意识的，抽烟会生病，但我继续抽，显然我也应该去找一个精神分析家，这个问题没有被分析。

但弗洛伊德得了癌仍然抽烟，这就和神经质联系在一起。大量的精神分析家也和弗洛伊德一样抽烟，但更奇怪的是人们在利用科学手段不断研究烟，农业学家研究如何让烟叶更优质、烟生产商研究如何让烟更爽口；还有武器军火的买卖，这次炸掉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也利用银行的资金来实施他们的行动。他们都在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于是我们不得不问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想到天命的问题，如果天命已绝，皇帝就会被推翻，所以皇帝和天就有一个盟约，必须顺天意而为。但西方世界却不是这样，做了许多对老百姓的坏事，按西方世界的话语来说就是价值的丧失，但什么是价值呢？有人说价值就是美元。比如艾滋病的问题，sida，最先大家以为是同性恋的问题，如果只是这样就可以把同性恋送进集中营把他们全杀掉，但后来发现还有毒品的问题，通过针头的注射有一个艾滋病毒的感染。在 sida 的检查中发现和细胞 t4 有关，当这个细胞增加，病就更严重。在德国有一个部门，在动物园的旁边设有一个名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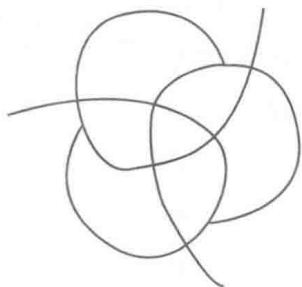
4tiertgartin 的机构，里面的医生负责精神上有问题的患者，那些人有一个计划就是屠杀所有精神上有问题的人，计划就取名为 t4，所以现在艾滋病的细胞也以此命名，生物学家做这个命名并没有想到这个和四、五十年前的经历有关系。但为什么这样命名我也不知道，也许有他们的理由，但也许有无意识的联系。

不管生物学的问题如何，但这里确实看得到一个联系。这就回到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命名的同一性中关于科学的主体的问题，上面的 t4 代表着一个科学的主体，而这又和下面的 t4 联系在一起，拉康说科学的主体就是让人类消失的那些东西，主体的消失不是在文明的意义，而是通过谋杀让主体消失。至少拉康在讨论科学的主体的时候，他和导演认识到科学的主体就是对人性的谋杀。我现在想到了污染，这也和科学连在一起，没有科学就没有污染，布什退出东京反对大气污染的条约，是因为他说这样会使美国的经济衰退。拉康创造了一个无意识主体的概念，是在科学的主体的概念之上提出的，如果没有笛卡尔提出科学的主体就没有拉康的无意识主体的提出。

讨 论

听众：关于您讲的创伤，为什么符号界可以分裂出去，而实在界和想象界却始终联系在一起？

吉：这个问题很复杂，拉康在回答别人问题时总是回答得很简单，他创造了一个词 *responsire*，使人想起 *responsible*。拉康有点借鉴道家在算卦时的双关或和尚的禅语。拉康画了这个图，说他不对这个问题负责，他仅仅说就是这样发生的，如果切掉一个圈，其它两个也就分开了，在神经症中这三个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宏观的情况中也是这样，神经症代表着文明，割掉一个就会脱落，就是精神病，



集体的精神病。

听众：有无符号界断掉和想象界的联系？

吉：有很多拓扑学的研究，这里暂时不讲。拉康创立了弗洛伊德学院，后要解散，就如切掉这个符号性的圈，于是所有的学员都自由了。在这一图形中，切断任一个圈，其它两个也就脱落了。其它的三圈（结构）要切断两个圈才能散开，而拉康所举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圈（的结构）。

第五讲*

今天下午我重新读了拉康 1970 年的文本，拉康的文本被翻译成中文的很少，我想你们可能对拉康的文本比对弗洛伊德的更有兴趣，但这并不影响我讲弗洛伊德。这个文本即《东京的话语》。我想到拉康到过日本，显然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更对西方开放，拉康也希望在北京停留一下，但在 1970 年的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不想重复这个文本，它在霍大同那里有，我只想说一下这个文本中的最后一句话：“精神分析处于危险之中，很可能在我死后精神分析不存在。”这些话是对日本人讲的，并以这句话结束了东京之行。日本人对精神分析的了解是通过美国这个中介传入的，但美国人把精神分析简化为心理学，大部分美国精神分析家是从奥地利、德国逃到美国去的，拉康批评他们遗忘了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但这些精神分析家都影响了日本。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拉康的野心，他看到了精神分析家在德国被屠杀，也看到了精神分析被美国人简化，这种简化了的精神分析传到了日本。他希望给精神分析最后一个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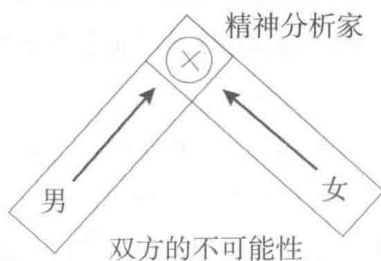
拉康谈到了表意文字的问题，他说自己对这种文字的认识很少，但当他这样的说的时侯，说明他已有了大量的认识。他面对（很可能成为精神分析家的）日本的知识分子，说德国、美国的情况，指出这样精神分析很可能会结束，所以他希望再给精神分析一个机会。他批评了大学中的精神分析教育，表达了忧虑，他始终认为精神分析是另一个东西，他认为在大学中教授的都是人们愿意听到的东西，大学不教授人们不愿

* 9月29日晚7:00—9: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11室。

意听到的。但在另一个场所，人们惊奇地听到了他们不愿听的东西，当精神分析家倾听躺在躺椅上的患者的言说时，对精神分析家来说，突然听到患者的言说也是一种困难，精神分析的工作就在于让自己惊奇地去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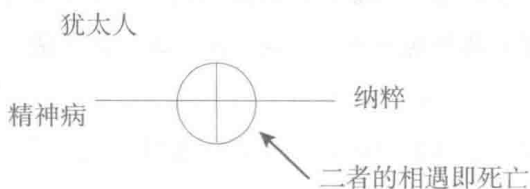
最基本的困难，拉康和弗洛伊德一样都指出是性的问题。昨天有人问为何有男女的区分，我回答说这只有问上帝，精神分析家不问为何有这样的差异，他们只是观察到了这样的差异，两性的相遇是在一个神秘的地点和场所，社会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看法。弗洛伊德创造了“快乐”这个概念，直到1920年，他写了《超越快乐原则》，拉康把这个术语转成了法语中的“享乐”（*plaisir-jouissance*）。

在这个性的相遇中就没有一个科学的关系，拉康这样说是因为他听到了躺椅上的病人对他的讲述，在这里，感受到了惊奇的知道。一个女性在她的快乐或享乐中，但她无法把这讲给她的性伙伴听，因为对方不能理解，相反，男的也是一样。这样拉康的经验就是想要一个惊奇的知道，以懂得对方所说。弗洛伊德认为症状所讲的是那个人不能说的，那就是性的问题。拉康补充说这样的困难是和不可能性连在一起的，这种不可能性又是和实在连在一起的。有一个不可能性是指两个做爱的人不可能来讲他们在做爱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下图。



但当他们单独面对精神分析家的时候就可能说出来，但要精神分析家处在准备接受突然的惊奇的状态中才可能听到。拉康认为有些精神分析家是不愿意听到这些东西的，比如荣格，这和弗洛伊德所说的一样。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的大会上，荣格作为弗洛伊德

的弟子写信给弗洛伊德说只讲无意识，不讲性，但弗洛伊德说你不讲性就不要去。



拉康所讲现实性中的犹太人、精神病人是实实在在地死了，纳粹是在精神上的死亡，Traumatism（创伤），两者的相遇就是死亡。

上面的图案也有个谋杀的问题，我要杀死你，那么上面的那个东西也可以叫作创伤，下面处在社会学的领域，处在个体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发生了谋杀的事件。有人在男女做爱的时候说“我要杀死你”，或者在集体的层面上是真实的死亡，下面是隐喻的死亡。

拉康在东京的文本中引用了“爱你的邻里如爱你自己”。这个句子中的困难是什么？是你自己是一个谜，具有神秘性。因为如果自己都是神秘的，如何爱邻里呢？爱自己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可能出自柏拉图或更早，在社会群体的层面上，纳粹杀死了犹太人和精神病患者，不少犹太人都是愿意成为德国人的犹太人，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邻里。所以应注意到纳粹是在屠杀他们最亲近的人，是他们的同类。他们先杀的是国内的犹太人和精神病，再扩展到欧洲各地，这个行动抵达了哲学或历史的终结。因为希腊哲学中柏拉图的观点和基督教的信仰是一致的，但当纳粹在杀害他们的同类时就让这句话死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的神秘性。无论科学、正义、法律等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哲学以及科学的机器都被利用起来为这样的谋杀服务。精神分析也许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的方法，如果精神分析能让它突然出现，就可以来倾听患者的话语。拉康想说的是，如果精神分析家处在“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状态，就可能让这个东西突现而被抓住。拉康认为除了他，恐怕后来难再有人处在这种状态中。

刚才我们所说的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发生在他们的司法、哲学、法律等背景下，在中国的背景下是否能发生我不知道，我只想给你们说在我们的文化下发生的事。拉康说在男女之间有一个不可言说的东西，而在犹太人和精神病那里也有不可言说的东西，因为在他们那里有死亡的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在男女之间也发生了象征性的谋杀。中文有“操死你”，西方则说男女做爱是两个变成了一个，那么消失的一个便是被谋杀了。在拉康的欲望（*désire*）的意义上说，性的欲望就是变成一个，也就是要铲除另一个，所以拉康称之为死亡的享乐。在集体的层面上，在纳粹和犹太人的关系间也是要把两个变成一个，在愿望的后面就是纯粹化，成为一个纯洁种族，那么一个这样的种族就只要这样的一个，而不要别的种族以免混合。在前不久的南斯拉夫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孩子的出生是男女两性的结果，种族的纯粹就是消除混合性。

成为“一”的欲望类似于成为上帝的欲望，因为上帝是一个，这样一种“一”的概念就导致了天主教的神甫处在单身汉的状态中，这种宗教的代表因为是一，所以他们也更接近上帝，因此不需要性关系，也因为天主教的教义“性是糟糕的东西”，也使很多神经症患者加入到了天主教中。

我不知道我是否接近了创伤的理论，这样一种创伤是社会不让我们听到这个东西，而精神分析家是唯一能听到这些东西的人。

拉康说有一个苦行和禁欲的东西，*Ascèse*，在西方的传统上也是对知识的爱，它是想纯粹化，也让性纯粹化，也就是要禁止性。西方哲学中对知识的爱也导致禁欲，由此，在这个情况下，精神分析和西方的各种其它学科有一个区分，由于只有禁欲才能有对知识的热爱，大师就要求弟子们禁欲，所以拉康反对禁欲，反对精神分析家成为这样的大师，于是就有了精神分析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中，精神分析家可以成为主人也可以有弟子，但不是在禁欲的方向上。

我想再讲一点作为今天的结束，也作为下次的引子，这就是关于科学的主体的问题：

犹太人和精神病患者实际上是像符号那样在起作用。纳粹运用了所有知识的机器，就是为了更为清楚地定义这些符号，让其没有歧义，使我们听到时不会有误解，即最为科学化地定义谁是犹太人。纳粹做了这样的事情，在1937年，他们让所有的专家来制定法律，以使大家清楚谁是犹太人而没有任何疑义，最后使犹太人这个词成为了一个符号，在拉康看来就是让能指转化成了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着某种必须屠杀的东西，以同样的办法，希特勒还转化了纳粹这个符号，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代表着某种要屠杀他们的东西。

17世纪笛卡儿构造科学的主体的终结，使作为主体的人类成为了客体。犹太人变成了符号，只要是这个符号就意味着被杀死，纳粹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删除了语言，也就是把能指变成了符号，为另外一个人代表着某个东西，犹太人对纳粹而言代表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死亡，这也就是科学的主体。拉康从这里出发，以一个精神分析家的立场——他始终处在倾听躺椅上的患者的状态上——，构造了无意识主体这个概念。它是一个能指，即为了另外一个能指而代表着某个东西的能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纳粹和犹太人的关系消失了，因为犹太人和纳粹都不是能指，他们变成了能指也就成了被屠杀的对象，这说明精神分析在德国会非常困难。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是一个符号，这里有一个性的行为，隐喻性地说就是死亡，虽然不像集体层面上那么极端，但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什么叫能指，能指就是没有一个唯一性，而是多义性，唯一性是它只能说一个东西，而多义性则可以有很多意思。昨天关于桌子概念的使用就有歧义性，即可以是坐在桌旁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讲出来的意思，在我今天所看拉康的东京文本中也正好讲了法语的歧义性。当分析者说“坐到桌子边来”意思就是该吃饭了时，他是在抱怨他的夫人，精神分析家听到他的抱怨时是“桌子”这个词引起了他的惊异；精神分析家听

到他对夫人的抱怨，但他却不说他的过去，这时精神分析家就会唱国际歌，意味着你应该谈过去，以砸碎过去，告诉他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掀开，也就是把过去扫除了。当然分析者听到精神分析家唱这个歌时肯定很吃惊，但随后他便开始讲他的母亲，他抱怨他的夫人实际上是在抱怨他的母亲。但这里的惊奇超出他的想象，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共产党员，因为她是个很积极的共产党员，成天为了她的事业而奋斗，从不管他的儿子，也不管她的丈夫。在此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家并不知道他的母亲是共产党员。何以要唱这个歌，是因为他处在惊异的状态中，当他听到他抱怨夫人的话时，这歌突然出现在精神分析家的脑海中，他就唱出了这首歌。这就是精神分析的规则，即不遵守任何社会的约定，当然只在语言的层面上，让他自由地言说，不要有什么约束。

拉康在东京文本中说到了一个也许对你们而言比较复杂的问题：日本人往往要先说许多礼节性的话再说正事，这对精神分析家来说是一个障碍。精神分析不要这么多礼节性的东西。这就是能指的概念，拉康想说的是语言是歧义性的。在科学的近现代的世界，让能指从多义性变成单一性，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分析诞生了。拉康说精神分析诞生在这样一个科学的世界中，它也不可能诞生在科学的主体的概念提出来之前。为什么，是因为以前西方世界处在犹太和基督的统治下，多义性和单一性是可以考虑的，没有精神分析存在的位置。如果多义和单一的论战是可能的话，就不会有一个位子让精神分析诞生。在17世纪前，上帝和人类的关系的讨论是可能的，但之后，科学使这种讨论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单一性占了上风。

为了结束我的谈话，我要说得简略一些：即人是不能讲的，是被他者所讲，是被语言所讲，是语言控制人，而人不能控制语言。如果有人以为他能控制语言，是说的主人，那就是单一性，那就错了。这即拉康所说的“主人的话语”。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我们语言的主人，这是弗洛伊德在梦的理论中的发现，白天我们说话，晚上我们被梦所讲，我们也被语误、过失、症状所讲。拉康认为一个社会的欲望是可以相互理解，

但拉康又认为正因为语言是一个多义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所讲的和对方所讲的，于是就只有让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拉康与精神分析家的工作，不是去理解分析者，也不去寻找任何东西，不把分析者变为寻找的对象。拉康说：“我不寻找，但我找到”，法国有个谚语：“人寻找，但上帝找到”。这个谚语是在17世纪前出现的，17世纪后上帝不存在了，这个找到的任务就由精神分析家来担任。

正是这样，当拉康在讨论班上讲时，没有人懂他，尽管大家不懂，但话还是进入了耳朵里。而他就让大家讲很多以前不会讲的东西，正是这些新的东西促使大家去思考。所有人都不懂拉康的演讲，它却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因此大家都会去谈论它，拓扑学家也在研究他的圈。

能够讲的是治疗之外的东西，让大家在分析中去讲他们的秘密。

拉康造成了声音的回响，也许有人在20年后会懂，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种回应，如果你们有不太懂的东西，也没有关系，只要你们能相互讲或自己讲就行了，我希望你们能去做精神分析，然后成为精神分析家。

讨 论

听众：这个歌是谁唱的？

霍：分析家。

听众：我的感受，很难讲，可能也是不能言说，我也有一种惊讶，在这个状态中抓到了一种东西。

吉：当然是很困难的，你抓到了一个东西，但讲不出来，特别是在公众的场所下。

听众：不，我只是也有一种很惊讶的突然抓住了什么东西的感觉，我觉得我理解了很多东西，同时我觉得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吉：那很好。理解不理解的问题是相对一个位置而言。有些人自认为理解得很多、很快，什么都懂了，而精神分析家是让自己始终处在准

备有吃惊的发现的位上，重要的是不要太快急于去理解。昨天有一个女学生给我讲法语，我很高兴，讲了她男朋友的梦，她想证实是否这个梦意味着她的男朋友想去追另一个女孩，我听出那梦是这个意思，但我没有给予她肯定的回答，却说这也许给了我一个机会，你能否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她不愿意，但旁边三个也懂法语的女孩却说我们把电话号码给你，我只好说我太忙了，我是来工作的。

听众：对于主体、客体，我认为应该在想象界而不是符号界。

吉：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我下一次讲，三个圈结合在一个没有能指的序列中，我要讲能指的序列，为另外的东西代表的东西，将涉及到主体的问题。

听众：拉康说他死后精神分析可能不存在，是因为人们不能处在突然的惊奇的状态去倾听，我想问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人，老先生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吉：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必须自己接受精神分析。

第六讲*

我们前天讲到能指和符号的区分，这一方面是在语言的层面上，一方面是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因为弗洛伊德和拉康都讲到了语言，为了举例，我讲了犹太人和纳粹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来说就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对纳粹仅仅意味着屠杀。同样弗洛伊德所讲的男女的关系，也是一个符号，代表着性的行为，在隐喻的意义上也代表着死亡的东西，语言在这里简化为一个行为，做的行为，能指为另外一个能指代表着某种东西。

这里有两个层次，一是社会、政治的，一是个体的。弗洛伊德在治疗中的实践着重于性的关系，而这是一种独特的关系。相对弗洛伊德而言，后来的精神分析家，包括拉康也认识到了犹太人与纳粹的关系。同样拉康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马克思认为人在工作中产生了 object（客体），这些客体本身就是为了相互的交换，也就产生了市场的概念。马克思不仅说生产为了交换，还说人本身也成了交换的对象。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不仅对拉康，对我，对大量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人在出卖他的劳动力，这样人也成了客体，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概念。我没有涉及马克思后来的影响。

在人变成客体的过程中，一个最严重的结果是犹太人变成了客体然后被屠杀，我们能够看到除弗洛伊德谈的男女关系外，后来的精神分析家如拉康还看到了政治和社会的领域中发生的事，我现在想说对弗洛伊德而言什么是创伤的问题，在他那里是和性欲连在一起的。

* 10月1日上午8:30—11: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11室。

在我准备这次旅行之际，发生了美国的事，让我的内心很紊乱，特别是今天早上，接到法国的电话说巴黎机场发现了可疑的行为而被关闭，而在这之前一个工厂也出现了爆炸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也有—种运动，即反对 WTO 的运动，那些反对者抓住了话语，这些人取得了发言权，指出该组织不仅把所有的东西变成了客体，而且把人也变成了客体，即产品。我想到 68 年的运动，学生走上街头取得了话语权，那时拉康指出精神分析家应该到街上听那些人讲什么，而不要只待在自己的诊所里面。精神分析的沙发和沙发床的构造是一种人工的东西，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拉康说你们应该到街上去听。68 运动有一个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拉康说应该到街上去听这些话后面的东西。现在这些人出来游行或通过互联网发帖，也有口号即“不要战争、不要把人变成商品”。在美国，大家都知道他们正在准备战争，而且即将行动，但美国或欧洲的年轻人不少认为尽管有恐怖事件但也不要打仗，这不仅考虑了美国的情况也考虑了伊斯兰和整个世界的情况。之所以年轻人走上街头反战，有一种分析认为是美国政策的结果，导致阿富汗处于悲惨的状况中，所以塔利班利用了这点来搞恐怖行动，如果没有美国的政策也不会有这样的行动。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分析，让年轻人走向街头也使警察走向街头来维持秩序。

这些事让我在今天上午受到了一些扰乱，现在我们可以回来继续讲创伤的问题。

有一个哲学家叫德里达，他到了北京在大学中举办讲座谈马克思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倾向于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降低成了客体。有一个美国的计划就是要结束传统的耕作方式，过去是农民把种子种在地里，长出植物，然后收获、卖出、换成钱，但不是所有的都卖，要留下一部分，为了自己吃也为了明年的继续耕作。该计划就是为了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结束，这个计划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种子公司，他们生产出的种子种下去后不会再长出种子，农民只有不断地向这些公司去买种子，通过科学技术改良了的种子，因为农民必须买，所以价格就非常高。这

也将把农民放在一个悲惨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美国的价值观是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垄断的公司宣称因为我们改良了品种，是为了你们好，这类似于希特勒对犹太人说由于你们是一个糟糕的民族所以让你们死了是对你们好。这就是一个美元主义的价值观。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是不仅有钱，而且还有上帝，但塔利班也提出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不仅有美元而且有真主。

昨天的电话让我想到这些。昨天在黄龙溪喝茶时，我想今天本来该讲性的问题，但我也觉察到了一对农民夫妇的情况，我注意到他们怎么有了第二个孩子。那个农民在5岁时死了父亲，一直由母亲带，后来他要了第二个女儿，理由是至少他生病了有两个孩子可以抬他到医院而不用请别的人，当时乡里要拆他的屋子，他说可以要他的命，但不能拆房子。

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原教旨的弗洛伊德派的分析家，要求患者讲述如何和他的性伙伴做爱。但现在更多分析家不这样做，而让自己处于开放的、突然惊讶的状态，而不应该强迫他们讲，虽然有理论的问题，但只能这样去倾听。精神分析一直在发展，但依旧是一个不能让我们相信的理论，如果你相信也许你就和塔利班一样，因为他们相信真主。

那个孩子的出世也许不仅仅是性的问题，他父亲以他的生命来保护孩子保护房子，同时付钱来保证生育的权利，对孩子来说感受更多的是如何出世如何被保护和怎样被父亲抚养成人，他之所以成为父亲是因为社会政治的问题，如果你仅仅看到性的问题就是一个弗洛伊德的原教旨主义者，孩子不仅仅通过性而诞生，也通过能指通过他父亲的言说而诞生。我们看到的是话语的问题，这里和弗洛伊德的关于生孩子的观点是连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也带着惊奇，但不是原教旨主义的观点。生产一个孩子意味着有性关系，是生物学的立场，当然在昨天那个父亲的讲述中肯定有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孩子是寄居在话语之中，给一个孩子生命的不仅仅是生物学的，而且是和父母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连在一起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给孩子一个生命，这个女儿就是在这样的符号性的社会政治的背景中成为了一个人。

这个女儿跟张晶燕老师说有一个很强的焦虑，张女士就在公众场合下给她做了一个心理治疗。我想如果我处在这个女儿的位置上也会很怕考试，一方面这个女孩在学校接受各种知识，在这里她有一个知道，但另一方面她还有一个内心的知道，更深处的知道，通常这两个知道不能很和谐地相处。小姑娘谈到考试时说老师提的问题是非常熟悉的问题，但她不能说一个词，从这儿就可看出她内心深处的问题。考试失败后她就向精神分析家讲。听着小姑娘的诉说，引起了我心里深处的问题。我有段时间也处于类似的情况下，我当时的考试是为了成为外科医生，听着小姑娘的故事时我联想到了自己，因此，我是带着自己的经历来听这个故事的。在40年以前老师也给我提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问题，但我却说不出一个词，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失败了，于是我就去向一个精神分析家讲，所以40年后我到成都来不是作为一个外科医生而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我以我自己的历史去听那个女孩的言说，涉及到的是我自己的问题。在这个倾听中如果我给予她解释就错了，因为我听到的不是她的故事而是我的故事，也许有一个地点我们可以相互交换。如果是原教旨的精神分析学派就听不懂所说的故事，而拉康派的分析家就会知道这个女孩在说什么。原教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精神分析家们封闭了自己。塔利班就是利用了人民的境况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他们并不听老百姓怎么说，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所有的扰乱，但它能帮助我的嘴巴和耳朵的工作。

人们怎么让孩子诞生，如果没有扰乱的话，我准备讲的是这个。弗洛伊德在当时仅仅把让孩子诞生的行为归结为生物学的因素，虽然他也讲了语言的问题，但没有考虑人也存在于语言的序列之中，拉康发现了这一点，对弗洛伊德而言，孩子的创伤是他们看到了父母亲做爱的场面，尽管他也说了孩子听到了某些东西，但他主要是指孩子所看到的。

你们知道我认为学一门语言主要是学会听别人说，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读书，我在巴黎时也自学了很多汉字，但对我讲中文没有任何帮助。弗洛伊德对听强调的很少，而拉康认为听是更重要的。弗洛伊德强调创

伤是因为孩子观看了父母做爱的场面，拉康则认为要孩子成为社会化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听到的某些东西。弗洛伊德讲创伤理论更多地是讲一个生物如何变成社会化的人，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则是如何在文化中成为社会的一员，我不是说弗洛伊德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他给了我启示，还有一个好奇心的问题，何以人能够产生？

听众：精神分析没有在中国普及，是否因为中国的文化自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注重家庭传统，有些观念可以起治疗作用？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好像都不倾向于接受精神分析，现在接受西方文化很普遍，但我们女孩子一般不谈性的问题，这也可能是缺少表达的语言。

中国人有一个听和说的差别，希望接受了解而不是去接受分析，这个翻译可能让人联想到是被别人分析而不是自由联想。好像自己的语言多了，也缓解了自己的压力。我是女性，但分析家是男性，说不下去，但又很痛苦，我想可能中国缺少女分析家。

吉：哲学家追求自己的理论被证实，而精神分析不追求这个东西，更多的是让自己听见别人所说的。黑格尔认为在他之后哲学就结束了。在他的辩证法中，哪怕你的回答和问题相反，也证实了你的提问是对的，这是一个西方哲学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中国和西方一样也有很多哲学流派。法国有个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写了《迂回与进入》，要超越两个文化不仅要读书而更重要的是学它的语言，才能消除隔阂，在这一点上和精神分析比较接近。

弗洛伊德有一个“认同”的概念，凭什么我们认同一个人的存在？二战时不少德国人都认同希特勒。那些拒绝认同的人被杀了。不认同的人有德国人，但不仅仅是德国人，而认同的人全都是德国人，他们都认同了独裁的原则，独裁者认为所有做的都是我所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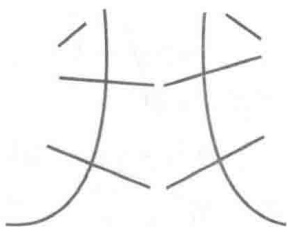
说东方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不一样是很明显的，这个我没有兴趣。中西各有上千种流派，但有语言的问题，比如在中国有广东话、北京话，法国也是，这里不存在“一”，我更感兴趣的是差异性的东西。我当然是一个法国人，但我又不仅仅是一个法国人，否则我不会来中国，你们

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否则你们不会接待我。中国曾经不接待外国人，语言在交流之外还有其它的东西。昨天我在村中和那个农民谈话，我也不仅仅是以法国人的身份。去年的公开演讲中讲了耶稣会的问题，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耶稣会只让人们信他们，中国人很狡猾，当他们发现西方人教授他们科学的目的是让他们改信上帝时，他们把耶稣会以及其后面的东西赶出去了。我看了一个关于中国数学的博士论文，作者说当耶稣会来了之后，在中国有一个倾向是遗忘自己的数学，耶稣会的人利用这一点来传授西方的数学以便让人们接受耶稣会。

对于中国的统一，不是中国的哲学，也不是中国的语言，而是中国的文字系统，大家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而书写系统使他们统一，语言是一个听觉的东西，而书写是一个视觉的东西，看的东西，这也是最近精神分析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在西方的语言中，每一个字母都和一个声音连在一起，当我们写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和声音发生关系，和语音系统联系在一起，和人们看到的東西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和身体的形象连在一起，也没有和象形的东西连在一起。如字母 a 只表音，不表义，就有一个极端的抽象性，有一个视觉的断裂。很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字和象形的东西连在一起，尽管后来有形声字，但这并不影响最早的文字是和我们的视觉感知连在一起的，也就和身体的感知连在一起的，所以断裂就是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之间的断裂，而在中文的表意文字中就没有这样的断裂。我们在讲中文时是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東西连在一起的，尽管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这个切口也是说的东西和绘画的东西之间的断裂。在中文中，因为没有断裂，所以就有一个从视觉到绘画到书法等东西的连接。中国的绘画中，书法是其中一个部分，包括作者留下的名字和印章，但西方却不是，有时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知道作者是谁。

我所讲的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中的统一性，也许是统一的，也许不是，也许是我理解错了。在西方的精神分析的框架下，最大的困难就是要重新建立听到的和看到的東西之间的断裂，而中国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的断裂，这样对中国人的精神分析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我举一个例子，也许是我将在明年4月的会上讲的问题，比如说“我”，这是一个象形字，尽管中国的文字几千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但还是有联系。拉康在讨论班上曾写了甲骨文、古代中国字和现代中国字，指出虽然变化很大，但实际上是联系的，没有断裂，但埃及的文字和它现在的拼音文字就完全没有联系了。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在一个人不认识中文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他能否发现是同一个字。



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图像在镜像中，但下面镜像关系消失了。“戈”是武器，那左边的是不是也是武器呢？是不是右边是指我们看到的，而左边的是指我们听到的东西？这个很重要。相对下面的，有两个东西消失了，一是镜像图像，二是镜像关系，左右传递的信息也就消失了，在这镜像中一个是武器，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在镜子中的区分就是拉康所说的主体的分裂。去年我跟你们工作时，曾讨论了镜子阶段的文本，其中拉康讨论了什么是“我”的问题，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例子中，都有一个让镜像消失的倾向，也就是说有一个社会的趋势让“我”的分裂消失，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到面容，但看不到背面，中西方都有让镜子的关系消失的趋势。

我们前几天讲了被再认的愿望，即通过他者来认识我们，在这个愿望中实际上存在一个遗忘，我们遗忘了曾经在镜子中看到我们自己。1937年一个德国的戏剧家 Camett 写了一部戏《虚荣心的喜剧》，写的是人们希望消除镜子。戏剧中人们没有权利拥有镜子，在这个剧中讲国家决定消除镜子，之后这个国家成了精神病，疯了！这个戏剧想说的是当时德国所有的人都希望通过一个独裁者而得到再认，如果只有通过独裁者才能得到再认，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就变成了疯狂。上面的“我”的

消失也许是因为下面的“我”写起来更容易，那么，更为简单的书写也许蕴涵着深层的意思，意味着人们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比人们通过镜子来认识自己更容易。我发现好几个字都有同样的情况。

讨 论

听众：哪几个字？

吉：现在暂时记不起来了，涉及到身体的词，也许明年4月我要讲。

听众：德里达和拉康有什么区别？

吉：拉康认为语言在先，因为他在治疗中是倾听，而德里达强调书写。拉康认为听到的不是听到的声音， a 不等于 a ，但德里达认为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是一样的，这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并说文明不能离开文字，强调文字的优先性。但拉康说为了记载文字，首先是人们讲，如果没有言说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文字的记录，之所以记录，是因为人们在言说，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很大。在这里，要注意德里达和拉康的实践是不一样的，拉康不是写书，而主要是在诊所中听患者的述说。当然德里达也对公众演讲，拉康也讲，但拉康倾听躺在沙发上的人的言说的这个实践是德里达所没有的。我们不能混淆哲学的话语和精神分析的话语，精神分析建立在倾听的实践中，而哲学是另外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德里达仍然想让精神分析家相信他是对的，但拉康只讲了5分钟德里达的问题，就开始讲别的问题。去年或是前年的时候，德里达还在讲他是对的，拉康错了，拉康已经死了20年他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德里达是个很重要的哲学家，也有很具价值的思想，是个很好的哲学家，但他总是想说服他人，让大众相信他是正确的，这不是拉康的方法，而是德里达的方法。拉康从不这样做，德里达可以被理解，但人们不理解拉康。

第七讲*

昨天我讲的东西是没有准备的。

前天参观了村子，有了联想然后讲了出来。有时候不要有准备，要让突然的惊讶跑出来。我讲时不是一个精神分析家，也不是一个教授，而是处于分析者的位子上。在法国，不叫病人、患者，而叫处在分析中的人，正在做分析的人，*analysant*。精神分析的技术就是给出话语，那么，讲话的人正是处于被分析的状态中，听者就是精神分析家。讲到这儿，我脑海里冒出弗洛伊德说的一句话，被翻译成了法语，弗洛伊德说的是德文，写的是德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的题目很重要，引论就是引导某人进入，我现在讲的话也是想把精神分析引入中国。

这个世界上讲几种语言比讲一种好得多。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是技术，最为可能的情况是使处于被分析状态的人能够解决他神秘的问题。精神分析是治疗的技术，它包含神秘性，这样的神秘性之所以被解决，是由处于分析中的主体来解决的。如果你们认为我是精神分析家，你们就提问，我回答，但神秘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只有通过的分析状态中的主体的自由言说，这种神秘性才能得以解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人们努力要忘记这句话，试图让这句话变味，使精神分析家处于引导、领导、独裁者的位子上，在精神分析的内部和外部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你认为这是普遍性，寻找答案，你就会寻找主人，独裁者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有不少的精神分析家把弗洛伊德变成一个主人、独裁者、领导者。拉康有句话，所有的人都假设精神分析

* 10月2日上午9:00—11: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11室。

家拥有一个知识，认为他们是全知全能的，是知识的主体——subject-supposé-savoir。例如，分析者会假设精神分析家对自己的问题有个答案，如果不给出答案，分析者就会感到受了伤害，很生气。如果这个人假设分析家可能有答案，那他在分析中就已经走了一步，如果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家有答案，那就是偏执的倾向。阅读弗洛伊德时，读的是被分析者的话语，而不是分析者的话语，读它能解决自己谜一样的答案。

在这个地方，我是处于被分析者的位子，因为我要解决自己的谜，为什么我不远万里来中国，通过言语来找到这个答案，我所讲的东西能帮助你们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因为我在讲，而是因为你们在听。当然，是通过霍大同的翻译，霍大同就是我的分析家，另一方面他在翻译中加了一些他的东西，这样他也在说，也处在被分析的位置上。这是精神分析最基本的东西。当然最近精神分析界有人想忘掉这些东西，弗洛伊德有个词来说明这个遗忘，就是“压抑”。

创伤对弗洛伊德来说也是一个谜，他写这么多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谜，解决自己的创伤。弗洛伊德的工作是一个孩子在讲，他承认脑袋里的孩子在讲（是个想象的孩子或是理想的孩子）。在成人的内心中始终有个孩子在讲，弗洛伊德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内心也还有个孩子在讲，这个孩子之所以得癔症，是因为这个成人在孩提时观看了父母亲的性生活，他看到了也同时听到了父母亲的性场面，这样就让弗洛伊德受到了创伤，由此引起了他的混乱与障碍，这些混乱与障碍就是他称为癔症的东西。当时，这个术语很重要，人们看到了有人瘫痪、手脚不能动，但找不到生理方面的原因。这个理论是根据癔症患者创造出来的，是分析家遵循了患者的要求才有了自由联想，因为她说“不要碰我，只听我说”。

但弗洛伊德考虑得更多的是看的维度，理论构造依赖于看，拉康则强调听的问题。西方在看与听之间存在断裂，这看与听之间的混乱是与语言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是这样，中国也许不是。弗洛伊德用了很多的力量寻找孩子看到父母性交场面的真实性，认为他们知道但是已经遗忘，从这点说弗洛伊德不是精神分析家。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说，他

不是精神分析家，但通过分析家的工作他知道自己弄错了，这儿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我阅读作品所知，弗洛伊德没说他观看了父母亲的性交场面，尽管确实有些孩子经历了一些性交场面，还有些父母亲让孩子看。弗洛伊德认为孩子想象父母亲做爱，是一个幻想，弗洛伊德说两个东西：（1）孩子看到了或听到了；（2）孩子想象或思考这样的东西（幻想）。

弗洛伊德的学说在当时是爆炸性新闻，当时人们认为孩子是客体，认为小孩子不知道，那时是遗传决定论占上风，父母亲把孩子当成狗，类似于动物，弗洛伊德则讲孩子可以进一步说，孩子通过听进入语言序列，他可以讲。如果孩子说中文，首先是因为他听到了什么，流行观点认为是遗传，但弗洛伊德认为孩子的语言能力是受环境影响的。当时有语言学家认为孩子生下来就会讲希伯来语，他们认为上帝是希伯来人，在这背景下出生的孩子天生就会说希伯来语，但弗洛伊德提出了是孩子听了才说。这对于世界是个创伤。

弗洛伊德说孩子看到、听到，然后会得出一些观念。那时维也纳也有开放人士，但对于性场面仍然无法接受。于是他创造了一个词“Eros”（爱若），以避免“性”这个词的刺激。他寻找孩子看到性场面的真实性，这也是创伤的问题，原始场景的问题。弗洛伊德经历了这一时期，认为孩子并不是真的看到性场面，而是想象到了，所以他拒绝了以前的观点，又回到精神分析的路线上来。拉康据此创造了“权利的丧失”，新的发现引起了另外的问题，有些孩子承认看到或受到保姆及父母的诱惑，但当他们说这些时精神分析家并没有听到，他们认为是孩子的性幻想，不是真实的。同样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家也说对犹太人的谋杀、毒气室是幻想，不是真实的。这导致原教旨的弗洛伊德主义。

弗洛伊德开始是精神分析家，后来他不是，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幻想，这就不是精神分析家，精神分析家是无法用文凭或者文件来说明的，所以你在每一刻都要重新成为精神分析家。

弗洛伊德在猜想孩子何以会有幻想性的场面。因为孩子有 *désire*（欲望），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每个孩子应该都构造了自己出生的理论，

但每个孩子都不同。孩子在自己的尿罐里撒尿，他构造的理论是父亲撒尿在母亲的尿罐里就有了自己，他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但一旦被推广成为普遍性就不是精神分析。在这里，孩子说的东西他是不晓得的，同时他又是晓得的，一方面他不知道，但他说的又表明他知道。

拉康是如何看待的呢？弗洛伊德说孩子想象父母亲的性场面，是回答他从哪儿来的。他创造了自己起源的理论。我们处于变革时代，男的女的生了孩子，也许不久孩子就从工厂生出来。弗洛伊德预言如果父母做爱时可以不考虑会有孩子的话，也许我们就没有神经症。弗洛伊德说两个人做爱成为一体，生孩子就是成为三，成为一就没有神经症、就是天堂的景象。两个人做爱就会想到要孩子或不要孩子，不要孩子就会采取措施，如果工厂可以造的话就不会考虑孩子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不要，又不采取措施，将导致很多问题，女的怀孕了，当时也不知道，在往后的日子里才知道。做了爱去工作没有什么，但如果怀了孕就跟丈夫说，可能发生争论，引起很多话语，这些话语就是由孩子这个第三者引起的。中国的情况是很多话语产生于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在这怀孕的9个月中就有很多话，在这9个月中孩子还未出生，但所有的话语都是由孩子引起的。

这个例子就似昨天的中秋节，月亮在与不在，男人说孩子不在，女人说孩子在，成都的天就像孕妇，虽然有月亮但我们看不见。

拉康说孩子在但看不见，拉康说精子与卵子结合成为受精卵，虽然CT看不见，但引起了话语，也出现了无意识主体，即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引起了话语。再进一步发展，多尔多认为孩子在怀孕时就可听到关于他的话语。孩子在怀孕时动，他或者听到了但是不懂，这个位子也是精神分析家的，精神分析家听到了但不懂，孩子虽然不懂他听到的话语，但话语本身是在说他。在理论上说精神分析家当然听得懂，但要让你的耳朵打开，听到这种声音，不要试图去理解。孩子就听到了声音，听着听着有一天就会说话了，也即拉康意义上的无意识主体。

孩子10个月后就诞生了，引起一连串话语，“是男的还是女的”，

生了女儿，父亲的态度可能不高兴，爷爷奶奶的态度又会不同，这些都引起讨论。“像哪个？”他的相貌，可能与某个人的希望、欲望之间有些差距，也引起话题。孩子诞生后可以听到了，可以看到了，听在看中产生意义，从听到理解需要时间。

弗洛伊德说在癔症中有发现，承认癔症的来源是无意识的产物。癔症症状源于孩子很早以前听到的这个声音，但是在很久以后才抓到了意义。弗洛伊德认为每一次都这么说就不是精神分析家了。可能有一次孩子在7、8个月时就成熟了，弗洛伊德从成人的症状中发现7、8个月的孩子听到了什么，这对弗洛伊德来说仍然是很惊讶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精神分析引起的创伤，精神分析给予社会的创伤，必须给予，不给予就不是精神分析。纳粹给予现实的死亡，精神分析给予符号性死亡，隐喻性地说这个社会将再生。

孩子的位子就是精神分析家的位子，他遇到新的人，他听到声音，对于他说没有意义，逐渐地有了意义，在分析家和分析者中都产生意义，当分析者得到了意义就可以离开分析。

讨 论

听众：精神分析家的状态是否类似于道家的赤子之心？在精神分析中是否精神分析家的人格感召比技术更重要？

吉：在精神分析中有时人格会成为精神分析的障碍，如当自己处在问题中时，会拒绝来访者，精神分析有它的限度，有时精神分析家还会打破沉默，告诉分析者自己的问题。

听众：我觉得在分析中说不出来，看不见分析家有点不舒服，反而说不出来。

吉：1920年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发现人们追求不快乐，一般的心理治疗给予快乐，但精神分析必须让人们经受不快乐，打破不快乐的重复。面对不快乐，除精神病患者外（他可以大声对自己说），分

析者有可能说不出声。

听众：我觉得精神分析家好像成了客体。

吉：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真的，但它并不对应着真理。

我前面举过例子说分析者提问，但没有回答，所以他不高兴，觉得精神分析家对他不好，可能去给别人说，有抱怨、有敌意。实际的情况是精神分析家并没有掌握真理。

人们显然要想象精神分析家会是怎样的，显然患者都有这种想象，但心理的事实不对应现实的事实，对此哲学有很多讨论，包括佛教。我去年在宝光寺吃了素食，结果把豆腐做的鱼当成了真正的鱼。从佛教的素食中也许可以了解其思想，即看到的不是真实的。

自我的对话是痛苦的，因为要面对自己。西方说政治家如果面对镜子演讲会很痛苦，因为他可以对公众说很多谎话，但面对自己就很不舒服。

精神分析家就是要让患者面对这种不舒服。

听众：Id、Ego、Super-ego 好像有分裂。

吉：不仅弗洛伊德，拉康也说主体的分裂，这和分析的概念连在一起，有分析化学、分析哲学、分析数学，一包烟是综合的，可以拿出来看有多少支，盒子上是红色，但你可以看到这里字，那里是画，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分解，你也可以说是分裂。

第八讲*

我们昨天经历了很长的一天，既有弗洛伊德也有拉康。电影每次看都有新的收获，比如拉康的形象，与其说是好笑，不如说他使社会受到创伤，但与希特勒所引起的不一样，因为他是话语的创伤。

昨天我有了一个惊喜，哲学系的高小强老师是康德的专家，他懂德文，电影唤起了他的兴趣。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因为看的人毕竟很少。在巴黎有些精神分析家听说我经常到中国来，以为我是一个疯子，但电影的导演却希望中国的观众能懂他的电影，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玩笑，因为还是有些精神分析家会来参加你们明年的大会。

（听众：能否邀请导演来？）

这个问题我无法从学校的角度来回答，不过艺术学院可以试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时遇到了法国大使馆的人，他们很吃惊居然有一个精神分析的会在北京半公开地召开。不过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导演和我不一样，我是一个小人物，而他是一个大人物，不可能只对20几个人讲，所以你们如果要邀请他的话，首先可能得让更多的人看这个电影。他为这部电影工作了14年，创造了很多电影方面的语言，如果让他来讲，兴许会对中国的导演有帮助。也许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一般的观众更想看成堆的尸体，但这个电影中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到人们在言说时的困难，一般的记录片让人发笑，但这个导演决不这样做，他想让人们感到创伤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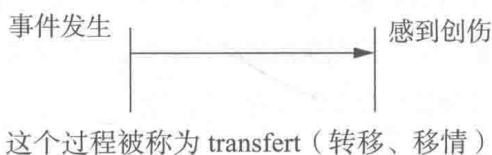
回到我们的主题，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是在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前

* 10月3日上午9:00—11: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11室。

创立的，没有考虑后来的问题。后来弗洛伊德遇到了战争，它带来了悲伤、痛苦等，但这不是我所说的创伤或符号性的断裂。弗洛伊德说孩子诞生下来后听和看，但听和看并不就会有创伤，只有在孩子说话了，也就是事后（nachträglich）才可能有创伤的发生，所谓事后是指在他找到一个意义的时候才有创伤。Träglich 来自 Vertragen，即携带一个东西，Übertragen 在法文中翻译为转移，弗洛伊德要说的是发生了某个事情，被带到了以后。打击性事件发生后可以带到以后，而具有一个意义，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创伤。

（听众：是否想表达却表达不出来？）

一个打击或一个事件，它本身给他一个原因或意义，一般意义上讲在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有一个转移，或一个爱的转移，但实际的情况更复杂。



一个事件可以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这就是一个空间的转移。按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假设，孩子受到成年人的性攻击，而这个攻击的地点就是身体，弗洛伊德认为在生殖的地点上发生的事可以使手瘫痪，这就是一个转移。昨天说的孩子认为自己出生是因为父亲尿在了母亲的尿罐中，由生殖的功能转为了泌尿的功能，这只是一个生殖功能的转移。如果孩子假设是妈妈吃了什么东西，就有从生殖功能到饮食功能的转移，如果假设是母亲拉屎，就有到排泄功能的转移。分析者把爱投到弗洛伊德身上是对父亲的爱转移，但它有更多的含义，不能简约为仅仅在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发生的事情。

德文 nachtragen 翻译成法文 rancunier 即记事的人或记仇的人，如果有人受到了伤害，内心就会记住，并持续很久，这里有一个打击，他带着它走到这里，突然有一个爆发，或一个报复，这才看出了他对伤害的

回应。

突然我想到一个观点，精神分析家在没有工作的时候相互交换的工具是概念性的，这可以让我们继续讲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分析中让分析者不断说下去。其好处在于，如果一个人带有创伤，想要行动，如希特勒在二战的行动是因为一战德国受到了创伤，那么分析家使这种报复成为话语而不是行动。关于转移的概念，很多人有一个趋势是将之简化为分析者对他们的分析家的爱，但很多患者并不这样觉得。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概念仅仅是一种工具，这个概念本身是需要解释的，这个概念在语言中有很多意思，而意义是展开性的而不是唯一性的，特别是在各种语言的翻译中就会有更多的意义。

又比如俄狄浦斯情结，不只弗洛伊德还有很多人都把它简约成一个很小的部分，于是很多人就争论我们是否有这个情结，人们倾向于将之简约为“我想杀掉父亲”，或“我想和母亲睡觉”。于是就有人出来说我有这个愿望，有人说我没有这个愿望。我现在讲的仍然是一个简化的东西，如果这里有一个希腊神话的专家也许他会说得更多。

这个神话所说的是，有一位盲人预言家叫哈伊诺斯（你们中国人应该知道记录在甲骨文上的文字是具有预言性的），他看不到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东西，但却可以看到未来。他说拉伊奥斯国王如果有一个孩子的话，这个孩子有一天会杀掉父亲，并娶母亲。于是国王不想要孩子，但他的妻子想要，于是她有一次让国王喝醉了酒，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他妻子实现了要一个孩子的愿望。这时拉伊奥斯就是生物学的父亲。当国王发现后很不高兴，于是决定抛弃这个孩子。由于有了抛弃，也就有了转移。孩子转移到了另外一对夫妇中，他在新的家庭中被养活，他叫新的父亲爸爸，有了爱的感情，而他始终认为那就是他的爸爸。这对夫妇没有告诉他其真正的历史。长大后他离开了家，在路上碰到他的生物学的父亲，这时也遇到一个问题，即他自己处在死亡的危险中，且不能通过话语而只能通过武器来解决。结果俄狄浦斯赢了，但这种杀掉父亲的愿望是不同的，因为他如果不杀掉国王，国王就要杀掉他，所以神话并不对应着

杀掉父亲的愿望，而只对应活下去的愿望，他杀掉父亲是在他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说有一个杀掉父亲的愿望，那他就应该杀掉养他的爸爸，他之所以杀掉生物学的父亲是因为他想要生存下去。当他赢了这个决斗后他遇到了生物学的母亲，他和她睡觉而没有和爱他的妈妈睡觉，而这个生物学的母亲已经抛弃了他。之所以和他生物学的母亲睡觉是在这之前就有一个预言，不是说他有和母亲睡觉的愿望，而是因为他的生物学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人，她可以获得一切她想要的东西，因此主动者也许是他的生物学的母亲，所以有罪恶感的也许应该是母亲而不是他本人。

这使我想到一个概念仅仅是我们相互之间开玩笑的东西，在分析中应该忘掉，它仅仅帮助我们休息，虽然它本身是复杂的。精神分析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因为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忘记了概念的工具，但比如对建筑工人来说如果忘了带工具就会得罪老板——因为我在成都看到很多工地，想来应该有不少的建筑工人。除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打麻将的，还有第三种人，就是我们，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忘掉了自己的工具。刚才讲到弗洛伊德说“事后”，即在孩子开始讲的时候才具有意义。

在孩子诞生的发生学维度上拉康引进了镜子的概念，往前走一步就是拉康的观点，而我们现在仍然在弗洛伊德那里。

镜子的问题是去年我刚开始和你们一起工作时所接触的文本。当孩子可以在记忆或幻想中说话时，弗洛伊德说到了压抑这个概念。为什么是压抑呢？是因为孩子通过一个转移或移置来说这个事情。那么这不仅仅发生在精神领域，其身体也加入了进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参与到其间的身体就是爱若的身体，这也成了个丑闻。从女性生殖器中出来的孩子成了爱若的身体，如果我们把耳朵张开一点就能听到妇女在生孩子时痛苦的叫声，但她仍然获得了快乐，以及性活动中女性的叫喊，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说痛苦也可以抵达快乐。但后来拉康说其中也有不快乐的成分，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弗洛伊德把孩子称作爱若的身体，以及当母亲把乳房给孩子吮吸时，可以看到母子之间爱若的关系；

也可以看到当父亲看到这种关系时，爸爸会很吃醋，他发现自己无法达到孩子和自己的妻子之间的享乐程度。甚至有一些男的看到这种情况后逃跑了，于是只愿意和女人保持情人的关系，要成为爸爸的男人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是他认为在性行为中无论如何都达不到这样的爱若的状态。

弗洛伊德和我这样讲，都是由于我们脑海中的孩子，但现在有了儿童的精神分析家，他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所有这些东西都强调快乐的动力，都是对哲学讨论的灵魂和肉体关系的反动，精神分析认为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儿童精神分析家不是听成人讲这些问题，而是直接听孩子或母亲讲，所以也就更直接地进入了这种爱若的关系中间，这归功于弗洛伊德、拉康。

昨天的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一个英国的精神分析家说拉康思想的引入解放了妇女的话语，当然还有妇女的运动，但精神分析确实解放了妇女的话语，精神分析家还谈到在孩子和母亲之间有一种超越了两性之间做爱的高潮，人们观察到了男性婴儿身上有生殖器的勃起，非洲有习俗是母亲将之含在嘴中让它平息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有些东西是要说的，但他不能说，因为说了周围的人会认为他是坏孩子，这便有了创伤，如同当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说孩子的性欲时成了一个丑闻。举一个例子，一对男女有了性关系，女的有了孩子，孩子听到了话语，尽管他完全不懂；他遇到了生物学的父亲和生物学的母亲，但精子未必每一次都能进入卵子，这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东西，可能做很多次爱都不行，可能有一次女的在过道中遇到了一个漂亮的男人，结果下一次和丈夫做爱时她在想象中以那个男人为对象，结果成功了；当他们做爱时，邻居那个男的咳嗽了几声，女的听到了并获得了快乐，她这次之所以怀孕不是因为精子和卵子的问题，而是听到了一种声音，这个邻居的声音就是能指的父亲；孩子出生，生物学的父亲是他爸爸，但孩子听到了那个声音。他渐渐长大，一次他生病了，不断地咳嗽，去看医生，母亲说你不能这样咳嗽，因为这让她很不好受。邻居的咳嗽一方面使母亲怀了孕，一方面让孩子咳嗽，我们可以看到能指变成了孩子的咳嗽，而母亲又不允许他咳嗽，于是孩

子便不能说。可以看到母亲怎样拒绝了能指，母亲对咳嗽的解决便引出了拉康的概念——父姓的能指的丧失；当孩子长大后来见精神分析家，讲到他的咳嗽和母亲不让他咳嗽，但讲不出母亲做爱时所听到的咳嗽，于是就有一个在现实中不可言说的东西，那就是创伤。

讨 论

听众：那母亲意识到她为什么要禁止孩子咳嗽了吗？

吉：当母亲把孩子带给分析家时，那个时候她也许会给分析家讲，她也许会想到这个故事。

听众：那孩子呢？

吉：当然孩子不知道，母亲也处在无意识当中，但精神分析家会问这个孩子是怎么出生的，那时母亲也许会想起来。

听众：意识到这后是否会解决孩子的症状？

吉：当然是，如果母亲给分析家讲这些时，孩子都在那里，他会知晓这种关系；对于丈夫而言显然很难接受他的妻子无意识地在想另一个男人，这也是精神分析的创伤，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听到这个故事也是一个创伤。我想说的是精神分析必须要有这个创伤，必须要有打开这个创伤的过程才可能有精神分析的治疗，否则就不是精神分析。孩子知晓了这个故事，知道了他爱的爸爸是生物学的爸爸，但还有一个能指的爸爸，对他而言就是打开这个创伤。就如弗洛伊德所言，精神分析治疗就是痛苦的复苏，但这种复苏让身体的痛苦变成了话语的述说。

听众：孩子被另外一个人的话语所治疗？

吉：当然，拉康说人们所讲的都是他人的话语。

听众：这是否意味着在分析中不一定要说真实的话语，只要在说就可以被治疗？

吉：这个是你们自己的权利，类似你们在公众场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是政府规定的事，我起不了这个作用，我只能说你们想到什么说

什么，在法国政府也不准许人们在公众场合下说某些东西。

听众：这个例子好像太巧合了？

吉：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实际的个案，不是我想出来的。

听众：是压抑还是治愈？

吉：我并没有找这个原因，我仅仅说通过母亲的言说，孩子的病消失了，之后孩子继续接受分析，没有发现其它的躯体症状，也就是那个精神分析家没有发现转移。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一个谜。弗洛伊德认为只有通过话语来解决，在这个个案中我们看到母亲讲，孩子讲，可能父亲也会讲，那么母亲讲了这个故事后孩子的症状就消失了，说明这个母亲是很有权力的，可能中国的母亲有这样的权力，法国的母亲不一定有这样的权力。如果要一个孩子，除了和丈夫做爱还需要一个能指，我说的是绝对的权力，在西方是上帝。

第九讲*

我所讲的内容接近于终点。

我一方面谈弗洛伊德如何引出创伤这个概念，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在精神分析中，无论对集体还是个人，都是打开伤口让人说，而不是闭上伤口让人沉默。我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创伤严格说来不是创伤，他听到分析者说是创伤，但对他来说仅仅是生活。

弗洛伊德在孩子身上发现他们为快乐而追求快乐，但在快乐的追求中体验到痛苦。生命遇到的创伤只是生命本身。生命从诞生开始就意味着走向死亡，而弗洛伊德认为是创伤。弗洛伊德发明精神分析来解释它——不仅仅是生存的活动而且是爱若的活动。弗洛伊德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解释那些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他发现一些活生生的人是具有创伤的人，他发现的东西是具有创伤性的生命的存在，但这并非创伤本身。人必须走向死亡，弗洛伊德认为此乃创伤，但我却认为这仅是生命本身。

弗洛伊德的理论创造是为了让我们理解此种生存样态。弗洛伊德的发现指出孩子有爱若特征，这遭到了当时维也纳社会的抵制，表明他引起了社会的创伤，也意味着打开了一个伤口。

弗洛伊德的发现导致一个生的冲动，同时还有一个概念是死的冲动。两个概念表明弗洛伊德发现生存同时有生，也有死。当他说到死亡的时候，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抵制，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宣扬每一个人都在走向死亡。但他说生的冲动，表现为孩子出生时的生存的精神。

但在精神分析中，要求创伤被打开，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本身就是

* 10月4日上午9:00—11: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11室。

创伤。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本身就是创伤。

弗洛伊德的弟子奥托·兰克发明了一个概念叫诞生的创伤，他认为许多现实的焦虑来自于诞生的时刻，因为诞生有痛苦、尖叫、流血，这些都是创伤。

弗洛伊德在讲快乐的时候，注意到了“重复”，人们反复重复一种行为，比如抽烟、喝酒。精神分析中也有重复，在快乐原则之外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反而给我们痛苦，这就是唯死原则的创建。弗洛伊德反复抽雪茄，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因为他有口腔癌。我也抽雪茄，但我不会像他那样。他有痛苦，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在重复，他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精神分析中的发现都是如此，弗洛伊德发现所有的人都在重复使自己感到痛苦的行为，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重复。如此我们来到了精神分析的创伤理论。这些人们不知道的事就构成了迷，弗洛伊德干脆把它称作为死冲动。

这是用一个词来称呼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及引起此事的原因，这个事实，让我们开始言说。我们不仅仅用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来命名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我们在言说，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原因，但我们仍要表达。原因是难以解释的，所以有死冲动的概念。精神分析的创伤是我们不知道创伤是什么，但我们不停地要言说它。不停地言说的冲动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就是精神分析的创伤。弗洛伊德在构造理论的时候，爱因斯坦正在构建相对论，推翻了以前的因果论，但弗洛伊德仍然寻找原因；尽管他不知道重复的原因，但仍然使用了一个词“死冲动”。弗洛伊德构造的理论仍然停留在古典物理学领域，他因而只能以他的水平来构建理论。但他说得很好。

拉康的第一个文本《超越现实原则》，也是如此。

弗洛伊德在1920年的《超越快乐原则》中写到人们痛苦的重复是因为死冲动。在书中提到一个女人萨宾娜·斯皮尔林（Sabina Spielrein, 1885~1941），她是俄国人，生于斯大林格勒，在孩提时就有心理问题。

在 20 世纪初，她父母听人说瑞士有精神科医生可能解决她的问题，于是她经过长途的旅行从俄国到了瑞士——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移动——1906 年 21 岁的她在瑞士的医院中找到了荣格。荣格曾听弗洛伊德说过在医生和病人之间会发生一些与爱若有关的事情，这一点曾引起维也纳很多人的不舒服。爱是得病的原因，也可能是治愈的原因。弗洛伊德当时发现家庭中的欲望在治疗中重复。

弗洛伊德发现了快乐、也发现了爱，他发现不仅有快乐还有痛苦，不仅有爱还有恨。荣格在听弗洛伊德说爱与痛苦，他对该病人的治疗导致这个女孩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她，这不仅是隐喻性的，还有性的成分。荣格比弗洛伊德年轻，荣格除了妻子以外还有情人，他和这个女孩做了爱。荣格是基督教，女孩是犹太人，荣格没有理解弗洛伊德所说的，他认为爱就是做爱，实际是转移，替代性满足。除了他俩的教义不同，病人还让荣格离开自己的妻子并想跟他生个孩子，因为这个事件导致这个女孩精神紊乱，荣格建议她和自己的妻子住在一起，但这个女孩不愿意。我们不要忘记，她是个 21 岁的姑娘，但与荣格做了爱就成了少妇，荣格在做这件事情时就不再是精神分析家，而是精神病医生。与女病人做爱并诊断该女病人为精神病不是精神分析家应做的，荣格利用他的权力做了这个诊断，这个女人去了维也纳到弗洛伊德那儿做精神分析，这时，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关系还很好。

于是，弗洛伊德开始倾听这个女人的言说，当时他还理解荣格。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有个女人是精神病患者，是犹太人。弗洛伊德在实际分析中知道了做分析的女人就是荣格所提到的女人，他知道这个女人想与荣格结婚生孩子是因为想要一个基督教和犹太教混合的孩子，弗洛伊德认为这很重要，他认为他想和荣格共同创建精神分析的想法和这个女人的想法一样，只是在象征层面上。弗洛伊德打开自己的耳朵听到了这个女人的话，也理解了自己的愿望，他劝告该妇女中断与荣格的关系，同时他自己也中断了与荣格的关系，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分裂从此开始。

有人问精神分析家有没有自己的障碍，我回答我就有。我们看到如

果这个女的不到弗洛伊德那里，她就会停下来始终在精神病院中。荣格与俄国女人中断关系后又与另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并建议这个女人也和他的妻子同住在一起，荣格在重复他所做的事情。

这里我们看到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差别：一个听，一个说，弗洛伊德是分析家，荣格是精神病学家，两人因此而分手。弗洛伊德治疗了俄国女人，后来此人成为了精神分析家。她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破坏如同未来的原因》，谈到她在荣格那里发生的事，认为性关系有一种破坏性，她想结婚、生孩子的愿望被荣格破坏了。精神分析家也有自己的精神问题。有意思的是她自己的计划被破坏后遇到了弗洛伊德的倾听，通过精神分析，她可以重新开始工作。

荣格后来又遇到另一个女人，又要求她与自己的妻子住在一起，此人同意了，荣格的妻子也同意了。荣格又重复了自己过去的做法，因此他只是个精神病学家。

那本书中说行为的摧毁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弗洛伊德写《超越快乐原则》，仅仅使用死冲动来说明而不是用摧毁。

当弗洛伊德说死冲动的时候，死亡这个名词就已经是哲学化或象征化的东西，但那个女人所说的“破坏、摧毁”是形容词的“摧毁”，meurtre 是谋杀，而不是死亡，这个女人在书中想说的是她和荣格的性关系谋杀了她的计划，但通过谋杀使她成为精神分析家，也成了未来的原因。

谋杀的概念被弗洛伊德变成死亡的概念。弗洛伊德谈到死冲动和生冲动时，显然很哲学化，但这个女人却涉及到很多她与荣格性关系以外的事情。比如她 1885 年出生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她是犹太人，当时就有反闪族主义，她先后到瑞士、维也纳，成为精神分析家，然后回到苏联，但三个姐妹已被斯大林政府杀害，后来纳粹进攻苏联，占领了她所在的城市，放了一把火烧死了这里的犹太人，也包括她。所以这个女人说死亡或摧毁是预见后来发生的事。但弗洛伊德却没有预见或经历这些事。

我所说的创伤的意义就在于此，性关系导致了现实的和象征的谋杀。这个谋杀既是隐喻的又是象征的。

我觉得刚才讲得很困难，对我和对你们来说可能都是这样。当时弗洛伊德所处的世界也许是一个创伤的世界，于是弗洛伊德让人讲，但拉康却说是ça在讲，也是it在讲，ça=es=it，可以是他，也可以是它我在讲，但都蕴涵一个意义，即有一个它我的地点，德文词“Es”，被翻译成了“本我”，应翻译成“它我”。弗洛伊德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有一种语言，是发生在前意识的层面，而无意识是冲动的范畴，但拉康认为语言是无意识层面的，并说“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在弗洛伊德的时代，人们都以为是在自己在说，认为自己是言说的主体，但弗洛伊德却说你们是在前意识的层面上讲，你们以为可以控制自己的言说是不对的，于是他的理论造成了创伤。一般的人认为我们是言说的主人，而拉康则进一步说言说发生在无意识的层面上，虽然和弗洛伊德有区别，但共同的是他们都认为言说发生在另一个地点，即大他，这个区域中的言说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不是主人。

我准备举一个例子，这时我是我言说的主人，“我有一个女朋友，她住在重庆”；“我有一个女朋友，她住在雄起”，这里有一个语误。前者是我想说的，而后者我不是它的主人，它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语误不是我愿意造成的。又如，我遇到一个女的，我想说“我问你”，但我说成“我吻你”，可能我会挨一个耳光。这时你们看到有另一个东西在另一个地点讲，而这时我不是话语的主人，本来是我想说，但我却被另外一个东西说。在那时，弗洛伊德说语言处在前意识的层面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后来拉康说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共同的意思是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有语言，我们在意识的平面上可以控制，可成为主人，但语误不是，还有过失，比如今天上午我写了张字条准备带给你们其中的一位朋友，但我却把它搞丢了。在现实中我可以我说错了，不是雄起而是重庆，不是吻你而是问你，但精神分析就是要倾听这些语误。

弗洛伊德和拉康有不一样的地方，拉康打开了一道门，是那个俄国妇女先打开的：在另外的一个地点，本来有一个东西在说，但现在那个东西都已经不说了，这就是创伤。当我们在做梦或出现语误时，这个言

说仍然在我之内，然而一旦有了摧毁的概念，就已经没有了我的言说，而只是外部的言说。比如秦伟所问我的幻听的现象就是这样，弗洛伊德也说当内部的东西被破坏后，就从外部来言说。拉康也说当符号的序列被割断，那个讲的他者就消失了，就变成了外部的他者，这个外部的他者就是实在的序列。

补充一点，当一个人听到外部声音的时候，分析家是听不到的，所以这对精神分析的技术就提出了问题。弗洛伊德创立这个理论，让被分析者躺在沙发上言说，但如果这个人听到的是外部的言说，这种声音就是创伤性的、命令性的，但分析家听不到，这种言说往往是不和善的，于是便要求修改分析的技术，但现在我无法涉及，也许下一次我到成都来可以讲这个问题。

之所以回到屠杀犹太人的电影，是因为这个事件就是符号性的断裂，于是大家都没有办法说，而导演就是想促使大家说以打破沉默。又如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当时大家也没有办法说，后来才知道法国军队向那里的村庄丢燃烧弹，摧毁了许多村庄，结果大家沉默了30年才开始说。这个战争法国人是不讲的，讲的主体来自外部，是阿尔及利亚人在讲，到现在法国人才说，所以是一个外部的言说促使内部来说。对于我而言，也许那不是战争而是谋杀，这种谋杀便造成了符号序列的断裂，于是大家只有沉默。

讨 论

听众：即使那个它也不说了，但还是在无意识层面，只不过没有说出来，也可能没有言辞表达，但语言始终都存在。

吉：也可能是不准你说，比如南京大屠杀，日本不说，而为了国际关系，中国人也不说，但那是被迫的。

在语言中肯定有无法言说的，如道家的和一些神秘主义者所认为的无法言说的神秘，但也有禁止，如西西里的黑手党，不许人们说一些话，

否则就将他们杀死。但我想说的是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开始出现了一种摧毁，破坏了言说的机制，这是道家等没有遇到的，而拉康遇到了；比如精神病患者的幻听，这些也是以前的人们没有遇到的，而精神分析家遇到了。

比如我看到青城山的道观，我不想走，想住在那里，但不得不走。我要到北京去见孤独症的孩子，他们完全不能讲，缺乏讲话的机制。但幻听的人的情况是道家、佛家的人没有遇到的，如果在青城山的山顶我听到他人的话语让我做什么（指幻听），道家或许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希特勒会杀掉我，但精神分析家恰恰试图了解这样一种情况，这也许是精神分析家和别人不同的态度。

到现在为止，有一个原因是我是被外婆带大的，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也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也许这使我有了好奇心去了解精神病患者。这个谜一样的东西不仅使那个俄国的妇女回到俄国，也使我来到中国，也使一个患孤独症孩子的母亲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来见我仅仅为了讲一句话，她的移动比我更大，因为我只需要坐9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到中国。

精神分析有些东西可以在大学学到，但有些东西是学不到的，比如今天早上在校园中碰到那个懂几门语言的卖邮票的人，我说重庆，他听成雄起，说“啊，你喜欢足球”，正是这种语误使我们有了交流。但如果是一个女人听成了雄起就可能给我一耳光。

问：请再说说荣格的问题。

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那个俄国妇女到荣格所在的医院时，荣格还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在瑞士也有各种方言，类似中国的很多方言，如北京话、普通话、成都话、四川话、广东话，但那里的医生都讲德语，所以可能听不懂精神病患者的话，于是有一个医生叫 Bleuler 让大家去学方言。当时荣格刚发明了词的联想，也遇见了弗洛伊德，荣格很优秀，但很难说他是不是精神分析家，有些教条主义认为如果没有处在弗洛伊德或拉康的路线上，就不是精神分析家。我有很多各派的朋友，是不是

精神分析家，不是看理论，主要是他们是否愿意真正地倾听患者的言说。当然荣格有他的症状，就是始终想找情人。我说那个时刻他不是精神分析家是指在当时，但后来他做了很多事，直到1975年去世。弗洛伊德可能在某一刻也不是，我在某一刻也不是，但当我们说是不是时，这个问题便展开了，可以充分讨论，看在不是的那一刻我们哪些没有做够，不是也为是提供了可能。比如我现在就不是精神分析家，最多是一个分析者，我和我的孩子、妻子、情人在一起时也不是，我只是一个人，我们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精神分析家。我有些朋友24小时都是精神分析家，当他们和情人做爱的时候也是，总想分析什么，但当我坐9个小时的飞机来听坐40小时火车的人来给我说的时候我就是，因为那时我的耳朵是打开了的。

问：实在的东西不能被符号语言化，但听到的是语言，为什么说幻听是实在界的？

吉：幻想属于想象的领域，幻听在拉康那里属于实在的领域。拉康从来不定义，那是大学教授的事。拉康只讲符号的序列，不讲实在和想象的序列，同时他也从来不做判断。

问：佛家、道家中都有专门诱发幻视、幻听的做法，如何看待？

吉：有一个差别，人们可能会有意识地寻找（幻觉），如吸毒或爬山都有幻觉，但精神病患者不是去寻找，超过8000米可能丧失控制，要么下来，要么死亡。

第十讲*

(从这一讲开始吉布尔先生让大家参与讨论)

张晶燕：你的朋友西蒙娜女士说 Pallus（石祖）仅是一个幻象，男女都没有“法吕士”，如何划分性欲链，男女如何区分？

吉：如果是石祖，它属于中国神话学领域，对应于弗洛伊德最早所讲的男性生殖器的意义，在你这个问题的后面是否是指西蒙娜说了蠢话？

弗洛伊德从来没有给定义，所以也不会说女的是没有男性生殖器的男人，弗洛伊德在他的分析工作中听到成人脑海中的孩子在讲，可能是男孩也可能是女孩，他们讲他们出生后在看，但没有看到阴阳，你们看到阴阳了吗？

这是看不到的，只是一个假设。

阴阳的理论和创世纪的理论都是成人构造的，而不是孩子构造的，这是中国孩子与西方孩子所听到的，但他们要探究，究竟孩子看到了什么？孩子是如何想的？举一个小男孩的例子，他不知道自己是男的，是大人给他说的，但在说之外他还看到了大腿之间的一个东西，偶尔那个东西还会像你们说的那样雄起，不仅看到，还有感觉，会去摸它，在非洲母亲会把它含在嘴中。弗洛伊德发现了这一个问题，男孩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有，同时他继续看，突然发现小姑娘没有这个东西，这时候一个重要的时刻出现了，“为什么她没有”？

* 10月5日晚7:00—9: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24室。

弗洛伊德发现当小男孩发现小女孩没有时，可能会认为小女孩原来有现在掉了，认为自己的也可能会失掉，于是他构造了“阉割焦虑”的概念。弗洛伊德所说的阉割焦虑并不是说谁会去阉割它，这是秦伟讨论的问题：是父亲还是母亲去阉割它。

后来拉康构造了一个逻辑结构，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但有一个人没有，所以他也可能失掉，这是一个逻辑的东西，而不是他会被谁阉割。也可能这个男孩看到她妈妈没有，于是可能有另外的逻辑，他以为妈妈是一个权威，便担心妈妈会把它割掉。我不知道在中国当一个男孩子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国的父母究竟怎么说，但也许不会说是阴阳的问题，当然我的问题是对成人提的，但你们都曾经是小孩子，那时你们有这个困惑时也许会觉得它是一个谜。我遇到一个女人，甚至在和男人做了爱并有了孩子后仍不觉得有那个东西的存在，好像是有了两个孩子，但我记不起孩子的性别了，也许他们在黑暗中做爱，但我想说不是所有的法国的女人都是这样的，法国也没有在黑暗中做爱的传统，显然每个社会都有它的规则，都有一些禁止看的東西。

针对秦伟的文章，我补充两点：在这个逻辑上父母亲增加了什么？也许母亲是阉割者，也许父亲是阉割者，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当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要说并不是所有的父母亲都是这样的，有些父母做的事是为了减轻孩子的阉割焦虑。说西方是父亲阉割而东方是母亲阉割并没有增加什么意义，我的兴趣是当孩子提出这个问题时，父母怎么说，他们肯定不会说阴阳的问题，而且父母亲说的在东西方也会不一样。

（听众：当大人说要割去小鸡鸡的时候，孩子恐惧的是身体受伤、痛，且成了小女孩一类。）

对男性生殖器有很多称呼，在西方，共同的称呼是小鸟、小笼头等，不知你们中国有些什么称呼？

（听众：有很多，雀雀、小鸡鸡、小弟弟、老二……）

但在弗洛伊德意义上，Phallus 则完全是另一个东西，Phallus 在希腊神话中就有这样的石雕，即石祖。蔡江发现了很多石头的这样的东西。

在石祖和阴茎之间，有相似处，那就是父母都不会这样来叫小孩的那个东西，甚至父母在威胁小孩要阉割他们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也不这样称呼。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个东西，但还不敢把它完全说出来，只能用学校的语言来说，并没有说父母如何称呼他发现的那个东西。弗洛伊德经常使用的术语是阴茎，偶尔用石祖，但他并没有把它们区分得很清楚，当说阴茎的时候指的是男性的性器官，这也是他在学校中学到的，当他讲石祖的时候讲的是希腊的神话或在某处人们看到的石头。由于它是竖起的，所以要打掉它就很费事，因为石祖是始终竖起的坚固的东西。希腊中也有一个 Phallus 神，而这个神对男女都是一样的。（我的书上没有写这个神）必须去问那个作者为什么把这个神忘了，也许那个神是叫 Priape，类似一个病的名字 priapisme（阴茎异常突起），也就是说阴茎始终是勃起的，也就不需要雄起了。在病理学中可以看到石祖和阴茎的区别，后者并不始终是勃起的。

听众：因农村重男轻女，因此感到阴茎给自己带来较多的优越感，和妹妹相比没有阉割焦虑。

吉：也许这样的差异没有给你焦虑，你看到的是行为，而弗洛伊德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讲的。你有“小鸡鸡”父母就爱你，可以平息你的焦虑，这在西方也有，说明不能得出结论谁就是阉割者，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既有父亲也有母亲是阉割者。

弗洛伊德创造了“阉割”这个词作为工具，于是大家可以谈论它，如果大家说不同的词，就没法交流，创造这个词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讲自己的历史，讲述的可能是焦虑，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生育的焦虑，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弗洛伊德创造了这个概念，使大家能够交流，以回溯自己的历史。

比如建筑工人都使用榔头这个工具，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叫法，但又有共同的约定，所以弗洛伊德的阉割概念只是一个工具，以方便大家使用。

我现在想编一个例子，足球运动员喜欢使用左脚，教练说他有问题，

就让他去看精神分析家，结果发现他有阉割焦虑。四川人喊雄起就暗含了这个意思，实际上是没有雄起，否则就不喊了；这说明中国的足球运动员有癔症的倾向，从雄起可以看出在足球运动中也有性的问题，但足球运动员在踢球时遇到问题并不觉得是阉割的焦虑。

石祖的形象可以使我们想象，石祖对于男人和女人都同样有效，弗洛伊德认为它是象征性的，是一个图像。

第十一讲*

我们遇到的问题始终和精神病连在一起。某一个人焦虑漫出来的反映是打电话给警察说他希望得到保护，很遗憾警察把他放了，在法国，警察会请精神病医生来诊断他是否应该得到保护，但这个警察没有，却让他回到了引发他焦虑的社会，如果得到了保护，那么焦虑就会减轻一些。当然法国的情况是，当一个人的焦虑漫出来后就请精神病医生让他安静下来。现在请张女士继续提问，但我肯定不会回答你，因为我没有答案。

听众：Phallus 是象征的，始终是竖立的，如何理解它对男人女人都一样？

吉：Phallus 人人都可以看，那么它对所有的人都一样，无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甚至一个狗都可以在它面前撒尿，所以它是社会的一个神话，类似于西方有一个唯一的上帝，唯一的神。当然我们可以说男人和女人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可以倒过来说它拥有男人和女人。

听众：女人的阉割焦虑是什么？

吉：首先弗洛伊德的发现是基于对他自己的理解的，他先是一个孩子，长大后脑海中仍有自己小孩的记忆。对于小姑娘的问题，显然对弗洛伊德来说有疑问，他自己没有体验过。女性患者对弗洛伊德讲，他打开自己的耳朵倾听，这是 20 世纪初的事，至于俄狄浦斯神话，它涉及的是一个小男孩的问题，这种麻烦也出现在拉康的身上，因为拉康也是一个小男孩。一次在讨论班上，拉康突然说要让那些女的打开她们的嘴巴，由于你是一个女孩，我就把话语给你，让你讲，“说吧”。

* 10月6日上午9:00—11: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24。

听众：我们女孩长大后在文化中有感受，比如比男的差，贞洁观，以及生理上的麻烦，男性好像要自由些，享受更多的宽容，但女人会更严格。

吉：男孩子犯错误也会被抓起来，对我而言，什么是错误？

不允许一个女孩子在丈夫之前和别的男人有性关系这个问题与现实原则有关系，超我在形成后很难改变，虽然社会的习俗在变。处女的问题过去在法国的习俗也类似，中国也是，北京附近有个村子，这个村中一个20多岁的人指着一个房间说这是女孩子住的，她们在里面学习家务活，只有在父母指定了新郎并和丈夫结婚后才能出来。如果你到非洲的原始部落去，小男孩和小女孩赤身裸体在一起，有性接触是很正常的，只在成年后才有约束。每个社会的群体都有其自身的风俗和法律，如中国的少数民族很多和汉族就不一样，但不管怎样都有规则和习惯，这些东西强制性地灌输给孩子，孩子也不得不接受这些规则和习惯。你可以想象非洲那些部落的小女孩如果不愿与小男孩有性关系，她所在的群体也会认为她犯了错误，但法文中不说犯错误，而说没有遵从规则。你看到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按拉康的看法这也和享乐连在一起，因为有孩子出生的快乐。我想到弗洛伊德所说的，孩子看到自己两个腿之间的那个东西，但他发现大便也是从两腿之间出来然后消失，他可能因此而焦虑，害怕自己的那个东西也消失，而妇女的生孩子也是从（两腿）中间出来，类似排便，于是也有一个焦虑，所以不少妇女生产后有一种抑郁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将男性生殖器、粪便、生孩子连在了一起。人们把排便的焦虑称作肛门的阉割，不少孩子在解便时很恐惧，害怕排走什么东西。

你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只有你讲了后才会有我的想法。我想到拉康想区分大学的辞说和精神分析的辞说之间的区别，大学的辞说是假设我有一个问题想你回答，但精神分析的辞说是你的问题你说出来，我在倾听并且引起我的联想，处于一种更自由的状态。精神分析的辞说在另外一个逻辑上，这里没有拥有与丧失的关系。

听众：我听到你的话进一步联想到你看到妇女的生产，那是身体和身体的关系，我感到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利，觉得不公平，但又不敢为，不能反抗。

吉：母亲如果生了一个男孩会觉得这个孩子及其小鸡鸡也是属于她的（昨天那个人说的），这填补了母亲的缺失，但同时孩子的出生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作用，就可以使母亲拥有小鸡鸡。弗洛伊德要说的是，很多母亲并不管孩子有没有小鸡鸡，只关心我有了一个孩子，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的分析，弗洛伊德发现了另外的东西。

男孩子生殖器向外长，女孩子生殖器向内长，有本书叫《一棵倒长的树》似乎也有这个意思，给我感觉男性有生殖器更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应该负担起更多的责任。

对于从哪里来的问题，当然孩子都希望父母回答，但父母可能回答也可能不回答，但弗洛伊德是说孩子自己要构造这个理论，如果父母不回答就去问别人。但其实所有的孩子在问别人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问别人只是要印证，在长大的过程中，孩子还会不断地探求，通过询问、看书等等，直到获得一个他认为满意的答案。有些父母不允许孩子与其他人有社会关系。而在非洲一个妇女没有孩子是很糟糕的，因为社会需要繁衍、需要再生产。但之外还有一个性快感的问题，哪怕它可能是和痛苦连在一起的，弗洛伊德说如果不考虑生孩子那社会就成了天堂。在那个记录片中，说弗洛伊德是一个完美的资产阶级，他有他的家庭、妻子和孩子，他的社会角色扮演得很好，但在这之外他还有发现，即性的问题。当时有一个宗教运动，认为社会很糟糕，所以就应该禁止生孩子，也许中国的生育政策和西方的这个宗教运动有类似性。

听众：联想无确定性吗？

吉：常识中是寻找确定性，但在联想中确定性没有了。说确定性来自外部，很美，但又有一种挫败感，因为没有确定性。

首先，弗洛伊德创立的自由联想原则仅仅是在分析中，并不应用在公众场合，否则警察可能会把你送到监狱中，不仅在中国，在法国也一

样，因为这个规则只用在分析中。你们以为我在自由地讲，但并不完全是，精神分析家在公共场合也是在谈自由联想的原则，类似抽象画和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原则。强调准确的定义是在强调唯一性，当然它是有的，但这只是科学的话语，比如说这个手表就是手表，对手表有明确的定义。但这个社会并不仅仅是科学的话语，还有如诗歌等，精神分析也是要传递给公众以多义性，所以诗人、画家等接受这种多义性的语言。

第十二讲*

听众：拉康关于 Phallus（石祖）的看法是怎样的，书上说 Phallus 是能指？

吉：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说，那可能就是真的。你是否在明年的会上要说这个问题，不一定要想好了再讲。去年你讲了一个多小时。有个问题让你对这个主题一直有兴趣，是什么问题？

听众：性本质的问题。如果男女都不具有 Phallus，那么女性何以区别于男性，男女仅成了一种象征。这也是图兰朵中讲到的问题。

吉：刚才翻译的是“不存在女人（复数 les femmes）”，但拉康的意思是“不存在妇女这样一个概念”，是单数的 la femme，拉康经常引诱女性，可见女性是存在的。

听众：每个女人心中都有斯芬克斯，女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迷惑男人，然后把他杀掉，（对此）我怎么感觉不到，无论是在意识层面或分析层面？

吉：你不引诱每一个男人，同时引诱了以后也不杀了他。

为什么你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这只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情结。而且只有图兰朵的作者这样说。

听众：我以为图兰朵的说法有代表性。

吉：并不是所有拉康派的人都这样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说法。如果拉康听见图兰朵的作者这样说，肯定要用耳光把他扇走。

拉康只有话语，没有思想，不是思想家。海德格尔是思想家。他不

* 10月7日上午9:00—11:0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24室。

拒绝写作。拉康最主要的教育是他的演讲。他的著作选集是被迫写出来的。拉康的女婿要把拉康的演讲变成文字，把拉康变成思想家。他把话语变成文字的工作是希望成为唯一的文本，但这完全不能与拉康的演讲协调起来，这种做法与拉康的演讲不同。现在也有其他人在整理出版拉康的演讲。如果图兰朵的作者认为自己是拉康思想的解释者，他的头脑肯定出了问题，需要做精神分析。

“女人是否存在”的句子不是来自拉康的文本，是从中文来的。中文没有 les（女人们）和 la（女人）的区分，理解拉康就出现了困难。也许有一天拉康在讨论班上说 la lemme，而其他人在咖啡馆讨论时说 les femmes，这就有了差别。其实拉康不断地重复这句话。拉康不是学校的老师。问题是拉康这样说 la lemme 而其他听者听成了 les femmes。你们听到“女人不存在”后进行的讨论，也是我无法完全理解的。

听众：就现实而言，具体的男性形象是存在的，如我从小就有一个男性形象在头脑中，我肯定有一个男性角色的认同，像我父亲或邻居小孩的父亲。但我已经过了那个认同的年龄，我发现我没有达到那个目标，所以我说那个男人根本不存在。

吉：你们已经在符号的层面上讨论了父亲，你们不需要一个拉康。

Humus — 发芽

Humanité — 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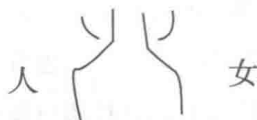
Humain — 人类

Homme — 人，男人

拉丁语“幼芽”这个词最后变成了人性，同时变成了人，这个人就是男人，由此又提出了人权的问题，又有了反对人性的罪行的问题，提出了人与动物之间区别的问题，这个符号序列用于区分人与动物。那么，在这符号领域中，可以看到，女人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影响女人的存在，这是犹太人、法国人的传统，并不意味着说拉康说不存在就不存在。

听众：我学法文才感受到词要分阴阳，这加强了的女性意识。

吉：在另外一个语言中间可以给我们一种平衡，尽管有时是创伤。这也是我学中文的感觉。比如下图中这个字：



镜像关系

霍：妣，女祖先的意思。

吉：霍大同有一个语误（说人性为人心），这说明精神分析在中国是可能的，这是个好消息。

法国女在左，左为下。

弗洛伊德只有在写字时才能分清左右。左右是一个平衡。古典物理学说空间有对称性，无左右区分。

有一个女性认为有左右，不对称。西方认为右为上。

中国同样也是有这方面的情况：无出其右。从汉字的情况来看：如妣的情况。

左右是怎么看的，是从自身来看的，还是从一般水平的角度，如照相。

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汉字将男人放在左边，而将女人放在右边，而西方的情况则不一样，中国人以左为尊，而西方人以右为贵。

西方的传统是男人发明了言语，在沙纸上写字，导致痕迹。因此从隐喻的角度看文字为阳，纸为阴，有一种穿透的趋势，相当于 penis（阴茎）穿透于女性的身体。相比而言，精神分析家作为一个倾听者，更像是女性的行为。

美国女作家用 she 顶替 he，像是她们企图拥有一个石祖。

足球运动员说“雄起”就是让石祖转移到脚上。

创伤就是语言的消失，如犹太民族语言的消失，或不能用这种语言来表达。

第十三讲*

精神病医生不接受分析就变成精神分析家那就意味着精神分析的结束，通过精神分析的话语也许可以使精神病学家成为好的精神分析家，但不接受分析就成为精神分析家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北京就遇到一个年轻人，他是搞心理治疗的，听了德国人讲精神分析，就以为自己成了精神分析家，这就意味着精神分析的结束，而德国人就参与了使精神分析结束的工作。

听众：你好像认为这种短期培训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也是一种办法？

不能说是好还是坏，它仅仅是一个行动，说明中国现在的需求，类似中国当时培训赤脚医生来回应社会的需求。但另一方面，要培训精神分析家确实要很长时间，但听说中国有很多治疗手段，是否要增加精神分析也是一个问题。但精神分析不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弗洛伊德是倾听一个人的言说而不是社会的、群体的言说，为了回应这种社会的需求，你们中国有很多方法，有道家、佛家、共产主义，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可以到庙里去说，或对组织说，也可以解决问题。

弗洛伊德发明精神分析是因为那些女病人来给他说独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社会没有提供解决办法的，那些医生没有解决她们的问题。比如在北京田女士使出浑身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的问题，为了找钱，她求助于国际社会，因为政府不给她钱。我当时找了一些俱乐部或基金会看是否可以投钱，田要我发言，我说了一个小时告诉他们应该投钱。但这只是钱的问题，田女士还遇到了别的障碍。她有一个教育的系统可以教

* 10月8日上午9:00—11:30于四川大学文科楼224室。

育孩子，那些家长也很想接受这些训练以便去教育孩子，但不是所有家长都可以，有些家长自己有问题，如抑郁等，不能做到。于是我的任务就是给家长谈，这必须一个一个地来，这就是精神分析，不是听大众说，对我而言，这种对话给了我惊奇。

田女士是一个做事很有效率的人，但她理解了要当精神分析家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有些人不懂，以为参加了一个什么会或接受了一个什么培训，就可以立即把精神分析家的标签贴在自己的头上。比如一个精神病医生听了精神分析的会觉得很有意思，也觉得自己可以给别人做分析了，也许他会像开药那样使用话语，但精神分析是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人，而精神病医生是面对大众开药。一个搞教育的人看了精神分析所说的关于孩子的理论觉得很不错，就按照这个理论去教育孩子，但这和精神分析是不一样的，因为精神分析不是一个对教育的补充。

我们在拉康的记录片中看到一个英国的精神分析家，说了如何引入拉康的观点由此解放所有的妇女，美国也有对男人的战争。但这些不是精神分析，反而会威胁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不是要解决所有妇女的问题，只是面对一个个独立的妇女，把话语权给她，让她说。

同样，在法国，有些大学有精神分析系，有精神分析的教授或老师，传授精神分析的知识，这些知识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精神分析的书，如弗洛伊德的著述。那么学生就记笔记，但这个时候教授就不是精神分析家而仅仅是教授，因为精神分析家的工作不是言说而是倾听，当他面对一个新的分析者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没有任何知识，当面对一个分析者的时候，精神分析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预期的知识，只有发现，他的发现只是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哦，他说这个，说那个，这个过程可以唤起他自己的体会，可能唤起分析者的某些情感情绪，比如高兴或愤怒等，但没有任何知识。并不是说在治疗过程没有任何知识，肯定是有的，但它在无意识中。分析者来找分析家时假设对方有这个知识，当然精神分析家是有这个知识，但他会说我们看看、听听再说。所谓无意识的知识指这种知识既不存在于分析家的内心也不存在于分析者的内

心，而是存在于这两者之间，无意识的知识不是一个妇女怀了个孩子在她身上那样，而是在一个言说和一个倾听的互动之间。

昨天早上，霍大同是大学中的教授，但这个语误不是在他内心里面，他在写字的时候不能写汉字而写拼音，这个时候不在他的内心，也不在我的内心，而在黑板上，有一个知识，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这个知识既在霍大同那里也在我这里，因为我听到了，我们不能把它传授出去，只能工作，看这个语误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有 g 这个字母，是我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我后来意识到了，这不是他的意愿，我也是不自愿地注意到的，这个字母与我的姓有关，我们不知道这个知识，但这使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说它。霍大同在法国时在我那里接受精神分析，这个语误在我们之间，我们在公众面前可以把它说出来，我今天是作为分析者而不是霍大同的分析家来讲的，如果让霍大同来讲，他肯定无法讲我刚才讲的，一定有所不同，但他能够讲语误，这个时候他既不是一个教授也不是一个分析家而是作为分析者在讲。如果他愿意自由联想的话。

经常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语误，但常人不理解，认为是他弄错了，而精神分析认为这儿有个知识，在分析过程中要让处在分析中的人意识到这种知识，意识到是这种语误推动他在讲。

战争也需要精神分析的帮助，我是分析家，应该回去帮忙。

有个故事，在一个宴会上，滑稽演员和将军相遇，前者被请求讲个妙语，滑稽演员说可以啊，只要你来一炮，我就可以。滑稽演员可以随时说滑稽话，而将军不能什么时候都开炮，只能在战场上开炮，分析家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家只有在分析时才是精神分析家。

拉康的演讲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人把他当作是个大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家、教授，但拉康却认为他仅仅是在作为分析者做自由联想，在公众面前做一个自我分析，很多人做了笔记认为这里有知识，究竟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拉康也不管，这就是拉康天才之所在。

刚才我开玩笑，说我想回法国参战，帮助法国人打阿富汗，但这不仅仅是个玩笑，二战时德国人曾抓住了恐怖分子，让恐怖分子到分析家

那儿去做分析，参与政治、军事，这是对精神分析的一个威胁。

在二战时，当时德国的精神分析家为了逃避纳粹来到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培养了一批IPA的分析家。拉丁美洲是独裁的国家，和纳粹差不多。二战后，也有些纳粹分子跑到阿根廷，这时阿根廷的军政府杀了很多人。他们把孩子交给纳粹的家庭，培养他们。有一位精神分析家听一个分析者言说，后来这个分析者成为了分析家，他去警察局工作，为了让被抓捕的人讲话，直到这些人被杀死。在这儿我们看到精神分析家以社会的名义做这些工作，有个女分析家听到这一切，她说在这儿有问题，就花了十年时间写了一本书并出版了，在她写书的这十年中受到了整个群体的反对和威胁。她被威胁可能会杀死，她的书的法文的题目是《不要和任何人说》，意思是说了就将被杀。精神分析式的工作就是倾听一个人的独特语言，而在阿根廷不一样，你必须讲，否则被杀，显然在这儿让你讲是为了死亡，这本书1997年在法国出版，我的朋友R.Major也是IPA的，她写了序言后就与IPA发生了矛盾，退出了IPA。这里我们看到从二战到1997年之间创伤的影响。

秦：我对能指链的断裂很兴奋，但无法表达，也许我们从症状可以去推断，去猜想一个创伤，但回忆没有抵达创伤。昨天做了很多的梦，情绪很类似，我梦见在一个小镇上，有个男的，我给了他两张纸，他给我一个包，我说不要，我只想要那两张纸写些东西就行了，不要包。很显然，对我来说，那个男性和我同龄或稍比我大些，属于中年人。小镇是黄龙溪，从小梯坎，进入小巷，就是上次你们谈话的地方，在梦中你们也在那儿谈话、闲聊，我在外边晒太阳，车夫给我递烟，这个梦和黄龙溪有点关系。在一个柜台边，我将柜台看成镜子，我在照镜子，觉得很有意思。昨天我和家人在科学馆散步，下午太阳很好，我在科学馆看见我的样子，那时我和妻子、女儿在外面晒太阳，我穿着现在穿的衣服，当时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就是人到中年的模样，再也不像十几年前那样。昨天早上我和尹力说在计算机方面可以看到年龄的差距，我和计算机始终有距离，但居飞等人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个男人问：“你是几几年的，

65年还是63年，在他们的眼里我已经很老了，这种年龄应该是博导的，应该有所建树，我才刚刚开始，在梦中有种焦虑，要到40的焦虑。一年前我37岁时在茶馆和霍大同闲聊，霍大同说我想40而立，肯定在年龄和立之间有个不平衡，有个焦虑，想抓住什么东西，当年我放弃中医转向数学和实验心理时，就想抓住一个确定性让我觉得有力能用得上，但中医就没有这种感觉。也许在这儿和很多事情都有关联。有句话叫“墙上挂团鱼，四边无靠”，这句话唤醒我个人很强烈的情绪与联想。我很想抓住什么东西，比如金钱、技术、地位等。就像当初我父亲放弃政府工作去学医，也可能是这样。这样做可以对未来有一种把握。我在这儿的联想可能会有很多，但不是一对一的，我需要时间化化妆，检查检查，然后说。但是这样语误出现得就少，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在公众面前做自由联想如果超过一个界限就很受限制，也许你们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不过就得麻烦你们了。我说一些与梦有关的，不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吉布尔说分析仅仅是倾听，重要的是说的过程。老先生为人处事的风格与其他法国人不一样，其他的法国人比较跳动，这种感觉很难说，他的处世风格比他讲授的内容对人有更深的影 响。反过来，我就会反思自己，想想是不是自己在某些方面错了，如我给很多人讲精神分析，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在教授精神分析的方法上是不是有错误。

吉布尔：现在的情况是我给你们讲，我在这儿是处在被分析状态中，就像你现在一样。当他们在讲时我们就应该对他们尊重，我们在听他们说，我们就是分析家。

弗洛伊德讲他的梦而出版成了一本书，已经是一个解释，已经有人反对，我们听到了又有个解释，现在很多人还在阐释，其中有个知识是不可知的，若干年后也许有人会解释秦伟的梦。秦伟所讲的梦就是加上了你的解释，我们在听又加上了我们的解释，对于梦的理解比我讲的创伤理论更复杂。（张海燕说秦伟很年轻。）是的，你听到这个梦时，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笑时，你可以讲一个小时，此时有个无意识的知识呈现出来，在两者之间，弗洛伊德的伟大的发现是通过言说有个平

衡，同时无意识从这儿展现出来。一个教授、军人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平衡，弗洛伊德则为那些焦虑的人在言语中找到一个平衡。精神分析不仅给对方一个平衡，也给自己一个平衡。而精神病医生，只给患者平衡，并不给自己以平衡。这些找弗洛伊德的人，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在分析中通过言说重新找到平衡，不仅是病人而且分析家也重新找到了平衡。他们都是转移神经症。

当秦伟在做梦时他会认为是陌生的，当他讲出来就会熟悉，所以叙述梦时，梦就由一种陌生变成一个相对熟悉的东西。中文对我来说也一样，就像梦和语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到无意识，另外一种语言存在于我们内心，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了解这种语言。每人都有一个陌生的语言，精神分析家就是倾听每个人陌生的独特的语言，只有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才能理解这种陌生的语言。学习这种陌生的语言确实需要很多时间。同样，学习心中的陌生的语言也需要很多时间。有的人需要的时间长，有的人可能感到不适。弗洛伊德说如果你能用分析者的语言来交流，你就可以理解分析者，拉康说妇女做这个工作可能更容易一些。

现在我的头脑中就想起了一个嬷嬷，她信仰天主教，她选择做一个处女。因为她失掉了平衡，所以来找分析家。作为一个嬷嬷她选择了进入修道院，这意味着她是位处女，当时她是60岁，她跑来找精神分析家，教会是反对的，她被教会看成一个疯子。对分析家来说这是个很困难的工作，在她的头脑中存在着一个很陌生的语言，但她还是讲，这个陌生的语言就像精子穿透了她，在分析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她愿意让陌生的语言穿透她，就在此时，她想起了她当嬷嬷就是逃避和男人有关系，最后她觉得应该让男人穿透。从这儿我们发现语言的穿透与阴茎的穿透有个关系。法语中语言就是舌头的意思，舌头就是爱若的器官，语言的穿透和性的穿透都是通过它，语言的穿透是与舌头的动作连在一起的。妇女更容易成为分析家是因为她们更容易让自己的身体被他人穿透，这不仅仅是解剖学上的。男人想成为分析家，就必须学会被陌生的语言所穿透。对于男人来说，要被自己的梦或语误穿透，或者被外在的其它语言所穿透，

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家。困难的是，解剖学上认为女的更容易被穿透，男的有一些人有被穿透的愿望，男性同性恋者就是例子。弗洛伊德认为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我想说的是在男性中不仅这样，女性同样也是这样。如一个女人做精神分析，她的词语就穿透了分析家的耳朵。其中有个谜一样的东西，昨天讲的女性作家就想要一种穿透，放一个种子，让它成为自己的孩子。

谷：我想讲一下我的一个朋友的梦。A(女)、B(男)、C(男)三人。女和C男恋爱，但一天女梦见另外一个男朋友，并叫了名字。其男友C询问，“是不是做梦？”，A回答说“是”，C说你是不是喊另一个人的名字，但又不是我，A回答说是，我在喊B，C问A说你是不是爱上B，A说我们分手吧，C觉得太突然；A和B认识，当时A对B有好感，A参加了工作，B去了日本，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A和B已经联系了半年，今年B从日本回成都，A告诉我这个梦，A几次想对C说分手，但C对A很好，A找不到理由分手，A说不出口，如果直接对C说她说不出来。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不管是熟睡，是假睡，都是其想分手的愿望的表达。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吉：秦伟和其他精神分析家一样，都要做梦。秦伟和谷建岭梦的不一样，秦伟是自己的梦，而谷建岭是他人的梦。我们理解自己的梦，秦伟讲自己的梦，就像我们交流一样。我讲的你们是很感兴趣的，并不存在不能交流的可能性。出现语误后的交流更充分，我们看的记录片中有弗洛伊德的星期三的聚会，所有的成员都很自由地讲语误和梦，这种认识很深刻，从昨天开始我们相互之间的认识就比以前更多，也比去年多，这一点也许和秦伟讲的梦有关系。

昨天我在市区散步，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很快要回法国去了，我就跟出租汽车司机和行人交流，我对出租车司机说雄起，他哈哈大笑，差点打错了方向盘，很自然地我的中文就出来了，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交流得很好，让自己都很吃惊。也许与秦伟讲梦有什么关系，我在昨天晚上没有障碍地讲中文。在分析治疗中，如果分析者处于很严重的状态中，

你说个词让对方发笑，就可能打开了一道门。

尹：我梦见尿床，但起来发现没有，很高兴，我本来很怕黑，但喜欢吃黑色的东西，如巧克力等。和异性关系好的时候，就像在黑暗中，我一直在想小便和人的性格的关系。

张：我在他说第一个梦的时候也想说自己的梦，但一想到这个问题就心跳加快，好像坐立不安，因为在3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要死了，就几分钟了，我很想我妈妈，她即使坐飞机过来也来不及了，我很遗憾，觉得没有很好地表达对我母亲的爱，我很想表达，可能几秒钟就要死，我在梦中深刻地体会了将死之人的感受，但就在这时我妈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握住了我的手，就在这时我奇迹般地复活了，我很奇怪，因为一般我的梦都记不住。

吉：我们看到秦伟讲了自己的梦后就能让大家讲自己的梦，也使我能够讲一些事，你们有人梦见梦中找厕所，我去年经常尿胀了找厕所，但找到后我不敢解只好回宾馆解。今年不一样了，但我还是只敢小便，不敢大便。我去年说了中国与西方的区别，中国人解手后想留下什么，西方人则立即冲掉。那天我想去解一次大便，进去看到一个男的在那里解大便，但他的样子实际上在大街上就看得到的，可以看到他蹲在那里和两个大腿之间的那个东西。刚才张女士说自己梦时很激动，说明身体实际上干预了语言，二者有一种联系。我今年敢解大便，但不敢像那个男的一样，只敢找最后的一个隔间。大家在这里讲自己的问题或梦也相当于当众解大便，因为这也是些脏的东西，却在公共场合排泄出来。当我们讲的时候就是新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会讲撒尿、拉屎或性。但东西有两个意思，一是事物本身，一是东方和西方的差别，如果我们说东西方的事物，我们也许可以说东西的东西。这还有一个意味，拉康曾说中国人或日本人不可能做精神分析，但这几天的情况看是可能的，精神分析可以扎根在中国，同时可以反过来促进西方的精神分析。罗宾取名为东西，我给他去了信说“东方有西方，西方有东方”，所以不能完全分开，但他现在还没有回信。

肖：我在教室，很大，很暗，我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结婚，都要有男朋友，我怀疑自己有同性恋倾向，看见一个兵马俑似的人，是我初中的男友，很像霍老师，觉得很奇怪。

严：我刚从农村来时也不习惯城市的厕所，觉得这是从西方来的玩意。

吉：我在农村长大的，农场的厕所在房子在外边，有两个蹲位，因为冬天太冷，两个人一起上会热和些，当然是不是这样，我也并不知道。后来城市中的厕所都是抽水马桶，上面都写有“请保持清洁”，告诉你解便后应该冲洗，让它和之前一样。城市的厕所始终是一个蹲位，关闭的，可能使你相信其他人不解大便。我想到一个主意，你们到阿富汗去问那些塔利班的人：是否你们也和大家一样解大便？

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问谁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凶恶的动物？

听众：人。

听众：我自己。

听众：粗鲁的动物，会妨碍别人思考的东西，让一种静止的东西突然被打断（是哪样的？），我描述不出来，也许是一些声音。

听众：人，第一个反应，再想，也许每一个都是，也许都不是。

听众：人。

听众：自身。

听众：希特勒。

听众：老鼠。

听众：有四个东西，一边是拉登和塔利班，一边是布什和布莱尔。

听众：人。

吉：你们是否知道 crocolion？它有一个狮子的头和一个鳄鱼的身体，它可能是最凶猛的动物，因为它不能拉屎。

我听到一个朋友给我说，他在拉康那里接受分析的时候，拉康放了一个很响的屁，放完后就让他出去了。拉康受道家的影响很大，就是要在公众中做一些大家禁止的事。

一对夫妇中常常有第三者，要么是孩子要么是情人，但在我和我妻

子之间的第三者是拉康，因为她是拉康的分析者，但我更希望她是拉康的情人。总有第三者，或者是某一方的父亲或母亲。夫妻间的爱和对父母的爱往往有竞争关系（听者：可能有新的第三者，那就是互联网上的游戏），对，或者是麻将。法国有一种纸牌游戏很流行，但男的打得多，当男的迷恋上这个东西时，女的往往很吃醋，当我们接受了第三者的时候，就意味着可能接受第四者。

夫妻之间钱的问题也是第三个因素，在法国，如果女的挣钱比男的多，男的会很不高兴。我看到一篇文章署名霍大同、秦伟、张晶燕的文章“从零开始”，在法国精神分析家中流传，但他们看到中国的精神分析收费一次只有 20 元，觉得太少了，所以不愿到中国来，而愿意去阿根廷，因为那里都是一些有钱人来接受分析，给那些阿根廷的分析家做督导分析的收费也很高。我到中国来也花了很多钱，但还好，吃住是由学校出的，再加上这么多中国朋友送我这么多东西，使我觉得它比钱更珍贵。

但不管怎样，精神分析一开始就和钱连在一起。法国有一个电影，说一个年纪大的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一天这个男的怀疑对方是不是只爱自己的钱，就问对方，那个女的回答说你和你的钱是一回事，这就是说像爱对方的钱一样爱对方。

法国做分析每一次都没有固定的价格，每个人的收费都不一样，每个精神分析家的收费也不一样，对有钱人收得高，对穷人收得低。但也不一定，我的一个朋友接待了一个女人，她看上去很富贵，但他收得很低，做完分析后那个女的从包中拿出了 500 元说我可以付得更高，分析家说下次我可以收得更高，但你还可以付更少的钱。因为那个女的没有工作，他的男人是个百万富翁，但如果收得高她就要不断地依赖她的丈夫，低收费可以让她独立于丈夫；另一个例子是有个年轻的作家到拉康那里接受分析，他当时很穷，但拉康收得很高，那个人很想接受分析，为此他必须拼命工作，所以在分析收费这个地方有很多游戏。

听众：法国对拉康批评的吗？我想听一下不同的看法。

吉：只有明年再讲了。我希望明年 4 月能来，但也不确定，战争怎

么发展我也不知道，也可能还有别的事。我去年来了中国三次，但从经济的角度看，也许我只能4月来，不能8月再来。我正在和法国大使馆联系，如果他们能支付我飞机票，我还可以在4月以外的时间来，但我更希望听你们说对我的批评，因为我还活着，我可以回答你们对我的批评，而拉康已经死了，他没有办法回答别人的批评。

张：能否讲一下你的个人经验？

吉：虽然我们要打开耳朵，要倾听，但有的时候也要关闭，如同忘记的记忆。如同一个女人有的时候要开放让一个男人穿透，但有的时候也要关闭。精神分析家也像一个女人一样。我对这几天的工作很高兴，因为你们打开了自己的嘴巴，有了很多讨论，讲了自己的梦，我希望我回到巴黎后，你们能继续这样做，去读你们的另外一个语言。

谢谢你们这么多的礼物，希望明年4月再回来，也希望能够和你们一起在田女士那里工作，如果你自己不好意思说，我可以介绍你到那里工作，也许我们在北京可以找到共同合作的方式。

秦：这种机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创伤，但也是机会，而且是很昂贵的创伤和机会。一是老先生为此付出了很多钱和时间，二是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精力，牺牲了休假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老先生带来了一种紊乱，让我们睡不安稳，让我们付出很多时间去看很多东西，比如禅宗、弗洛伊德、拉康，以及网上的东西等等，也许还有很多，但我们要感谢老先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力跟上他，只能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跟上他以作为对他来中国留下痕迹的报答。我连续两个晚上都做了有关留下痕迹的梦，可能是我无意识中说希望留下痕迹，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留下，也许为了这个刻下痕迹的无意识愿望我想再次感谢老先生。

吉：也许你还不能跟上我的思路，但至少你在讲你的梦的时候，你可以跟着你的语言走，这又引起了很多讲他们的梦，引发了讨论，无意识就这样通过言说在我们之间出现，而不是在大家的脑海中，这是最为重要的。

我能够到中国来又能回去意味着我能够穿透中国，另外霍大同也到

法国接受过分析，也是一个穿透，但这要感谢特定的政治环境，如果我现在到阿富汗去就可能会被塔利班扣为人质，我们到了东方留下了痕迹，霍大同到法国留下了痕迹，我觉得这样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奇妙的。现在我就感受着被穿透的快乐。

我很高兴，你们也很高兴。

何为精神分析？*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张海燕 / 记录 谷建岭、刘瑾 / 编校

我不是撒谎的人，当我说它（精神分析）帮助了我，肯定是真的，让我面对这么多同学演讲，我只有接受。通过讨论，大家决定让我讲精神分析。我做精神分析几十年，我能讲点东西，但你们希望能从中获得什么，那就错了。

虽然我不知道精神分析是什么，但你们来这儿是因为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你们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看我，显然你们对精神分析有兴趣，我想你们对精神分析有一些观点和想法。

精神分析家特别高兴每个人都能解释自己的问题。显然，你们每个人都会对精神分析有个想象，显然，我也需要有点时间来理解你们为什么来到这儿听精神分析家的演讲。

我也弄不明为什么我从法国来到这儿，对于我来说，这是长距离的一个移动，那么远到中国来，是精神性的一种工作。之所以有到中国来的愿望是由于我在35年以前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是有一天到了四川。我到四川不是个旅游者，为了实现我的梦，我花了35年的时间。我们不能太着急，必须有耐心。精神分析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必须有耐心。

* 本文是米歇尔·吉布尔先生2000年9月28日晚7:00—9:30于四川大学逸夫科学馆所做的公开讲演。原载于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内部刊物《精神分析笔记》第三卷第四期，主编：霍大同，副主编：秦伟、张晶艳，执行编辑：郑禹、尹立、严和来。

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中文，所以现在面对着麦克风发音能更容易些。

精神分析就是学习另外一个人的语言，因此我从巴黎来这儿，我可以在巴黎学中文，但要说汉语进行分析，就要到中国。对法国人来说，如果说确实存在另一种语言，那就是汉语。

我不是旅行者，但有些空余时间可以来这儿，我就骑着自行车到中国人多的地方，有很多声音震荡着我的耳朵，什么是精神分析？是有很多他人的声音在你的耳朵里，正是这样，我们学习了别人的语言。

（有人传递纸条上来希望吉布尔先生讲德国的精神分析传统，吉布尔回答说他的问题切断了他的演讲，如果每个人都提出讲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已经忍受不住现在的演讲了。）

这是个好问题，虽然我不懂你问题的目的所在，但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德国”这个词已经进入到我耳朵里。我想到的首先是精神分析的诞生，精神分析这个词是诞生于说德语的国家奥地利，德语是很特殊的语言，你可以不停地讲10分钟，但却听不懂，必须等动词的出现才理解他说什么。我能看出这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在精神分析中你并不能第一次就理解患者的问题，必须长时间才能，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并无功劳，只是让我们更有耐心一点而已；另外，我想到的还有奥地利人希特勒，他掌握了德国的权力，占领了奥地利，他制造出庞大的德国，屠杀了很多人，这里面有精神分析家，还烧毁了精神分析的书，这是50年前的事。

尽管烧精神分析的书，杀精神分析家，但仍然留下了很多痕迹，而后德国的精神分析家很少，大量的分析家到了美国，少数留下的去了死亡营，也有少数和纳粹合作。

精神分析是纳粹的敌人。

思路被打断是种巧合吧。什么是精神分析？是我们不断讲，不断讲，而我们听不见。那么，精神分析的一个方法是让患者自己讲出在头脑中冒出的想法和观念，此即自由联想。但在自由联想中患者并没有听见自己所说的。也许你们没注意这个问题，很多人并不真正懂自己所说的，花了很多工夫试图理解自己，偶尔精神分析家可能听懂一些事情，当精

神分析家听到患者需要的东西，就会发出声音，切断患者，以表示我听到了你所说的。在这样的切断下，患者从自己的症状中脱离出来。你们可能觉得我乱说一气，我忘了带提纲，也无法看它。但我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精神分析不是在大学中创造出来的，我想陈述一个事实，那就是精神分析是在大学之外发生的事情。

弗洛伊德之所以创造精神分析，是因为他听到痛苦的神经症患者的言说。神经症患者的痛苦是所有的医生束手无策的事情，为什么医生没考虑倾听患者的言说，弗洛伊德相反却让患者说下去。

那时，弗洛伊德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得了歇斯底里的症状，弗洛伊德做催眠术，并将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她竟然说你不要碰我，最好我自己讲，弗洛伊德听了她的话让她讲出来。

弗洛伊德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推广到所有患者，听患者讲，倾听另外一个人的语言，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甚至在两个人沟通时也需要翻译者。如果没有第三者，这两人是很难沟通的，很难想象他们能相互理解。

一位先生遇到一位女士，或一位女士遇到一位男士，相爱，接下来睡觉做爱生孩子，所有的事情进行得很好，讲了自己的语言几十年，以为能相互理解，其实不然，20年时间当中，他们之间相互欺骗，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没有翻译把他们的东西进行翻译，尽管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两个人却不能进行沟通，必须通过第三者做翻译。第三者可能是精神分析家，也可能是先生或女士头脑中存在的第三者，如果是同样的语言，如果能沟通，就不需要精神分析家了。就是因为两者在同样的语言中不能沟通。

先生碰到喜欢的女士，正好是吃饭时间，先生跟女士说：“吃饭吧”。显然这句话大家都理解，大家就坐在桌子边，但在法文中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讲话。警察让犯人必须讲话，我们能听到同样一句话，但含义全然不同，你们能从简单的例子中看出如果没有第三者就很难进行沟通。

现在我很想唱一首歌，法文中，“把桌子上的脏东西全部扫除，坐到桌子上来”，有两层意思，既可以是坐下吃饭的意思，也可以是扫清桌子的意思，法文中就有这些文字游戏。我相信在中文中有很多多义词，比法文多得多，之所以需要精神分析家，是因为法文中多义词太少，那么就需要翻译。也许中文的多义词太多，就不需要翻译。

我经常看中国人边说边笑，我想是多义词引起的言外之意引起的，当他们给我翻译过来后我并不觉得好笑，因为在法文中这些并不好笑。

在同一种语言中，存在着他者的语言，对每个人来说这种语言都是独特的，如果不存在他者的语言，怎么解释梦的现象。你做着自己的梦，肯定是自己的语言，但你不懂，肯定存在着另外一个语言，是因为你说的话你自己并没有听到。

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是在大学中创造的，是在诊所中通过倾听心灵痛苦的人而创造出来的，那些在分析中倾诉的人并不懂他们自己的语言，需要精神分析家们进行翻译。

二战以后，法国创造了一些东西，也许我稍微有些民族主义，在座的你们或多或少也有点，我非常高兴中国将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我确实很高兴，我不是狭隘的法国民族主义者，我买了中国纪念申奥成功的皮带。但我也有一点民族主义：拉康所创造的东西是弗洛伊德所没有的，他们倾听的对象不同，弗洛伊德倾听的对象是神经症，而拉康所倾听的是精神病院中住院的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的痛苦与神经症是不一样的。拉康在医院而不是在大学工作，这使他创造出新的东西，这中间有很重要的一点，每个精神病患者都是独特的，而大学强调共通性，抹杀独特性，没有大学就没有文明。某个人很不适应，就找精神分析家，讲述自己的痛苦，精神分析家倾听他的痛苦，精神分析就在这个时候创造出来。

大家对我的欢迎让我很感动，精神分析的工作非常私人化，在小小诊所倾听他人讲话。我并不常在大学做讲演，因为我所讲的东西非常刺耳，爱情与性，即使在大学中讲性，也是从生物学角度去讲，甚至人们

会介绍染色体、精子等概念。拉康在公众面前讲性的问题，这是很复杂的，也许我们的翻译无法翻译它，拉康说“没有性关系”。我不知道诸位听到后有什么感觉，女人碰到男人自然会发生性关系，法国人对拉康的话感到很奇怪，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那我和女人做爱是什么？法文中发生性关系的词还有“往上打报告”的意思，它的第三个意思是物理学的意思，是说这个瓶子与那个瓶子有无相同的水。拉康说没有性关系不是说人们没有性活动，只是没有科学的数学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可以解释他们之间发生的关系。

法国 1968 年的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做爱而不要作战，要战争就要科学，没有科学就没有战争，而做爱就不需要这些，科学、爱情、做爱、战争是不同的东西，没法比较。我不知道中国怎样，在法国总是男人先得到快感，所以女人会说希望再继续，男人的快感与女人的是不一样的，但并不是说女人没男人那么强烈，男人性快感与女人性快感是不可以比较和测量的。

当一个人面对公众讲话时是向公众表达爱情，那么你们可以继续，你们可以提出问题。

讨 论

听众：当一个精神分析家接待多个分析者时，他怎么能不忘记这些话呢？

吉：纯粹的记忆是没有的，混淆是必然的，生活中经常把这个人看成那个人是常见的，一个分析者经常把精神分析家看成父亲，但这并不严重。

听众：在法国，精神分析是不是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吉：在法国，到精神分析家那里做分析已经是时尚，有段时期，所有人都去做分析，包括精神病学家，已经影响到人文科学、知识分子，无意识压抑的概念尽人皆知，已经扎根于法国社会各阶层。

听众：原发创伤与继发创伤之间有什么差异？自由联想是不是很有有效的方法？

吉：这是技术性的问题，不仅仅有这一个方法，每个精神分析家面对每个患者，方法都不一样，原发和继发（创伤）肯定不一样。

听众：您认为精神分析是使人失去自由意志力的一种系统训练吗？

吉：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一个人很想杀人，让他的意志力减弱是应该的。

听众：爱一个人和想和一个人过一辈子是不是一回事？

（吉布尔让听众回答）：不是。

听众：精神分析家又怎么了解哪些是自己所说的，哪些是他们所说的，既然一个人听不懂另一个人的话？

吉：精神分析家不寻找理解，偶尔他能听到一些东西。

听众：精神分析家有障碍吗？他们自己寻求精神分析吗？

吉：我无法回答，我并不认识所有的精神分析家，但我对一个人的认识很深，那就是我自己，但我无法讲我自己，显然我是有问题的，我会跟其他精神分析家讲自己，尽管我已经做了精神分析家。

在此我讲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成都，喜欢骑着车到处转，见到厕所，我去上厕所，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我的自行车就被偷了。第二天我又买了一辆，我去听一位老师讲课，下课后自行车又没了。车掉后我心里受了打击，把约会给忘了，晚上做噩梦，产生了被迫害妄想，想到是有人故意和我作对。去年我（在这儿）呆了三周车也没丢，因此，心里落差很大，我怎么脱离这个状态，我就给自己做分析，对自己说这不是有人要害我，又听别人对我说丢一辆车是很正常的，这样我才好些。

听众：精神分析家说我们学习他人的语言，这个语言与法语、汉语有什么不同？

吉：难于描述，比如言外之意、语气，还有你是用温柔的还是用粗暴的语气说出，这里面是有差别的，每个人的语气都不一样。有位先生来找我做分析，说的是纯正的法语，有一天他说了一点带意大利口音的

法语，我因此问他，结果他就说他曾经在意大利生活，父母是意大利人，所以虽然他生长在法国，但带一丁点儿意大利口音，因为二战时纳粹在意大利的影响，使他全家迁到了法国，由此扯出了他的生活史和家庭史。

我没有在你面前说傻话。

听众：请您评价一下荣格的精神病理论。

吉：拉康与荣格的关系是受了天主教教义的影响，荣格属于新教，拉康属于天主教，他们俩是基督教，弗洛伊德是犹太教。

听众：精神分析存在不足吗，什么人适合被分析，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吉：幸亏精神分析有它的局限性，如果它是无局限的，那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精神分析家也有局限性，从事某种职业的人认为自己的职业没有局限是很危险的。认为所有的人都适合做精神分析，那就像希特勒处理犹太人一样。

听众：您是怎么处理孤独的？

吉：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无法回答，很多哲学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你可以去看这方面的书籍。

黑手党母亲*

米歇尔·吉布尔 / 著

佚名 / 译 金伟闯、张沙沙 / 编校

A. 精神分析干预的条件

我已经在北京田慧平女士的“星星雨”研究所工作了3次，每一次10天。我是在2000年1月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杂志《信使》知道这个研究所的。为了说明我与这个研究所的合作，有必要做一点解释。这一研究所不是国家办的，而是以国际资金作为其经济支撑的。它已经有15年的历史，并且因为它在全中国的声望而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它致力于被称为“孤独症”的孩子们的工作。众所周知，作为这个研究所创始人的田慧平女士之所以能投入到这一项工作之中，是因为她的儿子被诊断为孤独症，而整个医学界无法回答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人们没有任何办法。她按照教育的基本原则行事，但同时也根据中国孩子的实际情况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这包括没有问题的孩子（独生子），更包括有问题的孩子。因此，人们向父母和孩子（整个家庭）建议接受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培训，以便他们能够带着所学的方法同孩子一道回到家里。事实上，“孤独症”孩子被定义为被社会所排除的孩子。田女士所建议的是，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内，提供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嵌入。田女士领导的团队要让父母们学习到怎样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们的孩子生

* 原载于《2002年成都国际精神分析研讨会论文集》。

活、相应地让孩子在相互竞赛中获得起码的训练与教育。

这是很清楚的，田女士的团队的工作方向是言说（教育的）行动而不是倾听的行动。我想说接待的场合是激动人心的。这是一些处在绝望中的家庭。一开始人们就告诉他们：你们处在困难的情势中，或许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这一讯息进入到内心，人们就能够开始进行他们的工作。

而我所引入的工作则仅仅是同父母谈话，而不是同孩子，尽管后者有可能在场：即让父母说。

这些父母讲汉语，然后被翻译为英语。但到现在翻译已经仅仅是在我要求时才做。换句话说，经常是人们对我讲汉语，不要翻译。

我仅仅在我察觉到一个声音的旋律展开中的断裂、或者我听懂了一个汉语单词、或者在情绪冒起而导致了沉默之时才进行干预。

B. 我将谈及的个案涉及的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我本不愿意接待她，因为，团队的人对我讲她没有来参加培训的丈夫是一个毒品“老板”（boss）。我对这一个词被引入的方式已没有记忆了，但这个词（这一能指）将变成整个会面的控制词。事实上，在北京会议之后，在成都的同事们（霍大同、秦伟，张晶燕）参观这一研究所之际，我不得不接待这位母亲。

田女士建议不要搞成一个简单的参观。于是团队将这位母亲介绍给我们。

我向她解释我本不愿意接待她，因为我不能忍受这一团队耗费了如此多的精力，而她却是一个耗费同样的精力去破坏的毒品“老板”的妻子。她立即让我知道，她的丈夫不是一个毒品的“老板”，而是一个吸毒者。她还向我指出，人们经常形成一些与他人情势不相符的印象。

她于是开始对我们讲述她与这位小伙子的恋爱经历。他肯定不是一个“老板”，然而，她与他相遇时，他是有暴力倾向的。当时她遇到一伙街头的小混混，而他就是他们的头领。她妥协了并且同意同他交往，

其动机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同情和将他从毒品中拯救出来的愿望。孩子就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人世间。

人们能够看到能指“老板”继续引导着事态的发展。他们是他们那一伙的“老板”，也是给他钱买毒品的他父母的“老板”。同时，她也是控制着局面的“老板”。

她讲到了她自杀的企图。我向她询问细节。她向我展示在手臂上的伤痕。我于是问她姓什么。因此她谈到了她家庭中的取名问题和中国的姓的问题。这样，我们就了解到她家庭的历史、家庭的结构和她在这个家庭中的童年。她揭示出一个已多次在其它家庭那里听到的事实：当她很小时，她就扮演着一个“老板”的角色。孩子是家庭的支撑点。

她偶然地意识到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做这件事），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势中。

这是很奇怪的。在北京会议上，有一个发言是关于普契尼（Puccini）的歌剧图兰朵（Turandot）的。在我对这位妇女的迟疑的态度中，一个我将她理解为石祖（Phallus）的事实与那些我童年时所认识的、围绕在我周围的毒品“老板”混淆在一起。我不愿意接待她是由我接待她的愿望所致。是某种吸引力。

事实上，这个“图兰朵”，这个“石祖”，这个“老板”将说她同她丈夫之间的性生活已降到了很不满意的程度，尽管她之前并没感到这一点。但她现在能够这样说了。她并没有被与男人的相遇所穿透。现在她能够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让她讲。但是她同样能够说她遇到了男人，并且她知道了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她能够让她的计划浮现出来：断绝同孩子父亲的关系，也就是说摆脱从小就推动了她成为“老板”的命运，继续做她孩子的“老板”，但在与其他男人相遇时，再也不是石祖，再也不是“图兰朵”。

C. 会谈在她的计划的澄清中，也在一个相互的交谈中结束。

在最后的交换意见中，我既向她，也向团队的成员们说：我之前的

保留态度是来自在会谈之初我童年经历的缺位，但它在会谈中得以被发现。这也归功于她向我指出人们经常形成一些错误印象。我的被压抑的童年情景支配着讨论。作为一个在“毒品”环境中长大的人，我的问题是：谁是“老板”，“石祖”是什么，这是拉康的主要问题，不然的话，就是弗洛伊德的主要问题。

一例幻听个案的分析治疗*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张海燕、严和来 / 记录

居飞、秦伟 / 整理 杨春强、罗正杰 / 编校

* 编者按：2002年12月3日，吉布尔先生与结束巴黎访问的霍大同先生一起飞抵成都。为帮助成都精神分析小组筹备拟定于2004年召开的“精神分析临床个案国际研讨会”，吉布尔先生以他自己的一个分析个案为例，为小组成员做了七次较为详尽的报告和讲解。原载于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内部刊物《精神分析笔记》第四卷第四期，主编：霍大同，副主编：秦伟、张晶艳，执行编辑：郑禹、尹立、严和来。

开场白*

(吉布尔在黑板写了 AIPEC)

在成都我感到很高兴，AI 在中文中刚好是“爱”，我写下它是因为我在努力学习中文，同时也看到有些人在努力地学习法语，这让我很高兴。选这个 AI 是因为它意味着爱。在做生意的时候使用英文是好的。德文和法文则是在做精神分析的时候使用的语言。精神分析是一个“爱”的事情。希望霍大同讲一下他这次在法国的奇遇，这和他以前在法国的奇遇是联系在一起的，后者也不是偶然的，他有一种想成为精神分析家的爱的欲望。也许会有某些事情影响着你去读书，但我希望它们不会影响你来参加讨论班。讲个人的爱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不会让你们受到影响而不来。但要和一个精神分析家讲“爱”是不容易的，人们宁愿忍受“爱”的痛苦而不愿意去诉说这种痛苦。霍大同有一天在公众场合说我是他的精神分析家（我从来不这样说，这是一个职业习惯）。我在想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可以爱自己的父母、孩子、丈夫或妻子，也可以爱自己的分析家，但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爱精神分析本身。对精神分析的爱会把你带到一个奇遇中去。我的看法是，你们是很有运气的，因为你们开拓了一个奇遇，使我想起弗洛伊德在 100 年前开始的那个奇遇。

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北京遇到过一个法国记者阿斯克（Haski），他在宁夏为做一个调查，到了一个村庄，有人塞给了他一张小纸条，准确的说是一个母亲塞在他的口袋里的。回到北京以后他打开看，是她的女

* 时间：2002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30—11:30。

儿写给她的。这个母亲不识字，是别人读给她听的。纸条写的是“你没有权利让我停止读书”。那个女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不能读书，那我就和你一样，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阿斯克将这封信加上他的评论发表在《解放报》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读者读后都非常感动，就寄钱给他。然后阿斯克就带着这些钱回到了那个小村庄，用这些钱使得25个小孩回到了学校。阿斯克后来将女孩的日记翻译出来，加上他的评论，出版了一本书。

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偶然的事情有时会导致一个奇遇。人们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常常说的是一些该丢进垃圾桶的东西，但这样的话也可能给你带来奇遇。阿斯克的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法国，有许多孩子不愿意去上学。有些老师就让学生读这个故事，学生们最后意识到他们不去学校读书是不对的。这在法国中学中引起了许多反响。我这次在北大作报告之前，曾在会议室门口看到了用红字写的宣传海报“我爱我师——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这使我想起“我爱父母，爱孩子”甚至是“我爱毛主席”等等。但同时我也想到，那么我被谁爱呢？作为一个分析家，我想说的是，至少我自己爱我自己。“我自己爱自己一点点”，但并不是很容易说出来。早上刮胡子的时候，我看着镜子想，“还不错，我爱我自己一点点，我父母也爱我一点点”，不需要很多，一点点就好。我这次想通过一个个案来表明这些都并不容易。刚才霍大同讲了他的奇遇，提到了许多名字，他们在法国都是很有名的。我要讲的个案是曾在我这里做分析的某个人，这个人不知名，且她的分析已经做完了。而且，为了讲述她，我不得不创造一个名字。分析家的生活就是在分析室里倾听，这很不容易，如同来的人也不容易一样。我将要讲述的这个人与我有一个爱的关系，她是一位法国妇女，总是听到有人跟她说话的声音（即幻听）。

讨 论

问：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分析家，有一个标准吗？

答：弗洛伊德当时是医生，他发明精神分析是为了解决医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精神分析是在医学之后的事情，即先要成为一个医生，然后才能成为分析家。后来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必要的，因为医生并不懂精神分析。但在美国却一直如此，法国刚开始的时候也一样。后来大家知道分析家并不必然是医生，但认为至少应是一个心理学家；再后来知道这个要求也不是必须的。学哲学的、物理的、文学的等等，在经过了分析训练以后都能成为分析家，很好的分析家。因此成为分析家的条件在法国宽松得多。接受个人分析是前提，但对在哪一时刻起一个分析者就算是一个分析家，这在法国是有很多争议的。霍大同在我这里做分析，我就是分析家。要成为分析家的前提是你做了分析，但这还不够，你还要有欲望，在分析室每天听8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欲望是特殊的。有些医生说，如果没有医学训练是不能成为分析家的，有些机构或国家认为应由他们来判断谁是分析家。

在纳粹统治时的德国就认为精神分析是犹太人的东西，是坏东西。纳粹承认和利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进一步说，在纳粹德国，他们认为心理咨询能帮助所有人处在同一个状态中，每个人都感觉良好，所以他们承认和利用心理咨询。而精神分析不能起这样的作用，所以遭到排斥。当时整个欧洲的情况都与德国差不多。

问：分析者和分析家之间建立爱的关系？我对此感到困惑。

答：当然这种爱与通常的例如男女之爱是不一样的。生活中夫妻之爱即表示不能爱邻居的丈夫或妻子，他们必须相互忠诚，否则就违背婚姻的规则。而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爱是没有这种制约的，精神分析家并不忠实于对某个人的爱。对分析者来说，也会有一种嫉妒，例如前一个分析者和后一个分析者在过道里相遇了，后者会在分析中说他对前者的嫉妒，但这并不像生活中的嫉妒。

再问：但分析家有许多分析者，而爱一个人总是需要付出的，这怎么理解？

答：确实，要理解分析家有一个不忠实的权利是困难的，这种爱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爱，而是爱精神分析的功能、作用和它的工作。就像是我爱我的工作，是这样的一种爱。

问：分析家在什么时候干预？如何干预？如何处理倾听和干预？

答：分析中是不给解释的，是给话语，即让分析者说。但弗洛伊德有时也给了解释。对我来说，这些解释是可以批评的。说干预就会想到医学上的干预，或者美国干预伊拉克。而在分析中，干预只是为了让分析者继续讲话，这是最基本的。

问：如何做到爱自己？

答：很简单，在分析之后就可以了。

再问：如果不走这一条路，那么如何自己爱自己？

答：很多人知道自己爱自己。如果感到需要爱自己，就可以来做分析；如果你没有做分析时也能爱自己一点点，那很好。

再问：爱的范围太广了，我如何才能确定自己是爱自己的？

答：这是很复杂的。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说“要认识你自己”，哲学 2000 年来就是在讨论这句话。《圣经》里说“爱邻如己”，许多神学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很复杂。

问：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削弱了自我检查机制，这会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

答：你是否已经开始做分析了？（回答：“没有”。）找到答案的最好办法是去找一个分析家说说。

问：在分析中有“说”的欲望，同时我还有“写”的欲望。我发现这两者有冲突，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两者间的关系？

答：这也是一个我想知道的问题，至少是当霍大同在我那里做分析后改变了我的生活，使我来到中国，来到这里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字系统和西方的不同。你可以通过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来找到一个答案。但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

第一讲*

我选择这个临床个案，就精神分析治疗而言，目的是向你们讲述精神分析的作用与运作是如何在治疗中展开的。并不是拉康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而是我自己如何做。在这个个案中（分析者）有严重的幻听症状，她总是听到声音。你们可以看到精神分析是让一个人讲话，分析家听到声音，在这个个案里是分析者听到某些声音。

这个分析者听到某些声音，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没有听到此种声音。这类似于用录音机录音后导致她听不清楚自己的声音，声音已经有变化了。于是她来敲精神分析家的门，要求做分析。在这之前她接受过分析，帮助她变得更开心了，但是没有解决幻听这个问题。她接受了17次分析，她还去过精神病院。当她听到某些声音后，就做了很多扰乱社会的事情，结果是被警察抓住，送进了精神病院，并被诊断为慢性幻听。她是中学老师，所以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像这种类型的精神病患者，精神分析家一般都不收。这是弗洛伊德的传统，他接待的都是神经症患者。虽然他也做过精神病的研究，做过对一个精神病人日记的分析，但是他始终没有做过精神病的临床，所接待的都是维也纳的上层犹太人。

弗氏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说他只处理资产阶级内部的问题，不处理一般劳动人民的问题。在当时，有些人既是精神分析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海希（W. Reich）就是这样。他既接待很多工人，也接受资产阶级在他那里做分析。但在1934年他既被精神分析协会开除，也被德国共产党开除。因为同时被开除，在他身上留下了

* 时间：12月5日上午9:00—12:00。

很深的精神创伤。随后他移居美国，最终变成了疯子。

二战之后，在法国出现了一股潮流，那就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学派。这个运动就建立在海希所写的文本比较上：他曾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做了一个比较。

在海希的同时期，还有一些精神分析家同时也是精神病医生。例如荣格，他当时了解到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工作，就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处理一些精神病。在这个运动中还有另一个人——拉康。他有这样的经历：既在精神病院工作，又学习精神分析，他也会思考这些问题。任何人在医院做精神分析，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那么在医院工作的精神分析家就不得不发明新的理论来解释精神病患者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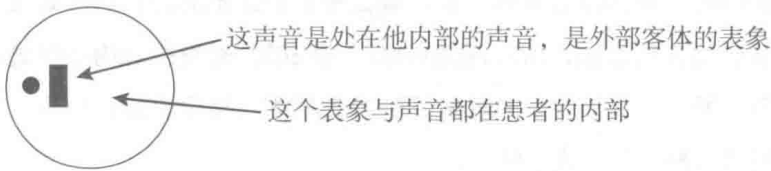
以前我也在医院工作，但是我更愿意在自己家里工作。对于大部分精神分析家来说，在自己家里接待精神病患者是很危险的，因为患者可能会做出过失行为，所以分析家更愿意在医院里接待他们。当我在分析室接待来访者时，我不是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的身份接待，而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的身份来接待。拉康在题为“论精神病的一切可能疗法的一个先决问题”的讨论班上认为：如果治疗是可能的，就需要有一个转移的实践，这不同于弗洛伊德所面对的神经症患者之转移实践。

对我来说，每个分析家面临的个案都不同，对于每个分析者都要发明一个不同的方法。弗洛伊德是个教条主义者，如果你不同意他的原则就要被开除。拉康则相反，认为每一个精神分析家在面对每一个分析者时都要创造一个精神分析的理论。这种发明实际上是一种再发明，是建立在以前理论的基础上的。如果仅仅依赖以前的基础，我们就不能倾听一个新的声音。如果你要听到，就要抛弃以前所接受的理论，去倾听这个新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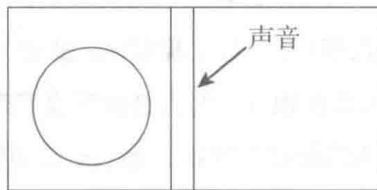
比如我自己就跟吉赛拉·潘科夫（G. Pankow，德国人，精神分析家，与一个德国犹太人结婚。后者在集中营中被杀，她随后来到法国，深受拉康的影响，在自己家里接待慢性精神病患者），我的治疗就是在她的（理论）基础上做的。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潘科夫发现仅仅让这样的患者言

说是不够的。仅仅让他说，如同平时处理神经症一样，是不行的，要重新建立一种关系。因为这个来访者听到了某种声音，仅仅让她说是不够的，因此分析家对分析者说：为我做某个事情。不是说，是做。分析家请求分析者做某种事情，这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是相反的，弗洛伊德说不能请求分析者做某种事情，如果分析家请求分析者做某件事情，就有转移的产生。当分析家发出这个请求后，他就从分析家转换成了分析者，因为只有分析者才发出请求；也就是说如果分析家自己的个人分析没有完成，当他面对分析者时会通过这样的请求使他的分析继续。

为了说明分析家请求分析者做某事的意义，我们用图来表达：



神经症的情况



精神病的情况

这是分析者，用一个圆圈表示。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在他讲话时听到声音，这个声音处在他的内部。也就是说这个声音是外部客体的表象，后者被声音所代替，因此声音和物理表象都处于这个人的内部。精神病患者相反，他听到一个外部声音，他不能认识到这个声音是他自己的，这个声音处于他之外，因此属于神经症的声音表象就消失了。对我而言患者所听到的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声音，这本是一个整体。但是对患者来说他被切成了两半，一个内在的，一个外在的。

拉康说幻听患者听到的声音本是更为实在（Réel）的。普通人听到

自己说话时的声音是一个现实的声音，而幻听患者听到的声音比现实（Réalité）更实在。当内部东西消失变成外部的，当一个东西被剥夺，它们就变成了实在的东西。拉康说某个症状被剥夺就成了更实在的东西。实在的东西意味着不是患者自己所经历的东西，例如我们感觉自己很痛苦，神经症患者是自己在经历，而精神病患者处在其经历之外。

潘科夫和我用胶泥所做的工作，就是让分析者为我们做点什么事情。不是画画，画画只是一个平面，而是让他们做事情，这是一个体积。潘科夫的立场和弗朗索瓦兹·多尔多（F. Doldo）的立场因此是正好相反的。前者认为要重构分析者的心理结构，就让他们做一些有体积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心理结构不是平面，而绘画是平面的，不能达到这个效果。绘画必须有目光的控制，对胶泥你可以闭着眼睛，是更接近内心深处的，所以就用胶泥。揉胶泥可以让分析者回到早年，至少比绘画更早。在早年他们的人格就被切成了两块。

当我请求分析者做点什么时，我建议她揉胶泥。她说我又不是孩子，你为什么让我做胶泥？我说对于你来说是有帮助的，正是这样，你也许会发现一些童年时的东西。于是她就揉胶泥。如果一个人听到一个声音，不是她自己的声音，那么在她童年时人格就曾或多或少被破坏、被切割。弗洛伊德的假设是，人之所以有症状，是童年经历被压抑。但面对精神病患者，压抑的概念没有用，她不能讲她的父亲，母亲，不像神经症患者那样。她不是被压抑，而是她的人格被去结构化（destruction）了。

第一次请她做胶泥后，第二次她就带了所做的东西来见我：几乎是一个平面，上面有些点，有些点代表房子，有些代表孩子，但整个胶泥都是黑的（附图1）：



她带来的平面胶泥让我想起二战时德国纳粹摧毁了的城市，许多房子被炸平，几千人死亡。最近我又看到另一个报道，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日本飞机摧毁了重庆。在我童年的时候，德国飞机经过我所住的村庄去

轰炸图卢兹（Toulouse, 法国城市名）。童年的记忆再次被唤起，那就是二战期间整个世界被摧毁的记忆。看到这个作品所唤起的恐怖的感觉，在我自己的个人分析中是没有被唤起的。我在分析中只是表达了这个事件，恐怖的感觉没有被唤起，但在治疗这个分析者时我的这种恐怖的感觉被唤起。

在分析进行到3年后这个女分析者有这样的作品（附图2）：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小点要冒起，似乎想在一个新世界上重新冒起来（雄起），从二维的变成三维的，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结构，似乎有这样的倾向。但这仍是一个死亡的世界，她在这个死亡的世界中寻找幸存者，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株植物。但后来她发现她就是幸存者，她站起来了。

在3年的分析中，这个分析者讲的全都是她的幻想，没有讲到过她的父亲、母亲。偶尔一次她提到自己有两个孩子，但我没有做干预。她讲的全部是幻想，比如飞机，救援，部队，如何处理尸体，二战的情况等等，没有提及过她的家庭。

我还听到过她骂的脏话，她骂女同性恋（Gouine: 娼妓，女同性恋），但我听成了皇后（Queen），因为她是中学英语老师。正是这样一句脏话让我回到了童年，当时我生活在一个农场，大约4、5岁的样子，所有的男人都躲在了山林子里，农场只有妇女和两个小男孩，以及公牛，母牛。我们两个小男孩看到过牛的性交场面，没有看到人的性交场面，因为只有妇女、儿童在农场。在这样的情境下，两个小男孩知道如果牛要有后代就要公牛骑到母牛上。这让我们联想到也许妇女之间也要有某种关系，才会有孩子，因为男人都躲到了山上，我们看不见。弗洛伊德说孩子有性欲，还会制作一个关于性的理论来解释小孩子出生的问题。我当时的性理论就是：要想有孩子，那么妇女间需要有些什么。

这个女分析者说她有孩子，但孩子的父亲不知道在哪儿，这让我想

起了自己童年的事情——女人跟孩子的关系。后来我才明白男人们白天抵抗法西斯，但在晚上会回到女人那儿睡觉。这又让我想到雄蜂回到蜂后那儿睡觉，性交后就死了。他们也是如此，晚上睡觉后，就有可能被德国人抓走。Queen 是危险的皇后，Gouine 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事，对于我来说二者就有这样的联系。

分析家的倾听并不是用拉康的理论来听，也不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听；不是用精神分析家专家的耳朵，也不是用精神病专家的耳朵在听；而是用分析家自己童年的痛苦经历来听。

讨 论

问：拉康说精神病患者听到的声音更为实在，为什么？

答：日常生活中的看与听，被命名为现实，你说话你自己能听到。而这个分析者听到一些声音，却不知道是谁的声音。如果给后者取一个名字，那么它相对于现实而言是更基础的、更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讲（parler）很多东西，而不是说（dire）。如果上帝说了什么，你就要服从。人们经常讲话，但偶尔人们会说点什么东西。“听”和“听到”，“讲”和“说”是不同的（霍：在古代我们区分了“听”和“闻”的关系，现代有“听”和“听到”的关系，以后我们还要重新定义）。

parler 讲

dire 说

ecouter 听

entendre 闻

学生应该听老师说，希特勒让所有的人都必须听，因此他把德国的符号系统都排除在外了，所有的德国人都要去听他说。我们的眼睛都不如古人，古人有视、看、闻的区别，现代的闻是闻味道的意思，而古代是听到的意思，含义有一个变化。我在北大演讲时提到，在田女士机构

的工作中有一个女士，她不愿意让别人听她说话，只有我和田老师才能听。等她说完，才让别的人进来。弗洛伊德早期运用的是催眠术，需要触摸，有一个女病人说“不要碰我”，弗洛伊德接受了这个命令转而去聆听她。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女士，她说“让他们出去”，是否她也听到了某些东西，听到了话外之音？和她的会谈结束后，别人进来后我又继续听，这时的我还是处于一个接受命令的听的状态。

问：如果仅仅有话语还不够，还要在治疗中加入其它因素，那么说神经症症状是话语的缺失到底对不对？

答：话语当然是一种缺失，真理永远只能半讲。因为人类一出生就掉在语言的网络中，只能讲一半。拉康画了很多拓扑图形，因此他还需要书写。我把女病人的胶泥看成一种文字。拓扑学是象形几何学。

问：分析者的言说能唤起分析家的情绪，比后者自己分析中所说的更彻底，在这种意义上，是否意味着精神分析仅仅靠言说是不够的？

答：首先我接受的分析是一个弗洛伊德派的分析，不能让我充分地表达情感。但不是所有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家都是这样，比如说在拉康派那儿就不是这样。拉康说没有分析家的反转移，只有分析家的抵抗；没有百分之百的分析，分析总是有局限的。一个分析家在和分析者见面时可以直接跟后者说我不行，你去找别的分析家，我没有办法承受。此外，如果接受了来访者，分析家也在对别人的分析中再次被分析。

问：分析者在治疗过程中回忆起一些事情，无意识被唤起。是不是无意识被唤起，分析者的症状就会消失？

答：当弗洛伊德倾听病人的时候带着一个观念，这也是通过倾听神经症患者得来的，即无意识是被压抑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倾听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压抑，到处都是无意识。也许需要给予一个压抑。精神病院的医生也许很高兴病人没有压抑，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要重新给予后者一个压抑。最后他们工作的结果是病人变得更严重、更绝望，甚至自杀。弗洛伊德的意识 and 无意识概念是适用于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病患者应该相反，他们没有压抑，无意识始终在场。后

来人们用排除（Verwerfung）来描述精神病，它和神经症患者的压抑不是一回事情。很多人没有弄清压抑和排除之间的区别，有些精神病医生不是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压抑，而是进一步让他们自由地写、自由地说，这恰恰导致绝望的状态更趋严重。

问：女分析者是受了刺激才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无意识在下面，那么过去的经验到哪儿去了？

答：童年经验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留待以后再谈。我们暂时不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假如有两个主体，那么在他们之间，无意识始终被另一个能指所代表。这个无意识既不是在这儿，也不是在那儿，而是在两个主体之间。我加上一句话，中国是一个能指，欧洲是一个能指，对于一个无意识的主体来说中国的能指被欧洲的能指所代表，反之，亦然。无意识主体存在于两个能指之间。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有一个朋友有幻视，能否对他做同样的工作？第二个问题是分析家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自由联想反馈回去，如果没有自己的联想是不是就属于分析家的抵抗？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每一个个案都是独特的，每一个来访者都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在我报告的这个个案中，她的童年经验和过去经验都在胶泥之上。这个童年经验是否是分析者的童年经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童年经验在那儿。

第二个问题：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否需要分析家把自己所唤起的童年经历传递给分析者，是否不传递就是抵抗，对此，除了我自己的经验之外我并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例如在星星雨工作中，我问是什么给了你帮助，那位母亲说是你讲的你自己的个人经历让我得到了帮助。拉康说分析家自己决定自己，可以讲自己，这样就离开了中立的立场，这使分析家的抵抗更小，中立的立场可以说也就是抵抗。

问：分析家需不需要保持这种抵抗，还是减小这种抵抗？

答：无论是否需要这种抵抗，对分析家有一个限制是必须接受个人分析训练，分析训练是你要去讲，是作为分析者的训练。作为分析家的

训练是不同的。如果分析家是一个主体，就不能成为某些原则的奴隶。我不回答是否你应该怎样，拉康说分析家自己管理自己，他应该结合自己的分析体验和分析实践来自我决定。

第二讲*

我们从女分析者所做的手工开始。是我请求她这样做的，所以是我缺少了什么，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因为缺失，就会要求去填补。那么你们可以想象，请求做分析，是请求帮助；一个人请求分析者做什么，也是请求帮助。对某些人来说，让他们知道精神分析并非完美是很重要的。

女分析者带来的作品是二战的恐怖场景，唤起了我对战争恐怖的回忆，这两者的相遇会让我们去寻找幸存者，这意味着如同在大海中航行，同坐一条船，面临着相同的危险，对两个人都是如此，尤其是对那个起着精神分析家功能的人。分析一次次进行，经过了3年，我和分析者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中生存下去。每次分析结束后，我都请求她做一个胶泥模型，重复第一次的情况。我称这种模型为“移置的场景”。“移置的场景”是由两个词组成，来自于弗洛伊德所谓的“原初场景”。孩子看见父母亲在一起做爱，就会创造孩子是由哪儿来的理论，我也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创造了孩子是由哪儿来的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亲在这个模型中已经被摧毁了，我只有让她讲她能讲的东西。如果我询问她童年时父母亲的事情，就太具进攻性，对她的人格就会有破坏性，因此只能通过移置的场景来迂回。移置的场景是隐喻的场景，但隐喻关系是被切断的，缺乏隐喻的参考系。也许这个场景中的某个人隐喻着她的母亲，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能指的隐喻关系也被切断，话语也是被切断的。隐喻性场景被切断的标志是声音来自于外部。所以她同时带着模型，也带着声音，两者联系在一起，通过这

* 时间：12月6日上午9:00—12:00。

个模型来说明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她讲述她听到一个声音，她自己也有一个声音，她自己内部有声音她才能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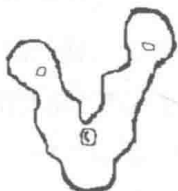
分析中出现的声音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难以辨认的，无法听清楚，只知道她在说，但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第二种声音是男人的，强有力的声音，可以听得很清楚；第三种，是打了引号的正常声音，日常生活中她使用的，现实的声音。然而，前两种声音是实在的。对于第二种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她每次开门都是很猛烈的，推开门，要求我做什么，我听得清清楚楚。但第一种声音是我听不清楚的喃喃自语。

三年以后，她带来了模型，如果不问，看不出是什么。我问她，模型中的人形是谁？在哪里？是男的还是女的？在哪个国家？在她过去的回答中一般都是很遥远的——这些人完全是幻想性的。三年后她带了有人形的模型过来后会回答说：这个是一个男的，曾到了某个地方，被杀掉了，做手术……场景完全是想象的！但是家庭的概念开始出现。

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没有家庭，却说自己是有家庭的，那她完全只是在想象，和童年经历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因为她开始谈论家庭了。比如说我问她，这个尸体怎么办？是埋了吗？她会说尸体腐烂了。那我又问骨头怎么办？她会说骨头放在博物馆……这完全是从死亡的世界渐渐走到一个活的世界，因为博物馆是一个虽然也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但仍是有关机的地方。当然她的所有这些内容仍然是想象的。

前面的问话完全是一个考古工作。如果骨头没有被人发现呢？她会想象说骨头化了，变成树，变成花。什么花呢，我就让她命名。这样不断地问下去。她也在不断地用胶泥做这种人，有一次共有四个人，但这些都缺一只手臂，始终有一个缺失，而这个缺失就是一个能指。这些人物经常都是男的，鉴别不出缺的是左手臂还是右手臂。有一天我问她这个问题，而她说“你不要问！”她的这个反对我是个冲击。因为我当时正在讨论镜子的问题，搞不清左右，实际上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而想从她那里得到答案。一年以后我就把这个讨论班停了，有一天我在讨

论班上说（因为有人听），我对讨论班的成员说讨论班今天就停在这，同时也把我临床中碰到的问题给大家讲了一下。许多人不理解，说我傻了，为了一个分析者就停了讨论班。但我还是决定停下来，因为它影响了我与女分析者的分析。在这之后有一天，她带来一个模型，像是两个人，是女的，粘在一起的（附图3）：



接下来她作了一系列这样的模型，这些模型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胸部越来越突出，但下面还是粘在一起的；逐渐出现了两个人相互拥抱的手臂，脸的形象也出现了，注意她的眼睛不是对视的，而是看向另一面的。逐渐又看见一个洞，是嘴巴，后来眼睛也从洞变成了圈，一个是闭，一个是开，显然是不一样的（附图4）：



再接下来，她就把圈戳成一个洞，说明她的手可以穿透泥土。后来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也是两个人，前面一个是女的，因为她有胸部，而另一个是男的。接下来就出现男的用手抱住女的泥塑（附图5）：



有一天她带了个男性的胶泥，看得很清楚是缺了左腿。她直冲进分析室，用男性的声音说话，然后用右腿搭在我的桌上。我请她不要这样做，而她很生气地说那个时候她父亲就是这样做的（第一次说到了她与家庭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分析工作持续了三年后，通过（她的）重复——左腿的缺失，我发现了她是在模仿父亲，通过这个能指表达了童年她和父亲的关系。

讨 论

问：我想这个个案比较特殊，吉布尔先生为什么给这个分析者起这个名字（Angele）？

答：肯定有关系，现在说太早了，后面会讲。前天霍大同说他在巴黎见了很多有名的人，但是也见了些没有名气的人，包括我在内。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后面会说。别急！

问：美国有一个关于意象的疗法，包括起名字、想象一个形象，对这些形象命名，然后对话，我想问与吉布尔先生说的胶泥技术之间有何关系？

答：这个技术在法国也很多。法国称它为“醒着的梦”，就是让人说他想象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可是，这个胶泥是三维的，有物质性。这让这个女分析者脚踏在实地上，而不是浮在空中。如果始终浮在空中，摸不着实在的东西，可能会摔到地上，这有很大的差别。这让我想起女娲造人，两者有些类似。我就请这个女人作为女娲来工作。所谓醒着的梦，也就是白日梦，是有很多梦，在不需要鼓励的情况下仍会有很多。分析者请求成为客体，而发生的幻想是主动的。分析家则要让她想象这个客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她说到与自己有关系的具体事情是在三年之后。为让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诉说自己是很困难的。当年被送到集中营的那些人，刚开始是讲不出来的，要经过40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回忆他们的往事。像这种分析者，往往是当她

讲了很多事之后才可能会困难地开始谈到她遇到的问题。因此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会对她提问，你们可以看到她在讲的时候，仍有很多东西是讲不出来的，需要别人提问。

问：我刚才想到的是有好多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住在医院里的，因为他们有破坏性，而吉布尔先生如何有勇气在家里做？

答：不是勇气，而是症状。

问：与神经症和与精神病患者工作是不一样的。对于精神病患者要给予压抑，我不太理解，如何对精神病人施加压抑？

答：这正是我准备要讲的，压抑也好，排除也好，都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在这个方向上，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搞清楚哪些是神经症，哪些是精神病，尽管我在工作中会参考他们的观点。这里有一个困难，要工作就要借助理论。但理论会影响自己去创造新的理论，理论也会影响工作。如果你要带着理论去工作，就会影响工作。

问：您讲到在您的个案中，对精神病用了提问的方法。而我们面对神经症患者时，是运用自由联想。当神经症患者言说很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提问的方式？

答：这和昨天讨论的问题一样。分析者在讲的时候肯定有困难，为什么要绕开这个困难，为什么不可以等他呢？有一种人很有欲望让别人说出什么来，那就是警察，他们甚至可以用各种手段让别人说出来。但这不是分析家的立场，精神分析没有很强的这样的愿望。而我这里的个案不是“说”的问题，因为她不断地说。所以关键是要让她不再用那三种声音说，要让她停下，用另外的方式说。

问：胶泥人物的演变是有联系的。但从最开始的到后来的图形，它们的关系不是很清楚，不知以后会不会讲到？

答：这里面有一个逻辑，是在三年间发生的，要讲太长了，所以我把它们略去了。但是后来的形状是从原始形状开始，逐渐演变过来的。比如昨天我们说到有一个小点点（一棵树）长出来了，从死亡里长出来了。比如说刚开始是平板状的，有一些小人、小树，表现为一些粘在板上的

小点点。后来就有一些树立起来，从二维变成了三维。

问：吉布尔先生先是要求来访者做这个东西，后来由镜子的讨论到提出左右腿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分析家的提问都有一个缺失或经验？原来我以为分析家的提问都是应该有利于帮助分析者的。是不是分析家提问都是这样的，还是偶尔为之？如果都是这样，那么是不是分析家提出的问题越多，缺失就越多？

答：对这个提问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是不是都是呢？我不这样认为。别人是否都是这样，那我不知道。假如我是国家元首，我可以这样说。我只能说我碰到的这个个案是这样的，到底是不是都是，你们自己如果有个案就会很清楚。此外，分析家自己的个人分析永远是没有结束的，当他提问时，他就是分析者了。你的提问，让分析者想到一个问题。分析者来的时候，他会来握手；走的时候，要说“再见”。我对一个分析者说，“如果你有什么话，请去对你的分析家说。”法国有句谚语：如果你是聪明的，你就沉默。

问：女分析者进门以后，把左腿放在桌子上，你请她放下，我不知道到底放下没有？

答：不是把左腿而是右腿放上去的，她的父亲是缺了左腿的。最后她放下来了，然后分析继续进行。

问：分析中的话语是不是都是一个欲望？

答：这个事情，抽象地说是不好说清楚的。在某一时刻说什么是和彼时的状态连在一起的。在这个个案中，当时是唤起了她童年的情景。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分析家的愿望，我们不知道。这如同两个人在大海中航行，或者如同两个孩子在玩游戏，只是在事后才发现或许当时有一个分析家的愿望。大学里教授的精神分析，是与一个文凭连在一起的，以此来衡量是不是分析家。其实，每一次分析在事先都不能说这是一个分析，都只能在事后给一个判断，当时都是无法说的。分析的过程是一个奇遇，当两个人坐在船上时，你不能料到会遇到什么事情，只有到达了彼岸，你才能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说这是有效的。唯一有保证的是外科手术，

但是实际上，它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效。只有去看书，然后按书的指引去做，才是有保证的，但这个办法对精神分析来说，始终是种危险的存在。

问：分析家是参考自己童年的经历在倾听。当分析者诉说自己的经历，与分析家的经历相遇时，是不是分析家也有一个言说的冲动？

答：当然是一个相遇，不过精神分析中的相遇与通常的相遇是不一样的。弗洛伊德遇到一个女患者，女患者说“你不要动，听我说话！”，由此发明了精神分析。对我而言，当女来访者说：“你停下来不要问”时，我也照她的话做了。还有一种是荣格式的，他说他和无意识有一个相遇。他遇到一个犹太女人萨宾娜·斯皮尔林，和这个女人有了性关系。这个女人离开他后去找了弗洛伊德做分析。这时，荣格非常痛苦，他说他遇到了无意识。我参加了对这个女人的传记的写作，她后来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家。

问：在这个个案中，请求精神病患者做胶泥，那么做沙盘游戏情况如何？是不是能更好地唤起精神病患者缺失的东西？

答：对我来说，我没有称这个女分析者是精神病患者，我叫她的名字。因为我不知道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的分类，所以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问：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书中讲到分类系统，是在古代，是原始人那里有的。中国也有，但现在消失了。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分类系统的消失？

答：这是一个人类学与精神分析的问题，也是神话学与精神分析的问题。当时荣格就想通过研究神话来发现无意识。弗洛伊德与之相反。拉康在此之后引用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概念，但他也批评了弗洛伊德和科学。在分析中，弗洛伊德听到了这个部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是如何登录在个体中？因为这些人就是在这个登录上出现了问题。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将之纳入社会框架中有很多方法，包括判刑、吃药。但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弗洛伊德做催眠时，是想把女患者放在一个类型中，而她不愿意，这就离开了类型的范畴。精神分析家倾听孤独症的孩子，相信他们同样是生活在语言之中的。而纳粹会把这些孩子送进煤气室，他们认为孩子不会说话就毫无用处。拉康派的

教育都强调这种独特性，而传统的教育也是分类的。拉康关于“享乐”（Jouissance）的概念，是来自马克思的理论。享乐很多，包括性的享乐。但是这些享乐都是男人在说，男人在研究。但拉康说，要听妇女说她们自己的话，她们自己的享乐。比如美国的妇女运动，招贴画都是女人，排除了男人，这与以前的完全相反。但拉康说，要听女人，说她和男人的关系。拉康说，一个女人不完全在石祖享乐中，她还有作为女人自己独特的享乐。如此，拉康让法国精神分析前进了一步。

第三讲*

我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并不是女分析者听到一个声音，而是有人在对她说话。刚开始，这个女人来的时候不是说“我听到一个声音”，而是说“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这两个表达是不一样的。我听到一个声音，我（法语：Je）在场，这是很激烈的、很强的。这和“有人在对我讲话”，在法语中是不一样的。后一句话中，我（Je）没出现，变成了宾格的我（Moi）。后一句陈述的主体是她而不是我，当这个女分析者说有人在讲话时，是我把它翻译成了同一个声音。以前介绍的做胶泥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有个人在跟她讲话，她听到一个声音。之前讲移置的场景时，她讲的都是与她此时此刻距离很远的东西。但她又总是说有人缺了一条腿，这个重复可能和她自己的经历有关。还有一个重复，即胶泥慢慢地分开，开始的性别是不清楚的，后来是一女一男，然后再到变成男的从后面抱着女的，这显然和她的亲身经历有关。

胶泥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提供了安全感。一旦感到安全，就可以开始讲自己的事情。内心深处的东西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来到分析室？内心深处到底有什么在她身上发生？做胶泥提供了安全的空间，这样她逐渐地开始讲她自己。

她把脚搭在桌子上，我很生气，说“为什么你这样做？”，她说“我父亲就是像你这样说话的”。由此，她开始讲自己的经历。胶泥开始时没有性别，后面出现了两个女人的形状，然后女人的胸脯呈现了出来，后来又变成了一男一女，男的在后面抱着女的，但是表征男女性别差异

* 时间：12月9日上午9:00—12:00。

的生殖器还是没有出来。我请大家注意她有两个孩子，经历过性行为。两个女人的这种泥塑，表示她从童年经历出发所创建的性理论是两个女人在一起可以生孩子，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也可以生孩子，没有生殖器也可以生孩子，这是她的幼儿性理论。于是你这时会有一个假设，但你并没有必要跟她说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样太具进攻性。开始治疗时，她的世界是死亡的世界，完全没有安全感，让她有安全感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她才可以逐渐地说。

在做这个胶泥期间，她有时也带只有头的胶泥来。当她带着胶泥做的头时，她说当她听到外部有个声音对她说话时，她现在能知道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当一个人跟她讲话时，她可以描述自己内心世界中某种奇怪的现象，她可以说这个声音并不是某个人在跟她讲。只有当她推开门、走楼梯、运动时，才会听到这个声音。她内心有了这个体验，伴随着这个体验、这个运动，她开始做梦，也能逐渐开始讲她的家庭。在拉康理论的意义上，她遇到的都是实在的；当她开始讲她的梦、她的家庭时，她就开始接触到她内在的现实，就有了从实在转到现实的过程。

她开始讲她的家庭：父亲是新教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有很多冲突，然后他们的婚姻破裂了；她还讲到欧洲历史上三百年的教派冲突，发生冲突后，双方都把对方排除出去，她通过这种描述来讲她的家庭。

讲了这些以后，她讲她在童年时和父亲有一个性的关系，是特殊的性关系，她父亲从后面与她肛交。这正好和图中表示的男人在女人的后面相一致，因此胶泥是童年经历的一个表达。事后我们来看她的整个治疗过程，如果我在看到男女胶泥的时候说这是你的父母亲，就是给出了一个进攻性的解释，如同她的父亲在她童年时对她所做的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安全的氛围被建立，她就会逐渐地说出来。最重要的就是给她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她自己把它们说出来。在整个过程中，外部声音也被具体化，以前她只知道有个声音在讲，现在她知道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在说，这样就有了一个变化。刚开始她说只有一个声音说，第

二步，是上帝（God）在对皇后（Queen）说，这实际上是返回到父母亲教派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跟上帝有关。逐渐到了第三步是某个具体的人在说，皇后（Queen）变成了女同性恋者（Gouine）。

因为个案较复杂，今天我不准备讲太多，我们就停在这里。

讨 论

问：是上帝在对皇后讲，还是上帝在讲皇后？

答：上帝讲皇后，也对皇后讲。她的父亲和女儿有这样的行为，等于把女儿看成皇后。由于教派之间的冲突，她的父亲处在上帝的位子上，他要保护他的女儿不受她母亲的影响。她父亲有严重的问题，其实她那时就处在皇后的位子上。

问：她好像没有太多的涉及到她母亲？

答：当然有，有和她母亲的整个关系，明天我们会讲。

问：分析是弹性时间吗？让她捏胶泥，这个弹性时间会不会给分析者很大压力？

答：是弹性时间。相反，弹性时间为她提供了一个安全空间，是我和她一起构成一个安全的空间。我们的谈话在哪儿停下来是不依赖时间的。我们没有看时间，该停止的时候就说“停下来”。如果我看了时间再停，就会进入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会让分析者感到焦虑，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问：是不是弹性时间对于分析者来说更焦虑，因为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停，比如应该说 20 分钟，而在 10 分钟左右就停了，是不是反而引起分析者的焦虑？

答：首先，精神分析的规则不是焦虑，而是想到什么说什么。弹性时间让你失掉把握，如果你失掉把握，就会焦虑，安全的氛围就是你有权利焦虑。在分析中如果你不知道持续多少时间，会感觉焦虑。若你有固定时间，还没到，就焦虑。之所以你焦虑是因为你借用了别人的规则，所以你焦虑。在安全的氛围中你有权利焦虑。弗洛伊德说我们只有一个

规则，就是把来到你脑海中的东西讲出来，其目的就是要去掉这个把握，去掉这个控制。你能控制时间，是处于控制者的位子上。对于分析者一样，想到什么说什么。结束是分析家想到的，如果始终控制着，就没有自由联想。分析家不是时间的主人，让分析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分析家其实也失掉了控制。

问：虽然分析家让其自由言说，但是分析家心中应该有一个目标，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方向？

答：对于个案而言，这个个案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相信上帝的人认为上帝对他说话是很正常的。但我不信上帝的精神分析家。所以如果是信仰神的人听到说这是上帝说的，就会相信。但如果你对公众说这件事，别人会说你妖言惑众。我是一个不信上帝的分析家，当听到她讲三百年的教派之争时，我就意识到发生了其它事情。

问：我想知道对于一般的个案，是不是也要听分析者讲一年、三年，没有一个基本的目标？

答：我只回答关于这个个案的问题。当她讲的时候你想治疗她，这是分析家的欲望，这是拉康和弗洛伊德不同的一点，有治愈的愿望。

问：你能谈一下这个个案中转移的情况吗？

答：转移不是她的转移。如果有转移，也是双方的，不能区分是我的还是她的。当她做某些事情时，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自己。例如在第三年时，她连续三次都大声吼叫，整栋楼的人都听到了。我讲给我的同事听，同事说：你怎么能忍受？如果是我就会叫她停下。随后我在巴黎读到了一本书，是一个女演员讲述的一个故事，她的双亲因为煤气中毒死了。在书中，她将母亲的图片慢慢放大，直到只有眼睛。看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喊，这让我意识到我以前在分析中没有喊叫（霍：当你意识到你的转移时，你就懂得了对方的转移）。因此周末回去以后，在新的一次分析之后，我就对她说，你要大声喊我能够忍受，因为我一直不敢喊。你这样喊，实际上是在推动我们的关系。在这之后，她就停止了喊叫，开始说话。

问：关于时间设置，有些人反映可能会快些，有些人会慢些，是不是根据不同的人进行设置？

答：你所说的就是没有普遍的规则，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

问：但是时间太短，是不是就不行，或者是要根据人的生理规则？

答：肯定有一种自然的节奏，这是互动的，分析者与分析家都有。但在这个个案中，她的节奏是被摧毁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她的问题是如何恢复这个节奏。自然节奏仍然是逻辑的概念。也许在中国要根据自然的规则。而西方并没有完全把人简化为自然的人。

问：拉康说恢复重度精神病人的现实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症状而治愈。刚才说节奏被摧毁，但是说话本身都是有节奏的。那么，请问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节奏被破坏？能不能弱化一种治愈的念头，比如说仍听到某种实在的声音，但不去做会让警察抓的事情？

答：第一个问题，当女分析者说有一个人在对她说话，这就意味着在这里她的节奏有一个裂口。她是一个英文老师，被外语控制总会让她舒服一些，显然在本土文化中她不是很舒服，这是一个文化的裂口。我个人也会觉得身在国外，比如中国、土耳其、美国，比在法国舒服。显然，她的目标是非常严格的，她遇到的所有声音都是非常强权的，所以她要將声音变成行动。她的声音是很硬的，你必须服从这个声音。也许在这儿是有差别的，在西方，上帝说的基本就是法律；在中国，你们是否有类似上帝的人，起的作用和上帝一样，那么是这样一个人的声音在对她说话。我认识一个汉学家是研究道教的，说他没有找到类似的一个声音。另一个做道教研究的汉学家说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这样的文本。

问：如果分析者说不出来，分析家如何做？

答：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有人提过。分析家的目的，并不是让对方说出来。分析家并不是警察，而是把话语权给对方，你可以讲，也可以沉默。分析者可以沉默，自己沉默到受不了。沉默也许会比说很多话更有意义。也许他的问题是他话太多。沉默者说一个字，也许这个字比他说很多更有意义。对于每一次的沉默，分析家要根据情况来处理。因为分析的规

则是说出你头脑中的东西，如果头脑中没有东西，是空的，当然没有说的。如果你强迫他说，你就违背了这个规则；或者他有东西在那儿，他正在准备；或在选择；分析家要容许他沉默。

问：我是精神科医生，想知道在三年的治疗中是否用药。如果在医院，面对这种病人，反复发作的精神病患者，我们需要用药。经常，即使在药物的控制下，也不见得能解决幻听症状，我想知道用分析的方法，不用药就能解决吗？

答：我自己的立场是：我原来是精神科医生，后来自己把自己开除了，就是只做分析，我没有权利开药，我只在家里做分析。但并不是说分析能取代所有的治疗功能，比如药物的作用。我知道很多医院很多精神科医生也做分析，我很尊重别的精神科医生或救治者的工作，应该尊重，只有在这种尊重的条件下，分析才能做。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打着引号的治愈是很重要的。那个女分析者后来找了一个音乐老师，帮助她唱出来，对她有很大的帮助，我所做的工作也许就是帮助她去找这个教她唱歌的人，精神分析并不是全能的。

问：根据临床经验，如果我说得很少，我的病人就会走，因为他们想让我多说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在法国很多人都知道分析家是听别人讲话的，是不说话的，在中国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情况。在法国一个人到医院是寻求药物治疗，没有想找一个分析家倾诉的欲望。但也许是你自己不能忍受沉默，这也是一个可能。还有，也许这些人只是想到你这儿寻求建议。

问：被精神病医生诊断为终身服药的患者，可否通过精神分析摆脱药物？

答：当然有成千上万的例子，有一些孩子经过三年的分析就好了。医生说终身服药，这么说并不是建立在一个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很模糊的。他只是认为这很严重，需要服一辈子的药，但是他也并不知道这个药如何起作用，怎样起作用，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你

认为一辈子服药是极权化的，那么精神分析可以让他摆脱这种极权化。就是如此。有人说精神分析对所有的人都起作用，但这并非精神分析的立场，它不说我这种方法对所有的人都起作用，精神分析只说有这么一个方法。纳粹就相反，比如有些政治家，他们就很极权。

问：这个病人是否是躺在沙发上工作？

答：不是，是面对面。分析的规则并不是躺在沙发上，而是你说。

问：是否这样自由联想就会打点折扣？

答：自由联想是一个奇怪的术语。如果你只有躺了才能自由联想，这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躺着做分析只是因为弗洛伊德这么做了，后者就遵循了这个。当时的人会遇到很多社会禁忌，但弗洛伊德说你在这儿可以自由言说。其实你说的话是由你的无意识结构决定的，并没有完全的自由，只是相对的，如果你觉得你的设置能给他这个自由，就够了。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躺或坐的问题，关键是分析家是否可以接受一个分析者用不同于平常的方式来讲。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者站着，看着我的眼睛讲，也有同样的效果。

第四讲*

在分析工作进行到将近三年的时候，她开始讲听到的声音，并会顺带讲一些大脑和身体的感觉，以及讲一些梦。但是她是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在讲。基本上，当她带着这些模型来的时候，她把声音、模型与自己的感觉联系在了一起。当然她讲了与父亲的关系：父亲断了一条腿，与母亲有冲突，是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然而最关键的是她自己的感觉。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声音，现在能与人类中的某一个，如街道上的某个人、教室的某个学生联系起来，她也讲她自己听到此声音的感觉。

一天她拿了一个胶泥做的脑袋，有三个面，有一个脸在这边，有一个脸在里边，还有一个脸在侧边。有意思的是，她能够在胶泥上做些洞，也就是说她能够穿透胶泥。这个行为与她的身体被她父亲穿透有关，现在她有了对这种关系的一个表达。童年时被父亲穿透与穿透胶泥之间存在着一个关系，我很高兴地发现这个事实，但是并没有告诉她，因为她不是我的分析家。我很高兴她开始讲她做的这个模型，这里是一个嘴巴，声音从此出来，嘴歪向耳朵，因为声音出来之后到达耳朵（附图6—附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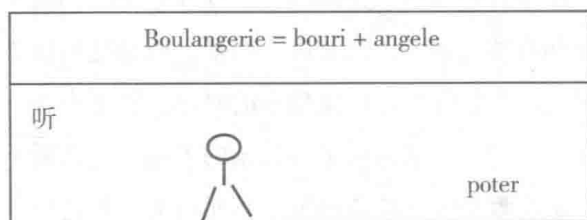


这个嘴巴也歪向耳朵，声音出来到耳朵。同时，当她听到声音的时

* 时间：12月10日上午9:00—12:00。

候感觉身体是歪的，如同这个嘴巴朝向耳朵。这个女分析者在家中歪着身体，在分析中借助这个媒介（胶泥）身体朝向耳朵。因为十分直接而不能直接表达，只能借助中介来表达。那么在我脑中想到嘴歪起也许与她被父亲穿透是有关系的，都是从一个洞到另外一个洞。

在随后一次的分析中，这位女分析者说来时候听到路边一个商店传出骂她的声音，她看到商店玻璃后有人，觉得可能那就是自己投射的影子（附图9）：



最上面的字是“面包店”（Boulangerie，可以分为 bouri，angele，angele 是其姓名）。听到有人骂自己，觉得窗户后的人可能是自己的投影，说明实际上不是面包店而是另一个名字在骂。此名字对应着她自己的名字，因此她必须创造一个词来说明这种关系，关系一致，但字母不一样。注意有意思的是声音出来进入耳朵，这里也是进入耳朵，但旋转扭曲的感觉消失了，被投射到了镜中。

这次分析后，她带了一个东西给我，说是大便（从肛门中出来的），而且她对我说，对她讲话的声音已不在外部，而是来自她身体内部的粪便。在分析者讲述的过程中，她试图确定声音来自于她身体的哪个部位。先发现是肚子，后确定是肚子中的粪便在给她讲。然后她继续说在这次来之前，在家中上厕所，粪便掉了下去，而正是那个掉下的粪便在给她讲。

我建议休息一下，因为今天讲的也很复杂，和上次一样，都是很关键的分析。稍等一下，我补充一句，刚才说过头脑中讲话的声音和父亲对她的肛交有关，而在我的脑海中，她所说的粪便，实际上是她父亲生殖器的隐喻。

讨 论

问：是大便掉下来再对她说话还是在肚子中的时候说话，我没有听清楚。

答：在她分析时是她肚子内部有声音在讲，然后分析之前在家上厕所时是大便在讲。由此她把自己考虑为三维的，身体里面可以包含一些东西，这点很重要。因为最初她做的胶泥都是二维的，后来逐渐才变成三维的。所以我有一个猜测，在她被父亲穿透后，始终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二维的，而现在这个身体变成了三维，而且里面可以容纳很多东西。根据其模型和症状来看，她之前感觉自己是二维的，声音来自外部；而现在变成三维的，这种割裂得到了修补。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是因为考虑到之前她所做的模型：上面分成两个人，下面没有分开，生殖器没有显示，就不能想象身体有两个洞，而只会有一个洞（阴道）；另一个洞恰恰是被父亲穿透的，她拒绝承认后面的这个洞（肛门）。在这次分析后很长一段时期，她把两个孩子都看成是粪便。同时由于她和男人有性行为，便认为肛门和阴道是一个东西。尽管她怀过孕，却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二维的，孩子是掉出来的。

问：她与父亲有性关系是你猜测的还是后来被证实了的？

答：当她把右脚搭在桌上时，很生气地说父亲也这样做，然后她说父亲对她有过这种行为。只知道是她说的，但究竟这是不是真实发生的是另一回事。

问：父亲从一个洞出来到另一个洞是什么意思？

答：阴茎也有一个洞，有时候冒出点东西。

问：有三个面孔，女的嘴巴是歪向哪一个人呢？

答：女的嘴巴歪了，可以传到耳朵，这是我的假设，但你可以有你的假设。在整合之前三个东西是分开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分析者自己是怎么说的。

问：患者说有一种晕眩感后听到一种声音。联系到父亲对她的性行

为所带来的恶心由此成为一个创伤，是否是在三者之间有一个联系？

（霍：在我看来吉布尔已经做了这个联系）

答：显然我们可以这样想。你怎么想是你的事情，我怎么想是我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她怎么说。

问：关于面包店这个单词，对中国人来说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联系？

（霍：这是你的问题）

答：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她没有写出名字，我可能意识不到镜子后的是她。但名字和形象一起出来，我就意识到了。在西方的传统中，上帝说话的同时也书写，这在西方文化中很重要。后几天我要讲一些基督教的问题。在中国，我不断问你们诸位，包括问那个汉学家，在道家和佛家中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医院中肯定有不少人既有幻听又有幻视，但在文化中是另外一回事。

我给你们讲两个《圣经》中的语录，首先是希伯来人看到了朝向耳朵的词，词和嘴巴联在一起，然后接吻。接吻在法语中也是做爱的隐喻。这些词如同希伯来人身上的肌肉，连接着每个人的信仰。目光的“看”变成了文字的“声音”，但目光不能将“看”和“听”、“在场”和“不在场”连接起来。在彼者的存在中每一个听和看都具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如同在寻找一个崇高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存在于雅典或其它城市人们口头的传递中，由此需要反思，由视觉引起听觉，而文字的询问照亮了声音的目光。（霍：当时存在着一种倾向是把听和看对立、希腊哲学和犹太教传统对立，这是不对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当时存在一个对立，即切口。具体地说，当时希腊人更多强调沉思，是一种目光；而犹太人强调上帝言说，要倾听，强调的是声音。而在这个对立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传统是整合。

在这个个案中，来访者看到了声音，也听到了声音。文字与上帝，与性行为有关系。这个女性又讲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新教徒，他们经常争论关于信仰的问题而不能达成一致，最后只有分开。所以说这个病人的故事反映了整个西方的传统。中国是否存在着这种对立？似乎没

有。但这次我在峨嵋看到舍身崖，有人说看到佛光就跳下去，因为佛陀在招手。那么现在是否还有和尚跳崖？（尹力：和尚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拉康对此的解释是，幻听的声音是实在的，佛陀的声音不是实在的。（尹力：应该是既看到影子也听到声音。道家是说玉皇大帝来招他，同时也会听到宣讲诏书的声音。）那和尚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尹力：大概是欢迎的声音。）如果这样，那么我最有兴趣的是当和尚跳下去时是否听到声音？（霍：听到外部的声音和我们自己的幻想或白日梦不一样，一为实在的，一为现实的。）（秦伟：我补充下，禅宗有一个文本说和尚躺在床上，听到跳蚤在哭，因为腿断了。）（霍：不一样，因为和尚确实是看到跳蚤腿断了，是一个理智的判断，而粪便则不同。）（秦：是一回事，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跳蚤会说话。）吉：对我而言，粪便是她排出来的，而跳蚤是独立的声音，是有差别的，但究竟有什么差别，我不清楚。

问：大便是阴茎的隐喻，为什么？

（霍：形象上有相似之处，同时有肛交的存在。）

问：关于面包店和自己的名字，是否女分析者在自己的无意识中也切割了这个名字，而后有一个转换，意识到声音是自己的？

答：是我假设她做了这个切割，她并没有说她有这个切割。

问：镜像中的声音是什么声音，我没有听清楚？

答：那个声音认为她是女同性恋者。

（霍：我补充一下，也许我没有翻译清楚，整个过程是，首先这个女性在家听到拉出的大便在说话，然后是面包店里的影子在说话，之后在分析中是自己肚子中的大便在说话，由外部转向内部，由此看到是建立了三维空间）。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在这次分析之后——当然是否是这次分析的影响，我也不知道——，这个女的就去请了一个音乐老师学唱歌，就因为想把声音发出来。是那种让很多人都听到的声音，和喃喃自语不一样。那个老师说，你要发出你的声音，就要用你的心、你的身体、你的生殖器（美

声唱法)。通过这种训练,她意识到了她的身体有两个洞,变成了三维。

问:从她说到被父亲肛交到她意识到声音是自己的经过了多长时间?

答:她说这是事实,但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不知道。但她不断地说,使人感到是真的。当她第一次说的时候我没有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这个经历太可怕。至于用了多少时间我记不清了,后来有一次她问我相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说今天暂时不讨论这个事情。

问:关于旋转的问题,模型中的嘴是歪的,令我想到自己在分析中也有旋转直到眩晕的愿望,我想到佛教中有一个符号与纳粹的符号是反的,又想到小的时候有转圈的习惯,这是我的联想,想问吉布尔先生对此有什么说的没有?

答:很有意思(中文)。1924年纳粹讨论符号时,决定左边算数。联系到这个病人是左耳听,父亲是左腿断,就很有意思。有次她说我们结束治疗后可以一起出去反对纳粹。

问: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不仅有形,也有声和意。说话时会同时联想到形和意,也听到声音,我想我们中国人做分析就可能会与西方人不同,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读书时不能仅仅听,还要看才行?

答:所以正是这样,你应该写。

问:开始我听到粪便时,没有听清。似乎发音像“Guibal”(吉布尔)这个词。经询问后发现不是,是像母亲这个词的发音。另一个问题是来访者在分析中先说父亲之后才说母亲,而她做胶泥时却是倒过来的,先是女性,后才看出是男性,顺序是相反的。为什么?

答: Cette femme 这个女人

Mère de Cet enfant 这个孩子的母亲

Mère 母亲

Merde 粪便

如果è没有发出音,这个孩子的母亲(Mère de)就成了这个孩子的粪便。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做的东西和讲的顺序正好相反。

问：中国有句老话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而临床上是幻听多于幻视，请问吉布尔先生对此有无什么理解？

答：是否幻听多于幻视，我没有做一个统计学的研究。我有一个老师，是当时和拉康齐名的精神病学家，他曾说幻听并不仅仅局限于精神病患者，神经症患者也有幻听。这对我帮助很大，根据我的经验和这方面的研究著述来看，纯粹的幻听比夹杂幻视的幻听更严重，就如同这个患者那样。

问：整个分析过程中幻听在不断变化，由外到内，我想知道她在其它方面有无变化，如情感、行为，同时她有过两次住院，这是否与分析有关，声音从外到内是从真性幻听到假性幻听的过程，而假性幻听在临床上更有诊断精神分裂症的意义，那么这个患者究竟是否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答：我不清楚你的意思。在法国，如果声音来自外部是幻听，如果它来自于内部则不同，带有拥有的意味。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许这是精神病学的问题，而不是精神分析的问题。在这个女性来见我之前，她住了17次医院，都是被警察抓进去的。而在见我期间她没有进医院。之后她又有过住院，这个我明天要讲。

第五讲*

今天要讲的很困难，比以前讲的还要困难，我不知道怎样开始，但还是要开始。

有一次分析她仍然带着粪便，不是说话的粪便，而且她说这个粪便将永远存在。我们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个人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拉出来的，但是这个粪便将永远存在。永远存在让我想到当这个女分析者找我做分析时也找了另一位分析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始终没有什么变化。跟我分析了3、4年后她听到的那个声音仍然在那儿。尽管她在这段时间没有住院，但是那个声音仍然还在。因此，她曾说过没有变化，她也声称带的这个东西永远不变。我的进一步联想是，永不变化是时间概念，只有上帝是永恒的。这个时间概念和中国人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时间概念与她父母之间信仰的冲突相联系，这种冲突与上帝有关，当然父母之间的冲突还包含人性间的冲突。这些让我想到这个女人所带的永远不变的粪便也就是上帝。

这次分析的前两分钟，当她说了这些时，我就跟她说起我童年时在农场中发现的事情，看到牛拉粪，拉出来的粪便每天发生变化。这个女人说动物的粪便当然是在变化，但这个粪便不是动物拉出来的，而是人拉出来的。我继续问人的粪便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她说它永远不会发生变化，永远都是这样。她把人拉出的粪便等同于上帝，如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一样。

当我在整理这个个案期间，我看到了一个语录，是希伯来教（犹太教）

* 时间：12月11日上午9:00—12:00。

创始者的语录，这个女人遇到的问题和这个教派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我们破坏性禁忌，这个性禁忌正是产生我们的性禁忌。我们是淫荡的产物，我们来自于月经血和尿。在我们受孕时，仅仅有一滴液体，像鼻涕一样的一滴。正是这样，我们揩鼻涕，感觉很糟糕。因此我们完全像腐烂的东西，像呕吐物，像那些粪便一样，从头到脚都是这样，完全不存在一个干净的孩子。我们一生都是这样的状态，否则我们会变成尘土，重新回到尘土中，我们将是那些发出臭味、腐烂的东西。我们将被烧掉，被空虚吞掉、被自负所填满。”

粪便产生人，永远不变，因此粪便是上帝，上帝才是这样。如果一个精神病医生听到她的话，就会认为她疯了。但是她是登录在西方文化中的，西方文化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认为人是粪便，是肮脏的。我由此理解了这个女人所处的位子。正是这样这个分析者开始讲纳粹，讲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为什么纳粹要这样，是因为纳粹想成为上帝，想像上帝那样永恒不变。

对我来说现在很困难，以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空间的概念，现在看到的是时间的概念。在这个时间概念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实，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前她讲三百年之前的一些幻想，现在讲到了这个现实，虽然她还没有讲到她的生活经历，但是她现在所讲的已经开始涉及现实。分析过程中存在从空间到时间变化，对死亡想象的场景变成了对现实死亡的描述。因为她童年的性经历，她始终认为只有一个洞，拉大便，生孩子，月经都从这个洞出来。西方犹太教谈到尿、粪便和经血都是从这个洞出来，没有做区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对这样一种混淆，弗洛伊德说了很多。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医生对孩子进行观察，观察他们的性行为，询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总是说像撒尿和拉粪便那样而来。对男孩子来说撒尿和拉粪便之间的差别，是来源于两个不同的洞。对于女孩子她们弄不清楚，认为是从一个洞出来的，生殖器对女孩子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对男孩子而言生殖器是一个东西，可以触摸，可以看到，可以解小便，而女孩子则需要借助

别人或工具来看到生殖器。这个分析者就始终处在小女孩的位子上，尽管她有了两个孩子，她仍认为他们是像粪便一样拉出来的。尽管她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她仍然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她还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她在音乐老师那儿学唱歌，老师让她意识到下面的孔道，让她下面的孔道也参与进来。当她意识和感觉到阴道和肛门之间的区分时很惊讶，情绪被搅乱，因为发现了她的女性特征。这种情绪的搅乱让她想自杀，她自杀过一次，但没有成功。

讨 论

问：这个分析者说粪便是不变的，是否也许在说上帝是永恒的，或者说父亲对她的伤害是永不消失的，因为粪便是父亲生殖器的象征？

答：能够这样说，但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呢？父亲对她的伤害造成了固着，她结婚和生孩子都没有让这种固着改变。换句话说，爱的行为对她来说是没有发生的，因为她固着在以前的经历中。

问：这个分析者说粪便是肮脏的，犹太教也这样说，她所说的和犹太教所说的是一样的，精神病医生说她是疯的，分析家怎么认为？她意识到她是一个女性时想到要自杀，为什么要自杀？

答：首先，她所说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连前后洞的差别都没有区分开；其次，当她发现她的女性特征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她有了性经历，有了孩子，但居然不知道有两个洞的区分。她以前的经历完全是糊涂的，面对以后的生活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她知道这点时年纪已经很大，已经太晚了。这样的一个人知道对她来说是一个创伤性的经历，她完全没有办法正视这点，所以想到自杀。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我的同事讲了一个个案，一个人突然遇到了仇恨，是在分析中发现的，她想自杀。以前她认为自己生活在爱中，只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当她在分析中发现这点后，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想到自杀。反之，这个个案中的女人生活在仇恨当中，突然发现自己生活中也有爱，没办法接受，所以也想到自杀。

问：你的个案是处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而我们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来听，东方文化中佛教和道教中有一条戒律，男人必须蹲着小便，缩阴，具体来说就是会阴前后的二交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第一点，佛教虽有这样的规定，但他仍然可以玩弄他的生殖器，但女性就不可以，这种差别对任何文化都是这样的。人类有着共同的基础，解释不同，就有不同的文化。会阴点是不是快感点我不知道，如果有科学的证明，那么精神分析就要修订它的理论，就需要一个脱离于宗教和精神分析的研究。目前为止，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体会到会阴点是快感区？我们有口交和肛交的记录，但有没有在会阴点做爱的记录？是不是在会阴点做爱的高潮比口交、肛交和性交的高潮更高？如果真正有这样的一点，我们再来具体讨论。文本上是不是这样说的？先找到文本我们再讨论。（霍：我想补充说，不管是佛教、道教、基督教的解释，都是成人的解释，不是孩子自己的解释。）

弗洛伊德说全世界的人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就是男孩子可以看到它，摸它，玩它，女孩子是不能的。孩子有他自己的经历，他要回答他从哪儿来，就会有不同的解释。经过文化筛选，提供解释，就形成了超我。佛家的规定，要成为和尚，就要缩阴，这是一个超我性。弗洛伊德说这肯定是超我，但还应该有一个它我、自我。一个孩子出生后，男孩子除了看还可以触摸（生殖器），女孩子不能。男孩子看自己的生殖器与别人跟他说的东西之间有一个冲突，精神分析解决的是这类冲突，解决个体独特性和文化性的冲突。大家都说西方有个人的概念，东方没有。弗洛伊德说要倾听每个个体讲他的故事，倾听登录在文化中的个体讲他的故事。如果东方没有个体，那么精神分析不可能在中国存在。

问：患者为什么会自杀，是因为她知道得太晚了？分析经常会让分析者感受到这样致命的后果。如果想预防，分析家是不是要有预感，在这之后，怎样去转变？因为不加转变的话，这个分析者可能终止分析，由此可能永远痛苦下去，甚至自杀，我相信每个分析家都不想看着分析者这样下去。如果要防止这种现象，应该怎么做？

答：应该做什么不是我的立场。分析家是个体的，倾听的也是个体的事情。很多西方人对中国说你们应该做什么，把中国当成孩子。我来中国，只是倾听，不会说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想怎么做，如何做，那是你们的事情。我是作为个人来倾听个人的讲述，从来没有一个集体的“对我说”，你应该怎么做。我所报告的个案只涉及一个人，那就是这个女人。当然应该避免自杀的危险性，但是分析家也应该接受分析者痛苦的经历。心理治疗师和分析家不同，治疗师说应该尽量不要把伤口打开。是否打开伤口这是分析者来做的决定。分析家面对这样的一个情景，当分析者打开这个伤口发现爱的时候，她想自杀，因此我们可能就会冒这个危险。作为分析家就要敢于冒这个危险。在接受我的分析前她接受了另一个分析家的分析，并且反复住了几次院，想走出来却没能走出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是因为以前的分析家不敢冒这个危险。我冒了这个危险，所以帮助她走出来了。作为分析家就是应该冒这个险，治疗师和分析家的差别是对于我自己而言是否愿意冒这个危险，并不是对你们而言。分析结束意味着什么东西死了，或者是象征性的死亡或者是真实的死亡。在这个个案中这个界限非常微妙，经常这个界限是非常脆弱的，要不就是分析者死了，自杀成功；要不就是分析家被分析者杀了。我自己冒了这个危险，真实的死亡没成功，导致象征性死亡成功了。我的同事被杀，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敢冒这个危险。去年我开的讨论班讲创伤，希特勒的统治导致对全世界的创伤。弗洛伊德发现分析者在童年时的创伤，而分析本身也是创伤。如果没有这个创伤，就没有改变。分析者来，是她需要做改变，分析帮助她实现这个改变，有改变就有创伤，分析家就必须冒这个危险。但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不需要经历这样的创伤就可以改变？

问：自杀是很棘手的，是她自己要滑到那儿去。如果自杀成功，就可能面对刑事纠纷，在法国会不会陷入刑事纠纷，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答：第一，处在分析中的人自杀的是极少有的。第二，在法国，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分析者）自杀而诉讼分析家的。有对医生的控告，

这些已经很复杂了，因此要说自杀是分析家的错就更困难。第三，如果在分析者自己家中自杀了，那么他们本来和亲朋好友生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不制止？分析家不能在生活中制止来访者的行为，他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在这个个案中分析者也是和父亲的关系出了问题。当然在法国，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精神分析，也有人可能说自杀与分析有关。

问：在中国是医生的话需要举证，这该如何去做？

答：（霍：刚才教了你三点如何处理。）那么，在法国与中国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在法国，没有说必须要有一个医疗结果，如果在法国你没有利用好医疗（手段），病人并不能因此控告医生。

问：我想知道的是关于这个个案的女性性心理的，这个女性的心理是不是普遍性的问题？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据我知道的，以我的经验，童年期都有性萌芽的。但我觉得有点不一样，不知道别的女孩子是如何区分的？

答：你是一个女孩子，你就可以讲一下，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提问者：我知道因为撒尿是向前的，排便是向后的，所以，撒尿的口与排便是不一样的。也许男的站着撒尿，所以男性是因此而知道区分的。

答：那么，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允许你自由探索，而对个案中的女人来说，自由被禁止，所以你是幸运的。男的是不是更容易发现？只是男的更明显，男的要发现两个洞，两个洞不一样，比女的更容易。对于一个男性来说，当然能看到一个女性生殖器，但只晓得有两个洞，不晓得有三个洞。女孩子通过摸，可以知道自己有三个洞。女性通过一个工具，也可以看到。所以在美国的女权运动中，所有的女人都要买一面镜子，通过镜子就可以看到。

问：我想问，病人当时多少岁？她是不是知道有两个洞才要自杀的？

答：现在可能四十七、八岁。当时多大我不清楚，也许是十年前开始做分析的，当时我仅仅是让她讲话。最好不要机械地看这个关系。但是她如果不做分析，也许永远不会找一个唱歌的人。也就不知道用全身的腔来唱歌，也就不会发现两个洞，虽然这种发现对她来说太晚了。女

性会发现自己有三个洞。如果不是刚才张海燕说，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女性是有三个洞的，我很感谢张海燕。

第六讲*

有一次分析时，女分析者带来了胶泥的模型，类似于一个盘子，然后她说：“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她原来带胶泥的时候会说什么东西怎样，而不会说这让我想到了什么。而现在她说“我想到了什么”，开始说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有听觉幻想的人那里，而现在她处在了与没有听觉幻想的人同样的位子上，我没有更具体地问她。

中文的想和思考是两个不同的字，法文也同样。思考和想是一样的，思考 and 想有可能没有声音，也有可能声音，在内心听到妈妈的声音和想妈妈是不一样的。她开始时听到在外边有一个声音，然后后者转变成内部的声音，再然后又变成她想，她有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我们可能考虑有一个声音在外边或内部讲时，她的思想被语音化和语言化（话语化了）了，在之前这个思想有可能处于沉默的状况。我们已经谈到在西方文化中的冲突，希腊哲学家默默思考，他们不说话；宗教的传统则始终是上帝在说，思想语言化了或语音化了，或者说他们的思想语音化或语言化了，这两者始终存在着冲突。也就是说在神学的传统中上帝说，神学家也说。希腊尽管有神存在，但是这些哲学家在默默思考。这是一个抽象的说法，虽然在希腊哲学中同样也可以找到言说，在宗教教义中也可以找到思考，但总趋势是这样的。想象刚诞生的孩子是如何思考或想问题的？我试图回答婴儿刚诞生时是不想和不思考的，一个婴儿不可能像哲学家那样思考，他一出生就处于一个被声音化、语音化的世界中。在这个意义上说

* 时间：12月12日上午9:00—12:00。

哲学家是成人，他们默默思考和想，而犹太教的被语音化的思想是婴儿化的，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切割。

也就是说这个分析者刚开始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听到身体内部的一个声音，那么就说明她处在婴儿的状态。而分析也是如此，你讲，我听，当分析家倾听的时候就处在一个婴儿的状态。而这次她带来东西说“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思我想。她说了这话后就离开了听的状态，而进入了思考的状态。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此思想是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他说“我思故我在”时忘记了他的童年。这个断裂在希腊和犹太教之间就发生过，近代在笛卡尔身上也发生过。精神分析就处在一个类似儿童的状态。这时不能说笛卡尔离开了基督教的传统，因为基督教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上帝讲了一次话，然后就不讲了，他们认为上帝不再讲话了，如有谁说上帝讲话了，就会被认为是疯子，由此基督教内部的断裂发生了。我们看到在这儿，童年和成年之间有一个切口，精神分析正是从这个切口之间插入进去。

每个成人都曾是儿童，在自由联想的时候，成人中的那个儿童就出来了。女分析者会说“我想我的妈妈”，而不说“我思故我在”，她回到了婴儿化的语音或语言状态。笛卡尔的立场和前者的立场不一样，他稍微离开了婴儿的状态，成了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能想象，分析家在倾听孩子时，孩子总会说爸爸、妈妈、奶奶怎么样，这个分析者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她说到她的母亲时比划了一个动作，让我想到她这次带来的东西。她说这是一面镜子，让我联想到她带来的东西也是镜子，同时让我想起了商店的玻璃也是镜子，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因为我没有问她。分析者看到自己的动作，说这镜子中有一个村子，然后马上说不是，是面孔。法语单词村子是 Village，面孔是 Visage。在这儿有一个语误，她想说面孔，结果说成了村子。当她说“不，不，我想说的是面孔”时，我知道她想说的是村子。分析者说童年时在村子中有很多桃树，而且是很多种类的，但现在只剩一种了。这是加入 WTO 带来的

问题，因为它有一个思路，是要选择最好的产品，其它的就淘汰了。那么全世界只有一种桃子在卖，只有一种单一性，其它的都被淘汰。WTO的人这么做只考虑经济问题，这个分析者觉得很可惜。她其实是回到了童年状态才会有这样的感慨，绿色组织也在进行抵抗WTO的运动，把那些WTO所淘汰的品种再重新进行种植。当分析者处在反对WTO的运动中时，她是一个成人。这让她想到了希特勒的行为，只保留一个种族，把其它种族消灭掉，这又让她想到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只有一条腿。WTO和希特勒想变成单数，她父亲之所以只有一条腿，是因为她的父亲参加了抵抗希特勒的运动，在抵抗运动中她的父亲失去了这条腿。

我们看到经由这个语误打开了一扇门，从这个语误出发说到村子、桃子、单数、希特勒、WTO、父亲。通过这个联想，她面对着父亲的两个面孔，一个是抵抗希特勒运动的面孔，这个面孔是存在的；另一个面孔是不存在的，是她父亲对她性侵犯的面孔。这让她想起就很痛苦。后一个面孔摧毁了她整个童年，也让她的父亲离开了母亲，重新和另一个女人结婚。这个面孔也让她想到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冲突，这个冲突要不就是天主教打倒新教，要不就是新教打倒天主教，总之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世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她谈到很多关于面孔的事情，时间有限，明天再说。

讨 论

霍：补充一下刚才的翻译问题，遇到的有个法语词，我们翻译成“语音化”，但实际上比较麻烦，在法文中为：

vocalisation 元音的发音

vocaliser 音乐学中的练音

vocalisme 辅音的元音化

voix 声音

答：这最早要追溯到犹太人的《圣经》文本，他们最早只有辅音字母，逐渐才引进了元音字母。没有元音的话辅音本不能发音，而当只有辅音时人们就只能猜它的发音，在比较小的群体中尚可如此，但到了比较大的群体就会有困难，所以他们就引进了元音，但并不是字母，而是通过打点点来表示元音。希伯来语是这样写的，只能看到辅音，可以自己加不同的元音，所以对不同的文本就有不同的加元音的方法，所以就不存在原教旨主义。但到了4世纪，希腊的文字是有元音的，文本就只有一种解释。希伯来语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也被教条化了，即只有一种解释，没有别的解释，由此开始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冲突。后来也导致了希特勒与犹太人的冲突与屠杀。希伯来语的 Nkl 就变成了 donc（因而就…… therefore），如果没有元音化而被任意添加的话就可能变成“拉康语”。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拉康自己说的。当时基督教把《旧约》翻译成希腊语时有翻译的差别也有解释的差别。我们可以想象把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含义，如灵魂（seele）在法文中翻译成 ame，英文翻译成 mind，而这二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法文翻译沿用的是拉丁语传统，而英文的翻译又有不同。况且把希腊语翻译成希伯来语的时候，希伯来语还没有元音化，所以差别之大就更可以想象了。

（霍：中文从音韵讲是没有切开的，后来从拉丁引入拼音时才切开了汉字的元音和辅音。）

问：刚才吉布尔先生说道：患者从“我听”到了“我想”，这是一个变化，同时又由“想”变化到“看”到了村子，我想问这是不是幻视，如果是的话，是否需要重视？

答：今天我讲的是村子的问题，明天会讲面孔的问题。

问：为什么患者不直接说，我想到了“村子、桃子”而是要通过“面孔”才能说到？

答：明天我们要讨论镜子和面孔的问题，所以明天再说。

问：两个面孔使我想到了你画过的图，不过那时是三个，这之间有

无联系？

答：仍然是留待明天再说。今天说的是声音，视觉的问题明天讨论。我解释一下，患者做模型时处在儿童的状态，是一个系列，这是一个领域。当她说村子时又是一个领域，虽是外在的，但不是幻觉。而说父亲时，是头脑中的，也不是幻觉，而是隐喻的。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是符号的，二是实在的，三是想象的，具体讨论明天再说。

问：弗洛伊德在成人中听到了儿童的声音，而分析家在听的时候也是处在儿童的状态，这二者是否有类似？

答：这个关系是一个不对称的关系，分析家自己接受过了分析，而分析者还处在分析中。另外分析者只有一个分析家，而分析家有很多个分析者。

问：我听吉布尔先生这次讲个案更多地引出了文化背景的东西，促使了你自己对文化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又反过来促进了对患者的理解，是否是这样？

答：刚才我的那些想法并不是对分析者说的。对她我只说了一句话“我听到了村子”。所有这些联想不是去理解患者，而是去帮助理解我自己。这些联想是在帮助我自己的分析，这些想法是对你们说的，而不是对来访者说。我问“是左边还是右边”来访者就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而不是她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应该去找个分析家。这个个案已经十年了，是我在重新整理时所想到的。

问：“看到了她的手势就想到了这个模型”什么意思？我觉得应该是先对模型赋予了一个意义。

答：明天我再讲。（霍：自由联想就是自由联想，不是逻辑分析）之所以我这样说是因为前面有很多次分析了，也有商店的镜子的启示。或许她带来的东西和她说的东西连在一起，所以就有这样的联想。如果说逻辑的话，那就是2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镜子的问题，我第一次到中国来也是说镜子的问题，我提的问题“左边还是右边”是镜子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补充一点，拉康的第一个文本就是关于镜子的，拉康精神

分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看到别人的面孔而看不到自己的面孔，所以我建议你们每天早上洗漱时都看看镜子中自己的面孔，当我第一次看到你们时我就在想自己是否会说一些傻话，做些傻事。但你们提了很基本的问题，使得我发现我没有（说傻话），但当我看镜子时，我就想我是否说了傻话，因为镜子中的那个人无法回答我。

问：分析家的联想对分析者的影响是什么，是否会是一种暗示？

答：精神分析的发明是相对于催眠暗示的，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不是暗示，但这种边界是很脆弱的。比如我问“是左边还是右边”就可能是一个暗示。但如果分析家什么都不说是否分析者就猜不到呢，这也很难说。有人说无意识之间有交流，但这个问题太复杂，如果你们清楚，可以告诉我。这种影响不仅有分析家对分析者的，也有分析者对分析家的，就像那个女患者对弗洛伊德说“停下来听我说”一样。还有我报告的这个个案的来访者叫我不再问，我也由此停止了我（关于镜子）的讨论班。在结束这个个案四年后，我有几次决定在讨论班上讲这个个案，但是奇怪的是每次我决定要讲的时候，这个女的就会给我打电话说要约见我，还说我是一只狐狸。据我所知她并不认识分析界的人，后来秦伟也说我是一只狐狸。

霍大同在法国高师讲你们成都的精神分析实践时，到处都是相关的广告，还请了很多精神分析界的人，但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看到了广告，第一个到了会场，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女的，我们握手问好。结果她是最后一个向霍大同提问的人，我当时完全晕了，完全听不清她问的什么问题。（霍：也许当时我接受分析时她也正在那里做分析。我当时不知道，看到了这些模型，以为是吉布尔先生在那里做着玩。）

我曾接待了一个分析者，觉得有困难，想去找拉康做控制分析。回去后又见到了那个分析者，那人竟说你一定把我的事讲给另一个人了。我问拉康怎么回事，拉康说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什么进展。（听众：是个女分析者吗？）是男的。我想补充说的是，那个女的到会场上来不是为了扰乱秩序，而是为了提个问题，不是她听到了什么声音，

而是她想别人听到她的声音。

问：你在分析中是否也允许来访者的家人在场？

答：父母亲在场的情况一般是对孩子的分析。对孩子要根据情况而定，分析家一般要先见父母，因为他们是责任者也是付钱者。至于成人，有一次是一个姑娘来做分析，期间她母亲打电话要见我，我征求来访者同意后见了她。结果她母亲说如果你要和我女儿结婚可以，但我没有一分钱，如果你有其它想法是不行的。（听众：那你是怎样回答的？）我记不清了，好像谈了一个小时，总之顺利摆脱了威胁，也继续给她女儿做分析。渐渐知道了她母亲很有钱，但不愿意给她女儿一分钱，所以那个女孩也不可能付给我很多钱。我想起当时那个女孩进入分析时我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我可以开个条子让她报帐。但后来我不是了，那个女孩就只有自己付，或者让母亲付。所以她母亲很愤怒。有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是家庭治疗，全部家庭成员都参加，但我不做这个。

问：你来讲这个案例之前是否征得了来访者的同意？

答：没有。刚才那个女孩的例子中是我征求了她的同意后才见了她的母亲，这是我的惯例。

问：你的个案是由远及近，从文化讲到个体，而我自己的体验是由近及远的，你怎么看？

吉：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

第七讲*

这是最后一次课。前面一次我们谈到关于村子和面孔的语误。当她带来胶泥时说这让她想起了她的母亲。她举起手做了一个动作让我想起她所带的模型和镜子，在这镜子中我们能看到母亲的形象。她虽然没有说她看到了她母亲的形象，但她是能够看到母亲的形象的。当她说这些话的同时她看着自己带来的东西。当她看到这个东西时随后就说她看到了面孔。

我们能够理解这是重要的一刻，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转移的发生。分析家是作为第三者出现的，她首先说看到了母亲的形象，后来说看到了分析家的形象。分析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占据了母亲的位置。我自己的头脑在想：她在商店的橱窗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在她比划的动作中看到母亲的形象，在模型中看到我的形象，这个人处在转折阶段。为什么？这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子问题，孩子刚开始看到镜子中的镜像时并不知道那是他自己，而现在是母亲指着镜子说“你在”：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说法。小孩子刚开始照镜子时不知道那是他自己，母亲会说这就是你，你就在这儿。通过母亲的话语他才意识到镜中是他自己。

也就是说这个分析者处在区分自己和母亲的过渡阶段。在商店的橱窗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在镜子中看到母亲，这样的过程实际是在对自己和母亲进行区分。她接着说小时候曾用水彩画了一个母亲的半身肖像画。我们要注意一点：在分析实践中所有的词都是要考虑的，她说是水彩画而不是油画，因为水彩画是先撒上水，然后涂颜色。这样水彩画

* 时间：12月13日上午9:00—12:00。

就起了一个反射的作用。当你在画一个人的面容时，同时可以由此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这个分析者自己说的。她说她并不习惯画水彩画，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没做过。她说当她画这个画的时候，有她自己的面孔和母亲面孔的混合，也就是在她画母亲的水彩画时从水彩画中照见了自己。

我在写这个文本时，包括现在，每到这个地方都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母亲。那么这个分析者在想的时候是在反思，“反思”这个词在法语中和“反射”是同一个单词 *Réfléchir*。她说在橱窗中看到自己，从一个手势动作中看到母亲，因此有在镜像水平的反思之意。*Réfléchir* 第一层意思是反射和反照，第二层才是思考和反思的意思。这个词有歧义，她反思母亲，通过镜像的反射看到母亲，看到自己，同时考虑她和母亲的关系。我继而想到有三次分析时她大声喊叫，我当时忍受了。当时我有一个幻觉，在她喊叫时我似乎觉得她的面孔离开了她，朝向了我，这个面孔是朝向我的面孔。在那个周末的晚上我看了一本书，是著名女演员安娜·杜白瑞（A.Duperrey）写的一本书《黑色的面纱》（*Le voile noir*）。我却把作者的名字读成了我精神病专业的老师，因为我把她的名字做了切分，变成了 *Du Père Ey*。*Du* 是介词，相当于 *de le*。*Père* 在法语中的意思是父亲，*Ey* 是当时精神病学界很有影响的人，相当于精神分析界的拉康，是我的老师。那么切分后的意思就是从父亲到我的老师。那个女演员描述她的父亲死了，她把母亲的照片放大，把母亲的头像放大了，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处在也想高声喊叫的状态，但是我没有喊出来。当我在做词的分割时，就想起我的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有幻听，并不说明他就是有精神病。”我的老师是拉康的朋友，但拉康把幻听和幻视作为精神病的标志。当时我处在一个忧虑的状态中，因为我有幻听、幻视，我看到这个分析者的面孔脱离她的身体朝向我自己，看到那张照片时也有一个幻听，想大声喊叫出来。我忧虑自己是否处在精神病状态中，也忧虑那个分析者是否处在精神病状态中。但是这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些联想，当然这是一瞬间发生的，我就请求她把她母亲的水彩画带给我看一看。她说她并不是为了画她母亲的形象，而是为了使自己更能靠近母亲。

讨 论

问：你说放弃了讨论班，遵从分析者的思路，看到很大的眼睛后自己想大喊，一条是分析者的思路，一条是分析家的思路，作为分析家在多大程度上在这两条线上游荡？

答：是否需要我给你一个规则？但是我从来不给人做控制，虽然你们认为我是一个比你们要好的分析家。但我也不控制自己，如果我控制自己，对自己有信心，那么我控制自己也会控制她，但这是没有把握的。这仍然是我自己的立场，不是你们的。如果我讲这些能给你们传递一些东西，这很好，但如果没有传递什么东西，也很好。

问：听讲时我的情绪一个一个地被唤起，今天我照镜子时想到能不能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做分析？

答：仍然是这样，你们总希望我能对你们说你可以这样做。我有时候会对着镜子说：“你好！你是谁？”但是没有人回答。

问：为什么今天的个案讨论停在这儿，是否她已经区分了她和母亲，所以停在这儿？

答：我在讲的时候她处在一个转换阶段，她要和她母亲做区分。在这儿有转移，让我知道了作为分析家的我所处的位子，我起了一个分析家的作用，同时等价于她的母亲。我并没说我停到这儿，仅仅是先讨论，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说。关于把握和控制是和主人或师傅联系在一起的，和主宰是一样的。有一个小故事，我第一次来中国时，我的大女儿给我做了一套服装，以色列的一个服装师说你做得不错，我说这不是我做的，这是我女儿做的。我说我是中国的精神分析家，那个人很高兴，说你既然是中国的分析家，那么对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很清楚。

问：他父亲有两个面孔？今天能不能谈谈昨天的问题。

答：关于头像上的三个面，和她父亲的两个形象，没有什么关系。头像上三个面有一个共同特征是“歪的”。在橱窗中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这样说了，但并不必然要歪着嘴说。

问：女同性恋与女皇之间有联系吗？

答：当然有，过一会儿再说。

问：为什么她不直接告诉你她想到了村子，而要以另外一种方式？

答：差不多等于这个镜子。有镜子时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脸，没有镜子就看不到。（她还不能直接说她自己，而要借助一个工具。）不仅仅是看，还需要一个言说。一个人第一次看到镜子中的人，他要提问“他是谁”？这时会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这是吉布尔”，或是“霍大同”。这样才会有一个联系。在这个个案中，当她在商场的橱窗上看到一个影子时，她听到一个声音，说她是同性恋。这次不一样，这次看到一个影子，而且在橱窗的上面看到了她的名字，这样她意识到是她自己在说。

问：从世贸组织选择最好的，到纳粹也选择最好的。她父亲反抗纳粹，这里隔得有些远，但我还是想请吉布尔先生再讲一下？

答：关于世贸，关于纳粹，当时我讲得很快。但两年后，她还请我和她一起上街参加反对纳粹的游行。这让我想起：在《旧约》上先是上帝对我们说，然后再是大众说。这个希伯来的文本是以寓言性的方式在说着问题，上帝的声音从天上降下来，首先是先知听到了，再讲给其他人听。之所以有这个转换过程是因为这个最高的声音是神的启示，同时处在先知的嘴巴上。这个分析者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建议我一起到大街上去说，等于她把我和她一起看作了上帝的先知，懂得了世上的一些事情，应该去告诉别人。

问：我想到有些佛经也不是佛说的，而是通过佛的加持而从某些人的口中说出来的。

答：佛家的说法肯定与希伯来语的文本是很接近的。问题是要考虑她在成为精神病患者之前是如何登陆在文化中的，但精神病医生从不考

虑这个问题，否则就不会简单地把她看作是疯子。在伊斯兰教中也是，先听到一个声音，然后从口中再说给别人，别人就以为他是智者。

问：我想请问要成为一个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家需要什么条件？

答：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但弗洛伊德说过，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精神分析家，你就必须成为一个好的梦者。

问：胶泥的分化过程使我想到了女性阉割的问题。

答：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女性的阉割，那就意味着你知道什么是男性的阉割。对我而言，我从不使用阉割一词，因为它使所有的孩子害怕。当你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也使我害怕。阉割在当时的意思是说女性没有阴茎，所以是被阉割了的。但女性有三个洞，男性只有两个洞，所以男的也缺少某种东西。我更愿意说男女都缺一个东西，而不是说阉割。对我而言，小伙子和姑娘双方都缺某个东西，比如我就缺少乳房，又少一个洞，也不能在肚子中怀孩子。至于女的缺什么是你说的。（听众：是否这样男女就要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要说自己缺了什么。（听众：好像既缺母爱又缺父爱。）

因为时间关系，现在我只能做一个结论，讲细节肯定是讲不完的。在另一次分析中分析者说她挨了一记耳光，是道德的耳光。因为她听到骂她的话，是婆婆骂她是女同性恋。她说到在童年时，她不仅和父母也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在这次分析之前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的那个女伴。在那个被战争摧毁了的年代，是她们的友谊使她能够活下来。有了这个故事后，这两个东西——道德的耳光和那个女孩子——让我想到她原来和那个女孩子以及和她母亲都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婆婆的声音是在告诉她，那种关系是一种性关系，而这使她想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性关系。接下来还有一次分析，她来之后说道：在她来时所乘坐的公共汽车上，有一对夫妇带了一个婴儿，她看到灵魂在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转悠。我想到的是在前一次分析时，她说和小女伴与母亲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而婆婆则说是性关系；但是她看到灵魂转世，这并不是思想性的，所以她是在重构婆婆的声音，即那是爱的关系，而不是和她与父

亲一样的性关系。三年后分析要结束时，在一次分析中她对我说，“通过分析我找到了在童年期的一个爱的关系”。她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始终有声音在对她说，但她现在可以不听从那个声音而做一些不再扰乱社会的事。

问：这个个案经历的创伤为什么导致的不是神经症而是分裂症，这是一个必然的还是一个偶然的結果？

答：对于我而言，我不管她是什么病，所有来敲我的门做分析的人都不是病人，这正是精神分析家与精神病医生之间的差别。

听众：讨论班就要结束了，我作为远道来的学生，感谢霍老师，也敬重吉布尔先生，之所以敬重是因为这几天我问了很多问题，他都没有给我回答。我准备用中国最古老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谢，给吉布尔先生鞠一个躬。我的症状是想得到答案，而吉布尔先生的症状是不回答，今天我没有提问，说明我的症状在缓解，而吉布尔先生依然带着他的症状。

（其他听众回应：就如中国的古话，有就是无，无就是有。）

答：我不知道是不是道家或《易经》真的有这个思想，有意思的是你们在等待一个西方人的答案，而这正是中国的状态。但也许你们应该做的是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WTO 就是美国的回答，而我的意见是你们最好对美国的回答保持一点怀疑。

问：具体到这个个案，患者最后如何看待她幼年和父亲的性关系？

答：对我而言，她早年的关系就是爱和性关系的混合。而她对性的发现太早，一般的孩子要晚些，孩子需要的是爱，而性是成人需要的。在后来的三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很遗憾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说。也许一个月前当她在会上拿麦克风说话的时候才是分析的结束。

问：我学到了三件事，第一是别急，无论是作为分析者还是分析家；第二是移动，就如吉布尔先生您一样；第三是答案就在自己身上。以前我很急，因为听不懂吉布尔先生在讲什么，而今天我好像才明白答案应该从自己身上去找。

答：这使我想到了三个洞，是你让我明白了你有三个洞。我也一样

有一个移动，我从巴黎到成都，霍大同也从成都到巴黎，但你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只是你自己的感受。补充一点，转移就是一个移置。

问：我想知道拉康所说的分析家的欲望是怎么一回事？

答：分析家的欲望（le désir de l'analyste）是两重的：一是分析家的欲望，一是我有一个想给分析家讲的欲望。而不论怎样，有一个欲望就说明有一个缺失（manque）。

拉康讲分析家的欲望，神学家讲上帝的欲望，而黑格尔讲认识欲望的欲望。分析家的欲望就可能是从上帝那里转化而来的。而如果是后者，是认识自己欲望的欲望，而缺失的概念是纯粹精神分析的。因为当哲学家和神学家在讲欲望时，是说我有这个东西，但忽视了它是缺失的产物，或许这种表述就可以用阉割来表达。

Théologien（神学家）

Le désir de Dieu（上帝的欲望）

Philosophe（哲学家）

Le désir de désir（欲望的欲望）

问：我的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不礼貌，但还是想问，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分析家还有这个欲望吗？

答：你看到了我有不喜欢这个工作的表情吗？

拉康与孟子*

米歇尔·吉布尔 / 主讲

霍大同 / 译 石岩、徐慧等 / 记录整理

严和来、姜余 / 编校

* 编者按：2008年2月28日，法国精神分析家吉布尔先生受邀前来成都进行为期四周的学术交流。吉布尔先生热爱中国文化，七十余高龄仍在学习中文，此前曾多次来到成都精神分析中心进行讲座，这次讲座以《拉康与孟子》为主题，以拉康1970年第18个讨论班《一个可能不是假装的辞说》（法文版）为蓝本，对拉康与孟子精神对话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解读。时间是每天上午9:00-11:30，地点在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01室。霍大同先生承担了所有的翻译工作。原载于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内部刊物《精神分析笔记》第十卷第一期，主编：霍大同，副主编：秦伟、张晶艳，执行编辑：严和来、张涛。

我们在这里发表这次学术交流的记录稿，以此纪念这次难忘的精神盛宴，并表达我们对吉布尔先生的感谢。

第一讲 辞说*

霍：大家欢迎吉布尔先生。

吉：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讨论。在法国这个讨论班也被叫作《雅克·拉康的中国之讨论班》，一共有十章。这十章，每一章我都自己给一个标题。本来拉康都已经有标题了，但是我个人再给个标题。第一章给的标题是“discours”。

霍：目前为止我们翻译成辞说，但吉布尔先生一直试图在中文中找到一个类似拉康的 discours 的翻译，但是所有的字典中的翻译在他看来都不能够很好地传达拉康在用 discours 这个词时表达的意思。

吉：为了好玩，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三个部分。第一：dis ce cours 意思就是“说这个课”，这样一个在大学的课。为了继续好玩，可以说 dire du secours 就是求救。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就说“救命”。在来的路上我和张涛、徐慧谈到学法语的问题。我跟他们说学法语最好是听法国的电台。他们两个说仅仅读拉康就够了。我说如果你们仅读拉康，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没人懂你们在说什么。所以我不建议你们学法语仅仅只读拉康，你必须要去听法国的电台。对我来说也一样，如果我认为我学中文仅仅为了读孟子就够了，那么我读了孟子以后走在中国的街上就不知道人们究竟想说什么。为了让大家明白拉康这个讨论班的基本内容，我们先看后面的索引，在索引中我们能看到拉康引用最多的是弗洛伊德，一共有 43 处引用。引用第二多的是俄狄浦斯，有 13 处。第三是孟子，有 12 处。孟子比俄狄浦斯引用得稍微少一点。我这一次要讲的内容和上次，

* 时间：2008 年 2 月 28 日上午。

就是去年十一月份先到西安再到成都来讲的内容是相联系的。除了上一次在成都讲课时的录音，我在西安讲课也有九个小时的录音、录像，发在西安的一个网站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

吉：因为我们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我要讲的东西必须是能够帮助你们通过考试，讲了以后你们能写个什么作业等等。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拉康在精神分析传递过程中间讨论了中国的思想和孟子的思想对他整个的精神分析的讲授起了极大的帮助，他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中国人来回答而不是法国人来回答的，而且法国人很难有这个能力来回答。这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如果大家能试图回答拉康对中国人提出的问题，就为两年后的讨论有个很好的准备。对我来说，也许同时也对很多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来说，我们有个呼唤，一个请求，请求你们中国人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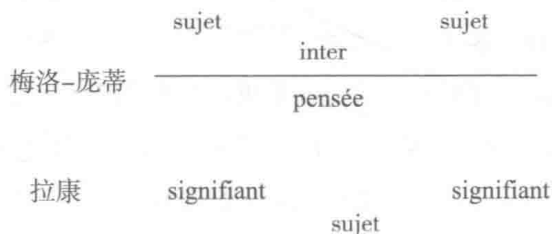
我想做的是对拉康讨论班的评论，这个评论在法文中就是 *commentaire*，如果把它切成两半就是 *commen (taire)*，*commen* 是怎样的意思，*taire* 是沉默的意思，就类似于中文的“为什么沉默”。但是因为我在这儿要说很多，实际上我要做的就不是“为什么沉默”的东西，而是为什么要说的东西 *commen(dire)*。拉康在这个讨论班的开头说，这里涉及到的不是一个我的辞说的辞说。d'un discours—ce n'est pas du mien qu'il s'agit，就类似于我在这儿也有个演讲，但这个演讲不是我的演讲，而是关于拉康的演讲的东西。拉康在办讨论班时有很多人来听，这个时候他就处在一个类似教授的位置，通过这个言说、演讲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处在这样一个教授的位置的时候他一上来就说：“我想讲的东西并不是我的言说”，他马上就把公众带入了精神分析的领域。当拉康说了第一句话以后，立刻就把公众带入了精神分析的领域。接下来他就援引了弗洛伊德关于双重登录的思想。我们在讲话、思考、行动的时候存在着我们能控制的一部分，同时存在着不能控制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弗洛伊德说的语误、过失行为、梦、症状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说那些能被控制的登录在一个地方，那些不能被我们控制的登录在这个地方

的反面，那么正是这样它是一种双重的登录。这就对应着拉康说这样一个辞说并不是我的辞说，在我这个辞说之外还有个辞说。

拉康接下来说，如果继续发展弗洛伊德的双重登录的思想，假如说我们存在着一个地方其中登录着我们能够控制的部分，在它的反面还存在着我们不能控制的部分的话，那么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我们要经过一个边才能从正面到反面，但是存在一个可能性是我从正面到反面的过渡不需要越过这个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拉康把弗洛伊德的思想 and 莫比乌斯带联在一起了。当拉康试图把弗洛伊德的双重登录的思想和拓扑学的莫比乌斯带联在一起的过程中，实际上拉康是想说话语、言说和拼音的书写是不够的。需要另外一种新的书写，这时他引进了拓扑学，但是在引进拓扑学之前，他使用的非拼音的书写的东西是汉字。在斯特拉斯堡工作的精神分析家盖伊·弗莱彻（Guy Flecher），专门做了个研究，他发现拉康在最后一次写了中文之后才开始画拓扑学的东西。

那么，正是在这里，拉康第一次谈到了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的概念。拉康这时已经考虑到主体间性的概念，如果把两个主体都考虑成个人的话就是一个哲学的辞说，而不是一个精神分析的辞说，这时拉康已经开始思考他后来提出的四大辞说的问题。这时梅洛-庞蒂把主体看成控制着他的言说的主体。拉康考虑到如果这样去处理辞说和主体的关系那就是哲学的概念，但是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双重登录的概念引导出的主体和辞说的关系正好是相反的，是辞说控制着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最早谈论梅洛-庞蒂是在罗马的报告中，在《在精神分析中话语和语言的功能与领域》中他引用了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但没有陈述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面，即辞说控制主体的一面。拉康认为由此就给精神分析领域中间带来了一个混乱，拉康就在1970年的这个讨论班中公开向大家道歉，因为他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陈述而引起了混乱，为此向所有的人道歉。实际上拉康在“在精神分析中话语和语言的功能与领域”这篇文章中已经开始意识到哲学讨论的问题，包括梅洛-庞蒂的主体间性的问题。因为哲学家们讨论更多的是思想，当拉康把言说和语言

引入了精神分析领域中间时，就替代了哲学的关于思想的讨论。思想的讨论实际上是内容的讨论，而语言和言说的讨论是结构的讨论，在这里他引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后来他把主体间性的两个主体都变成了能指，主体就在两个能指中间。拉康就有了著名的一句话：一个能指为另外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他强调结构的概念而不是内容的概念，强调语言和言说的概念而不是思想的概念。



在这样一个图示中，我们能看到拉康和西方哲学的基本区分。正是通过这个，拉康构造他自己命名为精神分析的辞说的东西，和哲学的辞说（我们翻译成主仆的辞说）进行了一个根本性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主仆的辞说中间（当然这是拉康的命名，西方哲学家并不认为他们的辞说是主仆的辞说），主体等于个人，在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的是思想，中介是思想。拉康通过能指来替换主体，主体就落在了两个能指之间，成了一个中介，这时我们就能看到拉康说被切分的主体的意义，主体是被能指所切分的。当拉康说，这涉及到的辞说不是我的辞说时，他想说的是，他在讲的时候所讲的并不是他的辞说，而是他在讲的过程中被一个辞说所决定，被一个具有语言结构的东西所决定，就是被一个他命名为精神分析的辞说所决定。当他作为一个分析家在分析室里面工作、倾听他的分析者的言说时他是一个分析家。但他在演讲时，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分析者在说。这样一个辞说不是哲学家、教授的辞说，而是像所有的分析者一样，分析者在讲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被一个称为精神分析的辞说的东西所决定的。这样一个拉康的立场也是我在这个地方具有的立场。

去年十一月份的演讲中我也说,在我讲的时候因为霍大同在听我说,所以我是分析者,霍大同是分析家。而霍大同在翻译的时候又是分析者,你们所有人就是霍大同的分析家。这是在拉康的意义上说的。当我在讲时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千差万别的想法,这样对通过考试是没用的。显然如果你要通过大学的考试,你写的东西,教授看完后会说:“你怎么写成这样?去改了。”因为这样不符合大学里的教育,大学的教育要求传递一个确定的、统一的、唯一的思想,尤其是自然科学。大学的这一情况正反映了精神分析在大学中讲授所遇到的基本困难。在法国有大学讲授精神分析,同时也有精神分析协会。相对来说在精神分析协会中就可以各说各的,尽管也带着大学的辞说的倾向。但是至少精神分析协会是独立于大学的。而在这里在我看来还没有完全形成相互独立的部分。这是一个困境,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正是拉康这样的一个思考,最后使他形成了四大辞说的概念:主仆的辞说(哲学的辞说)、大学的辞说,精神分析的辞说,癔症的辞说。弗洛伊德的发现是从癔症开始的,代表着没有癔症的辞说就没有精神分析的辞说。癔症的辞说代表了整个临床、症状学的领域。在这个地方,只有真正在治疗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家才成为精神分析家。拉康没有回避精神分析家的辞说和癔症的辞说的困境。他仍然也触及到了基本的困境,基本的问题。

在此期间拉康曾是一本杂志的主编,杂志的拉丁名字的意思是《你能够知道》(*Scilicet*)。我们从杂志的拉丁名称可以看到他仍然强调知道的问题,或者知识的问题。而大学是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仍然得到拉康的尊重。精神分析杂志说,你能够知道、能够接受一些知识,也意味着知识的传授。我们可以看到拉康对大学传授知识的尊重。这个杂志和其它杂志在形式上有个显著的区别,它的所有文章都没有署名,而是在封底上列了个名单,将文章和作者分开了。为什么这个杂志要这么做呢?拉康在第一章给了个解释:在最后一页上列出作者,可以说某个文章可能是某个特定作者的,也可以用其他人替换。因为任何一个辞说都

没有一个作者，如果有一个辞说有一个作者的话那么这个辞说就是假装的辞说。实际上现实中所有的辞说都有个作者，拉康用条件式说也许存在一个辞说是没有作者的。而所有的有作者的辞说，它们都是假装的辞说，也许有个辞说因为没有作者才是真正的辞说。这个杂志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它在精神分析协会中间引起了很多问题，在它以后也没有哪个杂志用这种模式。拉康说我们这样办杂志是一种赌注，希望三、五年以后所有的杂志都像我们这个杂志一样。但是没有一个杂志效仿，赌注赌输了。因为我、霍大同和许多同事都希望写本书，把名字署上去，可以挣很多钱。

这种想法是很人性的。这样一种人性的欲望也是拉康本人没有逃脱的，据说拉康死前最后一句话是 *je me suis fait des ronds*，这是不是拉康说的我们并不知道，大家都这么传说。这话在法文中是：我给自己造了很多圆（*ronds*），隐喻就是说我挣了很多钱，就像中国的铜板。这里有个双关，因为拉康的莫比乌斯带，以及他在拓扑学中也画了很多圆圈。双关的意思就是，一方面他挣了很多钱，另一方面他做了很多拓扑学的工作。也可以这样理解，拉康也没能逃脱这样一种世俗的欲望，即写点东西、做点分析，来挣点钱。

正是因为涉及到的是每个人的欲望的问题，拉康就讨论了知识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他把知识和真理对立起来。在大学也传授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数学的知识、物理学的知识、语言学的知识。但是它是否是传递真理，对此拉康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坚持认为真理性的东西始终都是个体性的，都是独特的，而不可能在集体性的大学中传授。我通过对很多汉学家的阅读，发现汉学家普遍都认为知识和真理之间的这样一种对立在中国是没有那么被强调的。在中国到底是什么情况？这需要你们中国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知识的传授和真理性的对立，关于这个拉康说了很有名的一句话：真理仅仅只是半说。拉康认为真理性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说出来的，不是说某个人有个真理他只说了一半，剩下的保留起来，而是说语言不允许我们把所有的东西说出来。这样一种情况，在物理学、数学、所有的科学中都表现得非常清楚。一个物理学教授在

讲授课程的时候当然说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对的。同时一个好教授也希望把所有他知道的都传授给他的学生。但是物理学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教授今天讲的东西，今天认为是对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被新的科学的发展所推翻。最典型的就是 19 世纪的力学到 20 世纪的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实际上是对 19 世纪的力学提出了质疑。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和真理之间的这样一种对立，被认为是真理的现在的知识，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有可能受到质疑而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真理。这个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糟糕的记忆，在小学的时候，上课时要去解手就要举手，我就举手要求出去解手，我真的是很想去，结果老师没同意，我就拉在裤子里了，这个就是真理。

作为一个结论，拉康在引用孟子的时候，首先因此在《孟子》这本书中间，经常有“孟子曰”或是“曰”，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我故曰”，显然“我故曰”是孟子说或是孟子的某个弟子说，但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如果把“我”翻译成他、孟子或是某个人就错了。在读到“我故曰”的时候实际上是我自己——阅读者本人在说，这样子的一个阅读才是精神分析的阅读。就是我自己说孟子对于告子的这样一个批评，这个批评是说告子将某个东西放在外部是错的，实际上它是内部的。拉康的理解是，告子对内有个明确的区分，但是孟子本人强调内和外的一种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说，莫比乌斯带、拓扑学就已经在《孟子》这本书上讨论过了，弗洛伊德的双重登录的思想也在《孟子》这本书上讨论了。同时拉康读到在《孟子》中间的“言”的时候，发现有不同的翻译，有时翻译成言，有时译成辞，有时译成辞说，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翻译“言”的意思。拉康说有一个辞说可能不是假装的辞说，就是说所有的辞说都是假装的，但是我们假设可能有一个不是假装的。semblant 在字典中间有点“好像”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拉康的 semblant 的概念，我就建议用“儀”来表达，古文中的“儀”实际上是很准确的。这个“儀”就是装出一副仪表堂堂的样子，本来这个人不是仪表堂堂的，这个“儀”有这个意思，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儀”能够准确地表达拉

康的 *semblant* 的意思。为什么在这里讨论这个“儀”呢？因为我们十一月份讨论了氣和義，正是在对《孟子》当中的氣和義讨论中，拉康提出了一个问题：氣和義究竟是什么关系？拉康的思路是，氣和義是两个能指，主体在它们中间。義和“儀”是连在一起的。相对于简写的义，繁体的義中有个我。有个“義”的辞说，对我来说比用“好像”翻译更好，但是现在的汉语又没有这个说法。现在的中文很难翻译，但是从翻译 *semblant*（儀）的角度来说，这样更准确。

讨 论

问：义是否对应想象界的东西，气对应符号界的东西？

吉：气对应符号界、义对应想象界这个事情，因为我不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所以无法回答。对我来说气等于一个能指，义也是一个能指，变成能指之后，那么在拉康的拓扑学的构造：符号、想象、实在中的能指在哪里就是一个问题，能指和符号、想象、实在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拉康在引入拓扑学的书写来表达他的理论之前用中国的文字来书写。在他引入拓扑学的模型时能指究竟在哪，也是不清楚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大家讨论的。当时拉康说，中文允许能指概念的扩张，就是说中国的语言能让他的能指的概念扩张到一个很大的范围中间。

那么实际上在刚才回答能指和三界的拓扑学理论的关系时，对我来说（是听到了）你们中国人在听到实在、符号、想象、能指时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东西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对精神分析的基础提出一个质疑。这样一个对精神分析的质疑在西方，同样在法国也不断地在进行。那么在精神分析引入中国以后也要进行，也许中国的语言能够提供对精神分析的基础的新的探讨。这是因为你的问题而想到的。

在西方实在、符号、想象的概念都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实在”的概念本身是被拉康重新定义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拉康的独特概念。

“实在”被翻译成不可能，所谓不可能就是说（dire）的不可能，dire 在中

文中可以翻译成道、曰、说、讲，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指的是语言的限制、语言的极限，极限另一边的东西，不是极限以内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在拉康“实在”的概念中所包含的某些内容、实在的某些部分在中国却是很在场的、很显在的。西方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不在场的东西，在中文中间是在场的。拉康有个句子，说的是“我讲真理但是它仅仅只能够半说（或是半曰、半道）”。这里有个区分，强调的是 parler（讲）和 dire（“道”、“曰”、“说”）的区分。法语中有这种说法：你讲了很多话但实际上什么都没说。dire 类似“道”、“曰”、“说”，parler 类似“讲”。

问：先生说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主体存在于能指之间，还说主体被能指所切分，能不能就这点再说一些，怎么理解？

吉：只能简单地说，因为这个事情太困难，拉康的能指概念来自索绪尔，但是与索绪尔的观点不同。索绪尔有一个能指、一个所指，由此有一个意义。拉康在讨论能指时讨论的是一个独立的、纯粹的能指，那么马上遇到在西方的逻辑学中的同一律： $A=A$ ，一个东西等于它自身。但是这样一个概念在现在的逻辑学中间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重言式，也就是说它什么都没说，它不带任何经验。如果 $A=B$ ，这时就是一个经验的陈述。如果 $A=A$ ，就是一个纯粹的重言式，因为它什么都没说。借助这样一个讨论，那么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能指就是一个空的能指，它什么都没代表。在这个基础上拉康补充：能指自身与自身相区分。因为能指本身存在着两个功能。一个是能指本身的存在起了一个对意义进行区分的功能。这样一个观点来自于雅各布森在讨论语音学、音位学的过程中间提出的区分性功能的概念：某一个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总是和另外一个东西相区分的，某一个音位存在是和另外一个音位相区分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同时它又有个代表性的功能，它代表某个东西。能指至少具有这样一种区分。一个是它自身存在具有的一种区分性功能，另外一个它的代表性功能。正是这样拉康才说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说的正好是两个，一个能指和另外一个能指之间有区分性的功能，

同时正是因为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那么这个主体本身也是区分性的。这个区分性的特征使拉康提出了无意识主体的概念，以区分哲学上谈的主体的概念，拉康说哲学上所谈的实际上是意识的主体、思维的主体，与无意识的主体之间是不一样的，这里就有了主体切分的问题。

第二讲 男人和女人*

吉：为了和昨天的讨论联系在一起，我想引用拉康的两段语录。第一段大概的意思是：能指仅仅是很小的东西，在结构主义之后人们才熟悉它。人们相信大彼者是作为一个大彼者和能指的这个杠而存在。第二段语录：很显然这个东西来自于天上，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能看到，拉康探讨了天的概念，在西方的框架中间也有天，这时上帝是在天上。但这个讨论班是拉康的中文的讨论班，所以这个天不是西方的天而是中国的天。

在拉康之前，能指的概念如同野生老虎，人们对它很陌生也很害怕。在拉康学院里，拉康把野生老虎变成很可爱的家猫，使人们都能接触它、喜欢它。在拉康把野生老虎变成家猫的努力中，拉康同时引用了很多文字、书来谈论，他引用了希伯来文、埃及文、腓尼基文，同时也引用了中文，他显示了精神分析需要重新追溯到文字建立之初的时代，也就是文明建立之初的时代，才能够理解精神分析的基础。一方面，他参考了文化、文明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也参考了自然，自然实际上是孟子的自然。可以说，之所以参考孟子的自然的概念，是因为拉康认为自然在讲，同时有很多的能指，充满着能指。拉康认为只有带着这样的概念去读《孟子》才能理解孟子。他说在自然中起着语言的作用的东西是文字。

来的时候我送给霍大同一本书，对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也是有用的，书的题目叫《阅读的神经元》。这本书的作者在书中说，我们大脑中用于阅读的区域和动物的脑区是一样的。动物的脑区也能识别自然中间的

* 时间：2008年2月29日上午。

区分性的特征。这样一些自然中间的区分性的特征类似于一些符号，使动物意识到它所看到的東西要么是它可以吃的，要么它被这个东西吃。人在阅读过程中也是阅读到一些区分性的特征，只是他在阅读到这些区分性的特征之后做了另外的东西。拉康说每个人都知道 ∇ 是颠倒了的公牛的脑袋。为了显示这样一个颠倒的公牛的头，拉康就不得不用大写的 A 来表示颠倒的公牛的头。因为在古代公牛就写成这个样子，后来人们把它颠倒过来才变成 A，如果写成 a，整个形象就消失了。这个 a 是更接近“a”的发音，这意味着拼音化的、声音性的书写让区分性的特征消失了。正是因为拉康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他就使用了符号 ∇ ，以便使分析家意识到能指比可爱的家猫复杂得多。同时他也利用希伯来的文字来写自己的名字，他的目的是要显示还存在一些区分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动物中间就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区分性的特征实际上和中文中间的笔画是一致的。笔画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起的作用是构成一种区分。

现在我们到了第二章，题目是“男人和女人”，拉康构成了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精神分析的概念。第二次讨论班刚开始时拉康在找这些纸，它们记录了第一次讨论班讲的东西。这些纸不是他自己写的，习惯上是他讲的时候下面有人记录，在第二次讲之前秘书要把记录拿给他。但是这次没给他记录，没做记录，他就急了。所以第二次讨论班是他根据自己脑袋里想到的东西讲，因此他说他在讲的时候不是分析家而是分析者。假如说一人仅凭脑袋中的记忆讲，像个分析者在讲的时候，他的法文就是很糟糕的法文，而且讲的主题也是东一下、西一下，经常还有一些犹豫，要在脑袋中寻找一些合适的词，完全和分析者在分析室讲的情况是类似的。而教授讲课要准备好他的教材，那时他的法文就是很好的法文。如果做一个比较，稍微懂音乐的就明白，古典音乐和爵士乐的演奏有个很大的差别。古典音乐是有乐谱的，要严格按照乐谱来演奏。爵士乐相反，它是根据感觉、即兴发挥来演奏。这种差别类似即兴发言和教授准备好再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这就类似于中国的情况，一般说来人们总说我沿着一条路走，庄子说（记不清他怎么比喻的）我走的时候路才出来。

因此拉康的概念，辞说、假装这样一些概念都是一些边走边构造的概念。昨天翻译成“儀”的 *semblant*（假装）也是拉康边走边想边构造的概念，这个 *semblant* 就等于真理的一个原始功能，而对照的是拉康的话：我在讲真理，真理只能半说。（讨论如何翻译这句话：*moi, la vérité je parle, mais elle ne peut que se mi-dire.* 霍大同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是自我在讲，拉康想说的是实际上不是自我在讲，是主体在讲，主体让自我在讲。这个只能直译成“自我真理我讲，它仅仅能够得以半说”。）大家就看得到的，在精神分析中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精神分析不是可爱的家猫，我们不能去回避那些困难。这样一个句子是拉康即兴说出来的，这样一个即兴的句子对法国人也很困难，尤其是中国没有自我和我的区分可能就更加困难。这个让我想起弗洛伊德的说法，他曾经说正常人就是半神经症、半精神病的混合，虽然所有的人都愿意仅仅成为神经症尤其是强迫症，把什么都弄得清清楚楚，但实际上正常人都是半神经症半精神病的。拉康继续说，精神分析实际上是“二人谵妄”。

拉康说，也许存在一个不是假装的辞说，他又说假装和辞说是相互决定的。我们能看到拉康是怎样构造他的道路的。拉康继续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仅有一个地方是共同的，就是症状。借用拉康说的精神分析是二人谵妄，就可以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也是一种二人谵妄。拉康认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允许离开谵妄的是症状，而马克思讨论的症状是允许资本主义产生的东西。在医学的意义上症状是对某个人而言的某个东西的符号，也就是对医生而言的疾病。医学的疾病最大的特征是症状本身有个语言的缺位，疾病是不讲的、没有语言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症状，因为分析者在讲，症状就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着主体的能指。这个能指应该扩充理解为所有这样一些区分性的特征，文字的这样一些东西。正因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这样一种类似，拉康参照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提出了剩余享乐的概念。剩余享乐首先是性的享乐，拉康在这个文本中说他第一次开始讲性欲的问题。（霍：让我有点吃惊，我问吉布尔先生真的是第一次？吉布尔先生说至少是第一次

在讨论班上讲，拉康他自己说我现在第一次开始讲性欲的问题。我没查资料，也许他认为是第一次很严肃、正式地讲性欲的问题。)当然享乐不仅仅是性的享乐，还有比性的享乐更复杂的概念。关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导致的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也许大家都有兴趣，因为在中国的课堂上仍然在讲授马克思。

拉康接下来说，弗洛伊德讲的都是语言的问题，在其后是性欲的问题。一般人或精神分析界认为精神分析引起了所谓性欲的自由。拉康认为这是一个最错误的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弗洛伊德的发现概括起来是说，孩子构建了一个性欲的理论，不管孩子讲不讲话，孩子都对人们如何生孩子的问题有个想法，实际上这和性自由无关。弗洛伊德认为孩子都是理论家，每个人都构造了关于孩子是从哪里来的理论。拉康接下来说：“我所有的辞说、演讲，讲了那么多到现在为止都没讲‘性欲’这个术语所涉及到的问题。”（霍：就是非常严肃地讲。我们这里遇到一个翻译的问题。拉康在这个地方说，我仍然还没谈论性欲的问题，他就用了 *encore*（还有）一词，吉布尔有个联想，*encore* 后来成了一个讨论班的名字“*Encore*”，“继续”（也译作还有）的讨论班，正是在 *encore* 这样一个标题中拉康才正式讨论了性欲的问题。）关于 *encore*，如果我们用不同的形式来书写就可以写成 *en corps*：在身体上、关于身体的、身体的方面、与身体有关的。每个人都能讲话，但是身体呢？拉康认为弗洛伊德触及到所有的关于生命科学的问题，但是同时他又强调弗洛伊德的整个基本创造和生物学没有关系，他整个关于无意识的揭示和生物学没有关系。正是这样拉康能重新讨论在生物学之外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有个著名的公式：“没有性关系”。假如性关系确实存在，如果我们说有性关系，等于什么都没说，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性关系，等于是给出了性关系的存在。类似于说我们说上帝是好的，这个对上帝来说等于什么都没说，如果我们说上帝不存在，恰恰给了上帝一个存在。拉康这么说是根据弗洛伊德所讨论的“否认”概念。（霍：有几个否认的词汇，法文的、德文的，我们没办法区分，就是否认的意

思。)当时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他的一个分析者对他说:“也许你认为我在讲我的母亲,但是我讲的并不是我的母亲。”弗洛伊德说,正是因为他说他讲的不是他的母亲,恰恰证明他讲的就是他的母亲。通过否认来获得一个确认,否定起了一个划定存在的作用。现在我想起和潘科夫(Pankow)一起工作的一个例子,那时我跟分析者做胶泥,她做了个东西以后说它不是一个孩子,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孩子,我就和她争论起来说它就是一个孩子。在与潘科夫的控制分析过程中我做了这样一个争论。潘科夫就对我说,当她说它不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应该说的确如此,因为正是在她说它不是孩子的时候就说明有某一个和孩子有关的东西登录了,被确定了。如果这时说的确如此,由此就表明了“是孩子”的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性。

剩下几分钟讲讲石祖的问题,拉康说我们并不是等到石祖阶段以后才来区分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拉康想说的是,男孩和女孩一出生大家就能够根据生殖器官的特征进行判断(中国禁止B超之类的事情)。拉康说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形成与生物学的器官没有关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石祖的概念。在成年的时候,男人和女人的区分是属于命运的。由于一个言在的命运才有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区分。这个言在和动物的存在区分开来,也就是男人和女人是作为言在而存在的,由此区别于生物学上的存在。拉康继续说,男人是相对于女人而言的,女人是相对于男人而言的,他们不是独立的,两者是相互定义的。对一个小伙子来说,要铸成一个男人的样子才可能成为男人[和semblant(儀)联系到一起了],以便使姑娘来相信他是一个男人。相对姑娘而言要装出一个男人的样子,这种情况在动物界中也是如此,雄狮的毛发、孔雀等等。雄性面对雌性时,需要装出一个样子来诱惑雌性,因此拉康说自然界到处都是这种能指。之所以男人装模作样有效是因为女人对这个很敏感,因此才说男人和女人是相互定义的。所有这些都带有目的,最后就达成了性关系。由此就到了享乐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针对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这本著作中所提出的在快乐原则之外所存在的一些重复性的行为,这些重复性的

行为并不是快乐的,恰恰是很痛苦的。弗洛伊德谈的快乐涉及到的是身体,而享乐涉及到的是另外的维度,这是我们以后要讲的。我们可以说快乐在某种程度上是和性器官相关的,而享乐是和石祖相关的。

讨 论

问:讲到很多男人的装,自然界的装,但没有讲到他们为什么装。有个发生学的问题,是个生理上的爱还是心理的爱?

吉:动物装模作样,人也装模作样,但二者有区分,拉康强调人是言在。是不是可以说,动物有很多 *signe* (霍: *signe* 中文翻译成符号, *symbolique* 也翻译成符号。以后还要继续讨论)。我补充说,可不可以说人是语言的装模作样,动物是 *signe* (符号)的假装。[霍大同先生在写 *signe* (符号)时有个笔误,最初写成了 *singe*,是雄猴的意思。霍:如果这样的话翻译成中文就是符号的假装,人们就没办法懂了,因为符号的假装就是语言的假装,这样就让我很难翻译了。]

问:如果人的男女区分是言在,动物诱惑雌性可以回到拉康的想象界。生物学的男女也有连在一起。想象的和生物界的男女区分和符号的男女区分有什么差别。

答:如果要讨论符号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也许我还没能力讨论,只能即兴稍微说一点。在西方就已经很复杂了,在中文中 *signe* (符号)和 *symbolique* (符号)又没有区分就更复杂了,今天我们就不在这上面纠缠了。因为符号在拉康的拓扑学中和想象、实在连在一起,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在法国,三界中间最有问题的是实在,比如说在这个题目中涉及到的“可能不是假装的辞说”这句话中有个“不”的否认,正是这个“不”的否认给了假装一个存在的意义。雄性的动物装模作样地面对雌性,以便获得雌性的同意。动物为了达到性交的目的要做很多很多的行为,人也做这样的事情。人和动物不同的是男人要强奸女人,但是在动物界强奸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也许在强奸这个事实中有个实在的

东西冒出来，在装模作样的行为中有个实在的东西冒出来。符号、想象和实在很复杂，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不要着急。感谢大家的耐心，因为太复杂了。

第三讲 反对语言学家*

吉：我在电视上看到胡锦涛第一个走进大会堂，后面的人才跟着进去。因为我不是胡锦涛所以我（排在）后面开始。（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的共同点就是症状，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拉康那边就提出了剩余享乐。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就是通过我们拥有某种东西而获得享乐。希望你们在你们记忆的某个地方储存这个东西，即拉康做了一个联系，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触及了所有人。拉康的这样一个概念是说，精神分析也是涉及到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希望给分析家讲一些故事的这样一些人。在马克思那儿是经济的法律，所有人都服从经济的法律，这被人们称为资本主义。我就说这一点点，希望你们放在你们的记忆中，或许以后我们会再谈到它。）

关于拉康“男人和女人”这一章的语录，大概意思是：“大家都知道并不是到石祖期大家才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分。在成人的阶段，言在的命运就注定他们是男人或女人。”在“男人和女人”标题下讲男人和女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逃脱的不是精神分析而是命运。男人和女人的真正独特性是他们是言在。另外再引用拉康的一个句子：“对男人来说姑娘是石祖，阉割由此而来。对女人来说小伙子也是石祖，因此姑娘被阉割。正是因此他们被阉割，姑娘们能获得的东西只是阴茎。”我就引用到此，你们能清楚的看到石祖和阴茎之间的差别。在“男人和女人”这一章，拉康开始讲到孟子。他说：“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仅仅是一个拉康派的话，是因为以前我学过中文。我重新再读以前我读过的

* 时间：2008年3月5日上午。

东西时，以为我的耳朵听到的东西和我现在讲的精神分析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说中文）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我发音比较差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牙齿。大概意思是：“如果我们在语言中找不到就求助于心，如果在心中找不到就求助于气。这个孟子的思想和我自己讲的东西一致。”拉康说：“我之所以指出上面的语录，是因为你们说俗语是辞说的东西和俗语是精神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之间有个严格的区分。因此如果你们没有在话语的水平上找到的话就是绝望，你们就不要在心的水平寻找。但告子的说法是相反的。我们现在要知道在哪条道路寻找，为什么去寻找？”我想补充的是，在孟子的时代辞说就已经非常好地表达出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的同事寻求你们的帮助，因为孟子的辞说和拉康的辞说有种非常好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并不是说西方的精神分析家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说了，而是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已经说了涉及到精神分析的很多东西，这也就给了在中国发展精神分析的某种希望。关于精神分析的东西如果没有在话语的水平上找到的话就不要在其它地方寻找，这个观点在孟子那儿就已经有了。

现在开始第三章，题目是“反对语言学家”。拉康开始他的讨论班是在1970年，那时正好有罢工。那个时代他的讨论班举办的地点是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因为有罢工，他开始就说：“我在问自己是不是也要罢工。”这是因为当时他听到一些谣言说高师不准备把会议室租给他了。这是因为高师希望聘请几个语言学家，而这些语言学家无法忍受拉康的言论。问题是当时会议室里有很多人，他们都不希望拉康罢工。因此拉康说：“你们的出席逼着我来做这个讨论班，而你们的在场是我必须要重视的事实。因此这个‘義’气使我决定继续我的讨论班。”“儀”和“義”都有“我”字。拉康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義”是四大基本道德原则之一。因此他就做了反对大学中的语言学家的一个讨论班。他说在这想讲的是事先没准备的，是在听到谣言后想到的东西。也就是要做个演讲来反对语言学家和语音学本身。

他所有这些反对语言学家和语音学的中心意义就是每一个存在都是

言在。语音学家打算把语言看成一个客体、客观科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想把语言当成不讲的客体。拉康说：“如果在我们为了传递而必须说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把它当成不能讲的客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说没有元语言。拉康继续说：“这些语言学家来到高师是要付给他们工资的，像军队一样要由社会组织给他们工资。”拉康想说，人们付钱来发展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是和主仆的辞说联系在一起的。主仆的辞说是资本主义的动力。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实际上让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以便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继续工作的能力，剩余价值都被资本主义拿去了。

必须要记住讨论班是在1970年做的，68年运动之后两年，68年有很多示威游行。也许能让你们想起70年或68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在1968-1970年法国有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毛分子。当时在拉康的讨论班的听众中就有毛分子，所以他讲中国就只讲孟子没讲毛泽东。但那时中国是不能讲孟子的。68年时整个欧洲都有运动，如果我们比较在法国的学生运动和德国的学生运动就会发现很大的差别，法国的学生运动没有导致街头的冲突，德国恰恰相反，德国的一些极端的毛分子就走上街头和政府有武装冲突。有人比较了两个国家，就说法国的毛分子没那么极端，也许就有拉康的教育的影响，使法国的学生没有将反对制度的想法变成暴力的行动。这时他说：“如果你们成为一个科学的对象，你们就如同军队一样由社会支付费用。”他不仅说了军队，也隐喻了恐怖分子。（霍：大概的意思是，因为拉康说如果你们付诸行动，你们就和那些军队一样，你们应该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如果在话语的层面上找不到，在其它地方也找不到。法国的毛主义者就意识到不应该变成行动。）拉康说：“我能够说的就是我知道的，但我知道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我被放置在一个只能够被孟子所定义的地方，如果我知道支撑我的是什么的话，就必须同时说，是孟子在保护我。同时我也要说，我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个“我”就是“義”中的“我”。“我知道我所说的东西是我不能说的东西。所有这些说的东西都没有允许任何一个人来说。

（这是非常复杂的，但却是非常本质性的。）如果我不知道我所说的，是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拉康说：“不是仅仅我一个人说这个话，因为当时法国有个电影演员唱了一首歌《我知道我不知道》。所有的这些原因都在语言中。当你们不知道你们说的东西，那么你们不知道的原因在语言自身中存在。”拉康进一步说：“使我有兴趣的东西是语言。这个东西是我做的，也是我自己在分析室作为分析家所做的。而对于那些语言学家怎么说，我完全没兴趣、不在乎。”他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在那些语言学家想把他赶走的情况下说的。他说，语音学家用隐喻的习惯对语言做研究，把孩子作为一个客体来做语言的研究。

霍：简单来说，拉康说：“所有的知识都是隐喻性的，仅仅通过另外一个东西的媒介才能构成。在我说它的时候，我用雪茄来指示它的时候，这个行动就已经意味着我已经讲过它了。因为我选择这个它（雪茄）来指示我讲过的‘它’，但是我想说的不是雪茄本身而是其它东西。证据就是，当我把它点燃的时候，在它我的水平上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个著名的‘它’——弗洛伊德的它我，可以特别地简约为个人。”拉康的意思是，当我用一个东西（雪茄）指示我想说的东西的时候，在这个行动中这个说的东西已经被说的。但是要想讲我想说的东西，我就必须用另外一个东西来说这个已经被说过的东西。也就是说离开语言什么都不能表达，所有的都在语言之中，没有一个在语言之外的东西。拉康想说这个。

吉：我们总是在说“它”怎么样，为了避免歧义，“它”指的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霍：要在中文中翻译得传神至少需要两三天，我在这稍微说下。拉康的ça有两个意思：它和它我。一个游戏就是把这两个意思混合起来。另一个游戏是用抽雪茄（来做隐喻）。在法国如果你胡说八道，人们就说你这是抽烟的东西。类似我们的“酒话”，法国的胡说八道就是“烟话”。因为他是即兴演讲就用抽雪茄做了个语言的游戏来嘲笑当时的语言学理论。在索绪尔的基础上，他们区分了3个东西——能指（雪茄的声音）、

所指（脑中雪茄的图像）、参考系（外部的客体雪茄）。拉康说这三者中存在矛盾的现象。当我说“它”（影射它我）的时候没问题，当我抽的时候我就没办法说了。也就是参考系和能指、所指是矛盾的。

吉：为了在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的汉字之间的合作，我想说，在拼音文字之中有个双重连接。法国说胡说八道是说烟话。拉康说：“我说的是烟话，但是我说的不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烟话。我真正想抽烟的话我就不说了，所以我说的并不是烟话。”*fumeux*（晦涩的，冒烟的）和 *fameux*（著名的）中 *u* 和 *a* 的差别构成了区分性的特征，这个区分性的东西就是能指，而词就是所指。中国有个言说的过程，还有一种文字的独特性——我不说它是文字而是个图示，以此来表达中国文字的独特性。因为西方的文字书写的是音素，而用图示来表达中国文字的独特性，这也容易让人联想到拉康的拓扑学图示。拉康为了显示在西方的双重连接在中文中是什么情况就，写了个汉字“爲”。刚开始我查到的是“為”，还以为拉康错了，现在查字典发现确实有两种写法。还发现有两个音，二声和四声。拉康选择这个字是因为这个字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动词，第二个是介词。动词是和道家很有名的“无为”有关，在法语中翻译成不行动，“无为”就成了对行动的否定。对行动的否定给了“无为”这个概念以力量。介词在法语中翻译成“如同、好像”的意思，也就是说它用于（词的）结合以便形成隐喻的作用。它涉及某一个东西而形成隐喻。比如说姑娘像花儿一样。拉康说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动词转换为介词在中文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是拉康对于西方人和中国人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当我说西方语言时实际上说的是法语，因为英语是商务语言，是剩余价值的语言。在结束以前，我告诉大家一个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我讲中文不再讲英文，现在我觉得这一天差不多来了。拉康说：“中文是个很不错的东西，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以便我能将能指的概念一般化。”拉康继续说：“尽管我做这个东西让这些不懂中文的语言学家很不舒服。”

涉及到的拉康和语言学家的冲突，让我想起了拉康和法国的一个哲

学家德里达的冲突。拉康强调音素的优先性，德里达强调文字、书写的优先性，这就有个冲突。这和语言学家的冲突不一样，和德里达的冲突意味着双方有很多的交流，拉康和德里达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我想起这个是因为德里达在死之前跟法国的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 Bianco（安科）说很后悔没有学汉语。（安科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研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的意义。他指出毛泽东的红军革命的特色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的革命。这种革命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因为农民革命推翻旧统治都是由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而推翻的，这个模式是有传统的。由此在整个世界汉学界很出名。）安科写了本书，德里达给他作序，因为他们是高师读书的同班同学，关系很好。在高师读书的时候安科就学了汉语，当时德里达就说他很傻。后来在写序的时候说很后悔没有学汉语。我用拉康的这句话作为结束：“我走得很快，因为在这之前我失去了很多时间。有人说太快了，我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我以我的节奏做爱。”实际上他在此玩了个游戏，讲男人和女人在性关系中的差别。后来就有《继续》这么个讨论班。在做爱的过程中总是男人结束得太快，而女人说继续。

讨 论

问：吉布尔先生在开始时引用了《孟子》中的一句话：在语言中找不到就问心，心中找不到就问气，气中找不到就问义。这不是和后面说的拉康与孟子一致相矛盾吗？

霍：那个是《孟子》中引用告子的话，孟子不同意这个说法，孟子是要在语言中寻找，这个对应拉康的说法，大概是这个意思。

问：拉康关于 68 运动说不要行动，是不是他要走一条他从分析中得来的经验，通过语言来变革社会，他是不是走的这条途径？

吉：因为我不在拉康的脑袋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让我想到了鲁迅，他本打算学医来救国，他在日本看到了一部影片，那上面的

中国人都很麻木，他认为医学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希望通过文学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从事文学的时候他写了《故事新编》、《女娲的故事》等等。他是通过日本了解了弗洛伊德，来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又放弃了文学，认为文学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武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从弗洛伊德转到了马克思主义。68年运动的时候有些人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实际上武力解决问题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专制国家，比如说纳粹德国和军政府时期的阿根廷，分析家的工作是很困难的。怎样解决专制制度？使用恐怖主义的方法去解决还是用讨论来解决？用讨论来解决问题是个很理想的解决方式，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恐怖主义也要区分，有些人杀人仅仅是为了快乐，有些人杀人是为了革命。

我遇到一个阿根廷的分析家。当时他在军政府的时代做分析，在分析室接待了反军政府的小组织的成员（这些人被军政府称为恐怖分子）。从这个成员那里知道，这些成员的小组（4、5个人一个小组）与小组之间都没有交流，避免被军政府破坏。分析者在分析室里说，如果某个小组的成员有个口误，说出了秘密，那么其他人就有可能都被抓住、枪毙。如果成员有个口误，那么其他人就会把他杀了。可以看到，口误在精神分析中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而反军政府的小组成员考虑的是安全，不得不把犯错误的人杀掉。

拉康和很多分析家、和我一样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就像拉康在讨论班的开头说：“我也想罢工，因为你们都来了所以我才讲。孟子说的义气支持我讲，如果你们不来，这个讨论班就结束了。”由此可以看到拉康这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当时在军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只有少数的分析家还在坚持，大部分都去了欧洲。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有很多分析家都到美国去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不是很乐观的。孟子说，有个君主的声音，另外还有个人民的声音。对孟子来说，人民的声音应该优先于君主的声音。拉康也讲到存在着君主的声音和老百姓的呼声，老百姓可以通过革命来反对主仆的辞说，但是革命以后这些革命者仍然处在主仆辞说的水平上，就不断地革命、不断地替代。因此拉康说，精神分析家听到的是个体的

声音，不是群体的声音。有次离开成都时，我向霍大同提了个问题，我不记得问题是什么。我只记得回答是：“我仅仅做我的工作。”也就是坚持在某个地方。我想起了中国的成语：答非所问。答非所答。

第四讲 反对语言学家（续）*

霍：我们今天就开始，大家欢迎吉布尔先生。

吉：昨天我有两三个问题，可能是四个问题，但是我没准备好。有点像拉康。拉康在讨论班的时候遇见了罢工，我遇到的不是罢工，是昨天和张涛、陶陶打乒乓球。我欠了陶陶的债，很久以前来成都，她邀请我打，我说不，我说我来成都不是来打乒乓球的，这显然不是太客气。因此昨天我们有个约会，我们一起打乒乓球，我跟她比赛，我输了。我当然知道年龄大的要打赢年轻人是有困难的，而且乒乓球也不是法国人的特长，但是我并不是认输的人。后来我跟张涛打的时候又输了。输给男人比输给女人更糟糕。我还没有跟霍大同打网球比赛，也不知道输赢。比赛结束是七点钟，这扰乱了我的作息计划。我回到我房间的时候是七点半，为了吃饭，我需要开水，但是屋子里面却没有，所以我不能吃饭。然后，八点钟的时候天黑了，我开灯，但却短路了，没电。然后我去厕所大便，但厕所却是坏的。因此我本来想工作到深夜，来准备讨论班，但由于没电，我不能继续工作，电视也看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抽烟。我抽烟需要打火机，因为天黑又没电，我于是到处找，但却发现打火机也坏了，不能抽烟了。

在这之前，都是井井有条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突然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因此我无法准备我的讨论班，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部分，需要很多工作。今天来到这里，只有即兴地给大家讲了。接下来的讨论班非常复杂，涉及到法国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涉及法国人跟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 时间：2008年3月6日上午。

我想起了中国的成语“一言难尽”。因为这个复杂关系稍微涉及到拉康，也涉及到我，涉及到中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合作。

关于大便的问题，有时候你们在提问的时候假设我晓得答案，回答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答辩。我们也可以说答非所问，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正是分析家在分析室工作的位置。但是因为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分析家，我仍然给你们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是答非所答的答案。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迎来了一个被称为光明的世界，光明的词在德文中是 aufkfauwg（光明），而 auf 是个前缀，是光明的意思，如果把前缀换成 ab 时候，变成了大便。

Auf Kkfauwg RF _____ 1939/1945

Ab

即光明的世纪变成了大便的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有个光明的世纪，之后便是纳粹的时代，当时他们杀了很多犹太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吉普赛人。有人把这个事件称为世界的肛门期，你们看到，因为昨天的厕所坏了，让我能够即兴表达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时候让我们想起了拉康讲这是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共同之处——症状，对于马克思而言症状是剩余价值，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对于劳动者来说，他们被降低为商品，拼命地工作、出卖劳动力，仅能获得维持劳动力的收入，来继续为资本家工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拉康由此提出了剩余享乐的观点。

为了看懂拉康的剩余享乐之谜，有了中国人与法国人合作的工作。拉康引用了孟子的概念：性，翻译成法文是 nature；而性，从声音的平面有点接近 signe（符号）。而霍大同在上次书写时有个笔误，写成了 singe（雄猴）。我相信在中国神话中猴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神话中的猴子究竟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

Signe 作为符号。拉康专门讨论了符号与能指的区别，符号是某个东

西对于另外一个东西来说构成符号。比如一个动物——老虎，当另外一个动物经过时，这个动物对于老虎便构成符号，它需要判断这是我能吃的或者是能吃我的。而能指，是为主体代表另一个能指，是不一样的。拉康说在动物界，对于动物来说，自然有很多符号，而对人来说自然——“性”翻译成自然——有非常多的能指。自然对人类来说是能指的宝库。他给我们说的这个观点是在孟子中所说的，他给我们说在孟子中，“性在讲”，那么他参考了孟子的一段语录，但是原文没有找到，昨天晚上本来想找的，但是昨天晚上没有找到。

他引用了孟子的语录，孟子说：在动物的性和人的性之间有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拉康说，孟子说这样一个差异是无限的。那么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谜，是我希望获得你们帮助的谜，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阅读孟子，重新读繁体字下的孟子，也就是说性在讲。对于人来说，性在讲，对于动物来说，性显示出了很多符号。拉康继续说，我并不是把孟子作为一个公元前三世纪的人，作为具有原始心态的人来介绍给你们，而是把他作为某一个存在于他所说的地方的人，不是作为在他所书写中存在的人，而是在他所说之中存在的人。那么涉及到的是，他知道一些我们在说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所不知道的东西。他说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维持一个隐喻，而不是像语言学家所构造的那些行不通的东西。

关于和语言学家的斗争，让我想起了上次11月份我来的时候，霍大同给我泄露的秘密。当我们谈到拉康的咿呀言语（概念）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语言学家不行，整个科学界都不行，因为他们处于Melanconic（抑郁）的状态，和传统没有关系，而是照搬西方的一套。语言学研究与中国传统间隔了很大一块。拉康所反对的法国语言学家想把拉康赶出高师，不仅因为他不是老师，而且在他们看来拉康是在胡说八道。拉康却说正是因为我的胡说八道，这些语言学家才真正开始工作，那么你们赶走我当然很好，但是是我让你们开始真正地工作，在有些时候，有那么一两个语言学家说了不是非常没有意思的东西。当他说幸亏有我时，实际上是说幸亏有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阅读，也即实际上幸亏有精神

分析。

Double articulation significant u a
Signifier Fumeux Fameux

所谓真正开始工作，以西方语言为例，它是一个双重连接，上面是能指，是一些本身没有意义的音素，但通过音素的构成便有意义了。那么为了开个玩笑，这个Fumeux是冒烟，弗洛伊德和拉康抽烟，霍大同抽烟，我也抽烟，所有的精神分析家都抽烟。那么Fumeux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烟话的意思，即不晓得在说什么。张涛昨天给我说，他要准备抽烟，好像只要抽烟就可以称为分析家。我说这里只有小伙子抽烟，但是他告诉我很多姑娘也抽烟。因此我有个建议，不抽烟的要抽烟，尤其是要胡说八道，因为这些胡说八道使得语言学家工作，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就是应该去工作。

对于法国的语言学家，他们说双重连接是语言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但是拉康说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懂中文。他说法国的语言学家们，讨论双重连接的语言学家们没有考虑中文的情况，如果他们学了中文就不会这样说了。也许类似于德里达，他构造了一大堆关于书写的理论，但在晚年的时候非常后悔没有读中文。拉康说他们在讨论语言特征时，只考虑西方的拼音文字，没有考虑到中文的情况。拉康因为学了中文，允许他在拼音文字的基础之上来一般化他的能指的概念。

爲 為

拉康一般化能指概念的时候拿了中文的“为”字作例。我先以为是编辑出了问题，晚上我回去，查了这个字典，发现前面是个更早的形式，后者是简体字之前的简化形式，而老的形式最早来源于一个图画的形式，即母猴，是在金文中。

（霍：这个是对的，但是我另外想到一个“为”是一个手牵大象的图像。你们可去查一下。）

那么最后简化成这个，原来是否是母猴，反正我也不认识。从拼音来说，这样一个图形读作 wei，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从声音的角度，类似 u，我们把它处理成一个音素。这样一个声音作为音素，与 u 不一样。u 没有意义，不是一个能指；而 wei 是有意义的，是一个能指。因为“为”有两种读音，因为中国的语言有声调，这实际上把“为”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音素。声调本身没有意义，但起了区分的特征，所以是能指。我们能够看到，同样的音素，有四个声调，有一二三四声。这个二声的“为”，不仅仅代表一个字，而是代表五十个字，那么对于第四声，同样有五十个汉字。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四声的 wei，差不多有两百个字。wei 不能只指示着一个词，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能指，从而构成区分性特征的，同时又没有意义的是声调，也许我们能说，在中文中声调是能指。

西方语言与中国语言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在中国的语言中，声调作为能指是没有被写出来的，而在拼音文字中，音素作为能指，是被写出来的。从而有了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中国的图示性的文字中，能指是未被写出来的，拼音系统是五十年代才引进的。实际上书写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声调。霍大同刚才还在读 xing 的四个声调，不知道是几声，应该是四声，但并不一定是四声（性 xing），大家在写拼音的时候，声调没有充分写出来。那么正是这样，拉康批评语言学家，他们说双重的连接构成语言的基本特征，仅仅是考虑了西方的拼音文字下的语言。拉康举例，这样一个双重的特征在中文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法国的语言学家或者中国的语言学家来研究，双重的特征是语言的特征之一，但不能定义语言的本质。例如有白色的牛，和黑色的牛，但我们不能用黑色或者白色来定义牛。

我们这样的一种胡说八道能够促使语言学家们再来研究语言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在考虑中文的特征后的研究。

吉：我们重新开始。我按照我的节奏讲，有人说拉康结束得太快，但是拉康说这就是我做爱的节奏。正是因为这样，那些来参加他讨论班的人总是说继续、继续，还要、还要。正是这样，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没

有一个性关系。大家都在继续继续，由此拉康做了一个《Encore》的讨论班，来讨论女性享乐的问题。我希望今天以非常慢的速度结束。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这个样子做爱的，但是今天我想慢慢地结束。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准备，今天我到达了一个我不知道在说什么的位置上。我不晓得跟拉康在做爱方面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我晓得我跟他没有做过爱。我试图给你们传递一些关于拉康的教育，但是仍然是我的阅读。如果他活着，我就不能说这么多东西。我实际上想对你们说，在很多地方我不同意（在拉康死后）拉康教育中所说的东西。

（*déictique*，指示性）

昨天的讨论班，我们引用了一个段落，是说语言与物之间的关系。习惯上，当我们在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我们说杯子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指那个东西。当我说的时侯，手会不断地指示这个杯子。就是说语言学起了一个用手指示说话对象的东西。拉康在说这个的时候用了一个，我在说这个雪茄，那么同时，当我说雪茄的时候“雪茄”在语言中，用语言指示物，此时的雪茄不是真正的雪茄，当我把火点燃吸的时候我不说，这时雪茄就是真正的雪茄。

语言、词和物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当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在语言中，人是“言在”时，说的是成人化的人，一个有充分说的能力的人。实际上，孩子出生时，他不能讲话，尽管他处于语言中，他能听到语言，同时他有能力最终成为一个言说的存在，但此时他仍然不能说。在从完全不能说到能说的过程中，当他说不出来的时候，要东西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用手指示的过程。这如同我初到成都，别人问我要什么我只能用手指，同时我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说，也知道它对应某个东西。而这个事情是拉康没考虑的，所以我不完全同意拉康说孩子一出生就是一个言在。当我们说“*être parlant*”是个言在时，实际上是一个被说的言在。需要区分一个主动的说的存在和一个被动的说的存在。孩子在说之前用手指表达他所需要的东西，并没有充分地表达自己说的意愿。这并不意味着有儿童

精神分析家，也不意味有精神病的分析家，不管是那种分析家，都接受这个人，他有姓有名，都是个人，是分析者，没有差别。在第二阶的时候，才区分说他是一个孩子、老人、女人、男人、精神病，或者有做爱结束太快的问题。如果我们说有儿童的精神分析专家，精神病的精神分析专家，实际上是说他有关于儿童的知识，有关于儿童的共同的东西，这样便把儿童的差别抹掉了，只看到一般性的儿童，这不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在接待个体的独特性，这才是精神分析。

当一个孩子走进来的时候，我们接待他，这时他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我们不可能成为某个独特个人的精神分析家，比如我们不能说我是关于张三的精神分析专家，或者李四的精神分析专家。如果我们说有关于个体的特点的知识，就可能抹掉所有人的差别，我们不能获得这样一个知识。所谓专家就是说他拥有一个关于分析者的或者病人的知识，他给出建议，意味着他有这个知识。而根据拉康的观点，精神分析的独特性在于他知道他不知道。

那么言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讲的人，意味着他们晓得什么东西，所以他们讲，属于行动者；另外一部分人被语言讲，被言在，这样的区分是拉康没有解决的。拉康把所有的孩子放在言在的范围中，而没有考虑被语言讲的存在。为了结束被说的存在，我举例霍大同的例子，开他一个玩笑。他把 *signe*（符号）写成 *singe*（雄猴）（猴子），从这个语误可以看到实际上霍大同在被猴子讲，尽管他主观上想写的是符号，但是他写成了猴子。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被语言所讲的存在，这个东西是弗洛伊德的创造，他说所有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是一个孩子，也就都是个被讲的个体，这与道家的“无为”的概念离得很近。这显示了精神分析进入中国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人与法国人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原来基督教传递到中国的方式，他们让中国人接受教义。我们共同的兴趣是孟子和精神分析，因为拉康讲孟子。孟子和孔子一起构成儒家基本的代表，但是对于我来说，孟子也许缺乏女性的、孩子的位置，这个位置也许是在老子那里提出的，至今不知道老子是男性还是女性，但是他

讲了一个女性的位置，这更符合精神分析的立场。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于儒家的研究，拉康没有讲孔子，而是讲孟子，显然对拉康来说，孟子有种吸引力，和精神分析有个很深的联系。

讨 论

问：今天你讲的拉康关于能指的一般化，说到了中国的拼音，四种声调起了一个能指的作用，王，玉，是否这个点也起了一个能指的作用？

答：拉康首先是在语言的平面上讲。这章是讲“书写与真理”，明天我将讲“书写与话语”，这两章要讲的是话语、言说如何促使了文字的诞生。一方面对应于拉康说言说在先，而德里达说文字在先。在拉康的讨论班中，大家都理解了能指的概念，似乎能一起工作，大家因此也满足了。拉康引入能指，使大家有个能指的概念，引进了书写，首先是文字的书写，然后是个拓扑学的书写。至于是不是，这是要你们回答的不是我来回答的。

第六章：一个不能写的功能；第七章：关于文学的声音；文学当然是书写。第八章，男人、女人和逻辑，逻辑也是一个书写，也是一个文字。这就是说从声音转到文字来看言说和文字的关系，究竟如何需要你们的工作。

那么这些笔画和声音是有区分的，声调是指在讲的语言中的区分性特征，而笔画是在书写的语言中的区分性特征。在法语中，在拼音文字中，a 和 u 的声音，在书写的语言和说的语言中是一样的。

问：拉康所有的东西都在语言中，多尔多（Dolto）说“一切都是语言”，吉布尔说他不认同拉康的观点，他认为人一出生不是一个言在，而是一个被言在，理由就是人出生后有个获得说话的能力，但是没有一个是本身说话的能力，正是这个原因，孩子用一些行为来表达他的愿望，也许他想表达，但还不能表达，所以多尔多说了那句话。拉康与多尔多

的话差别有点大……

问：对于多尔多而言，孩子都是主动地在讲。

霍：你的问题是，多尔多与拉康的观点是一样的，是否是这样？

答：实际上，拉康说性在讲，是自然在讲，人的自然的特征，人的自然的特征在讲，类似于多尔多说孩子也在讲。实际上自然并不讲，并不说话，因为人在讲，所以我们说自然也在讲。我们也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只有自然的特征，我们也说他在讲，之所以在讲，是因为大人在讲。大人没有把他当成动物，而是跟他讲，之所以讲，是认为孩子在讲。和性在讲是一样的，因为孩子出生了，只有自然的特性，并不意味着他处于言在的主动者位置上。

我举孤独症的例子，我们仍然认为有被说的和说的特点。现在命名为孤独症，就是孩子不能讲，这构成了精神分析和非精神分析的基本冲突。在黑皮书中，他们认为因为孩子不讲话，所以精神分析家跟他工作是很愚蠢的，因为分析家是跟语言工作，他们是不讲话的存在。我在北京田惠萍那儿被认为是个孤独症的专家，我发现那里 80% 的孩子都是神经症，而不是孤独症。我首先问孩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如果他能说他的名字，那么他处于语言中，是一个言在，而不是非言在。如果把孩子处理成非言在，那么就当他当成了动物。这一点我非常生气，把孤独症当成动物来对待。我说这话并不是针对北京，而是对法国的医学专家说的。

问：中国儒家传统，总是上辈对下辈付出的多，弗洛伊德说每个人都是孩子，在这个意义上，谁来照顾这些孩子呢？

霍：你的意思是内心的孩子与实际的孩子有什么差别？

吉：弗洛伊德的发现是在临床中的发现，癔症患者来到分析室，他听他们讲话，在讲话中童年期的问题会被回忆起，总是与他们的父母连在一起的。弗洛伊德发现在成人中始终有个孩子。至于社会的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并没有回答。有个母亲问弗洛伊德，我怎样才能照顾好我的孩子？弗洛伊德说“你做你能够做的、想做的事情，但是仍会出问题，你的孩子长大后仍会指责你”。

第五讲 天下之言性也*

（吉布尔先生在黑板上写下：“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

霍：我们现在就开始，欢迎吉布尔先生。

吉：我昨天回到旅馆，因为工作仍发生了点事。我7点到8点吃饭、看电视，然后开始工作。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四川大学的新闻节目，我以为会有我的讨论班，但是看了半天却没看到，我很失望。

我们这个讨论班持续一个月，但仍然构不成四川大学的新。当然，我不晓得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否是一个事件，但对于我来说肯定是个事件，是因为我在继续做我的精神分析。那么因此，就跟前天我因为打乒乓球输了很失望一样，昨天我也很失望，因为我没有被电视提及，所以我没有工作。结果我因此看了一个讲英文的美国电影，我发现实际上我不懂英语，恰恰相反，借助于中文字母，我才看懂了这部电影。因此对于我来说，相对容易地用中文写了孟子说的话。

我昨天讲，拉康说，孟子说自然在讲，即性在讲，同时我也说我没找到这句话的出处。昨天后来我发现我弄错了，实际上出处就在书上，书上有这个语录。拉康当时在讨论班的时候，自己在黑板上写汉字。那么我就引用拉康说的，这一部分从法语角度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也就是说对霍大同来说翻译起来不是很困难。

如同昨天我们在黑板上显示出来的，天是天，天下指所有在天之下的东西；第二个是，“之”，是一个限制词。涉及到的是某个东西在天之下，那么也就是说天之下是什么呢？在“之”后面的东西，是天之下

* 时间：2008年3月7日上午。

的，这就是一个区分性的话。在这个下面，不仅仅是“言说”。我以前说，拉康将“言”翻译成法语“mot”，“parole”，“discourse”（辞说），他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背景翻译，他把孟子中的“言”用三个不同的法语词来翻译。这个地方是“言性”，拉康强调，“性”在法文中有若干个意思，最为基本的意思是“自然”，类似“本质”的意思。“也”是一个结束句子的虚词。正是根据这个，拉康说将“言”与“性”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是自然，即本性在讲。我还注意到，拉康翻译“言”的第四个术语：语言。拉康说，“言”仅仅是语言，不是其它东西。同时在中文的上下文背景中，“言”仍然可以被使用为动词。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是言说，即讲话。那么第五个翻译就是“言说”，说的动作，但是讲的是什么呢？那么根据孟子的句子，讲的是性、本质、自然。

言：language, parole, mot, discours, parler

当说他在讲性，这意味着性也在讲。当我们说他在讲性、自然，那么这个是从一个主动的角度来说的，即我们在讲性，另外也可以说性在讲我们，我们被性所讲，这是在被动的意义上讲。拉康继续说，一方面这个句子有不同的断句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翻译成 parole 的话，这个时候汉语中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字（我估计是话）。这涉及到的是精确化，使这个意义精确化。这是古汉语的情况，如果在现代汉语中，我为了让这个意思更确切，此时我们需要在言之后加一个字，更确切化，例如 Language：“语”言，parole：言“说”，mot：词语，字词，discours：辞说；加一个东西以便使它的意义更确定、更具体。而在孟子的时代，我们有更多的自由给“言”以好几个意思。而在孟子的言中，我们可以说至少有两个意思：语言和言说，这样的歧义性是他写作中的最基本的特征。在我自己书写的东西中间，歧义性也是最为基本的。那么，在这个天之下的世界中，是语言构成了这个自然，这个性。当他说它构成了自然，说的是它构成了言在。总之，在孟子中的这样一个性，这样的自然不是任何一个自然，涉及到的是言在的自然，或者言在的性。在“言”

和“性”之间，拉康发现了所谓言在的人类的基本特征。那么在孟子所说的性、自然和另外的动物的性之间存在着差别，孟子说在人性和动物性之间，有个无限的差异，无法定义的差异。但是拉康没有给出一个出处，所以说现在还未查到。

则故而已矣也故者^①（吉布尔板书）

故 则（板书）

拉康在讨论中写了“则故而已矣也故者”，接着写了“故”，“则”，但在写拼音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ze（故），则（ku）。现在我们不知道是米勒的错误，还是编辑的错误。

△（板书）

（吉布尔说不认识这个词，并请教大家。霍老师说知道有这个字，但是不记得发音了，下来查一下徐中舒的《汉语大字典》，再给吉布尔解释。）

现在有一个趋势，都在说拉康什么地方弄错了，比如朱利安等一些汉学家批评拉康弄错了，这类似于儿子经常说我的父亲错了，是对父亲的批评和反对。我的情况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拉康写“为”的时候，他写的是最早期的形式“爲”，而不是中期的形式“為”，我就以为是拉康弄错了，结果后来发现是我弄错了。在这个地方，我又以为是拉康弄错了，实际上拉康是对的。

另外一个故事，因为拉康的兄弟是个神父，所以拉康讲了很多天主教的事情，而有一个耶稣会的教师认为拉康错了，花了15年的时间找证据，结果20年以后说“我花了15年的时间来寻找拉康的错误，后来发现我错了，拉康没错”。在50年代，拉康跟有名的汉学家戴密微学习汉语，

^① 原文：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孟子·离娄下》，此句素来被学者认作理解孟子核心思想最为重要又最困惑之处，主要在于其中“做”的意思与由此对“性”的定义和理解上，古今多家各执一词。——编者注

在这个时候，他跟程抱一每周一起工作。拉康没有弄错，但他欺骗女人。（霍老师问为何？）因为我知道。

当他说以他的方法做爱的时候，实际上不仅仅是与他的妻子做爱。因为我们讲的是性欲的这样一种转换，和性享乐及快乐原则相关，这我们昨天已提到。那么至少我们没有花 15 年的时间证明拉康没有弄错，我们只用五分钟，但是不管怎样，这里的确有个错误，我们不知道是拉康弄错了，还是米勒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弄错了，还是编辑弄错了。但是这个错误总是让人觉得有意思。当霍大同把“符号”（*signe*）写成猴子（*singe*）时，尤其有意思，他让我们回到最早的中国神话学的领域中猴子所起的作用。

我故曰^①（板书）

为何有意思，因为涉及到“我故曰”的“故”，翻译成法语“*c'est pourquoi ?*”，而这个法文翻译成希伯来语是：*Ncl*。那么希伯来语与古汉语的阅读一样，从右到左，如果换成我们现在阅读的方向，就是这样：*Lcn*。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式写，然后，中间再加上元音，那么在这三个辅音字母上加上具有区分性特征的元音 [ei] 后，就成了这个：*LaCaN*。因为希伯来语只写辅音，阅读的时候需要读者填写元音，那么这个元音就起了一个区分性的特征。类似昨天我们翻译抽烟（*fumeux*）和有名（*fameux*），区别在于你加什么，在抽烟（*fumeux*）中加 *u*，在有名（*fameux*）中加 *a*，类似于自己加元音，加了元音之后意思就不一样。在精神分析的基本问题的讨论班中，拉康用希伯来文写了他的姓和名，当他用希伯来文写出自己的姓和名的时候，只有辅音，没有元音，这个时候他把它翻译成法文是 *et pourtant*（然而）。

那么根据翻译成法文的 *et pourtant*，拉康的姓名在法文中实际上等于 *c'est pour quoi*（这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拉康在中文的“故”之中，

① 《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章，公孙丑与孟子辩论。——编者注

我故曰

Moi/ je la dit

通过希伯来语的转化，就是说 Jacques Lacan 在中文中等于“故”，因此翻译成中文，自我、我（拉康）说，我故曰就成了这个了。

但是，拉康说，希伯来语的拉康姓名翻译成法语是 *et pourtant*（然而），这实际上是个错误，为何？本来准确翻译是 *c'est pour quoi*？（这是为什么），实际上拉康在这里做了个文字游戏。

与参加过 11 月讨论班的人曾谈到了“我故曰”，这个表达不仅仅在孟子中是唯一一次，而且在中国所有的古籍中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孟子中是唯一的一次，是我说的，是在查了孟子以后说的；在整个古籍中是唯一的一次，是你们中国人说的，谷建岭、居飞等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在所有的文献中查找，他们发现在所有的古籍中，说“我故曰”是第一次。

那么“故”，在古代汉语中，构成句式，前面说了什么，故是什么什么，前面有个称述，通过“故”做个转折，后面跟一个陈述。在孟子中的意思是，前面说了什么，而故以后，孟子又说了什么。也就是说告子说的东西是不对的。

……故……

... *c'est pour quoi* ...（板书）

孟子在前面做了论证，由此他说：所以我说告子说的是不对的，是错的。因此翻译成 *c'est pour quoi*（这是为什么），对于“故”来说，是个很好的翻译。对于中国人来说，涉及到的是要知道为何告子说的东西没对。前面引述了告子说“如果言中没有，在心中寻找……”，而孟子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与告子的冲突，两个人的态度的不同，这需要你们的工作，去了解为何有这个冲突，究竟谁有道理，需要你们中国人的工作。

Et pure si move（意大利文：等动吧）

为何拉康当时将他的姓名翻译成 *et pourtant*（然而），没有翻译成 *c'est pour quoi*（这是为什么）是因为 *et pour tant* 在法文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来自于意大利语“*et pure si move*”（等动吧）。为何重要？原来人们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地球不转，这时候来了一个意大利人伽利略，他说，“*et pure si move*（等动吧）？”就是说 *et pour tant*，即：但是它在动，即地球在转。伽利略完全颠覆了原来的关于宇宙的概念。伽利略当时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地球它是在转的。虽然伽利略没有被宣判死刑，但是他说这个的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此当拉康用“*et pout tant*”来翻译“故”的时候，实际上使用了伽利略当时所说的句子，它颠覆了原来的宇宙概念。那么因此我做个假设，拉康处在类似于伽利略的位置，在这之前有个 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拉康因此说：是的，有弗洛伊德，还有哥白尼，有一个弗洛伊德的革命，但是我是伽利略。的确是有弗洛伊德的革命，但是还有一个拉康，他说的东西也许更重要，他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伽利略式的革命。如果将他的名字 *et pour tant*（但是它在动）翻译成 *c'est pour quoi*（这是为什么）的话，也许有一个更微妙的理解，因为弗洛伊德进行了这样一个革命，所以我拉康可以这样说。在书中出现的这个小错误（拼音），显然是个很小的错误，但是这个小小的笔误使我们意识到这个“故”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那么还有半个小时，我再讲一点，以便请求你们积极的合作，而不是消极的合作，仅仅是在半醒地听的状态。积极的合作涉及到赵旻提的问题，即：如何翻译 *et pourtant*（然而）。我们找到几个小小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否已经确定了这个翻译，和赵旻谈话后，我找到了另外的翻译：“纵然”是我找到的；在之前，我们找到了一个中文“退一步说”；另外一个“却”。那么有一个东西很重要，不管是“退一步说”还是“却”，都有“退让”的意思，即“退却”或“却退”。这个涉及到的是你们的合作，怎样翻译法语的“*et pourtant*”（然而）。你们可以马上说，如果你们有想法。

大家提出：毕竟，然而，尽管，进一步说，即便如此，却。

吉：要在中文中很斟酌地表达出来，是要费一些工夫的。

赵旻：刚才与刘谨讨论“却”，如果有主语的话，翻译成“却”，是比较合适的。但是 *et pour tant*，常常没有主语，又表示一个递进，所以翻译成“却”不是很好，反而这种情况下说“进一步说”比较好，能够表达这个意思。

陶杏华：即便如此好些。

霍老师与吉布尔讨论对“即便如此”的翻译：*si c'est tant ainsi*，吉布尔将其理解为“为什么”。

霍老师建议“*Même si, c'est ainsi*”（即使是这样的）。

吉：*et pour tant*（但是它在动），在中文中找一个词与其对应，要有伽利略冒着生命危险的样子，拉康当时说这句话时候，面临着高师要将他赶出去，语言学家们不让拉康在高师做演讲。说要把这个味道翻译出来。

陶杏华：*et pour tant*有承上启下的功能，承接上面，转折下面，用“然而”，然指上面，而指下面，这个词也有这两个功能，用于强调下面的。这个词有强调下面的意思，与刚才说的符合。

吉：关于“退一步说”，我问了很多人，让他们用“退一步说”举一个例子，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举得出来。

霍老师：刚才也问了我，我也举不出来。

（现场要求大家举例，现场没有人举例。）

霍：这句话的意思“的确有一个弗洛伊德的革命，但是我拉康还是说了一些东西。有一个转折。或者弗洛伊德的确做了一个革命，然而我拉康做了……”

有人建议：“退一步说，弗洛伊德做了一个革命，我拉康做了……”

赵旻：在继承的位置上向前走了一步，正是因为有前面的人，所以后面才有我拉康……

有人建议：正是前面有弗洛伊德说了什么，进一步说……

霍（表示不同意，接着解释）：我们的确有一个弗洛伊德的革命，

然而我拉康的贡献也是革命性的。

赵旻：实际上有个处境的意思，有个拉康与伽利略的处境的问题。字典上有“可是，然而”的意思，不是对前面的否定，不是这个意思。

霍：恩，继续讨论。

吉：我想说最后一点，我要强调，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太阳围绕地球转，伽利略当时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他认为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这里强调的是独特性。拉康引用“我故曰”的“故”，也是想强调孟子在这个地方的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正是精神分析强调的独特性。那么不管在“我故曰”中，“我”可能是孟子、拉康等等，可以客观地论“我”，然而仍然有个主观的读法，即读到这句话的读者，读到的是我的我。那么，这让你们进入孟子的阅读，并向你们提出问题，你们在读孟子的时候，你们怎么想的。

（中间休息）

霍：我们重新开始。

吉：因为只有一刻钟，我简单地对下次要讲的内容做个导言。昨天我们讲了拉康是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一个灵感，从而提出了剩余享乐的问题。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从社会角度提出的概念，来讨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经济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而拉康的剩余享乐谈的是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个体，每个独特的个体身上的症状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要追溯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发现的早期，当弗洛伊德的病人在治疗中谈到症状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病人的症状是男人与女人性关系的隐喻，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所谓性方面的革命，实际上弗洛伊德只是说症状是男人与女人性关系的隐喻。对这个东西的发现，是弗洛伊德最基本的贡献。弗洛伊德在他最早期的癔症的研究中，提出了快乐的概念，这个快乐当然不仅仅是性快乐，有性快乐但不仅仅是性快乐，他一直讲快乐，直到1915年，在《超越快乐原则》这本书之前，他都在讲快乐原则。

我不晓得，在中文中对 plaisir（快乐）是否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在

法文中，快乐指很多，除了性快乐之外，例如今天早上，我吃粽子，我可以说我有一个吃粽子的快乐。关于 plaisir，可以说很多。但究竟中文中是否有吃粽子的快乐和有性关系的快乐的区分，我不知道。弗洛伊德逐渐发现，在治疗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们重复的东西并不是快乐的东西，恰恰快乐的东西不重复，重复的却是不快乐的东西，怎么理解这种不快乐的重复？正是这个问题促使弗洛伊德写了《超越快乐原则》，为何？因为在症状中表现出来的重复恰恰是不快乐的。

哪怕是快乐的东西也不能重复太多，比如我吃这个粽子很快乐，但是吃了一周后，我要换东西吃，才能快乐。为何对于带来快乐的东西，我们不要了，要换另一个东西？这同样也是个问题。如果在我吃粽子和吃另外一个东西之间有个障碍，比如说四川大学的校长跑来对我说，从今天开始，禁止你吃粽子，那么我就不得不吃别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障碍就是禁止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的时代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道德禁止、不允许人们谈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在维也纳，身体的快感，做爱的身体的快感或者吃粽子所获得的身体的快感，即便不是被明文禁止的，也是被压制的，人们总是不能讲身体的快感。同时你能看到，所谓身体的快感总是被压制的，我们在中国缠小脚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我到现在也没懂为何缠小脚会对男人构成诱惑？女人的小脚能够对男人构成诱惑。在当时的维也纳，女人不缠小脚，但是女人有一件紧身衣，用一件紧身衣将身体箍起来达到一种体型，也就是说身体的快感是被压制的，人们也没有办法自由地谈身体。我不是说仅仅是因为精神分析，维也纳的妇女就去掉了紧身衣，但是精神分析也许在这里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关于中国缠小脚的问题，我晓得，实际上1949年以前，女人仍然要缠小脚，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的行为让女人们获得了自由，至少从缠小脚的意义上讲是这样。还剩下三分钟。正是因为弗洛伊德发现这个重复并不是因为快感引起的，弗洛伊德最终提出了死冲动的概念，人们重复表达的是死冲动。拉康继续往前走，提出了享乐，通过这个可以看到快乐与享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类似于马克思说剩余价值和财产、商品的拥有，和对汽车、房子、女人、钱的拥有相联，拉康提出享乐的概念，相对于快乐，是和死冲动联系在一起。今天我就停在这里，作为下一次讲的导论。我超过了1秒钟。

讨 论

陶杏华：“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拉康翻译成主动句，性主动在讲，但是我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个被动句，言是被性所讲的。

答：这涉及到拉康，我建议你阅读这个段落，这段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拉康的一些段落是非常难理解的，我读了都不晓得他说什么。但这一段相对容易读，他首先分析了这句话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如同所有古汉语中的句子有很多种读法一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接着说了主动态和被动态的关系，即“言性”和“性言”的关系，“言性”是主动地谈性，性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而“性言”，性处于一个主动的状态。他反复地谈论主动和被动，拉康想强调当人们在说的时候，总以为是我在说语言，语言是我的工具用来表达我的思想，但他们忽略了实际上是语言在说我，语言是决定我们的东西。这样一个概念，类似于打乒乓，我们说打乒乓，但没意识到同样是乒乓打我，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个。正是在语言说我的这个意义上，拉康说有这样一个言在，拉康通过主动、被动的游戏想强调言在的概念在孟子那里就有了，因此我建议大家都读拉康的讨论，这段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读的。

那么就是说，当时拉康想强调言在和被言在的概念，实际上是针对IPA的情况，拉康强调分析的治疗仅仅是语言的，为何？是因为你接待的分析者是一个言说的存在，是他在讲，这样一个存在是一个言说的存在，他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来自弗洛伊德最早创立精神分析的小故事。弗洛伊德最早在治疗时使用催眠术，弗洛伊德向病人讲要安静，要怎样怎样，

而这个病人把弗洛伊德推开说，你不要碰我，你让我讲。此时，弗洛伊德退到后面去，让她讲，到她背后的目的是让她更自由地讲，从这里开始，弗洛伊德创造了精神分析，从而与催眠术划清了界限。而这个事实，即病人是个言在，IPA 忘记了，忘了病人是个言在。拉康另外还说，不仅是分析者在讲，而且是分析者的无意识也在讲分析者，这个时候，所有的言在就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在讲，另一方面是语言在讲这个存在，就有一个主动态和一个被动态，一般的人认为是我在讲，是个主动态，但他们更多地忽略了是无意识在讲我。因此拉康才有这个句子：言性和性言的阐释，包含主动态和被动态的阐释，是对孟子的这样一种阐释。

问：我理解的“言性”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理解的是“天下之言，性也。”

霍：要不你看了这个书之后，再提问，好吧？要不要得？

吉：你不仅要再读拉康，还要再读孟子，读孟子在什么背景下说这句话“天下之言性也”，还要读拉康所说的东西，在人性与动物性之间有个无限的差别的东西，通过阅读拉康、孟子，你会有个自己的主意。

可以说拉康这样说，退一步说，我说另外的东西。可以是拉康说了这个，然而，我却说别的东西。

霍：我提醒大家如果要读孟子，要读已经翻译成法语的孟子，是汉学家翻译的，看一下那个翻译是怎么翻译了，拉康参考了这本书的。所以我要求吉布尔先生把既有拉丁文，又有法文的书带过来复印给大家。我自己原来读了很多古书，到了法国后乍一看发现没对，但是后来觉得别人那样说是有道理的。

法文版的孟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20 世纪初的版本，一个是现代的版本，上次是新的版本，这次是旧版本。你们要去看看，对比之后才能对话，他们是在这个版本上来理解中文的。

问：昨天讲的能指的区分性，今天讲到中文的歧义性。拉康在研究中文之后转到拓扑学，而拓扑学也有很多歧义性，那么是因为拉康认为中文不是一套好的能指系统所以转向拓扑学吗？

答：关于这个问题，认为拉康不写中文后就开始画拓扑学，这是最近的发现，出现在斯特拉斯堡的网站上，是最近提出的。为何拉康不再写汉字，而开始（用）拓扑学，也许两年后，会有个结果，为何会有这样一个转变，这个问题现在还是开放的。另外，我给了张涛一张光盘，有拉康的 15 个讨论班，同时有索引，可以查询。要理解这个问题，要借助光盘的帮助。如果大家需要，可以复制这张光盘。

问：拉康说中国人没有无意识，这句话是否跟他读中文有关系？

答：你必须给出出处。也许是因为你希望中国人没有谜，可能是你的无意识，也许是中国昨天宣布中国人没有无意识。我可以说我没有无意识，我有计算机、有 MP3、有收藏，无意识不在我身上，而是在人与人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国人没有无意识，中国人没有无意识。这也是一个我和霍大同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再也不是他能用网球来解决的。霍大同写了中国的无意识，但无意识只在存在之间，而不存在某个内容。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我们不能解决这个冲突，不能用网球比赛来解决，同样也不能通过阴茎的问题来解决。

我想指出，你们同样也有数字化了的孟子的书，通过搜索引擎可以找到所有孟子的概念，我也是这样读孟子，我打了“我故曰”，没找到，我想居飞、谷建岭也没找到。

第六讲 冲动：性与死*

吉：今天我们就不鼓掌了。因为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成都的牙医给我装了一颗假牙，现在我说话还不习惯，可能要取了才能说。但反过来，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有益的经验，也就是说，现在我身体的某一部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需要我去认识。牙医给我装的是活动假牙，他说装固定的假牙需要六个月，四千块钱。但如果我在成都呆六个月，巴黎的某些人就会不高兴，首先是我的夫人，然后是我的分析者可能会不高兴。

今天决定不带拉康的讨论班来做演讲，一方面是我自己想展开评论，另外一方面，拉康的讨论班有两章太难了，要懂得它，必须读拉康的其它讨论班，所以今天我决定抛开书本，来谈谈我读拉康讨论班的一些想法，做一个简单的评论。第三个理由是，我对这个讨论班最感兴趣的是拉康讲孟子的部分，目的是获得你们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为两年后可能召开的会议做准备。所以我决定把这本书甩开。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是拉康的与快乐相区分的“享乐”的概念，但我仍然不晓得关于“享乐”和“快乐”的中文的翻译。

上一次我讲了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这部著作之前是怎样构造“快乐”这个概念的。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在制造快乐的概念，直到他注意到在他的分析者那里，持续支撑他们的活动的不是快乐，而是不快乐。也就是说，在这些患者不断重复的情况下，他们重复的不是快乐，而是不快乐。因此在《超越快乐原则》这部著作中间，弗洛伊德根据重复不快乐的事实和临床的经验，提出了死冲动的概念。冲动是一个对子：

* 时间：2008年3月12日上午。

死冲动和生冲动。这个时候，他借用了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名称：Eros（爱若），代表生的冲动，Thanatos（死冲动），代表死的冲动。正是从《超越快乐原则》这部著作出发，拉康构造了他的享乐的概念。

在当时，当弗洛伊德构造了死冲动的这个概念，或者生和死的这个对子之后，他的学生拒绝这个概念。其中有一个叫威廉·海希的年轻学生，当时他非常年轻，22岁见了弗洛伊德，之后3个月，弗洛伊德就送了些分析者到他那里去，也就是说威廉·海希还没做分析者就成为分析家了。他一方面是分析家，另外一方面又是当时奥地利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这两方面工作，但到1934年的时候，弗洛伊德和共产党这两种运动都开除了他。

拉康把这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也就是所有制和剩余享乐放在一起，讨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连接。通过商品所有权的问题，他讨论剩余价值的问题和剩余享乐的问题。而威廉·海希因为当时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所以他发现了性欲的问题，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发现不能帮助解决年轻人的性欲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提出了另外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共产党认为除了性欲的问题，还有其它更多的问题，因此把威廉·海希开除了。这让我想起鲁迅的故事，鲁迅当时对弗洛伊德感兴趣，后来他发现性欲问题并不是一般老百姓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一般面临的是吃的问题，也就是温饱问题，温饱问题不能解决，根本不能谈性欲的问题。正是这个原因，使鲁迅抛开了精神分析，转到了文学这个新的方向，就是同情共产党的方向。我不想过多地涉及威廉·海希的方法，但是我想说他当时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德文题目我不记得了，翻译成法文，好像是《性高潮的功能》（*La fonction de l'orgasme*），因为我试图找到orgasme（高潮）的翻译，但是有很多种说法。

接下来，威廉被共产党开除了，也被精神分析开除了，1934年纳粹兴起了，纳粹要杀犹太人，他就是犹太人，因此不得不逃到美国。他虽然在美国做了一些事，但仍贫困潦倒。并且他又做了一些让美国人不高兴的事，最后死在了监狱。他一生的命运相对而言是比较悲惨的。当时

拉康对威廉做了一个评论：他错了，但没有任何人能够说他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

ORG Masculine（男性高潮） ORG Féminin（女性高潮）（板书）

在威廉的书中，他说有一个男性的性高潮，和女性的性高潮，这两个高潮不一样。拉康也说了一个类似的话，就是说人类的命运中，男人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弗洛伊德当时首先遇到了快乐的问题，比如说我抽烟很快乐，吃四川菜也很快乐等等，当然也包括性的快乐。他后来发现实际上是不快乐在支撑着这种重复的运动。因此，正是基于弗洛伊德这种重复的不快乐的理论，拉康构造了享乐的理论。这个理论和剩余享乐连在一起，而剩余享乐又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连在一起，实际上拉康的享乐有马克思的享乐的意思，马克思的享乐是说我拥有这个财富，拥有这个商品的享乐。这和拉康讲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享乐，即性的享乐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性快乐和性的享乐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么在这性快乐的领域中，仍然有女性性快乐和男性性快乐，这两个快乐是不一样的，同样，男性的性享乐和女性的性享乐也是不相同的。

经常我们读拉康的书的时候，觉得他说的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性快乐、性欲和享乐显然和每一个人都是相关的。虽然表面上看拉康与我们没关系，实际上是有关系的，通过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威廉当时在共产党的组织里面和年轻人谈性的问题，谈年轻人所遇见的性的问题，谈男人和女人性高潮的差别，以及如何协调这一关系的问题。如果你们接待这些有问题的人，这些问题当然包括了性的问题，当你发现涉及到的性的问题时，不要忘记，这些性问题与你的问题一样，实际上在某一个时刻，你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们用搜索引擎搜索“快乐”或“享乐”，你会发现很多人们对性方面的快乐或享乐的讨论，人们在讨论自己的性的问题，通过他们的叙述，你们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的性问题不一样。当然，理想的状态是大家都一样，同时达到高潮，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在现实中是有差

别的。在法国，根据网上的情况你能看到，女人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性冷淡，但男人从来不说自己性冷淡，男人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是早泄。也就是说，在法国，你从来不会听到一个男人说他是性冷淡，反过来你也不会听到一个女人说她更早地到达性高潮。我没上过中国的网，所以不清楚中国的情况，但如果你们想了解，可以上网看看中国人在谈到性问题时说些什么。

从来没有在网上找过性问题的请举手。（只有霍老师举手。）看来霍大同是很好地被分析了，所以不用找，而我还在网上继续搜索，我还没有被很好地分析。（霍老师解释：我的眼睛的问题让我不想计算机上工作，所以我对搜索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年以前，基本上是为了回法国人的信才上网，除此以外，基本上不在网上搜寻。后来眼睛非常不舒服，就更不想上了。）

（霍老师对中途他与吉布尔之间的对话做了翻译：吉布尔说霍大同不需要在网上去查，是因为他的分析者讲的就是这些问题。那我说吉布尔你也一样，你听到的也是这些问题。吉布尔说因为在成都为了上这个课，第一次上了这些网，感到很惊异，网上男人和女人的抱怨实际上和在分析室里听到的分析者的抱怨是一样的。人们总是有一种幻想，幻想达到和谐。这里我插一句，按我的观点，中国兴起的房中术，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时人们发现男女在性方面的一致，从而希望通过房中术来达到一种理想的和谐一致的状态。房中术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了，甚至3000年。）

霍大同提出的对房中术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孔子或老子的书中找不到有关性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是道家处理的问题，我们只能在道家的一些文献中找到。不是所有的道家都处理这个问题，而是部分的。拉康说动物也有躯体的问题，但它们感觉不到这个问题，而人感觉到了，人之所以能感受到，是因为人是言在，而语言的问题是孟子处理了的，所以拉康读了孟子。

关于道家，我注意到最早在道家的文献中，我们能够看到男神和女神数量差不多，地位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女神的数量减少，同时地位在

逐渐降低，男神的数量变多，同时地位提高了，在道家传统中有这样一个趋势。也许根据这个事实，拉康提到了所谓的石祖优先性问题，但同时整个女性主义运动就批评弗洛伊德和拉康思想中谈到的石祖优先权的问题。

拉康说之所以人类能够感到这个问题，同时认为这个问题是个问题，是因为人类是个言在。我听说类似女权运动批评石祖优先性这种情况中国也有。在中国，有种女书，只是女的写，男人是不懂的。显然，对女书做一些研究，是有意思的。我想说，之所以遇见这个问题，男女之间互相不懂，那是因为我们相互在说话，正是我们在说话，所以我们不能相互理解。女书想要形成一种文字，这种文字至少让女人之间通过书写、言说来相互理解，寻找人类之间获得相互理解的努力。所以很有研究价值。

这让我想起了拉康讨论班的题目，即“假装”，也许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总是假装相互理解。女书提供了一个例子，来理解假装好像这个概念。女书的存在就显示出我们实际上假装着相互理解，实际上我们是不理解的，如果真正理解了，就用不着假装理解。女书显然是遇见了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并试图解决。因此我们试图想获得一种理解，那么在头脑中就有一个理想，也就是拉康讨论班的题目：也许有一个不是假装的辞说，这个问题让我们用不着假装，也许女书的创造正是遇见了这个问题。这个题目用的是条件式：可能有一个不是假装的辞说。有一个希望、一个理想说也许我们会有一个不是假装的辞说。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了语言，语言使我们的理解发生了困难，而在动物界，它们的相互理解是没有困难的。标志着动物之间差别的符号对动物而言是很容易理解的，例如一个动物发现一个符号代表着老虎，老虎要吃掉它，所以它很快就跑了。而人类之间，符号变成了能指，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之间不能有个很好的理解。正是不能理解的这一事实，使大家来做一个精神分析，想改变这样一个不是很理解的事实，获得更多的理解。通过分析能够获得比原来更好的相互的理解。正如拉康所言，精神分析的作用就是要学

会和症状一起生活。拉康并没有说分析让症状消失，而是让我们能够很好地和症状在一起，比原来获得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构成了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的差别，心理治疗师会跟患者说，你到我这里治疗，什么都会变得很好。拉康说心理治疗师是一种伪善，拉康说如果你做了精神分析，你会获得的是与症状相处，精神分析家并不说，你来我这里做个分析，一切就变好了。精神分析不是这样的。

拉康说，我不晓得我说的是什么，实际上，不仅是拉康，我们所有的人，在发生语误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说了什么，通过精神分析之后，我们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个事实。拉康老年时在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作演讲，面对很多观众，一言不发，用一种很忧郁的眼光看着观众。沉默了许久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有一件事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所有的人都将走向死亡。”可以看到，一件小事就构成了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的差别。心理治疗包含了很多美好的承诺，甚至包括心理治疗能让人达到避开死亡的状态。相反，精神分析不会给人这样一种美好的承诺。

我重新写：Eros（生冲动）和 Thanatos（死冲动）。正是根据这两个希腊神的名字，弗洛伊德构造了生和死的冲动，也是基于此，拉康构造了享乐，包括性享乐的概念。

举个例子，我可能遇到一个中国女人（尽管我年龄偏高，又有假牙，这种几率比较小，但也不排除可能），我们谈得很愉快，于是接着约会。开始在茶馆、餐厅，后来就到了房间里，继续愉快地交谈。大家都很理解，大家都分享一种快乐，实际上这个时候所分享的这种相遇的快乐，我们讲的所有的快乐都是做爱的快乐，不是结婚的问题。至少中国有一些女性是比较自由的，不是一谈到性，就是结婚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继续做爱，假装相互之间非常了解，相互之间都假装很快乐。但到某一个时候，比如男的早泄了，或者女的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具体什么事我也说不出，因为我不是女的），在这种情况下，快乐就马上消失了。更重要的是，这时双方都没有办法假装说我们相互理解，很快乐。那么此处，

有一个男性的性高潮和女性的性高潮的差异切断了话语，此时，大家再也不说了。那么理想的状态是，性高潮对于男人和女人都一样，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经过了这样一个断裂的阶段后，两个人重新找到了话来谈，此时，你们讲什么呢？可能是性交后的悲哀（难过）。性交后的难过，在性高潮中话语被切断，掉下来后，人们重新找到话语，这个时候是一个难受的状态。

Post-coitum trists（板书）

这是我们经常遇见的一个现象。在同一个民族、社会中，我们始终遇见因为性高潮的疲惫之后的悲哀，为了维持关系，我们都假装很满足，我们总是维持这样一个假装的辞说来面对社会。但是我们有一个理想，我们幻想也许存在不是假装的辞说。这种幻想支配着我们到其它社会或民族寻找一个性伙伴，与异域性伙伴的快乐也许就不会是假装的。但现在在一个法国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了性关系之后，还是发现有性交后的悲哀，曾经的幻想就破灭了。我说这些不是阻止你们做爱，或者寻找一个异性性伙伴做爱。因为这个事实并不影响大家继续做爱。我想补充的是，性高潮这么一个快乐的阶段，拉康称之为享乐，法语把这一时刻命名为小死。从这个流行的法语单词“小死”中，可以看到死冲动。那么，小死到底指什么死了呢？就是之前的谈话、假装的快乐和了解。

（中间休息）

我们重新开始。

我非常高兴，我用这个假牙讲的非常好，至少我相信，我用这个假牙讲的很好，也就是说我并不总是晓得我说的是什么。我们讲了性高潮，然后享乐，或者小死，目的是让你们理解在这之后，稍微有些悲哀的感觉。我讲的这些和最近一两年我在巴黎的讨论班的内容是连在一起的，也和你们是联在一起的，即《临水夫人》。《临水夫人》这本书是一个女汉学家写的。临水夫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传说，那里有些祭祀她的仪式，作者参加了现场的仪式，进而写了这本书。临水夫人讲的是一

个道家女神，她不顾自己有孕在身，带领老百姓抵御洪水，结果导致自己流产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汉学家在书上描述了性行为方面男人的历程和女人的历程，尤其是二者在性行为方面的差别。这个时候，临水夫人组织了一个女同性恋团体。也就是说，涉及到性高潮问题的时候，是指女同性恋之间的性高潮。但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女人必须要找一个丈夫，结婚生子。在成为神仙之前，女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普通的姑娘，结婚的压力迫使女人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大家知道的白蛇。白蛇的形象是一个性欲没有界限的形象，她的目的是为了摧毁男人。白蛇遇见一个男人，救了他并结婚，以便她的性欲变得规范化，而不再是像之前白蛇代表的纵欲的形象。白蛇救这个男人，如同一个母亲救一个孩子一样，正是通过这个行动，白蛇变成了女神，成了保护母性和孩子的女神。在中国东南沿海对临水夫人的祭祀有专门的庙宇、塑像，妇女自己为了怀孕的问题，或者小孩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到这个像面前祈祷，希望她能帮助解决她们和孩子遇到的问题。

我开这个讨论班是对拉康关于享乐问题的批评，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实中，一个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相遇，他们感觉很好，然后上床做爱，这时总会遇见两个问题：如何避免怀孕，避免染上艾滋病。我们始终采取一些措施避免这两点，也就是说，在性关系中，始终存在着这两个问题。而拉康在讨论时，总是一个理想状态，一种单纯的男女性关系，没有孩子的问题和疾病的问题。也就是说，男人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是不相同的，但他们有一个相遇，相遇中有一个第三者，即孩子，所以说男女性关系始终涉及母性的问题。

今天停在这里，明天继续，现在请提问。

讨 论

问：男人与女人的相遇，是孩子的问题、母亲的问题，但是为何不是父亲的问题？

答：当然显然是父亲和母亲的问题，我之所以说是母亲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谈的是临水夫人。为什么呢？谈临水夫人的过程，即道家关于母性问题的讨论，是对西方关于石祖中心主体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因为在临水夫人的传说中，她救了丈夫，而丈夫是被当成儿子来救的。也就是说，在临水夫人和她丈夫的性关系中，存在一个母性享乐的问题，而母性的享乐是我要讲的。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女人需要什么？根据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能回答，在西方，女人寻找着一个父亲，而在中国，女人寻找一个孩子。

你们可以在下一次的讨论班，父性和男性的讨论班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也许从道家的角度来讨论和从儒家的角度来讨论是不一样的。那么至少在道家的角度，最早涉及到男女神的平等性，后来这种平等性就消失的。

问：每一个人都存在着生与死的冲突，分析家也一样。那么分析家应该如何帮助分析者，使其生的冲动更强烈些？

答：生与死的冲动，男人与女人的问题，是相互定义的问题，类似道家的太极图，生中有死，死中有生，二者是相互的，不可分开来讲。关于生的温情，实际上很多分析者到了分析室后，他们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他们感到的是死亡的笼罩，而不是生的温情。

问：但分析者找分析家不就是为了继续生活下去吗？

答：分析者找分析家，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有一些分析者无法自杀，找分析家帮助实现自杀的愿望。

问：是否可以理解为：那些不能自杀的分析者，实际上他们的生的冲动还没有顺从死的冲动，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解决生与死的冲突？

答：“答非所问，答非所答”在这里可以理解成：每个分析者都是独特的，你说的这个可能是理想状态。每个分析家所面对的分析者的请求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分析者的请求开始一个工作，没有一个一般性的概括。我遇见一个北京女人，她在网上告诉我她的母亲怎样怎样，问我她的母亲有什么问题，该怎么办？我当然不知道怎样，不仅精神分析家

不做疾病的诊断，即使是医生，他没有见过病人，没有检查过，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当你谈到一个理想的分析者时，我也无法回答您的问题。

问：分析家确实会遇到一个到底该不该鼓励分析者去死的两难问题。

答：有个分析者在我这里做了两年的分析，离婚后去了英国，继续通过电话分析。回国之后她没有走出离婚的阴影，却发现前夫有了别的女人，然后觉得爱她的前夫已经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他了，现在自己也只有去死了。之前我们一直都是电话分析，没有见面，但这次她直接来找我了，和我谈了很多。她说她是富人女子，从小受父母溺爱、保护，没受过什么挫折。而前夫家里比较穷，久而久之，前夫承受不了家庭背景过于悬殊的问题，和她离婚了，这对她而言是一次莫大的打击。谈话中，我感觉到这个打击对她而言确实很大，她的心确实已经死了。她还说从未真正地为自己活过，现在为自己活一次，就是为自己死。她这样说的时候，我感觉到她很冷，在发抖。这个时候，我闪过支持她死亡的念头，因为我觉得死亡对她而言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解脱。我们也知道，分析家也有死的冲动，并且觉得死不是一个坏事。但后来我还是觉得这样不人道，于是尽力让她明白在另外的世界也找不到前夫。前天她打电话过来，说她终于走出来了，复生了，她应该做一个智慧的人，坚强的人。

问：分析家遇到一个真正想死的分析者时，而且死对他而言又是一种真正的解脱时，该如何办？分析家想成全分析者死的念头到底是否道德？

答：所谓成全分析者是否死的问题，纳粹的立场是，让他们死，以便他们解脱，因此他们杀了很多精神病的孩子和犹太人。分析家碰见了寻死的分析者，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是否想死？比如我（吉布爾自己）得了癌症，中国的一个医生救了我，使我升起了重新想活的希望。如果分析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能跟分析者一起工作，如果不能回答，就应该建议他找别的分析家。因为如果自己都不能回答为什么想死，就不能很好地与分析者工作。

同样，比如我是男性分析家，遇到一个女性分析者，她说我不仅想在你这里做分析，也想跟你做爱。那我首先就需要问自己，是否想和这个女分析者做爱。如果我想跟这个分析者做爱，那么应该建议她去别的分析家那里。

如果一个分析者说她想死，这可能是一个隐喻，意指想与我有一个小死。法文中有一个词，叫快乐得要死，就指这个小死。也是中国的一首诗。

第七讲 从威廉·海希到临水夫人*

吉：大家早上好！我继续谈威廉·海希^①（William Reich），他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重要成员，当然他被精神分析、共产党、纳粹、美国人开除了，最后在迫害中死了。在接受精神分析之前，他就给别人做分析，也许不能称为分析，应该称为治疗。那时他接待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他那儿做分析，十年之后分析结束了，然后他和这个女人结了婚，显然分析给他带来了爱情。在第一个女病人的分析结束后，他和她结了婚，然后两个人移民到了美国，这个女人后来成为美国的著名分析家。他的妻子有一个女朋友，在他的妻子分析结束后，这位女朋友开始接受他的分析，不久他就和他的妻子离了婚，而和这个女人结了婚。海希自己有个伦理学，他和这两个女人结婚是在分析结束之后，而不是在分析过程中。海希认为年轻人有一些性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女人会有性冷淡。海希发明了一种方法，让她们和他做爱来解除这种性冷淡，获得一种做爱的能力和快感。海希这个事件发生在20世纪初到纳粹的时代。

弗洛伊德在神经症的工作中发现患者的问题来自和父母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与爱连在一起的，同时在分析过程中患者会有转移，转移也是和爱连在一起的。在转移中实际上是爱的转移，原来是和父母的爱，

* 时间：2008年3月13日上午。

① 国内根据英文发音一般译为赖希，威廉·海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提倡性革命、身心治疗即躯体心理治疗的先驱，著有：《听着，渺小的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情欲高潮的功能》、《性革命》、《性成熟、节欲、婚姻道德》、《青年的性斗争》、《性道德的突破》、《性格分析》、《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文化斗争中的性行为》、《乙醚、神和魔鬼》、《性高潮的功能》、《海希论弗洛伊德》。——编者注

当然接下来就是恨了。在精神分析中，转移重现了早年和父母的爱和恨，神经症只有通过这种转移的爱才能治愈。相对拉康而言，弗洛伊德那个时候还不清楚爱、欲望、快乐、享乐之间的关系，因此弗洛伊德在使用爱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是爱、欲望、快乐、享乐的混合。神经症患者为了离开神经症需要一个转移的爱，这是一个混合着欲望、享乐和快乐的爱，由于这个混合没有得到区分，弗洛伊德早期的弟子荣格就和他的一个分析者睡了觉。这个女分析者是萨宾娜·斯皮尔林，她是俄国人，由于有很严重的精神障碍，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瑞士，在荣格的精神病院住院。那时是1906年，正好荣格发现了精神分析，他就用“精神分析”方法给她做治疗。由于他混淆了爱、欲望、快乐、享乐的问题，这时他认为必须通过转移的爱才可能让她离开神经症，所以他想通过做爱的行为让她能够离开神经症，当然这是不行的。这个女人在弗洛伊德和荣格分裂的时候到弗洛伊德那里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后来这个女人回到了俄国，成为俄国第一个女分析家。她是整个精神分析世界里的第一个女分析家，在1912、1913年的时候就参加了弗洛伊德的讨论班。后来她回到俄国，1941年被纳粹抓到了，她也是犹太人，她和她的女儿还有其他的犹太人被赶到一个教堂，然后德国纳粹把这个教堂烧了，也许她是第一个被纳粹杀害的分析家。我和一个朋友写了一本关于她的书。

荣格的情况与威廉·海希是不同的，后者是在分析结束后和这个女人结了婚，而荣格当时已经结了婚，他和这个女分析者睡觉，当时在瑞士是一个很大的丑闻。这是因为那时人们还没弄清爱、欲望、快乐、享乐之间的关系。荣格不仅和这个人有性关系，他也对自己的妻子进行分析，他的妻子就成了一个荣格派的精神分析家。我不知道他的妻子是不是第一个女的荣格派分析家，但是有很多女人在荣格那儿做分析，同时在他的教学中也有很多女人围绕着。因为当时有这种爱、欲望、快乐、享乐的混淆，当时有很多分析家和他们的分析者做爱，同时继续做分析。因为威廉·海希坚持他的伦理原则，他就说哪些人和分析者睡了觉，同时还做分析。威廉·海希认为自己是在分析结束后才有睡觉的问题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在实施过程中是很危险的。危险是对男性分析家的。即使到现在，在精神分析运动中有些男性的分析家依然会和自己的分析者睡觉，即使是在拉康派分析家之中也有。为什么说对于男性分析家很危险呢？是因为女性分析者有让男性分析家掉入爱情陷阱的艺术，一方面她们找男分析家做分析，另一方面她们利用这种艺术让男性分析家与她们上床。这是需要时间的，威廉·海希的妻子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使海希掉入爱的陷阱中。这与拉康强调的石祖的优先性是连在一起的，而弗洛伊德本人没有在这个方面做工作。

拉康强调石祖的优先性，就是说在整个精神分析运动中，我们更多看到男性分析家把转移的爱变成了一种行动，而在女性分析家中则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后者可以通过石祖的优先性获得一种解释。精神分析在中国刚开始，这种把转移的爱变成一种享乐的过渡也是很有可能的，大家有必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变成行动的实践发生，分析家就再也不是分析家了。这种行动化的过程在其它领域中也会存在，比如老板和秘书做爱，但是老板还是老板。在精神分析中情况不同，如果分析家和分析者做爱，分析家就不再是分析家了。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不仅仅他做爱的时候他不是分析家，而且他在说话的时候也不是分析家，我在讲话的时候是处在分析的辞说中。在法国，有人说艺术家在表演时，其实是在与观众（听众）做爱，我也可以说我在演讲的时候是在和你们做爱。用拉康的话说，就是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做爱的时候我们是即兴的，不需要去查书然后怎么做，我现在的演讲也是即兴的。

我们回到威廉·海希，他写了一本书，我们昨天介绍过了，《性高潮的功能》，这本书是他的演讲的汇集。他对年轻人讲男、女性高潮的差别和解决的方案。他的听众中有一些是同性恋者，他对这些同性恋者说：“我的解决方案对你们同性恋者是没用的，你们应该去找个弗洛伊德派的分析家来解决你们的问题。”这就是说一方面他被弗洛伊德开除了，他和弗洛伊德处在对立的一面，他自己还发明了一些和弗洛伊德不同的性理论；另一方他认为同性恋者不应该在他那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应该

去弗洛伊德派的分析家那儿解决。

拉康说大家都知道威廉·海希错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错了。而我想提出一种解释来说明他为什么错了。我的假设是，弗洛伊德说：“男人都有一种同性恋的倾向，但是这种同性恋的倾向被压抑了”，而威廉·海希把这些同性恋者送到弗洛伊德那儿去是想对他说：“你说同性恋是被压抑的，那么这些人是没有被压抑的，你怎么做分析？”也许威廉·海希就有点类似 Schreber（施雷伯）。他受到了迫害，先是弗洛伊德，然后纳粹，然后共产党，然后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被压抑了的同性恋。他故意装出自己仅仅需要女人，说自己不是同性恋。威廉·海希和施雷伯相反，施雷伯是一个妄想狂，他把他的同性恋倾向表达了出来，而威廉·海希是压抑的。弗洛伊德在写作施雷伯个案的时候，正处在与荣格分裂的阶段，这期间弗洛伊德与荣格频繁通信，信中写的都是相互之间的爱。他们处在怀孕的期间，正在要生个孩子，这个孩子当然就是精神分析。但是他们用的都是男人和女人谈恋爱的术语来写的。那个通讯录还在。弗洛伊德是犹太人，荣格不是犹太人。因为萨宾娜·斯皮尔林与荣格睡了觉，她想要一个荣格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 *Arien-Sémitique*（阿里乌斯教派-闪语族）。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通信中也在谈这个犹太与非犹太混合的孩子，是以这个女分析者的口气在谈论这个问题。这个俄国女人当时就已经在弗洛伊德那儿做分析了，弗洛伊德建议她停止希望和非犹太人荣格有个混血儿的幻想，建议她和一个很好的犹太人结婚，要个男孩子。弗洛伊德正式和荣格分裂，当时他们也在谈论是否会有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混合的精神分析。因为和荣格的分裂，很多人认为精神分析是一个犹太人的科学。

拉康是天主教，他不属于犹太人的共同体，但是觉得自己需要学希伯来语，他用希伯来语写了自己的名字。当时欧洲有个问题，精神分析是否是犹太人的科学，还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这对拉康也是个问题。对中国文化来说，就像弗洛伊德对萨宾娜·斯皮尔林建议：“你去结婚，然后要一个男孩子”，我们可以想象，如同霍大同接待了一个女分析者，

这个女人在广东的分析家那里做过分析，她想象和那个分析家做爱然后要个孩子，这个时候霍大同说你不要想和一个广东人结婚，而是找一个好的四川男人，和他结婚生个孩子，有点这个味道。这涉及到拉康所说的石祖优先性，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石祖与阴茎是不同的。我们下边要讲到的临水夫人是关于石祖的优先性的，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为了讲临水夫人的传说，我不得不引用拉康在另外一个讨论班的一个很短的语录，这是拉康在1963年时关于“焦虑”的讨论班的内容。要读懂我们在1970年的“一个可能不是假装的辞说”的讨论班，必须追溯之前的讨论班的内容，因为这是拉康的思想发展的结果。

在拉康这个关于焦虑的讨论班中间有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在我们这（‘我们’可能是指男人、分析家或者人类，我们不知道拉康是指的什么），为了限制在我们之内，享乐和性高潮都是战斗之外和工具之外的东西。”在这里拉康实际上想说，享乐的问题和性高潮的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是言说的存在，而动物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因为言说使纯粹生物学的关系成为了问题。享乐和性高潮是战斗之外的事情，法语所说的小死是性高潮之后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死亡了就退出了战斗。拉康说男女的性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战斗，而享乐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同时产生的。我画个图，如果性高潮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同时达到，就达到了一个理想中的和谐。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大量的来找分析家做分析的人中，遇到的问题是男人和女人的性高潮的差别。性高潮和享乐是非常接近的，性高潮中断了快乐，转化成一种享乐。男人的享乐是在射精的一刻达到的，女人的享乐则是另外一个东西。拉康说，在男人和女人的性关系中始终有第三者，一方面是言说的存在，语言作为第三者，另一个水平上是有个孩子。

拉康讲到一种性交的方式，中世纪时比较流行，在性高潮之前，男人的阴茎退出女人的阴道，在阴道之外射精，从而避免怀孕。这就是中断了的性交。也就是说，如果男人的阴茎在阴道内射精，就有可能怀孕，所有他要退出去。射精的这一刻男人的享乐得以产生，也就是说男人可

以在性交之外获得享乐。因此男人退出了战斗后获得一种享乐，即被拉康命名的射精后的小死的状态，阉割的焦虑来自于此。这说的在男人这一面，阉割焦虑产生于阴茎退出后射精而产生的小死的状态。而对于女人来说，阴茎的退出就意味着阴茎的剥夺以及对孩子的剥夺，这里就有阴茎、石祖、孩子的混淆，拉康为了把这个混淆理清就重新定义了石祖。对我们这种言说的存在来说，石祖是属于能指的领域。拉康说之所以会出现中断的性交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是言说的存在。这种性交是人类的发明，在动物中不存在。拉康之所以讨论言说的存在的问题，是因为言说的存在影响了我们的性关系。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要举的例子仍然是萨宾娜·斯皮尔林，俄国犹太人，她和当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有很好的关系。当时弗洛伊德没有管，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发现中思考，和周围没什么联系。她和雅各布森关系很好，因为雅各布森也是个俄国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她不仅是一个弗洛伊德派的分析家，而且也是个拉康派的分析家，因为她与语言学家有很多的接触，接受了他们很多新的想法。那个时候语言学有两个学派，布拉格学派和维也纳学派，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学派。区分性特征就是雅各布森发明的。区分性特征的概念构成了拉康在构造他的能指概念时的一个基本支撑。俄国的这位女分析家也是皮亚杰的分析家，皮亚杰是儿童心理学家，他的儿童心理学是与弗洛伊德对立的。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发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孩子，这是间接的（与孩子的工作）。而这个俄国女分析家和皮亚杰工作，皮亚杰最后就成为儿童心理学的专家，孩子的问题就直接从皮亚杰身上呈现出来了。雅各布森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所有的语言中爸爸妈妈的称呼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普遍性。雅各布森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回答为什么全世界爸爸妈妈这个称呼是共有的。这时萨宾娜·斯皮尔林和一个犹太人结了婚，生了个女孩而不是弗洛伊德希望的男孩，她利用抚育孩子的经验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雅各布森的文章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她根据观察提出一种假设，ma 和 pa 这两个音

素是孩子吸母亲的奶的时候，因为这种享乐而发出的声音，它们表达的是具有一种色情意味的同母亲共同分享享乐的状态。显然这样的分析是一个非常拉康式的分析。

回到临水夫人的传说，她最早处在女性的共同体中间，有一种女同性恋的享乐，而她后来有了孩子，她和孩子之间也有一种享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拉康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第三者——语言，在临水夫人的传说以及在萨宾娜·斯皮尔林根据她和她女儿之间的享乐写的文章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也许有另外一种享乐——女性享乐，女性享乐中间不需要阴茎在场，也许在男女性关系之外，在第三项的语言之外，还有第四项——孩子，构成了女性享乐的第三项。这就对拉康所说的石祖的优先性提出了质疑，拉康没有清楚地讨论男女性关系中孩子起的作用。临水夫人的传说，也许能让我们揭开女性享乐之谜，在女性同性恋的关系中间，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享乐可以不需要阴茎，当然它需要石祖作为语言的能指。而在男性同性恋中间，阴茎是在场的，但是没有孩子，而只有艾滋病之类可能的疾病在场。拉康的教育揭示了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关系中妄想狂和男性同性恋是怎样一回事，但是这里没有孩子。明天我们更具体地讨论临水夫人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停在这。

讨 论

张谨怡：弗洛伊德对同性恋有个看法，在拉康看来，男性同性恋或女性同性恋出了什么问题？

吉：我在很早以前很仔细地看过，但是现在不在我的记忆中间，既然你看了，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假设我的脑袋中存储了所有的拉康的讨论班，而且清清楚楚的，但不是这个样子。

张谨怡：我就是没有把弗洛伊德的理论 and 拉康理论联系起来，弗洛伊德说男孩子认同于母亲爱他的父亲，以此来缓解阉割焦虑。拉康说仍然是对之前三元结构的复制，不能进入四元结构，我没有理解拉康。

吉：如果我们想象我们阅读了拉康的全部讨论班就没有问题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情况。每个人在阅读拉康时都有一个理解，如果你还没有一个理解，那么你就继续去工作，类似于我对你们说关于孟子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全懂拉康，我也没有全懂孟子，我在不断地阅读他们。就好像“我故曰”，“我”可以说是孟子，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如果我理解了什么我就说什么，如果你没有全懂很正常，继续你的工作。举个例子，《毛泽东语录》，为了让所有的人懂得毛泽东所说的，编辑的时候只用了1400个汉字，目的是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懂。让所有的人必须读他的书。但是拉康不是让所有的人都读他的书。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阅读和理解，类似于孟子的“我故曰”。

强迫性地服从于某个阅读，而忽视了自己的阅读，此例之一就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做了很多广告说它很好喝，究竟好不好喝大家是没有自己的感觉的。我现在想起了法国电视一台的台长说：“我们一台做节目并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做的，仅仅是为了宣传可口可乐来做这个节目的。”这些广告使很多年轻人喝可口可乐，但是这些年轻人并不知道他是否真正喜欢。广告强迫人去服从一些东西，比如电视里的手机广告，我在中国的电视台看到很多手机广告，让我觉得想去买一部手机，但是我仍然问自己是真正喜欢这个手机还是不喜欢。

我说了很多，我知道我答非所答，答非所问，但是我看到你听到我所说的以后笑了起来。

我的回答不是回答，所以没有人提问。

张谨怡：我本来就是个胡说八道、胡言乱语的人，我就在某个地方得到个建议，不应该胡说八道，应该看弗洛伊德和拉康。……今天又得到了个建议，应该放弃限制，应该胡说八道。我所理解的倒错就是说，应该放弃限制……

吉：谁批评你的？

张谨怡：霍老师。

吉：霍大同没有自我批评。我知道在中国某一个时期自我批评非常

的普遍，因此我理解自我批评总是会引起很多关于中国历史很糟糕的记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必须的，自我批评是很好的。霍大同从来没有表扬你，我表扬你，是因为你是仅有的敢于提问题的人。

问：男性在性关系外的享乐是否就是性快感？

吉：我们昨天讲的快感，是男人和女人相遇，产生了好感，交往直到进入房间，这些都是意识层面的快乐，享乐产生在快乐中间，快乐是享乐的准备。享乐来临的时候就变成了小死，是快乐的死亡，小死之后我们抽支烟。在我们举的例子中，快乐是在阴茎竖起的阶段，而享乐是在阴茎已经不能竖起的阶段，也就是享乐打断了快乐。

拉康进一步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男性的快乐和享乐之间的差别，比如男学生考试之后查结果，这是快乐，而当他看到了结果后，他就射精了，快乐就结束了。快乐就掉下来了，变成了享乐。在寻找的过程中是快乐，知道有了个好分数之后就掉下来了，变成享乐。拉康想说明男性可以在性关系之外获得性的享乐。也就是说自享乐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手淫。

问：女性享乐的问题，可不可说分成了女性同性恋的享乐、母性的享乐以及正常女性的享乐三种？

答：关于女性享乐之谜，实际上是女性需要什么，这是对男性来说的。我在巴黎研究的临水夫人的例子也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但是这个问题最终是需要女人来回答的。萨宾娜·斯皮尔林写了文章说，在孩子吮吸母亲的乳房的时候存在一个性的快乐或是享乐，还有一个爸爸妈妈的音素，也就是孩子登录在语言中间。但是我在这儿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男性的思考，但是真正的这个谜的揭开，是需要女性来说的事情。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纪录片《俄狄浦斯在中国》，但是霍大同说在中国没有这个神话。俄狄浦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把自己的父亲杀死，然后和自己的母亲睡觉。实际不是那么简单的，拉伊奥斯国王不愿意要孩子，王后想了个办法，把国王灌醉，然后要了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国王本来就不愿意要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对夫妇，俄狄浦斯称他们

为爸爸、妈妈。孩子长大后出游的时候遇到了父亲，他们有个决斗，他把父亲杀死了。但是他杀的是符号性的父亲，而不是他的爸爸。这个实际上说的是伊俄卡斯特想要个孩子，但国王不想要，女人可以在肚子里怀个孩子，男人是没有办法在肚子里有一个孩子的，因此这意味着一个阉割。女人在怀孩子的时候仍然是一个色情意味的行动。因此俄狄浦斯神话说的是女性想要孩子，而男性不想要孩子所导致的一个悲剧。我们同时可以看到符号性父亲和实在父亲有差别，实在的父亲是一个醉酒的父亲，哪怕他没喝酒也是醉醺醺地在做爱，他并不清楚是否有孩子，这是一个区分。而这个爸爸是一个想象的爸爸，孩子可以想象他的爸爸是国王，但是当想象结束的时候爸爸就是一个爸爸。

问：是不是体验小死来面对大的死，不断地小死就会出现不断的生？

吉：小死很难说是不断的，恰恰大死才可能是不断的，因为你就变成不朽的神仙了。不断地小死会导致大死，让我想到第三共和国的一个总统死在妓女的房间了，也许现在的总统萨科奇也有这种倾向，通过不断的小死最后就大死了。

吉：我们经常是做爱后抽支烟，而我现在和你们做爱时同时在抽烟，所以你们能看到和你们做爱和一般的做爱是有区别的，至少和你们做爱之后我不是悲哀的。

第八讲 临水夫人陈靖姑*

吉：你们都应该打开耳朵，我应该张开嘴。关于道家的祭祀。根据一个汉学家写的书——她写书的时候叫 B.Berthier（B. 贝铁尔），现在随夫姓叫 B.Baptandier（B. 巴唐迪耶）——后来陈靖姑变成了女神，女人就在她的像前为了孩子或者为了自身祈祷。另一方面她们请巫婆做巫术的祭祀，在祭祀的时候女的有灵魂附体的状态，有很多动作来表达这种状态，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状态理解为一种类似享乐的状态。国际人类学界称这样的一个巫婆为萨满，等于汉族地区说的巫术。巫婆做灵魂附体的活动时，到达一定的状态后就书写。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符，道家有很多符，类似于中国的汉字，但它不是汉字。道士可能把某些符和汉字联系起来解释符的意思。汉字书写的过程是和躯体的感觉联在一起的，有点类似拉康说的“享乐”的状态。作者在学术论文中复印了符，她把一些符翻译成汉语，这就有了身体感觉的传递。

为了传递我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是在 2000 年，我从北京田惠萍的孤独症中心星星雨那里回法国时碰到了这个汉学家，我对她讲了我在星星雨的工作。她问我有没有听到母亲讲请巫婆跳神？我说我没有听到。她就说：“你没听到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她们肯定请过。”她说的话让我不舒服。后来我到星星雨和孩子的母亲谈话时就提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遇到两例，其中一例是夫妇带着孩子见了巫婆，做了法事。另一例是夫妻已经离婚了，丈夫带着孩子进了一个类似法轮功的圈子，女的正通过法律争夺孩子。我在巴黎时就讨论这个问题，在座的居飞、谷建

* 时间：2008 年 3 月 14 日上午。

岭都说没有见到这样的事情，后来就唤起了居飞一个小小的回忆。他小的时候，他的奶奶或外婆讲到了陈靖姑的传说和祭祀的仪式。让我想到在星星雨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城市里的夫妇，所以他们不知道。做过法事的是山区农村的夫妇，所以他们把孩子带去做了法事。相反的，我这么几次在星星雨工作时大概见了 250 个家庭，他们在谈论孩子和自己的故事时，在我没有请求的情况下经常会拿一张纸来写。因为我对中国的书写做了很多研究，在和他们讨论书写的时候就可以不用翻译，他们常常写的是关于孩子的名字的事情。

当涉及到孩子的名字的时候，就和孩子出生的历史连在一起，也和为什么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和孩子出生时家庭的讨论连在一起。写陈靖姑的这本书里说到孩子出生时有个祭祀，在仪式中也谈到名字，因为孩子出生是有危险的，人们就讨论选择什么名字不会增加和避免危险。不仅孩子出生是危险的，而且给孩子取名字也很危险，要想办法解决。不知道你们看了《俄狄浦斯在中国》的纪录片么？其中有一段是关于星星雨的，导演和牵着孤独症孩子的母亲谈话，我在 20 米之外看到母亲很不舒服，因为孩子总是想跑，她要说话还要拉着孩子。我就过去对母亲说我帮她看着孩子，她和导演说话。我没有始终牵着孩子，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母亲看到我们就很担心。孩子要爬楼梯，我就跟在他后面让他自己爬。然后他就摔倒了，脑袋碰到地上，很轻。母亲就跑过来拉着孩子。我就和她交谈。她问我什么是孤独症，我说不知道。我说你的孩子不叫孤独症，他原本叫什么名字呢？她就要了张纸写孩子的名字。她就写，我记不清他名字的另外一边，但这一边都有“车”钱的部分。我就说难怪孩子的脑袋碰不疼，都是金属做的。她就说姓也有钱，我就问她名字谁取的，她说是他的爷爷取的。可能就是他要他多挣钱。这在我看来就是个分析。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如果你们以后和孩子做工作时千万不要说他们是孤独症、精神病。因为如果你这么说，就把孩子的名字、姓代表的家族的历史、欲望忘记了。要把孤独症、精神病、神经症甩开，这个孩子

不叫孤独症、精神病、神经症，他有自己的名字，这个时候才能和他们工作。星期一到精神病院做了个报告，结束后有个医生问我对精神病医生怎么看的。我说我不认识什么精神病医生，我只知道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不知道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医生，只知道某某先生、某某女士。

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和田惠萍和她的孤独症孩子一起去长城，孩子已经很高了。下来的时候孩子手舞足蹈的，这时有个英国的旅游团走过来。这个孩子就类似俄狄浦斯一样，遇到很多人就手舞足蹈的。田惠萍就对他们说，你们不用担心他是个孤独症的孩子。这让我很吃惊，因为她的孩子叫陶陶，我现在仍然不敢对田惠萍说她的孩子不是孤独症而是陶陶。田惠萍是行为主义的治疗家，当然她就这么说了，那是美国的传统。当你见到病人时，要把所有的理论都忘掉，要知道你对这个病人一无所知。相反在一个群体的工作中或是讨论班时再来谈论，这正是我在做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一些理论性的问题我们才能在这讨论。我们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拉康的精神分析而不是美国的精神分析、英国的精神分析。在把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引入中国的时候，因为有些理论的问题，我们才能在这里工作。

为什么说引入的时候会有些理论问题？因为在法文中说名字或姓时不存在书写的问题，因为说的和写的差异不大，但在中文中就不行，在说名字和姓的时候总是要书写。所以拉康说：“中国的文字允许我扩展能指的概念。”区分性的特征在说的语言中和书写的语言中怎么表现就是个问题。这是拉康提的问题，就是区分性特征在讲的中文中和说的中文中怎么表现。同时也就意味着从精神分析角度提出的问题也提给了中国的语言学家，他们怎么看待同样的问题。中国的语言学家显然也不都是一样，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和精神分析家工作就够了。拉康当时说这些问题是提给我们的语言学家，虽然他们想把我赶出高师，至少我让某几个语言学家开始为这个问题工作。比如说拉康把孟子的“言”，翻译成辞说、语言等等，这样一种翻译本身就已经是语言学的问题。朱利安先生和其他法国哲学家对性很感兴趣，他们把整个孟子的思想归结为性善

论，法文翻译成本性是好的。拉康回应说，什么是性善呢？性善有什么用呢？凭什么说性善呢？拉康提的问题是哲学家包括朱利安先生到现在都没有回答的问题。拉康的工作允许我们把孟子关于言的讨论和性的讨论连在一起，也就是把性的问题和语言学的问题连在一起。如果你们遇到语言学家，希望你们问他在孟子那里的性和言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你们已经作为分析家工作了，有一天一个语言学家来找你们做分析，你就马上问他在孟子那儿（性和言）究竟是什么关系。拉康本人就是一个讲话的人，他在公众面前时所有的教育都是口语的教育，他就提出了怎么能把他的话变成文字，然后他就出版了《书写》（也译作《文集》），这样他的话就变成了文字。他又提出拼音文字和非拼音文字有什么差别？然后他就画一些图，画图不够就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希伯来文，然后写中文。对他来说这还不够，然后就画拓扑学的图。在这之前他还写逻辑公式。

我们回到刚才说的陈靖姑的巫婆的仪式，跳神到了一定程度就写符，类似汉字但没人懂符究竟是什么意思。B.Baptandier 用汉字解释符是什么意思。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拉康就是个巫师，他自己说了很多东西大家不懂，写了些东西大家也不懂。这时来了个米勒把拉康的话放在一个很好的法语框架中，这样米勒就类似 B.Baptandier，拉康就类似巫师。今天早上张涛对我说有个讨论班的文字他读懂了但是图没懂，因为图没有介绍。这是拉康的风格，他不是照着文本做演讲的，我们有的文本是根据录音和笔记汇总而成的，图也是即兴的，图和文字总是对不起来，录音也不清楚，也没有录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拉康就是故意这样的，因为他有句话说注意不要理解得太快，如果你们很快就理解了，那就不对。

本来我计划我每节课介绍拉康讨论班的一章，但是我遇到了两章：话语与文字、话语与真理，这两章我都没有读懂，显然要想读懂它们就必须把拉康的全部讨论班装在头脑里。但是我还是知道拉康的整个讨论班的基本意思，我根据他的基本思路介绍。当时拉康提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话语如何变成文字。他不断地通过希伯来语、汉语、拓扑学、逻辑学的公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关于文字的作用他有一个回答：它让

人们讲。拉康写希伯来文、写汉字、画拓扑学的图、写逻辑公式，总是有人说：“我不懂，我不知道那些文字。”拉康立场的回答是：“之所以你不懂，就像你每次见到你的分析者，你也不懂。而且你不要试图理解得太快。”人类的存在都是一个言说的存在，怎样把言说变成文字，究竟有什么用？就是文字让他去讲。在博度安（Baudouin）的电影《俄狄浦斯在中国》中，当一个母亲写孩子的名字的时候，母亲就讲这个孩子的历史。就类似于不论我讲的东西她懂不懂，但是至少让她想起了钱包里有个文字，可以让她来这儿讲她自己的东西，同时我也在这儿写，好让你们继续讲。拉康引用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的例子，拉康指出索绪尔也没写，他仍然是说。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是他的几个学生的笔记的综合，说变成了书写，书写又使大家说。

因为对于拉康来说，拼音的书写是不够的，他就借助了汉语的书写。汉语的书写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和写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更一般的问题。今天早晨我没有烟了就去烟店，我想换一个牌子的烟，老板娘给我介绍了一种，我觉得太贵了，于是我就买了一个便宜的，而且包装很好。我知道是“天下秀”。张涛就纠正我“下”应该发四声。他补充说：“对西方人来说第四声很难发，因为必须要有杀人的冲动才能发出第四声。”声调起了一个区分性的作用。当然并不是说讲法语的法国人就没有杀人的冲动，如果这么说的话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杀人的冲动。法国的雪茄烟上都写着“抽杀”，如果你抽烟就意味着自杀。所有的分析家都抽烟，这就表达了所有的分析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希望自己被杀死。“天下”对中国人是很重要的，“秀”是漂亮的意思。天下并不总是很“秀”。至少我们从电视中看到中国的风景确实很漂亮，让我们相信天下是很漂亮的，但是天下是否漂亮就没有人知道了。至少精神分析家没有成功地杀死他们的父亲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一直在抽烟。以前中国都抽烟，所以我听到一个隐喻，一个人死了就说这个人抽烟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道家，支配着男人和女人命运的是道。拉康说之所以是男人在左边，女人在右边，是他们的命运决定的，命运在中文中由

道来命名，趋向于不朽、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道，对于拉康来说决定男人和女人的命运的是石祖。饭后一支烟，或者爱后一支烟，这是中国的成语，法国是不说的。和石祖相连的是西方文明建立的神话——对父亲的谋杀。在西方对应着道家的“道”的概念的是父亲被谋杀，父亲指的是原始部落中间的父亲。原始的父亲拥有所有的女人，那么这个群体的男人们为了获得女人就必须把父亲杀死。在中国，道家的基本的原则是道，这显然和西方的原始的父亲不同。

汉学家在讨论“女人要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参考了拉康的意见：女人要继续。在道的概念下，男人和女人朝向道的道路是不同。在拉康那里，男人和女人相对石祖的关系也不一样。公元后九百年，朝向道的女性的代表是观音，而朝向道的男性的代表是（具体人物还需要查找），他划开肚子，让万事万物都出来。请注意他的行动，男性的创造者具有母性的特征，他把自己的肚子划开，让东西出来，然后他就变成人了。道和老子有关，老子自己怀了孩子，通过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具有很强的女性化形象，老子是男的还是女的仍然不清楚。而在弗洛伊德的教育中，男性是没有母性特征的。在女性的维度中，陈靖姑放弃了自己的孩子成为一般老百姓的母亲。她一方面成为了抵抗洪水的领袖，和一群女性一起抵抗洪水。第二个事件是，一个男人受到白蛇的威胁，她以母亲的方式在水中把他救出来，并且和他结婚。那么就可以看得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生命过程中，都具有保护孩子的母性特征，不管男的一方还是女的一方。这是在中国的神话中。而在拉康的思路中，男人是没有任何母性特征的。在女人那面是否有母性的享乐、是否有和孩子分享的享乐，这在拉康那是不清楚的。因为这是我即兴讲的，没有带书，叙述中不是很准确，来不及查书，仅凭记忆。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描述也许大家都能清楚中国的情况和拉康关于男人和女人的讨论之间的差别。

我想补充一句，道作为动词是说的意思，石祖也是能指，从能指的意思上来说这两者是有一种联系的。不论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西方人

还是东方人都是言说的存在。所以我们要研究在不同的语言学群体中能指的意义。道本身有说的意思，而石祖没有这个意思。

问：你对道是如何理解的？

吉：在翻译成法文的时候，一般是“道路”的意思，但是人们忘了它可以当作“讲”来用。是你们需要回答当你们说“道”的时候，你们想的是什么？是道路还是言说，你们是否想到这两个意思。我知道道和老子有关，传说老子自己怀了孩子，所谓的道出来就是把孩子生出来，发展下去。

问：道是不能言说的。

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法语中至少有 20 多种翻译，我假设你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我想说的是老子对中国人来说，类似拉康对法国人，都是非常复杂的。

我想说的是我有一个皈依证，这是青城山太清宫给我办的。有一个道名，叫结崇义。他写的是简体字，因为他是共产党的道士。我不是共产党所以要用繁体字，结崇義。

拉康说，在孟子中氣和義之间有一个东西是很值得研究的。

第九讲 声音的知识*

吉：如同我所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越来越少，霍大同解释说可能他们太累了，这我可以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还有一些人仍然来了。如同长途赛跑一样，跑到最后只剩一个。我看到大家就在想只剩一个人的时候会是谁呢。（大家说：霍大同）至少我不会疲倦，哪怕霍大同也疲倦了，只剩我自己。人们会说这个人完全疯了，一个人在讲。最近我在成都听到个谣传：拉康是疯子，很多在他那儿做分析的人都自杀了。另外我看到张涛在读《精神分析的黑皮书》，这是个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的攻击，说拉康派的分析家都是疯子，这和说拉康是疯子离得不太远。疯狂和精神病在法语中有一点点差别，当我们说拉康疯了也可以说拉康是精神病。

一个精神病医生说某人是精神病，是他的工作，需要一个分类。但是对精神分析家来说这个分类不是他的工作。在弗洛伊德那个时代，他想定义一个正常人是什么样子。他回答说，某个人是正常人就是稍微有点精神病，稍微有点神经症的人。拉康在这里就往前走了一大步，他的精神病学博士论文处理的就是妄想狂，他在1932年要成为精神分析家的时候就说，妄想狂和知识联在一起。所谓知识就是从人类开始到现在为止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就是人们相信人们所说的东西是对的。妄想狂就是这样，为了获得知识我们必须相信人们所说的。根据这两个精神分析家的经历，我们可以说，拉康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说法就给出了和知识的区分。这就颠覆了整个知识的整体。正是这样一个说法，

* 时间：2008年3月19日上午。

让很多处在知识领域的人去工作，思考这个问题。拉康说的时候涉及语言学家，语言学家要把拉康赶出高师，拉康本人并不反对语言学和语言学家，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拉康说语言学家相信自己所说的，而精神分析发现是人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的最基本概念是无意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发现依赖他所谓的通向无意识的王道——梦的工作。每个人都做梦，但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做梦，每个人都有语误，但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有语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所做的，这就让我们去思考究竟我们做了什么。你们并不知道这三周以来，我在这工作的发现，这也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今天早上说的不是我预期要说的。

我这时突然在脑中冒出个词，oyez, oyez（肃静，肃静）。在中世纪时，那时只有少数拉丁语的书，大多数老百姓不讲拉丁语也不读拉丁语的书，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好的记忆。神父在讲道的时候就要说 oyez, oyez（肃静，肃静），注意听，注意听，让他们记住所说的。oyez（肃静）是 ouïr（倾听）的第二人称复数，是倾听的意思。当时笛卡尔同时代的人 Mersenne（梅森）写了本书叫 *des choses inouïes*（没听见的东西）。那时哲学和精神病的抑郁混在一起。他在书中说必须听到 e 才能离开这种抑郁，也许正是借助他姓中的 e 他才离开了精神病的抑郁。如果我们去掉 e，就成了 Mrsnn，精神病的抑郁。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拼音文字中，如何放在汉字的文字和语言中就是个问题。另外一个游戏是，当我说我听到，在中世纪时是 J'ouïs（听到），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耳朵来听就成了享乐（Jouis—Jouissance）的发音了。我把中世纪的我听和现代的享乐联系在一起也许是疯狂的表现，我在巴黎的某些同事不敢做这种联系。如果我们说听到什么是要有元音的，如果没有元音就没办法发出声音。精神病的抑郁就是不说话，之所以要说话是有赖于这个元音，一方面我说的时候要发元音，另一方面我被说的时候也是元音让我在说。所以 Mersenne（梅森）才说，要元音 e 帮助才能离开抑郁。

这个不能发音的父姓让我想起了上帝，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上帝

的姓名是不能说的，在死之前也是见不到他的。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个真正的精神病，那么就是上帝，因为他的名字是不能说的。注意，为了知道上帝是精神病，只要打开电视看看西方发生的事情，三个一神教之间的冲突（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明白上帝是个精神病患者。我说的是西方，尽管你们中国现在有些问题，比如说西藏的问题，但这和西方完全是没法比较的。甚至我收到从广东打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成都有很多警察，是不是有很多暴力，我是不是有危险。我说我仍然在这儿上课，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成都很大，可能我没遇到。中国的一些问题和西方的问题——三个一神教的冲突是没办法比较的。911的时候我是12号到的北京，就对田惠萍说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开始了。这三个一神教的冲突是你们很难想象的。拼音文字中书写和言说之间有一致性，书写的是一个声音。在中文中汉字和语言的关系与拼音文字中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考虑汉字和语言的关系显然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讨论。在西方的框架中有能指（区分性特征）、所指（意义）和参考系（音节所涉及的外部的客体）。我在成都散步的时候没看到很多警察，也没看到西藏人。我看到很多孩子用手指在指，周围的人在对他说，这时孩子不是言说的存在而是被言说的存在，周围人不断对他说，他正是听了周围人说的话最后自己才能说，在说之前他是用手来指某个东西的。但是他指某个东西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要吃这个东西还是玩这个东西，只有等到他用语言说要这个东西来吃还是要来玩。我也不知道法国的孩子是否和中国的孩子一样用手指头指，但是有一点差别，法语的书写和说的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指示的东西就是书写的文字——拼音文字，中国的孩子指示的东西应该是汉字。刚才这个想法有点让我理解法国的文字和汉字的差别，但是我仍然不能说得很多，但是我知道这是西方语言学家根据西方语言构造的理论，要转到汉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我们回到要讲的问题，好像我忘记了要讲的，实际并没忘记，刚才说的只是导言。回到临水夫人和陈靖姑的传说上面。在讲之前给大

家提个请求，汉学家在写临水夫人的传说时没有翻译完整的中文文本，只是摘要，汉学家说她的老师施舟人有。施舟人给了她一些文本。这就唤起我的好奇心，想找到这个文本做些工作，在巴黎也问过严和来希望他去找。如果你们谁能找到希望能够送给我，我自己可以在巴黎对这个文本做些工作。弗洛伊德写了篇文章“性的解剖学的差别和心理学的后果”，弗洛伊德说解剖学的差别可以引起心理学的后果，拉康提出批评说不是心理学的后果而是精神分析的后果。解剖学对西方医学的发展很重要，但是医生遇到些症状不可能在解剖学的水平上找到解释，弗洛伊德正是在解剖学的水平上遇到无法解释的问题才开始他的发现。所谓解剖学，包括现代的解剖学利用B超技术、核磁共振技术，仍然是目光对身体的观看，看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称为符号（*signe*）的东西。符号说的是能指和所指的整体现象，正是霍大同在黑板上写成猴子的东西。

弗洛伊德讨论心理学，而心理学处在能指的范围，能指也就是为主体而代表着另外一个能指的东西，而这个主体是无意识的主体。符号是某一个东西为另外一个人指示着的某个东西，所以这样一个解剖学的东西是参考系，解剖学的东西具有某个符号，对另外一个人具有一种意义。来自解剖学的符号对医生有一种意义，医生可以不管病人说的是什么感受，而是通过解剖学的对身体的检查去发现有什么问题，以此确定是手术还是吃药。医生通过解剖学的检查发现问题以便解决，由此西方医学取得巨大的进展，但是它遇到有些在解剖学的层面上找不到的症状，这是弗洛伊德工作的开始。从这个症状开始我们讲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在解剖学的层面上找不到原因的命运。一个是拉康勾画的命运，另一个是临水夫人的传说中显示出来的命运。拉康用了个词 *destin*，中文翻译成命运，这是个很强的词。他想说的是这个东西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没办法逃避。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死亡，因为死亡是无法逃避的。我们在成都播放过拉康的一个演讲，是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演讲，他面对听众说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死亡，道家发明了很多神仙、不死的神仙，表明他知道普通人是要死的。永生的神仙

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常人不死。

在谈到男人和女人的命运的时候，弗洛伊德在解剖学的意义上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男人有阴茎，女人没有阴茎，这是精神分析刚开始时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阴茎的有无构成男女的区分，从医学检验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怀孕几个月的时候可以通过B超看到子宫中的婴儿有阴茎就是男的，如果没看到就说是女的。在胎儿的层级上阴茎就构成了区分性特征，对成人的妇女来说乳房是区分性特征。现在中国禁止产前做性别的鉴定，因为普遍的情况是如果是女孩那么很有可能会做人工流产，这涉及到胎儿的生或死的问题。这样一个阴茎的有无构成了符号，这个符号对另外一个人有意义，涉及到生死。当时精神分析遇到的困难是有了符号后，如何从阴茎的有无变成石祖的概念，离开解剖学重新讨论男人和女人的命运，拉康提出了石祖的概念。如何从一个允许人们区分男人和女人的符号变成被拉康命名为石祖的能指，这个过程如何进行？

在精神分析学界，一个普遍的对阴茎和石祖的混淆表明了一个从符号到能指的转变的困难，能指的意义在于去掉解剖学意义上的参考系，要理解这种切掉是很困难的。这个例子，石祖（用的是希腊语）和阴茎（用的是法文），让我们想起埃菲尔铁塔象征着石祖，也许有不少女人幻想自己丈夫的阴茎像埃菲尔铁塔。但是埃菲尔铁塔本身不是阴茎，它是石祖的象征，因为阴茎竖立起来以后会掉下去，但埃菲尔铁塔始终立起，不会掉下去。在中国某些地区可以看到石头的建筑——塔，始终都是竖起的，经过了上千年。石祖和阴茎的差别之一是阴茎偶尔才会竖起，而石祖始终都是竖立的。

我们来谈临水夫人所涉及的问题，如果说道不是石祖的话，说明道和石祖的参考系是不同的。说到参考系，女人的典型形象是观音，男人的形象是把肚子剖开，把内脏拿出来，由此产生了很多后代，最后到了白蛇，这个形象涉及的不是有无阴茎的问题。女性那边是母性的问题，男性那边因为把肚子剖开类似生产的过程，也是母性的特征，不是阴茎或石祖的参考系。我很想看中国的文本，究竟是那个法国女研究者忘掉

了阴茎的参考系还是确实文本中根本就没有阴茎的参考系。现在比早上刚开始时人多了，我再一次提出请求，如果你们谁有这个文本的话希望能给我。

霍：为什么你不去找作者要？

吉：我也很想见到她，但是到现在我也没见到。我希望休息下，以便某个人举起手说找到了，这个举手是阴茎、石祖的形象。

在陈靖姑的传说中，她为了抵御洪水就流产了，照理说胎儿应该死了，但是在道家的传说中胎儿仍然活着。之后她就变成了人民的保护神，生活在同性恋的群体里。这时有个声音、预言，告诉她将和一个男人结婚，但她流产说明她已经有了性关系。根据法语的文本，照理说她应该和男人有性关系，但是在叙述中阴茎这个词没有出现，出现的是性高潮这个词。在男人那面就有白蛇，白蛇代表没有限制的性欲，同性恋的圈子也代表没有限制的女性性欲，中国用奸夫淫妇表达没有限制的性欲。当时她救了预言中要与她结婚的丈夫，如同母亲救孩子一样救了这个丈夫。之所以救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有阴茎，而是把他作为处在危险中的孩子救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男人处在孩子的位置上，女人处在母亲的位置上。她如同对待一般的孩子那样救了他，而不是因为他男人的形象而救了他。这时她就变成了保护神，而被保护者始终处在危险中。她变成了女神，保护有问题的母亲和孩子。生产、怀孕、出生、教育，这些都意味着孩子和母亲所处的危险状态。这个叙述的内容和拉康以石祖的概念讨论的男人和女人的命运有很大的差别。拉康的讨论也有危险，危险是阉割。在刚才的例子中危险不是阉割，因为没有阴茎的在场，孩子和母亲中间真正的危险是生和死的危险。但里面有个东西和拉康的讨论有些关系，出现了性高潮的概念，这和小死有联系。在拉康这个地方有阴茎作为符号，石祖作为能指。“道”在法文中翻译成“道路”、“言说”。“道”也是个能指。在法国，文字主要出现在书中、报纸上，而并不像中国一样到处都是，在中国甚至在道观里到处都是书写。那么这个文字对中国的孩子也起了参考系的作用。道，可以写的很漂亮，但是至少还有说的

意思，它是会意字，它在说。由于她流产的事件——尽管孩子仍然活着（即他变成了不朽）——就提出了问题，如何从死亡到不死，这个转换有困难。这个困难类似于西方的从阴茎到石祖的转换。已经十一点了，我想结束。谈话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至少一支烟是小小的阴茎。

讨 论

张涛问：讲“道”的时候有两个翻译，只讲了声音，没讲那个看。

吉：我有个局限，因为我遇到些问题所以没办法讲，至于书写怎么构成的是你们的问题。显然你不能想象我都能解释得了。我向你们提出问题，“道”是怎么构成的？必须要说我在法国的大学学了两年中文，第一年老师跟我讲汉字的语源学，他讲完后就说这是语源的科学，在这之外还有想象的语源学。我问他什么是语源的科学？他说他是根据中国的语源的科学而讲述的。但是在西方，语源学的讨论经常导致谵妄的结果，有很多语源的解释类似谵妄。这也许说的就是语源的想象？

霍：最早的道，在甲骨文、金文中，是一个人在十字路口观望走哪条路，这时就有个声音干预进来告诉他应该走哪条路。

吉：可能是谵妄了，我的理解是，当一个人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去哪的时候，这个声音要么是他自己说的，要怎么走；另一种是听到某个声音在画面之外。这正是拉康的教育想说的，一方面是话语如何变成文字，另一方面是文字如何让我们讲，道也起了这个作用，文字让我们讲。张涛提了个问题让我讲了很多，但是你没有说你是怎么解释道的。我们可以对自己说，如果他有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有个答案，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答案说出来。你的回答既不是我的也不是霍大同的回答，是个隐藏起来的回答，你不应该隐藏起来。

张涛：在拉康波罗米结的三界中，符号和想象界交叠的位置，我觉得这个交叠的“道”处有个声音“savoir”（知识）=Ca voit（它我在看）=sa voie（它的道路）=sa voix（它的声音），这是我的联想。

吉：很好，张涛用法文做了这个游戏，一方面有道路，另一方面有声音。在解剖学的层面上通过目光来获得一个知识之外，还有个声音的东西。我在法国对朱利安先生说，我到中国去是想知道中国人是否在耳中听到一个声音。因为《圣经》中经常遇到某个人说听到上帝的声音，我在中国的文本中还没找到这种描述。我有个疑问，是否中国人也听到一个声音，幻听。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找到，现在的这个讨论可以看到这个声音是在画面之外的，也许是个启发。在画面之外的声音让我想起拉康的讨论，有些东西是被符号界排除的，它们在实在界重新出现。在西方说在实在界重新出现的声音，幻听，是上帝在说，在中国如何处理这个画面之外的声音是个问题。

杨春强：辅音的区分性在字形上被压抑了，但在象形文字中没有这种现象。拉康强调区分性主要限于视觉上，刚才说的“有些东西是被符号界排除的，在实在界重新出现”。我觉得被符号界排除的也对应想象界，就是既有幻听也有幻视，在中文中可以看到，如果语音的区分性不能达成，那么就通过字形区分。

吉：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元音声音就发不出来，在西方的语言中上帝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当时希伯来文只有辅音的书写，没有元音的书写，当时人们把文字视为上帝的文字，上帝是不能说的。Mersenne 在讲哲学的和精神病的抑郁之关系时举了个例子：如果没有 e，声音就发不出来，如果没有元音就是抑郁的状态，同时元音在西方语言中和声音联在一起，是发声的音素。我们说的是在西方的文化中有人听到了一个声音，把它归结为上帝的声音，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一种幻听。针对这个幻听拉康说，被符号界排除的东西在实在界重新出现。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不出现幻听的保护机制。但是是否中国的精神病患者中间也出现幻听需要你们的回答。我曾经在成都介绍了一个个案，是和一个女分析者的工作，她听到了一个声音。这是我的经验，我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工作。我不知道中国的精神病是否也听到声音。同时学胶泥的各位也可以看看这个个案，这个个案是通过胶泥来进行的。霍大同解释道

字的时候说声音是在画面之外，让我想起精神分析和科学都是在中国之外引进的东西，这是你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停在最最基本的问题上。

霍：大家要注意到中国是有个缺口的，整个佛教的传入是因为我们到西方去寻找什么东西，因而有个缺口。西方的缺口是到东方寻找，任何文化都有个缺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是要到东方去。

吉：你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比我清楚，我知道那个时候西方人到东方用炮和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来寻找一些东西。他们是来寻找所有权，一种享乐、商品的享乐，寻找对中国的控制。一个文化需要寻找另外一个文化，这显然是需要的，但要看以哪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四川要把修路权卖给外国时就遇到了很强的抵抗，在人民公园还有个保护运动的纪念碑。我知道有几个精神分析家到中国来寻找是带着殖民主义的方式来的，如果这种寻找是一种相互的交流就是可以进行的，如果是带着殖民主义的方式就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如果声音从场景之外返回，它是从西方的实在中冒出来的，要知道，中国人曾经听到的炮声是从西方的实在中冒出来的。

谢谢张涛，你打开了一扇门让我可以讲到这些东西。

第十讲 Ludus*

吉：今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结束，因为有点拉肚子。昨天晚上在街上遇到一对很穷的夫妇，他们既不能讲法语也不能讲英语，是典型的四川人，他们好像可以讲普通话，但是带着很强的四川口音，我能和他们讲话，这对我是第一次。他们先问我是不是法国人，他们和一对很有钱的夫妇住在一起，有钱夫妇的女儿想要去法国，想问我可不可以见见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这个女儿快要毕业了，学的是商贸。这时这对夫妇就把手机掏出来打了个电话，很奇怪，虽然中国的穷人很穷但都有手机，一刻钟后母亲和女儿就来了，看穿着打扮就是有钱人，而且长得很漂亮。一般有钱人要比穷人看上去漂亮。在我的眼中看起来很漂亮，漂亮的妈妈、漂亮的女儿。我以为既然女儿想去法国总会讲点法语，没想到她一点都不会。她们就邀请我去餐馆。我说我不饿，（菜）就不要点多了，没想到她们点了一大桌。她们把啤酒、白酒都点上了，问我要什么。我们在那儿说了两个多小时，她们说的是中文，奇怪的是我能听懂大部分她们所说的，包括她们相互说的。女儿在学习，爸爸很有钱事情也很多，他忙生意去了，妈妈什么都不做。妈妈用普通话说说她就在家里玩。我就补充说四川话不说玩，说耍。小姑娘就坐在我的旁边，我就开玩笑说，我如果再年轻点就带你走了，去结婚。她妈妈听了就开玩笑：“为什么不是我呢？”也就是说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很好。因此我们就在那儿开了很多玩笑，我吃的比平时多，在中国点了那么多东西不吃是很不礼貌的，然后我今天就拉肚子了。父亲是个做白酒生意的大公司老

* 时间：2008年3月20日上午。

板。最后女儿就知道了，如果要去法国就至少要学两年的法语。两年对我来说还是可以等的，如果和一个有钱人的姑娘结婚显然比和一个穷人丫头结婚好，我也可以在妈妈和女儿之间选择，因为妈妈说她很自由，什么事都不做。因为昨天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已经讲完了，今天就不想来了，结果昨天的艳遇让我又有些东西可以讲，我要对孩子们说，希望你们到别处去耍，我也去别处耍。正是昨天晚上的艳遇让我可以用优美的四川方式做个引言。我查了字典，“耍”字有很多句子，有不同的含意，我没带字典所以没办法讲。耍和精神分析有关系，有人批评拉康，因为拉康把精神分析当作语言的游戏。

霍：他问我四川人可不可以用耍来说耍词？我说，耍字眼，耍文字游戏。

吉：拉康所发展的精神分析治疗整个都发生在文字游戏、辞说中。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整个精神分析的治疗都是语言的游戏，刚开始人们还不懂，对这有抵抗，后来才逐渐了解，精神分析是说人作为语言的存在要么讲、要么被讲，在讲和被讲中间精神分析得以进行。精神分析的一个思想就是你去别处做游戏（别处指的是无意识）。教孩子们、未来的精神分析家去别处玩，这就是精神分析教授的一个目的。这些孩子、精神病患者（拉康本人也被攻击为精神病患者）到别处去玩。我比较西方和中国，尤其是成都，既然成都人不仅仅只有孩子可以做游戏，就像我们可以在饭桌上做这种游戏，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或许中国比较容易接受精神分析，尤其是成都。当然这也许是我的一个幻想、理想，就是这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最容易接受精神分析。我们能在中国的很多电视台看到很多玩笑的节目，昨天晚上回到宾馆后我就看电视，不只是有孩子的父母在开玩笑，孩子也在做文字游戏。这样一种情况我在法国从来没有看到过。

我自己很早就用的邮箱地址是 ludus2@free.fr，ludus 在拉丁语中是开玩笑的人，ludus 在现代语中是开玩笑。在拉丁语中 ludus（开玩笑）和 scholus（开玩笑）两个词都表示教育应该在玩笑和诙谐中进行，后

来玩笑的意思就消失了，在法国的大学中就保留了 *scolaire*（摘要），*scolastique*（摘要），没有了诙谐和玩笑的意思。有个中世纪后期的哲学家，他有个拉丁语的名字 *comenius*（夸美纽斯），他在教育中引入了诙谐的成分，他让学生演戏，戏是有点喜剧色彩的戏，有点寓教于乐。这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后来这个运动消失了，更多地发展严肃的教育。我引入中世纪消失了的含意是为了让你们理解为什么我在这儿开玩笑，有寓教于乐的意思。相对而言我在成都开玩笑比在巴黎更自由，我在巴黎讲拉康与孟子，那些拉康派的老板就说：“你最好到一边玩儿去”，我就不得不买飞机票到成都。当然也有可能等到要结束的时候你们说，你到一边玩儿去，我就只能回巴黎了。你们不用担心，我星期一就走了。我不是个拉康派的老板，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也不在，我可以和老板的妻子、女儿开玩笑，如果老板在的话可能就稍微复杂一些。至少昨晚不是我付钱，是老板付钱。如果我们做精神分析，我们就要付费，有意思的问题是究竟哪个付费。这个涉及到我们作为分析家工作的时候是否也在耍文字游戏，因为在治疗中经常确实是生或死的问题，这时是否还能耍文字游戏？

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有人对我说拉康的分析者有很多自杀了。精神分析本身并不阻止一个人自杀或不自杀。这个谣传居然传到了成都，说拉康是精神病，他的很多分析者都自杀了。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确实存在着自杀的情况。如果我们看社会学的统计，就会发现没有做精神分析的人群中自杀的比例大于做精神分析的人群汇总自杀的比例。我们能不能在治疗中耍文字游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注意到一个人进入分析的时候是被文字、语言耍，在语误、梦中都是被语言耍的。分析的整个进程就是分析者从被语言耍转到他要语言，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也要非常小心。尤其是在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工作的分析家，你们这里有一两个人会去精神病院工作，精神病患者耍的文字游戏能让你笑起来，这时要特别当心，精神病患者有种摧毁语言的技能。在某种程度上他能耍文字游戏，他要文字游戏让你觉得好笑的时候，要意识到

他的内心是被文字游戏耍的。这时要区分他做的文字游戏和电台做的文字游戏之间的区别，他内心是被文字游戏耍的。当听到精神病患者说到些很好笑的东西时要非常注意。拉康曾经说过，精神分析应该是可笑的（marante），marante（耍文字游戏）类似于耍文字游戏。也可以分成ma rante（纨绔子弟），指的是在法国那些依靠父母、自己不工作的有钱人，纨绔子弟。有很多人找拉康做分析，他自己很有钱，可以说拉康就是依靠别人的钱生活的纨绔子弟。当时法国有种习惯，有名的人死之前要记录遗述，即最后说的话；这仍是个谣传，说拉康死之前说：“我做了一些圆”。他缠了很多莫比乌斯带，圆也对应硬币，他挣了很多钱。可以看到拉康在死的时候仍然在耍文字游戏。因为在拉康那时已经有很多人批评精神分析时间太长，价钱太贵。所以也许拉康说最后这句话（传说有这么句话，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来回应这种批评，这涉及到分析中谁在付费。也许人们觉得精神分析太贵了就寻找另外的解决方案，可能其它的解决方案付出的代价更大。做精神分析表面上看可能费用较高，实际上相对其它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更便宜。在结束之前我想说精神分析的目的，可以说开始的时候是被语言耍，在结束的时候是你在耍文字。法语中文字是 mots，有相同发音的是 maux 症状。也就是做分析的时候是被症状耍，结束的时候是可以和症状耍，因为症状永远不会消失，只是说你能和症状耍了。为了把它翻译成中文，我想到 maux 和毛病有点接近。

问：拉康说妄想狂是两个人相互的猜测，有没有一个人的妄想狂。

答：说另外一个人是精神病，这是精神病医生的立场，这是由彼者做鉴定。拉康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弗洛伊德谈到了 Schreber（施雷伯）的个案，拉康说弗洛伊德不懂精神病，他没有这样的实践，他遇到的仅仅是妄想狂本人写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是荣格给他的，他根据这个写的评论。拉康和精神病人、妄想狂工作，有这个经验。拉康在写论文的时候也想要成为精神分析家，他处在分析中。他认为不是哪个人是妄想狂，而是知识本身是妄想狂。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所说的、

相信知识，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立场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而妄想狂作为知识的特征是我相信我所说的。所以说知识本身是妄想狂，如果认为彼者是个妄想狂，这是精神病的立场和精神分析的立场不同。

举个荣格的例子，Schreber（施雷伯）的个案是由荣格介绍给弗洛伊德的，当时荣格在瑞士的一个很有名的精神病院工作。1906年 Spielrein（斯皮尔林）到了瑞士，荣格作为医生照顾她，这时他发现了弗洛伊德，并且也试图用自由联想的方法治疗她，在这个过程中他爱上了斯皮尔林。1916年的时候斯皮尔林离开荣格去了弗洛伊德那里。和斯皮尔林的分离给了荣格很大的痛苦，他处在一种危机中，他觉得神在对他说说话，就写了一篇文章，人们一直没懂这篇文章。也许是通过这篇文章他离开了这个危机，后来人们认为当时荣格处在精神病的状态，荣格自己说是和自己的无意识的相遇。可以看到荣格和无意识的相遇起源于和斯皮尔林的爱相遇，这种爱让他变得疯狂，类似昨天晚上我和姑娘及她妈妈的相遇一样。精神病医生觉得荣格当时就是个精神病，但荣格已经接受了精神分析，说自己是和无意识相遇，而无意识的相遇和爱的相遇联在一起。我现在在讲的时候类似于在做精神分析，你们类似于我的分析家。荣格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无意识是结构化的，但是不像拉康那样说是像语言一样结构化的。通过他自己的讨论我们可以补充说，这个无意识是像神话那样结构化的。这是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差别，弗洛伊德说要通过精神分析征服神话学。当荣格说“我和无意识相遇”，实际上说的是和一个结构化的无意识相遇，指的是和俄国姑娘相遇，就是和像神话那样结构化的无意识相遇。精神分析不说单独的个人是妄想狂或精神病，当时荣格是因为这种相遇才处在危机中。

我的观点是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是妄想狂或精神病。我对斯皮尔林做了很多研究，她去找弗洛伊德的时候很渴望要个荣格的孩子，说了一些话。荣格当时说那个女的是精神病，她说的都是假的，我和她没有关系。因为引起了公众的抗议，类似现在的性丑闻，荣格想说自己清白就说斯皮尔林是精神病。弗洛伊德刚开始也不清楚，后来从分析中知道她确实

爱荣格，也和荣格有性关系。把“Spielrein”（斯皮尔林）这个名字切开，“spiel”在意第绪语中是在恰当的声调中做游戏的意思，“spiel”如果写成德文也是耍的意思，“rein”是纯粹的意思，还有总是诱惑人的意思。名字本来就是诱惑的意思，所以荣格也被诱惑了。她本人是犹太人，就被纳粹杀了。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她的名字“诱惑”，在纳粹那儿的命运就不一样了。不能根据类型说她是精神病患者或犹太人，应该更多地考虑她自己的名字，Spielrein有诱惑人的意义在里面。她本人是个音乐家，她的女儿是个很有名的小提琴家，她成了第一个女精神分析家。因为她的名字——在恰当的声调中做游戏，她发现了婴儿的语言 ma、pa，也许和她的名字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说她是精神病，她是犹太人，这时她就是被纳粹清洗的对象。如果从姓名考虑就不一样了，因为她和弗洛伊德相遇成为了精神分析家，对语言的诞生提出了新的解释，和语言学家有很好的关系，也是皮亚杰的分析家，她的名字带给她的命运和她作为犹太人的一分子以及精神病患者带给她的命运不一样。荣格离开严重的危机后写了很多书，也许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可以和他讨论，如果把他归为精神病患者就没办法讨论了。

希望大家注意。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他是某个先生，某个女士，某个小姐。这让我想起曾经讲到的例子，在北京田惠萍的星星雨遇到的孩子，他的母亲问我孤独症怎么办，我对她说：“你的孩子不叫孤独症，你的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她就说了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命名的时候就有个历史，我们马上就遇到了这个历史，这个孩子本身不叫孤独症，叫钱某某。中国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他取名字就代表了独特的东西。而在西方名字就没什么意思，在某种程度上你们中国人更有运气，可以通过名字的分析进入他的独特历史。在西方可以看到姓是有意思的，她诱惑了荣格，她成为音乐家，对婴儿的语言有个发明，这些和她的姓有关联，通过她的姓进入了她的历史。如果我们仅仅说她是精神病、她是犹太人，等于我们什么都没说。因为你们有些人要到精神病院工作，要注意你们不是和精神病人工作，你们是和被精神病医生命名为精神病

的人工作，在一个精神分析的立场要知道和我工作的人姓什么、名什么，他是具体的独特的，而不是像精神病医生那样说他是个精神病。我们可以在精神分析中说神经症的或精神病的，这是没什么意义的。更有意义的是转移，存在着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的转移，是爱和欲望的转移，我们可以说是神经症性的转移或精神病性的转移。转移类似于在荣格和斯皮尔林之间发生的转移，通过转移重复了童年的经历，这样才有可能从被语言要的状态到要语言的状态。

问：我的问题也来自个谣言，说吉布尔先生经过 15 年分析终于获得了对于女人的自由……

答：不只 15 年。这个自由是有限制的，只在说话的层面上。我知道在中国说话要小心，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比如在这个时候说关于西藏的问题，也许中国政府就不再邀请我来了。当然自由依赖于社会环境，不仅在中国，在法国也有限制。我在这里说得稍微比在外面更自由是因为我对你们有性欲。我也听到一个谣言，广州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遇到暴力没有？成都到处都是警察、藏人。”我在逛街的时候没看到，也许在某个区域确实有，你们更有资格说这个事情。恰恰相反，我成都的朋友都没有和我说起这个，而是广州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对于女人的自由，拉康在讨论班中就说没有纯粹的一个男人的统一性，当然也没有一个单独的女人的统一性。男人总是相对于女人而定义，女人总是相对于男人而定义。也许一个男人相对于好几个女人而定义，我也不清楚，也许一个女人相对于好几个男人而定义。没有一个孤立的男人和女人的定义。关于女人的自由我想起个故事，2000 年 8 月我到成都，霍大同组织了一个公开的演讲，当时我没懂为什么要组织一个公开的演讲，后来我想也许霍大同想为学校收点钱。（霍大同：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印象中我们任何一个演讲都没收过钱。）公开演讲一共 10 次，有次我在去教室的路上遇到了两个穿着很时髦的女人，而且很漂亮。我就在想这两个人是不是瘾症？她们是不是到我的教室听我演讲？我到教室后就发现她们也在。在演讲中的某个结束时间，其中一个女人就过来说她是个心理治疗师，

遇到一个问题是一个男人爱上了她、想自杀。我就对她说：“像你这样漂亮的女人，有男人要自杀的肯定会很多很多。”这就是我的自由，可以说她很漂亮。她听到这个以后就很不高兴，走了。为了让大家不吃醋，有个汉学家说我和其他分析家不一样是因为我爱中国，我就说我当然爱中国，我更爱中国的妇女，因为你们都很漂亮，尤其是在提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是葡萄牙等等，我们始终都有个感觉就是外国女人都比本国女人漂亮。我不知道中国男人到巴黎街头是否会觉得法国女人比中国女人更漂亮。所有说的这些都不是真理，都是耍的。

问：精神病的享乐是什么？

霍（解释他与吉布尔的交流内容）：因为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我就对吉布尔说，笛卡尔的同代人 Mersenne（梅森）提到如果把元音取出来他的姓就无法发音。类似于上帝不能发音。这时就像一个精神病性的东西。吉布尔先生的回答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比如上帝是个精神病、上帝不能说话。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说了这个，就用这个来判断某个人是不是精神病，这仅是提供理解这个现象的思路。”我又问可不可以说有个精神病性的享乐？吉布尔先生回答：“精神分析家可以想到什么就把它说出来，当然可以说精神病性的享乐，只要你自己是在试图理解精神病的现象。比如我说这个茶很好喝，可能你喝了以后觉得不好，也可能我仅是出于礼貌说这个茶好喝，而心里想的是很糟糕。我很喜欢中国的‘你是否觉得’这个句式，比如‘你是否觉得这个茶好喝？’要么这个茶很好喝，要么这个茶不好喝，这是不是真理呢？我们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说很好喝也许仅仅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真理性的东西是相对而言的，没有孤立的真理。对于精神病的享乐，有没有精神病的享乐？我不能说有或没有，这是你的工作。”

第十一讲 结语*

吉：这是最后一次讨论班，之前霍大同老师对我说希望我出两个题让学生写作业，以便大家能得到很好的分数，幸运的是，我不负责改作业，所以究竟你们答的如何和我无关，我还是提出问题。因此我想了很久，我从来都没给学生出题，我想我们出的题应该与拉康的讨论班“可能不是假装的辞说”有关，但我在想为什么不和我的讨论班有关呢？至少这是我对拉康的讨论班的阅读，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所谓我的阅读也是针对拉康讨论班的阅读，我的这个讨论班选择拉康的讨论班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刚刚以米勒的名义出版的拉康的书，而且本来就是拉康关于中国的讨论班，显然和大家有关系。在拉康的中国的讨论班中拉康 12 次引用了孟子，我在自己的讨论班中也想弄懂为什么拉康对孟子有这么大的兴趣？我考虑的是这个问题。拉康不仅对孟子很有兴趣，同时他在讨论班中讨论了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对他认为的男人、女人的概念有很大的发展。因为拉康的讨论班提出了男人和女人是什么的问题，我自己在巴黎开的讨论班已经有一年多了，研究陈靖姑、临水夫人的传说，在传说中她也提出了什么是男人、女人的问题，但她是在道家的框架中提出的，拉康对孟子有兴趣，但他本人没有给予道家以关注。

这样你们就有了关于中国的两个方面：道家的和儒家的。这两者和精神分析有什么关系？对拉康来说是很清楚的，他认为孟子或孔子的思想是和精神分析有关系的。在临水夫人这个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和精神分析有关，因为她在作为洪水的保护神的立场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 时间：2008 年 3 月 21 日上午。

针对整个社会的，而当她逐渐变成不朽的保护神时，她提出的祭祀是具有治疗意义的祭祀，涉及的不是整个社会，而是那些有问题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她提议的法事是建立在巫术的基础上的，人类学家把中国的巫术称为萨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说到中国文化的三个基本方面：儒家、道家、佛教，我们还忘记了巫术——萨满教。中国称为巫术的东西，不仅仅是中国的东西，而且是在全世界都存在的超越文化的一种原始宗教。我想强调的是萨满教和精神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当萨满在做法事的时候，他在倾听患者的言说的过程中感到自己内部的一些变化，然后把它表现出来，传递给患者，起到治疗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和精神分析有一定的类似，分析家听分析者讲的时候会唤起分析家对自己的分析，不是给分析者建议，反过来再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我们命名的精神分析的转移实际上是相互的转移，分析者在做自己的分析的情况下唤起了分析家对自己的分析，有个相互的转移。萨满处在一种灵魂附体的状态，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自已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他把对身体内部的感觉通过行动或通过书写表达出来，起到对病人治疗的作用。所谓具有治疗意义的宗教实践在全世界都受到排斥。精神分析在社会中占有它的位置也是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很多的工作，并不是社会自发地接受精神分析。正是因为这样我希望大家能对精神分析和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做些研究。我想就此提出些问题。因为大学是个传递知识的地方，给你们上课的教授是知识的拥有者，他们传递给你们知识，通过考试检验你们是否接受了知识。这是教授的立场，我不想站在这个立场上，虽然这个立场也是值得尊重的。我讲了那么多，不知道你们是否听到了，是否理解了。但是显然你们有各自的理解，你们把理解写出来就行了，你们也可以发给我，我也愿意看，但是我不打分。

我希望你们寄给我不仅仅是因为好奇，而是为了帮助我继续工作。因为拉康在讨论班上说这些关于孟子的问题是提给中国人（程抱一）的，希望中国人能回答来帮助他进一步工作。我的想法也是，因为我的关于拉康和孟子和临水夫人的讨论班仍然在继续，我希望你们写的东西帮助

我进一步工作。在大学里面假设教授将知识传递给你们，学期结束的时候写个东西看你们是否真正接受了知识，有些人工作得多、好，分数就高，有些人工作得差，分数就低。学校假设学生是没有知识的，我相反，我觉得你们知道的和我知道的一样。这种知识的混合能帮助我们工作，帮助我工作，也帮助你们工作。尤其是帮助你们以后成为精神分析家，接待一些有问题的人，对这些人你一无所知，这样一个知识的相互交换对成为精神分析家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刚才说的是精神分析的立场和学校的立场，拉康不在大学任职，我也不是，相反霍大同是。我们觉得他一方面是精神分析家，一方面是教授，这个位置是很困难的，幸好我不是，相对比较轻松。如果你们的作业交给霍老师，他要给你们打分，这是老师的角色。作为精神分析家他也许可以和你们讨论，看他知道的东西和你们知道的东西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相互交流的。最后寄给我，对我也有帮助。在提问题之前我想说，现在在巴黎有一些讨论，居飞在巴黎做了个报告讨论拉康的命题：“精神分析家仅仅管他自己和几个其他人”。当时拉康提出这个命题是针对IPA，他们有很多制度化的东西，要想成为分析家你需要做什么，拉康就反对这个东西，提出这个命题，他想说的是大学的文凭不能保证成为精神分析家，由此他建立了他的学院——巴黎弗洛伊德学院，试图做一些新的努力来培养精神分析家。居飞的报告就是讨论拉康的这个命题，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大学的文凭不能保证你成为精神分析家。

在拉康的讨论班中有些拉康写的中文的《孟子》语录，你们怎么理解拉康对他写的《孟子》中的句子的回答？对《孟子》的句子拉康有个解释，你对这个解释是否同意？为什么同意？为什么不同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孟子》中找到拉康对中国人提的问题的回答。比如关于拉康提出的问题，把《孟子》怎么说的找到。第三个涉及到的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关于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有个西方的回答——拉康有个回答，我也有个回答；另外在陈靖姑的传说中也有个回答，你对陈靖姑的讨论有

什么理解？

赵旻正在翻译我的《拉康和孟子》讨论班的提纲，上面有些中文材料和评论。因为我们后年要开一个关于“拉康与孟子”的大会，不需要成绩的其他人也可以考虑写点东西，为后年的拉康和孟子的讨论做准备。在法国有几个精神分析家在拉康和孟子方面做了些工作，有个网站（拉康中国），我在成都试了几次都没能上去，我准备回去后把上面的文章下载下来再寄过来，不是为了你们这次课的考试，而是为了后年的讨论。我在西安讲了九个小时的课，我希望有些回应，结果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回应，让我比较失望。在成都还有回应，至少有个人在翻译我的东西，有人问我问题，希望在这两年之内能不断地收到你们的回应，以便知道你们确实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而且做了些工作。实际上拉康和孟子这个问题的提出不像是数学公式，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谈自己的看法。这个工作要比大学的工作更为复杂，因为大学的工作目的仅仅是得个好分数，而这个是要求你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至少我发现今天的笑声比前天少。

剩点时间我们讨论。

讨 论

问：前几天吉布尔先生讲中国文字对孩子也有参考系的作用，我和一个孩子一起工作，让我很吃惊的是他用胶泥做了两个字。能不能对此再讲一些。

吉：这是昨天她提出的问题，当时她说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单独谈一下，但是我有些事情就走了。虽然我走了，我想到的是为什么这个重要的问题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提出来？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正好她现在提出来了，很感谢。之所以让孩子做胶泥是因为他说话困难，我们让孩子把胶泥带来的目的仍然是让他说，看他对做的东西怎么说，比我们看胶泥做的东西本身更重要。当然你说这是个三维的书写，问题是这

个孩子对他用胶泥做的两个字说了什么？拉康的问题是怎么把言说变成文字，他就试图写拼音文字、画图、写中文、写希伯来文、画拓扑学，之所以做这个仍然是在说文字有什么作用？他得到的答案是文字让人讲。孩子做的这个胶泥的文字，它的作用仍然是让他讲。我们要打开耳朵去听，他做的文字让他说了什么。你提的问题让你讲，让我讲，让大家讲。孩子带来这个东西，我们要理解这个东西起的作用是他讲，我们要打开耳朵听他就他自己做的东西说什么，而不是看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

关于文字，我现在不能想象西方的孩子或者法国的孩子做一个胶泥是A、B这种字母，估计有，但我自己没遇到也没听说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和西方的文字也许是有差别的。在街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三维的中国文字，在晚上霓虹灯的牌子都是三维的，三维的文字在中国到处都有，这是第一个。第二，文字诞生的时候也是三维的，比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它是在泥板上用工具印刻进去，需要用暴力把文字刻在物质的支撑上。中国的文字也一样，我们知道先是刻在牛的肩胛骨上，或是铸在青铜器上，都是三维的，后来因为纸的发明才变成了二维。这个问题让我讲了这么多，任何一个人带个东西、带个胶泥作品来，最最基本的仍然是他做的东西让他说了什么？这时我们更多应该打开耳朵而不是眼睛，我们不是去看他做了什么，而是做的这个东西让他说了什么。显然，我们就三维文字说的东西不一定和孩子说他所做的东西有联系，他说的完全有可能和我刚才说的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他说的，而不是去看他究竟做了什么。对我们来说，讲的时候有很多方法，比如开个讨论班就可以讲，但是我们在分析中接待的人没有其它办法来说，我们就提供胶泥这种方法来让他说。之所以现在我们有其它方法来讲，也许是因为这之前我们也没办法讲，只有一个方法——到分析家那儿讲，通过这个讲出来以后，使我们现在有可能找出其它方法来讲。

问：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是靠写，他没办法说话，都是平面上的，这样才想到做胶泥，但是和写相比并没有转变。

霍：你还没懂他的意思。这个时候孩子说的是不是不一样？通过做

胶泥，他说的东西和书写的时候是不是不一样？这是问题的关键。（答：没有，他很附着于写上面）说不定是你附着于这上面，他才附着于这上面。因为你始终没说他怎么说。可能你很关注他写的问题，你没有在他写的时候让他说什么，说不定是这个。

稍微解释下，昨天我们走到望江公园的时候吉布尔先生对我说我们胶泥小组的一个问题。

吉：我注意到你们小组在工作的时候，哪个人带了个胶泥以后所有的人都去看，争先恐后地去看这个胶泥究竟做什么，而没有想到胶泥是个说话的支撑，究竟做胶泥的人说什么？这是更重要的。没有打开耳朵去听，好像是种诱惑，中国的书法确实是有诱惑，你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字很少到处写。而中国不管是庙、道观还是名胜古迹，到处都是书法，说明这种东西确实有种目光的诱惑。现在可以看到胶泥也对你们这些小组的人构成了诱惑，大家都争先恐后去看胶泥做成什么样子，而没想到做胶泥的人因为这个胶泥而说什么。形象、图像对人的诱惑在电视里表现得很清楚，中国尤其如此，每家的电视都是放在中间，而且很大。

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自然就不能说，实际上是被形象所诱惑。正是这样，商家看到了这种形象诱惑的魔力，就有了很多广告，比如可口可乐的广告，你看久了以后也会情不自禁地喝起可口可乐来，不管你自己究竟喜不喜欢。这是广告形象的诱惑导致的，这个全世界都存在。我见到很多外国人对刻在石上的汉字不断地拍照片，这些字对他们也构成很大的诱惑，但是很少有外国游客问它说的是什么，更多的是被刻在石头上的形象所诱惑。不久前我和霍大同一起访问了个道观，道观中写了上百种不同的“寿”字，这个当然也有诱惑力，但我关心的是“寿”字在中国文化中究竟想说什么，而不仅仅被各种各样的寿字所吸引。他用手做胶泥，这个地方是有种暴力的，相对书写需要更多的力量。其间的差别类似一个雕塑家把石头破坏掉来构成一个形象和画家在画布上作画之间的差别。他有些问题来找精神分析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有些暴力在他身上存在，但是他没办法说，这时他可以通过手工胶泥来表达，

这个表达出来之后有可能通过语言说出来。胶泥的益处之一就是他的暴力可以通过胶泥得到表达，然后可能把它说出来。更多的应该是听做了胶泥以后说什么，通过胶泥他想说什么，而不是看胶泥本身。比如说美国人拍了很多战争片，大家都被这种战争片的二维形象诱惑，而不想究竟战争本身是什么，三维的、实际的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看色情片的人了，他们都是不说的，或者有点不好意思，就是美美地在看。他们在脑中说自己很惭愧，但是继续看，可是做爱是在三维空间中进行的。

杨春强：我觉得他们的解符码化类似分析，后结构主义也对公众进行自由联想，是否类似拉康对着公众的自由联想？

吉：你的后结构主义是哪些人？你说的让我更多地想起超现实主义，当精神分析还是德语的精神分析、还没传到法国之前就有超现实主义做了自由联想，一个人写一句之后另一个人再写一句，写诗或者写小说。他们借用的是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来做这种游戏。拉康也参与了这个运动，他尤其和达利关系很好，他们对精神分析引入法国比医生起的作用更大，他们起了一个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精神分析的作用。这个和美国不一样。我想到的是这个，至于后结构主义的游戏我不知道。但是你说到编码、解码的问题，拉康当时也谈过编码、解码和信息的问题，但拉康更强调的是传递什么信息的问题，而不是编码、解码的问题。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些艺术家、诗人的聚会，谈到了他们这个圈子和精神分析的关系，因为至少在成都给我的感觉是没什么关系。在《俄狄浦斯在中国》电影里可以看到一些片段，给人的感觉是诗人和艺术家与精神分析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在北京也没有关系。昨天有人问是不是在上海精神分析和文学圈子有关系，因为上海对西方比较开放。因为我不了解上海精神分析的情况，所以也没有办法回答。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相对当时法国精神分析的起源来说，艺术界和精神分析有种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超现实主义，对精神分析在法国的诞生、引入起了很直接的作用。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我听到编码这个词，在艺术的圈子里是不尊重编码的，

他们突破规则，想传递更多的信息。而精神分析当然也尊重编码，但是对信息更有兴趣。当然在自由联想中有些编码，但恰恰通过自由联想传递的是信息。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杨春强：可能我问的也不清楚，我还有个问题，以前讲到精神分析家或拉康有种悲观，这种悲观主义是不是因为看到主仆的辞说不能被分析的辞说取代而导致的悲观？

吉：我们不知道拉康是不是悲观主义，至少根据拉康的某些说法可以看到拉康对社会的态度，拉康曾说对社会来说精神分析是个确定性的症状，最终是宗教赢得社会，因为宗教不是个确定性的症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祈祷上帝能帮助他们赢得战争，伊斯兰教也在祈祷他们的上帝能赢得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这个战争在西方社会中是宗教的战争，大家都祈求上帝来赢得战争。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对社会不是个真正的威胁，而宗教恰恰是个真正的威胁。整个的战争都以上帝的名义来进行，不管是在美国这一方还是伊斯兰教这一方。一神教是排他性的，要么信我的教，要么就该消灭，中国没有这种一神教的传统，也许是中国人的运气。比如说现在新疆、西藏要闹独立，我也不想对中国做过多的评论，但是如果他们从中国独立出去总要依靠，依靠谁？依靠塔利班，那么还是一神教中，仍然有宗教的冲突、宗教的战争。因此中国政府也不希望他们独立出去，依靠塔利班。中国的宗教不是一神教也许就避免了宗教的冲突、宗教的战争。

精神分析本身并不希望解决社会的症状，马克思主义希望通过解决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导致的症状，就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宗教也要解决社会的问题。精神分析不是去解决社会的问题，而是每个个体的症状。在这个意义上说，比如说塔利班进来了，以一神教的名义统治了中国，也许他们就不会允许我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到中国来。到目前为止似乎共产党对我这个精神分析家来访问并不是太担心。最近我和霍大同讨论西藏的问题，整个西方人对西藏的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有种着迷，好像非常地同情和支撑，但是西方人忘记了藏传佛教的建立是通过摧毁当时

的本教、萨满教。萨满教和精神分析有种联系，而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建立是通过摧毁当时的本教。因此如果达赖喇嘛重新统治了西藏，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去西藏，当然我也不能确定现在能不能去。说了这么多，我也稍微有点悲观主义，我想说的是精神分析不是解决社会性的问题，解决的是独特性的问题，信息的传递是个个体性的问题。准确说一个个体登录在社会中总会有些问题，这些问题被称为精神疾病，不管在什么社会中都会有这个问题。精神的疾病意味着他在登录到社会的过程中遇到了个死胡同，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顺利的登录，由此出现问题。而社会怎么处理？社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更极端的是送到集中营，送到死亡中去。当然有一些地方，比如我参观的成都的精神病院让我觉得他们用很好的方法对待精神病患者。但是存在一些政府没有好的办法对待那些在登录到社会的过程中出现问题的人。

我补充一句，拉康说：“精神分析家仅仅管他自己和几个其他人”。但是经常精神分析家遇到的是和其他分析家的问题。Elizabeth Roudinesco写了有关精神分析在法国的百年历史的著作，书的名字是《精神分析百年战争》（*La bataille de cent ans.: 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不仅说的是精神分析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包括精神分析内部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拉康。拉康在精神分析学界有他的编码，有些分析家无法接受这种编码。比如IPA，根据它的编码拉康就被驱逐。所谓精神分析共同体作为社会组织有自己的编码，但是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实际上是独特性的工作，目的是让独特性的信息能够通过，这个地方是有矛盾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家之间的战争没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问：怎么理解“没有假装的辞说”？

答：如果存在一个没有假装的辞说，这个例子就是强奸，这是属于实在。另外一个例子是战争，我不知道西方目前是否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中战士就不是假装的，他们很清楚要把敌人杀掉，强奸敌人的女人，这个就不是假装的。这是我想到的，强奸、

暴力和战争，这是实在界的東西。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中国人去打仗也是这样，这是没有国籍的。比如说现在我就装出个男人，很有礼貌，但是不要忘记我也是个真正的男人，有可能我把霍大同杀了，强奸这些女人。（我把过程说反了，霍大同翻译的时候纠正了，我应该先杀霍大同才能强奸这些女人。）这就是实在界的，没有假装的。当然我对这些女人的建议是你们要找个真正的男人，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男人？这就是个问题。同样对男人来说要找个真正的女人，什么是真正的女人也是个问题。那么对于没有假装的、真正的真理，故事的结尾是很困难的。

如果我们在假装的层面上，我们实际上是安全的，如果没有假装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让我想起我的小女儿要写篇政治哲学的论文，题目是关于现代社会的战争，其中有一章是她在萨拉热窝采访法国的一个将军，他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将军。他就说这个事情很麻烦，因为虽然他是士兵，但他没有办法打仗，他只能是平息他们的冲突。但是塞尔维亚的士兵就要真地打，不得已的时候还是要向他们开枪。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士兵就要打仗，但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说不能打仗，他就成了个假装的军人，不是真正的男人。而冲突的双方是真正的男人，他们要打仗。他们的这个位置就很困难。另外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孩子总是玩战争游戏，假装在打仗，假装自己是士兵，假装杀人。在非洲、越南、希特勒那里，最终孩子是在真正打仗而不是假装。拉康实际上在这个讨论班说：“当然你们可以希望有个不是假装的辞说，但这仍然是希望，我们遇到的辞说都是假装的辞说。”这就是说，字、词并不是原子弹。

《精神分析研究》约稿

《精神分析研究》是由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硕士点（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方向）、社会学与心理学系主办，四川省哲学学会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四川省心理学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综合性学术读物。

本书海内外公开发行，凡是有关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均欢迎赐稿。本书所刊用文章均为作者之研究成果，文责自负，不代表编委会的观点。

来稿请提供电子 Word 文本。同时，请另附作者的联系地址、邮编、电话以及电子信箱等信息，以方便编委会与您联系。

本书编委会的主要联系人：谷建岭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

邮政编号：610064

联系电话：13730852099（谷建岭）

E-mail: plainy@163.com

来稿规范说明

1. 来稿应包括论文题目、内容提要（200 字左右）、关键词（3-5 个）、作者简介、正文等内容，字数一般控制在 5000-10000 字。
2. 正文中引用参考文献，一律用脚注。对正文的注释性文字说明，也一律用脚注。为了查考的需要，外文文献不译成中文。
3. 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分完全格式和简略格式两种。

4. 参考文献第一次出现时，应用完全格式。完全格式的构成：

著作：作者、著作名、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页。

J.Lacan,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53.

译作：作者、著作名、译者、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7页。

S.Freud, *Two Case Histories* (“Littles Hans” and The “Rat Man”), Trans. by Anna Freud, Assisted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 The Hogarth Press, 1955, p.100.

载于期刊的论文（译文参照译作格式在译文题目后加译者）：

霍大同：“无意识思维的两种形式——梦与汉字的比较研究”，《汉字文化》，2001年，第1期。

载于书籍的论文（译文参照译作格式在译文题目后加译者）：

霍大同：“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的——无意识的剖理”，载《精神分析研究》，霍大同主编，商务印书馆，2015年。

M.Guibal, “Un barbare en Chine, Brèves remarques sur la voix au pays de la Voie”, in *L’indifférence à la psychanalyse, Sagesse du lettré chinois, désir du psychanalyste, Rencontres avec François Jullien, Textes recueillis, présentés et publiés sous la direction de Laurent Cornaz et Thierry Marchaisse*, 2004.

5. 参考文献在文中第二次及其后出现时，可用简略格式。简略格式可采用如下二种：

第1种 只写作者、书（文）名、页码（文章无此项），这几项的写法同完全格式，如：

J. Lacan, *Écrits*, p.53.

M. Guibal, “Un barbare en Chine, Brèves remarques sur la voix au pays de la Voie” .

第2种 紧接同一条文献，中文只写“同上。”字样，西文只写“ibid.”字样。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6798-7



9 787100 167987 >

定价：58.00 元

封面图片：© 视觉中国